

當代中國叢書

Contemporary China Book Series

後街金融 中國的 私營企業主

著／Kellee S. Tsai 譯／何大明

編校／葉國豪 導讀／陶儀芬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SBN 978-957-732-273-9



9 789577 322739

Back-Alley Private Entre

雖然人們普遍地對於雨後春筍般興起的中國私營企業主感到驚訝，蔡欣怡卻是第一個深入研究私營企業主如何取得資金的學者。藉由深入的訪談與檔案式的研究，蔡欣怡的研究照亮了中國經濟的灰色地帶。

—— 美國《外交事務》季刊

本書對於專研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與學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國進行投資的私營企業主也應該參考這一本著作。蔡欣怡對於私營企業主如何利用非正規金融網絡的研究，為學術界和業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 美國《中國經濟評論》

《後街金融》是一本以豐富的田野資料為基礎，講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真正推手——私營企業主——是如何透過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非正規金融的支持，「由下而上創造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謹學術著作。蔡欣怡藉由將研究成果的理論意涵層次拉高，挑戰主流觀點，讓作品的學術成就超越區域。

—— 美國《中國經濟評論》

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Kellee S. Tsai (蔡欣怡) 著

何大明 譯

葉國豪 編校 陶儀芬 導讀

 远流圖書公司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合作出版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Copyright © 2002 by Cornell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7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 / 蔡欣怡著；何大明
譯。—初版。—台北市：巨流，2007（民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SBN 978-957-732-273-9（平裝）

1. 金融問題 - 中國 2. 金融市場 - 中國

561.92

96009434

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

原著：Back-Alley Banking -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原著者：Kellee S. Tsai（蔡欣怡）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何大明

封面設計：永真急制工作室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集英樓2樓

電話：（02）86613898

傳真：（02）86615465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2969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87-957-732-273-9

2007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獻給我的母親

社會生活的布朗運動（微粒的不規則運動）——源自穩定秩序中不穩定機會的出現——為可能形成大環境長期變化的影響提供了機會。這些影響，或促進或阻撓，成了出人意外的可能性的原因。大環境的本質可能像內容一樣發生變化。它們或重或輕地束縛著與大環境俱來的人們。

羅伯特·安吉爾（Roberto Unger）

《政治：中心主題》，1997年

出版緣起

30年來，中國與國際政經情勢變化劇烈。中國在後冷戰與全球分工結構重組的雙重趨勢之下，走向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全球化也啟動了兩岸的經貿和社會關係。這些鉅變，不但促使中國研究成為國際學界一個重要且發展快速的領域，也提供了研究兩岸關係一個嶄新的脈絡。台灣的中國研究，因而面臨了由傳統的「大陸研究」，轉向強調社會科學理論與實地田野調查為基礎的中國區域研究。有鑑於此，國立清華大學於2003年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同年，本校與中央研究院所合作，開辦了中國研究碩士學程；並且在教育部顧問室的補助下，成立「中國市場社會發展：現代性與後社會主義轉型資料中心」，收藏了質量俱佳的圖書資料。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是一個倡議中國研究典範更新的志業組合。本中心以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整合為宗旨，網羅國內外一流的中國專家，從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中培養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過去幾年，我們邀請國際知名的中國專家前來開設當代中國講座，並協助推動學術合作。本中心同仁也致力於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集體研究成果。目前我們以跨校與國際合作的方式，推動「全球化與中國市場社會形成」整合型研究計畫，並

以此爲契機，有系統地訓練研究生之田野調查能力。這些努力，使 CfCC 逐步提升在國際學界的能見度，成爲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

「當代中國講座」(Contemporary China Lecture Series) 以及「當代中國叢書」(Contemporary China Book Series) 這兩套書系的出版，乃是延伸並累積本中心在研究與教學上的成果。「當代中國講座」這個系列，以本中心開設之講座講稿爲基礎，經過講座教授之增色以及中心同仁之細心編輯而成。「當代中國叢書」則以邀稿或翻譯的方式，出版當代中國研究中之前沿研究議題。兩套書系涵蓋的重要議題包括：中國崛起以及共產黨政權性質的變遷；中國市場經濟之發展，究竟將與世界資本主義殊途同歸、或可能走出嶄新的發展模式；兩岸經濟社會網絡之發展，對於中台之間、乃至東亞區域之永續和平道路的展望。我們深切期待，這些專書的陸續出版，將提供國內外中國研究社群最優質的文本，落實典範更新的理念，並引燃學術界對中國研究關鍵議題的辯論。

序言

今天，在中國旅行的人都會看到一個迅速增長著的喧鬧的私營經濟。但他們看不到的是，這些私營企業是如何籌措到資金的。從1970年代末，數以千萬計的私營企業主在無法獲得正規的信貸來源的情況下，開創了他們新興的事業。他們如何取得這種不太可能達到的功績的過程，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並且對於我們如何思考發展中和轉型中經濟的經濟增長意義深遠。中國的企業主們等不及北京的官員去認可私營金融機構或為商業建立可靠的產權，就已經動員起基層的政治資源及社會資源來籌資興業了。

ix

這本書，就是探索這個隱晦不清、基本上仍是非法的非正規金融世界。它根據的是1994年至2001年間近兩年的實地調查。這項研究包括三個部分：（1）在福建、浙江和河南三省對小企業主進行初步的調查；（2）訪問政府官員、銀行經理、地方機關幹部和學者；以及（3）收集與金融業、私營企業和地方經濟狀況有關的資料。調查過程在1996年及1997年進行了18個月，特別具有挑戰性。當我帶著一摞由文字處理的問卷出入在各個城鎮和村莊時，私營企業主們懷疑竟會有人對他們不受規章制度束縛的經歷感興趣。

「是工商局派你來的嗎？」福建省安溪縣的街上小販疑心重重地問。

「不是，我只是爲一項研究計畫來收集資料。」

x 「那麼，我就不必一定要回答你的問題了，是吧？」

「如果你不太忙，您的回答會對我的研究大有幫助。」

店主瞥了一眼成卷的調查問卷，「你的這些表格是幹什麼用的？」

「我用它們來採訪私營企業主。」

「然後呢？」

受訪者的疑懼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的小企業主要花費非常大的力氣來對付國家的官吏。典型的一天裡，賣菜小販要與工商行政管理局、衛生局、公安局、地稅局的幹部們，還有其他官吏打交道，或者受其騷擾；這些人要對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從事私營經濟者）進行監管和徵稅。要想做生意，只擔心自己生意上的事情並不行，我所要求他們的只是時間，並不是現金或政治上的順從。

我在進行了374次調查和186次正式採訪後，就已經多次回答了自己的基本問題。私營企業主在缺乏常規的資本來源的情況下，已經發明了一套驚人的非正規金融機制，從不計利息的民間借貸、信貸互助會到更制度化的金融仲介公司，例如私人「錢莊」和信用社。這類金融機構多半有著極具創意的組織型態，以社區爲基礎，方便小企業主。它們大多數是被中國人民銀行所明令禁止的。這類非政府金融機構得以生存正暴露了當前中國的黨國體系在規範經濟中信貸供應上國家能力的根本侷限。雖說非正規金融機構爲促進私營經濟的發展扮演重要的

角色，有時在地方基層，它們也得靠妥協才能穩定下來。非正規金融業不僅對私營經濟至關重要，在政治上也很敏感，而在很多情況下，也具有濃重的個人色彩。因此，我應該向成百上千位私營企業主和資訊提供者表示最大的感謝，他們在附錄B和C中都被匿去了姓名。我盡力在規範化和方法論上以最小的曲解把他們的經歷和看法呈現出來。

我在調查、正式訪談以及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受益於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的曲鴻亮（1994, 1996-1997）、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的何大明（1996-1997）、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1994, 1996-97）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的工作人員的幫助。我的研究與寫作獲得下列資金來源的支持：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1993-1999）、福特基金會發展中世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研討班（1994-1995）、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ACLS）（1996-1997）、富爾布萊特—黑斯博士論文研究海外項目（1996-1997）以及哈佛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院（1997-1999）。我衷心感謝上述各方的慷慨資助。

xi

我在哈佛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院的兩年，為我寫作此書的初稿提供了激發靈感的环境。身為「庫金研究員」（KuKin Fellow），我從參加哈佛研究院各式各樣的研究會中無數珍貴的寫作建議，他們包括「比較與國際政治經濟工作坊」（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kshop），其成員有：阿爾貝特·阿列斯娜（Alberta Alesina）、彼得·黑爾（Peter Hall）、傑弗瑞·弗列丹（Jeffrey Friedan）、麗莎·馬丁（Lisa Martin）和史蒂夫·傅格爾（Steve Vogel）；「民主表現工作坊」（Performance of Democracies Workshop），其成員有：喬治·多明格茲（Jorge Dominguez）、格茲戈茲·艾克爾

特 (Grzegorz Ekiert)、羅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和史蒂夫·傅格爾 (Steven Vogel)；由麥勒·戈特曼 (Merle Goldman) 擔任召集人的「費正清中心東亞研討群組」(Fairbank Center East Asian Colloquium)；由傅高義 (Ezra Vogel) 組織的「中國商業專題早餐會」(China Business Project Breakfast)；以及由薩繆爾·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領導的哈佛研究院 (Harvard Academy) 本身。我衷心感謝這些研討會的組織者與參加者。

許多其他的人也對此書手稿的各章節提出了建設性的和關鍵性的評論。我感謝羅伯特·貝茨 (Robert Bates)、馬克·布里斯 (Mark Blyth)、大衛·布克哈特 (David Bookhart)、亞歷山大·庫利 (Alexander Cooley)、薩拉·佛利曼 (Sara Friedman)、大衛·康 (David Kang)、史蒂文·列博 (Steven Liebo)、何戴惠丹 (Hue-Tam Ho Tai)、洛瑞爾·金達爾 (Laurel Kendall)、戴慕珍 (Jean Oi)、詹姆斯·洛恩 (James Ron)、史蒂文·索尼克 (Steven Solnick)、布里吉特·威爾斯 (Bridget Welsh)、吳介民、李章，以及我在麻省劍橋的「輪流寫作評論讀書會」(rotating writing and reading association) 的成員 (1997-1998)——班傑明·里德 (Benjamin Read)、伊莉莎白·列米克 (Elizabeth Remick)、亞當·塞加爾 (Adam Segal)、艾瑞克·索恩 (Eric Thun) 和蔡莉莉等閱讀了我在修改中的著作。在哥倫比亞大學，白思鼎 (Thomas Bernstein)、孔邁隆 (Myron Cohen)、黎安友 (Andrew Nathan)、理查·尼爾森 (Richard Nelson) 以及麥德琳·策林 (Madeleine Zelin) 等教授也都提出了思想深刻的建議。我的導師黎安友和白思鼎教授尤為不懈耐心地悉心指導。

我還得益於同許多人的交談和通信，他們是路易士·奧古斯丁一珍（Louis Augustin-Jean）、理查·鮑姆（Richard Baum）、湯瑪斯·伯格（Thomas Berger）、約瑟夫·波思科（Joseph Bosco）、伊莎貝爾·克魯克（Isabel Crook）、米契爾·克魯克（Michael Crook）、崔致遠、理查·多納（Richard Doner）、杜小山、南茜·赫斯特（Nancy Hearst）、徐斯儉、熊景明、德韋什·卡帕（Devesh Kapur）、史蒂芬·麥克庫克（Stephen McGurk）、劉文璞、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ar）、米契爾·蒙特桑諾（Michael Montesano）、亞伯特·派克（Albert Park）、佛羅倫斯·帕托凡尼（Florence Padovani）、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陶儀芬、任長慶、賈伊·羅森賈德（Jay Rosengard）、湯尼·塞克（Tony Saich）、卡嘉·舍特（Kaja Sehr）、派翠西亞·索恩頓（Patricia Thornton）、傅高義（Ezra Vogel）、王小藝、安德魯·華森（Andrew Watson）和吳文太（Wing Thye Woo）。

本書寫作的最後階段，我在艾莫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1999-2000）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0-2001）的政治學系擔任助理教授。羅傑·海頓（Roger Haydon）在此期間對我幫助很大，他以優雅的幽默感為我提供了及時的反饋，還有希爾·蓋茲（Hill Gates）和一位匿名讀者提供了極好的評論。我還要感謝威廉·康諾利（William Connolly）的指導和羅拉·洛克（Laura Locker）在編制索引上的精心幫助。

《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惠允我使用發表在該刊 161 期（2000 年 3 月號）第 143 頁至第 170 頁上的拙著〈宴會金

融業：華南的性別與儲貸互助會》(Banquet Banking: Gender and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in South China)。

在我的親人之中，我為家庭忍讓我的工作習慣而深為感激。我感謝大衛·布克哈特 (Davis Bookhart)，是他在福州為我介紹了第一組研究助理，並照料了我的研究、寫作及修改全過程。我的妹妹林達使我在久離紐約後還能在那裡有個家。最後，我要感謝父母，特別是母親凱薩琳·蔡，她激發起我對本課題的興趣，對此項研究的價值從不放棄信心，並總是遠超過母親的慈愛以一切所能想像得到的方式來幫助我。她是一位真正偉大的女性。

蔡欣怡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一個清楚而有力的眼光」 ——由下而上看中國的顛覆性視角¹

陶儀芬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在諾貝爾獎的官方網站上，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與他一手建立的格萊敏銀行（Grameen Bank）的名字下方，放著這樣一句簡短的得獎理由說明：「為表揚他們為由下而上創造經濟與社會發展所做的奉獻」（for their efforts to cre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below）。² 1976年，這位不算富裕的經濟學教授自掏腰包以大約27美元創立了格萊敏銀行，專門提供窮到無法拿出任何抵押品也沒有信用紀錄的窮苦農民一般商業銀行所不願提供的合理利率小額貸款，30年來這樣的「小額信貸」（microfinance）不但幫助了超過六百萬個孟加拉貧困家庭，也因為打擊貧困的效果顯著被推廣到全世界各個角落。

格萊敏銀行究竟用什麼「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去克服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s），做到一般商業銀行做不

¹ 「一個清楚而有力的眼光」借自側寫越戰紀念碑設計者，著名華裔美籍建築師Maya Lin的紀錄片片名*A Clear and Powerful Vision*。同樣是華裔女性，蔡欣怡這本著作，為我們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故事的理解，提供了一個由下而上的全新視角，充滿倒過來看的顛覆性力量，與越戰紀念碑的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

²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6/index.html

到的貧戶無擔保貸款呢？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凡是跟過會的婆婆媽媽都知道的「人情」，或我們現在社會科學流行的行話「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一個交往密切、關係複雜的社會網絡中，信用是靠信用破產後將面對的人情壓力（或社會資本的流失）來維繫。反之，在一個匿名性很高的原子化市場，信用則需要靠以暴力（合法的國家暴力或非法的討債公司）為基礎的有形契約來維繫。孟加拉的格萊敏銀行、婆婆媽媽經常參與的標會，或台灣中小企業間以「扣趴數」延展貨款支付期限的變相流動資金借貸都是一種以非正式社會制度所支持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小額信貸」。

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社會巨輪

「後街金融」便是一本以豐富的田野資料為基礎，講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真正推手——私營企業主——是如何透過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非正規金融的支持「由下而上創造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謹學術著作。政治經濟學者出身的作者蔡欣怡以人類學者的熱情，在1994年到2001年間，前後多次加起來進行了將近兩年的田野調查，從閩南、溫州到開封，大江南北一共做了374份問卷與186個正式的深入訪談，將既無資本亦無政治背景的小作坊業主、菜販、養鴨戶等各式各樣私營企業主如何透過如標會、典當、地下錢莊等非正式金融集資創業、周轉、擴張，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故事記錄下來。這些在其他國家民間社會普遍存在的「小額信貸」乍看雖無特別之處，但放在一個仍然標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禁止私人銀行、打壓

民間金融的一黨專政體制下，就別具政治意涵。尤其當我們注意到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壟斷了所有國有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僅創造了中國30%的產值，而從國有銀行貸不到款的其他所有非國有企業卻貢獻了另外70%的產值，我們就可以看出非正規金融的重要性，也為它們在實務上與理論上的不受重視感到不解與不平。如同本書作者在第一章「非正式制度的力量」中提到，非正規金融「就像轉型期經濟之輪中無聲無息、無影無蹤的潤滑油，運轉中缺它不行，但又無人真想關注它」。³

本書對中國研究的貢獻不僅在它針對中國私營企業主如何集資的灰色世界提供了一個廣泛而深入的第一手田野調查，它與政治經濟學一般性理論對話的企圖可能更值得推崇：作者藉由將研究成果的理論意涵層次拉高，挑戰主流觀點，讓作品的學術成就超越區域研究的範疇，受到中國研究社群之外學術圈的廣泛重視。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席捲全球的衝擊，198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經濟學研究，普遍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等人的主張，認為財產權明確而有效的定義與保障是在微觀層面最能降低交易成本，宏觀層面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前提，而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憲政主義精神則是這個制度維繫的最重要長期因素。⁴ 如果諾斯的理論成立，那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私有財產權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之下，維持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成長的事實呢？難道「中國奇蹟」否證了諾斯的理論嗎？

³ 參見本書第一章，頁3。

⁴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由下而上視角的顛覆性力量

蔡欣怡並不認為「中國奇蹟」否證了諾斯的理論。她認為中國當下的正式法律制度對財產權沒有明確的保障是一個事實，但在這個現實背景之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私營企業主會主動去創造各種非正式制度，以迴避或創意性詮釋正式法律制度的方式，設計彼此能夠同意的產權或契約安排，創造有利於交易活動順暢進行的非正式契約關係。這樣的制度安排有時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認可；有時卻在完全規避國家法規的情況下存在；有時則遊走於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這些林林總總的地方差異構成了本書的豐富內容，一方面呈現了一心追求財富的私營企業主充沛的生命力與靈活創意，另一方面也見證了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力量如何默默地帶動地方國家制度變遷的軌跡。

這個從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眼光看來似乎是特例的田野發現，可能正反映了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庶民生活的共同經驗。這樣的共同經驗在現有的比較政治學領域中卻很少有系統性的研究，蔡欣怡藉由這個研究提出了一個由下而上的全新視角，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對比較政治理論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一、挑戰經濟學新制度論「法治」為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的主流觀點

以諾斯為首的經濟學新制度論學者主張，明確而有效的產權界定是市場經濟帶來經濟繁榮的制度基礎，因為明確而有效的產權界定在微觀層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與投資的不確定性，

增加企業投資生產的意願，進而在宏觀層次促進經濟發展。明確而有效的產權界定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以其合法壟斷的暴力做為產權制度的後盾，但強大到足以支撐產權制度的國家當然也有足夠的力量成為破壞產權制度的掠奪者。要如何讓私營企業主相信強大到可以保護其財產的國家不會掠奪她的財產呢？新制度論經濟學者認為，統治者的口頭保證是不足以讓企業主放心的，唯有一套有內生強制力（self-enforcing）的政治制度，本身就已經蘊含了有限政府依法行使政治權力的「法治」精神，例如英國的憲政主義代議民主，或是美國的聯邦主義分權制衡，才能在政治制度上對國家不會隨意侵犯私有財產權提供「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這是英國自18世紀得以逐漸超越西班牙成為新的強權，而美國可以在19世紀下半眾多後進工業國家中脫穎而出，成為20世紀世界超強的政治經濟制度基礎。⁵

這種對大歷史長期發展所提出的解釋當然有它在實證層次與規範層次深刻而重大的意義，但對於19世紀末才因為殖民地擴張而被整合到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廣大晚開發地區來說，這樣的理想境界似乎有些遙不可及。在這些地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人，所面對的共同情境是，一個已經高度階層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一個因殖民主義或反殖民主義而生的政治權力任意性很強的國家，以及一個利益與價值差異性很大而幾乎沒有

⁵ 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LIX, No. 4 (December 1989): 803-832;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Historical Economics*, No. 149 (1993): 11-23.

自我組織力量的社會。這樣的情境之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私營企業主要如何降低自身經營的交易成本、減少投資的經濟與政治風險，在已經高度階層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找到生存利基呢？很可能不是正面去限制權力任意性很強的國家，追求「法治」的正式制度基礎，而是運用或規避國家的權力任意性，創造可以保障自有產權的特殊條件，這種透過賄賂、共謀、或游走所做的特殊主義的安排（particularistic arrangements），長期來說，可能與普遍主義的「法治」精神發展是相矛盾的。

這種私營企業主所面對的發展情境，對生長在企業家精神與特殊主義文化極致發展的台灣的一般讀者來說並不陌生，而本書所提供的轉型期中國私營企業主的發展經驗也是在這樣一個情境中去與國家逐步協商出可以暫時保障私有產權的特殊條件。事實上，這種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在許多其他有關華商在東南亞國家的特殊經濟地位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很值得台灣的相關研究者在理論與實務上做更進一步的探索。⁶

二、對東亞「發展型國家」論述提出反例

雖然本書所提供的轉型期中國私營企業主如何在經濟學新制度論者所言的產權制度基礎都幾乎不存在的情境之下，運用非正式制度安排追求財富的豐富素材，相當程度地挑戰了當前新自由主義思潮主張自由化、私有化與民主化是開發中國家追

⁶ Jomo, K. S., "A Specific Idiom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o-Malaysi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Face of State Hostility," in Daniel Chirot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求現代化的改革方向，但同樣的素材也挑戰了長期與新自由主義站在對立面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觀點。

有關「發展型國家」此一概念內涵的討論汗牛充棟，但其最根本的核心理念，應該是要強調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管制 (regulation) 對晚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其正面價值。近年，由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吸收了大量東亞各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地整合進入區域的國際分工生產網絡之中，這些地區製造業出口所帶動的快速經濟成長似乎複製了很多早期南韓、台灣等國家的工業化制度安排，所以漸漸有學者開始從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開發區政策、基礎建設提供、國家對社會的有效鎮壓能力等面向去探討早期研究東亞發展經驗的「發展型國家」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近年的發展經驗。然而，有別於發展型國家論者的國家中心觀點，本書作者從私營企業主的角度出發，由下而上所看到的國家面貌，無論中央或地方，至少在「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以前，並不是這麼積極正面的。⁷ 國家管制在大部分的時候並沒有「治理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⁸ 也沒有「選擇贏家」(picking the winners)，⁹ 反而是一種「打壓市場」、「幫助輸家」(國有

⁷ 事實上，本書作者在稍後的作品也針對「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在轉型期中國的適用性提出比較保留的看法，見 Kellee S. Tsai and Sarah Cook, "Developmental Dilemmas in China: Socialist Transition and Late Liberalization," in Saadia M. Pekkanen and Kellee, S. Tsai, eds., *Japan and China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⁸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⁹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企業)的角色，私營企業主只能利用國家管制執行不力的空隙，規避國家管制或與地方政府共謀重新詮釋國家管制。

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轉型期中國私營企業主之所以可以在不友善的國家管制條件下成長茁壯，成為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真正的推手，正是因為轉型期中國國家執行政策的效能出現鞭長莫及的情況。如果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政策上有發展型國家論者所崇尚的高度自主性（autonomy）與能力（capacity），那私營企業主各式富有創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可能就沒有這麼大的發揮空間了。

三、重構制度變遷的起源

本書強調轉型期中國一股正在興起的社會力量——私營企業主——如何運用非正式制度創造有利生存發展的條件，也刺激作者與讀者共同重新思考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關係，並為重構正式制度變遷的起源留下了伏筆。具體而言，像中國私營企業主這種有政治行動潛能的社會力量，面對正式制度的壓迫時，「動員—反抗—正式制度變遷」未必是唯一的選擇，在正式制度本身具有高度彈性時，「創造非正式制度—普遍化—正式制度變遷」或許是更能保障行動者實質利益的行動選項。

事實上，作者從本書研究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對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關係的體會，恰巧與近年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有關正式制度變遷的起源的一些理論發展不謀而合。因此，她在即將出版的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著作中，將以歷史制

度主義最新發展的理論為基礎，提出“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的概念，以解釋中國大陸廣大而價值分歧的私營企業主如何在個別領域運用非正式制度來謀求個別利益，又如何漸漸地在總體層次經過「制度層疊與轉換」（institutional layering and conversion）的過程，達到正式制度的變遷，促進其實質利益的斬獲，例如十六大以來有關私有產權保障的相關立法與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的改變都是具體例證。¹⁰

無論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或是傳統現代化理論的假設，都讓外界對中國有這樣一個期待：快速的經濟發展將孕育出一批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資本家，而這些資本家將成為要求中國民主化的主要社會力量。但作者發現，當我們注意到正式制度提供給行動者的不僅是限制、也是機會，而正式制度的高度彈性有助於非正式制度的創意詮釋，逐漸在現實脈絡中讓正式制度的實質內涵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時，正式制度的變遷未必要透過爭取擴大政治參與的大規模政治動員——也就是民主化——來完成。當越來越多研究中國政治的作品，從精英政治互動的制度化來討論中共政權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¹¹ 蔡欣怡的研究正好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一個重要切面——國家與私營企業主的關係——來說明，中共政權對社會要求的「回應能力」（responsiveness）可能更是我們探

¹⁰ Kellee S.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¹¹ 從比較政治理論觀點來探討中國近年精英政治制度化與政權穩定關係的作品，見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6-17；寇健文，《中共精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五南，2005年。

討其威權體制似乎越來越穩固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常被引用「沒有資產階級，沒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的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這句話原本就遭到了曲解。摩爾從來也沒有主張隨著現代資本主義擴張而逐漸茁壯的資產階級本身必定信仰民主價值，會爲了這個信仰而行動，只是認爲較早出現大量資產階級的英國，相較於歐陸，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經濟資源多元而分散的分配，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¹² 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國私營企業主與各種社會群體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蓬勃發展，對中國民主化的長期發展，還是有一定正面意義的。但如同稍早在討論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時提到，由於晚開發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情境，在東亞的資本家身上，尤其是華商，我們所看到的是透過對政治權力的賄賂、共謀或走避等特殊主義行徑來創造自身經濟利益極大化的環境，這種行爲模式似乎與強調普遍主義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是否會成爲這些地區民主政治發展的障礙，則待關心此一議題者更進一步的研究。

父母皆來自台灣的蔡欣怡，在本書發展的初期，曾經在一個私下閒聊的機會告訴我，她之所以想研究中國私營企業主如何靠社會網絡進行融資借貸來做生意，與她從小觀察她母親運用台灣人在美國的新移民社會網絡來集資經營事業有很大的關係，或許這是爲什麼台灣的讀者會在這本著作中，從轉型期中國私營企業主身上看到台灣小商人的影子的原因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本所有想在台灣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中國研究的人都應該看的書。

¹² Barrington Moore,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1966).

目次

序言	ix
「一個清楚而有力的眼光」	
——由下而上看中國的顛覆性視角／陶儀芬	xv
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001
第二章 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政治經濟學	031
第三章 福建省金融業的性別世界	075
第四章 溫州的金融創新與管制	147
第五章 河南省有創意的資本家	203
第六章 比較脈絡下的場外市場	261
第七章 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	303
附錄A 研究方法論	329
附錄B 1994年至2001年非問卷調查的田野訪問名單	345
附錄C 1996年至1997年問卷調查名單	355
附錄D 行業類型的編碼	367
附錄E 信貸互助會的比較綜述	368
表6.1及附錄E中的資料來源	374
索引	381

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我們必須嚴厲打擊金融領域內一切非法的和違反規章的行為。我們必須保證金融法規得到徹底的貫徹執行。我們必須強調禁止銀行高息集儲、社會非法集資和任意的金融活動。¹

——《人民日報》，1999年2月1日

1990年代末，正當金融風暴席捲亞洲，北京淡泊地宣布中國將不貶值它的貨幣。它將以國際經濟社會中一個負責任的成員行事，抵禦風暴的侵襲。確實如此，人民幣維持了它的幣值；宏觀經濟指數顯示，相對而言，中國經濟未受東亞金融危機的傷害。

然而，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間，中國金融百病叢生的症狀事實上正在其國內各地持續累積。一個大量的地下非正式金融仲介公司，緊隨著經濟的自由化而湧現出來。此外，官方取締非法金融活動及機構的努力，已經產生了引發公眾不滿的不良效應。¹請看下列事件：

¹ 199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正式的「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活動的規定」，（以重複多次的陳詞濫調）重申非法金融機構應被禁止。見〈禁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經營活動的措施〉，《新華通訊社》，1998年7月22日，見FBIS-CHI-98-209。

- 1998年11月，河南省鄭州市：因一家投資公司垮台而喪失了儲蓄的兩千多人在省會遊行抗議。
- 2 • 1999年8月，湖南省長沙市郊區：有五千農民參加的約50次遊行示威，抗議政府關閉農村信貸儲蓄基金會的二千家分支機構。
- 1999年11月，重慶：在一家地方投資公司倒閉後，三百人舉著毛主席的大幅畫像遊行抗議倒閉背後牽扯到的貪腐問題。

僅提及幾個這樣的地方危機，就暴露出當代中國非正式金融機構那不穩定的、黑暗的一面。正是這一面，使得北京的保守派擔心頭20年經濟改革的步伐太快，使得黨國感到失控。私人金融交易能夠破壞國家控制通貨膨脹的努力，助長投機性的資本投資活動，而且最可怕的是，它會危及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同時，非正式金融機構顯然也在經濟中扮演了建設性的作用。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以來，私營經濟一直很清楚地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三千多萬家私營企業在此後的20年間創辦起來，但官方的國有銀行主要是貸款給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而不是私營企業。直到2000年末之時，整個國家銀行體系貸給私營經濟的資金不足1%。² 私營企業主也把自己被正規信貸來源拒之門外視為理所當然。

當我調查私營企業主時，「你曾經從銀行借過錢嗎？」這個典型的問題總是能引出生動熱烈的回應來，如果不把這些回答視為自貶的話。例如：

² 從《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表19.3中計算得出。

「你瘋了嗎？私人企業主是不可能從銀行借到錢的！」

「我不識字，也沒有抵押品，甚至連城市戶口也沒有，就是你會借錢給我嗎？」

一位飯店老闆當著我的面大笑起來，說了一句最令人可笑的話：「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活過來，叫銀行貸給我款，他們也不會幹的！」

這些回答產生了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在得不到國家主導的銀行體系貸款的情況下，國民經濟中整個私營部分是怎樣才能發展和繁榮起來的？如果銀行不貸給私營企業主，那麼中國的「經濟奇蹟」是怎樣籌措到資金的呢？

答案很簡單：是非正規，而且經常是非法的金融業所提供。私營企業主依靠的是非正規金融活動的百花齊放。這些活動包括，從臨時的民間借貸和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的行業信用到更加制度化的機制，例如信貸互助會、基層信用社，甚至是提供全方位服務但卻是未被認可的私營銀行。從經濟層面瞭解改革開放時代的私營金融業，為私營企業主服務的光怪陸離的各色非正規金融機構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大書特書。的確，對中國政治經濟學中這樣一個核心部分進行研究是極其必須的。西方學者強調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更突出的面向，而且中國的公開出版物幾乎不承認非正規金融業。它就像是轉型經濟之輪中無聲無息、無影無蹤的潤滑油——對運行不可或缺，但又無人真正地關注它。然而，在顯示出私營經濟增長的國家銀行及國家統計局那不穩定的損益表背後，人們每一天都在合法行為的邊緣處打擦邊球。成千上萬的人靠乞求、借款和偷竊來創辦新的事業、新的生活以及對政權的新的挑戰。根據我在1994年

至2001年間23個月的田野調查，這本書披露出精巧偽裝下的非正規金融世界是怎樣自1970年代末以來為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的

本書也展示了非正規金融業的動態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更廣義地說，還有我們思考經濟與制度發展的方式。非正規金融業是在一個缺乏完善的產權制度的條件下，鑲嵌於一個更大的未曾被講述過的私營經濟增長的故事中。中國的私營老闆不僅被國有銀行拒之門外，而且其經濟交易也僅能得到法律的微弱保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私人金融交易在法律意義上來說是非法的。這些運作現實向經濟增長必須有必要條件的常規觀念提出了挑戰。例如，受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影響深遠的產權傳統的經濟學家們，可能會不明白為何還會有人想參與中國的轉型期經濟。³ 學者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產生的繁榮奠基於一個清楚界定的法律制度，以此來規範資產的所有權、使用和移轉。根據這種觀點，在持續執行此制度時，產權就會減少市場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並提供經濟行動者促使效率最大化的資訊和動機。⁴ 因此，有人解釋第三世界的持續不發達是由於

³ James M. Buchanan, *Property as a Guarantor of Libert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3); Harold Demsetz,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2 (1967): 347-59; 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4 (1989): 803-32;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⁴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它缺乏正規的產權。例如，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就說，如果允許窮人合法地積累、展露和交易他們的非正規財富，他們就會更為富有。⁵ 然而，在中國，私營經濟活動卻已經得到巨大的擴張。金融企業主、私營企業和逐漸產生市場區隔的消費者正在用正規或非正規的方式積累、展露和交易他們的資產。儘管私人產權模糊不清，上述現象卻依然正在發生；這對資本主義增長的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

產權的觀點不能提供中國的轉型經濟完整的洞見，因為其經濟理性的假設過分簡化了現實生活互動中政治與社會的脈絡。本書並不關注缺乏明晰的產權，而是解釋中國某些地區在明顯的不確定和風險的環境下，私營經濟如何以及為何能繁榮興旺。我並非不考慮完善產權的效用；然而，我確實建議其因果關係的邏輯應重新被界定並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⁶ 在所謂中國產權不清的前提之下，政治及經濟行動者一直能夠就各種資產的使用和控制問題發明出相互可以理解的協議來。⁷ 有

386-405; Coase,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1960): 1-44;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⁵ 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ies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Cf.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⁶ 以此觀點從事研究的著作可見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f. Hu Xiaobo, *Problem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Models*, *East Asian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6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⁷ David D. Li,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 時，這些協議是清晰詳細地訂了契約，因而具有法律約束力，如同出讓30年土地使用權的租借權的例子一樣。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經濟協議是地方官員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最普通的例子就是對當地集體企業實行優惠的稅賦待遇。而且在非正規金融業的多種形式中，制度上的各種安排也反映了未必去尋求其活動有法律效力的一般人所自我實施的創新，因為它們一開始就不合法。最後，在具有理想狀態產權的國家與法治不健全的窮國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灰色區域，東亞和東南亞的成長大多數屬於這種類型。非正規金融業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然而又典型地被忽略的那一部分。

爲了詳細說明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實際運作，本書圍繞著三個主要的問題建構：（1）**儘管其非法卻活躍的非正規金融業的普及程度**：既然中央政府禁止私營金融機構，企業主們如何能設法創造替代國有銀行的民間銀行？（2）**非正規金融業的地方差異性**：既然全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們都面臨著正規銀行在信貸上的結構條件限制，爲什麼有些地方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非正規金融仲介，而其他地方卻幾乎是塊空白？（3）**私營企業主使用非正規金融業的差別性**：爲什麼具有相似的資本限制因素的企業主，又在同一個地區經營，卻採用著差異極大的融資策略？下面幾章將爲這些問題提供豐富的實證答案，但這些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 (1996): 1-19; Victor Nee and Sijin Su, "Local Corporatism and Informal Privatization in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in Thomas Lyons and Victor Nee, ed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Er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1994); Martin Weitzman and Chenggang Xu,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1994): 121-45.

問題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分析意義。

首先，國家的正式規章與非正規金融業的普遍流行之間的背離就表明，即使是在威權主義的治理之下，中國的國家金融能力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強大。儘管有被殺頭的危險，非正規金融業仍然興旺發達，官方資金正在從國家銀行體系中流失出來。

第二，私營金融業在各地的差異性挑戰了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類似的宏觀經濟限制條件會產生類似的解決辦法。即使私營經濟做為一個整體都難於獲得正規金融體系的貸款，各地非正規金融業的實際運作差異卻很大。不僅沒有出現機制上的同型性，制度上的多樣性反而很顯著。⁸ 有些地方的非正規金融機構種類很有限，而別的地方則有著形形色色的私營信貸設施。我把這種差異歸結為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進而，還有它們對私營金融仲介時常不得不搞的制度上的獨特偽裝的容忍程度。

第三，企業主們對金融活動選擇上的差異，源自於制度上選擇的微觀邏輯以及基層的市場割據。在同一個地區，經營同樣規模的兩位私企老闆，因為他們依靠的是不同的社會網絡和政治資源，可能就會使用完全不同類型的非正規金融業。雖然非正規金融業的某些形式主要依賴於經濟上的選取標準和實施

6

⁸ 組織結構理論的一個分枝認為，由於競爭的和要適應現狀的壓力之故，機構都會變得相互相似。見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H. Hamilto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East Asia,"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61-62。同樣的論點可見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April 1983): 147-60。

的機制（例如，生意經營狀況、抵押物的使用以及利率），大多數的非正規信貸機構也涉及社會壓力、信譽和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信任等綜合因素。換句話說，企業主們的非經濟特徵在非正規金融世界中非常重要。

本書在探索這三個問題時，顯示出微觀層面上非正規的相互作用也會產生宏觀層面上的後果——而且，與之相關的是，本書也思考為什麼國家一直反覆地企圖消滅在實際中對經濟至關重要的這種東西。制度上的發展不僅是一個從上而下控制嚴密的過程，熟練的複製著中央的官僚訓令。基層的政治及經濟現實扭曲了國家政策的實施。⁹ 人們認定的金融交易的市場邏輯，實際上是受到一種政治及社會的邏輯所影響。私營金融業的創建與使用不純粹是由市場驅動的，甚至它們在國家的範圍之外發生時也是如此。

非正規金融業的政治成果

本書的核心問題，在於探討在一個政治上和金融上受壓制的環境中制度建立的悖論。當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私營金融機構之時，企業主們如何能創建出替代國家銀行的非官方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是個威權主義的共產黨專制國家，它不僅在韋伯觀點的意義上壟斷了權力的合法使用，還壟斷了經濟中資本

⁹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1, 2 (1999): 167-86.

的合法分配。在毛的時代，公有制和資本分配是與強大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理由聯在一起。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消亡之前，它要外禦「帝國主義侵略者」，內肅「資產階級」。現在，雖然意識形態的任務已經逐漸消失，但它對於維持宏觀經濟的（因而還有政治的）穩定的關切，使它對金融的控制毫不放鬆。一黨專制下的國家仍然控制著金融體系，並且時時仍以意識形態的陳腔濫調來證明這種控制的合理性。然而，被共產主義革命有組織按計畫消滅的金融資本家——或是在國內受迫害，或是被驅趕到香港、台灣、東南亞的境外——又捲土重來。在40年的中斷之後，後街的高利貸者、當舖老闆和職業的金融家又重操舊業；而且，湧現出來的新手正在提供創造性的新式金融服務。這一切是怎樣可能的呢？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非正規金融業的湧現是市場機制的自然產物。只要官方的信貸供應滿足不了市場對信貸的實際需要，供需關係的基本法則就會要求替代的金融來源出現。由於官方的國家銀行在體制上就傾向於將優惠貸款貸給國有企業，自然不能滿足私營經濟的金融需求。因此，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於發現由利益驅動的企業主起而開發這個結構上現成的市場，就不足為怪了。正如一位變成高利貸者的前工廠經理所說：「國有的工廠並不真的需要我，但是當地的企業主們需要我。從事借錢生意能更好地發揮我的才能、時間——還有金錢。」非正規金融業，或是經濟學家所稱的「場外市場」（curb market），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在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由於信貸紀錄、性別、種族和法律地位等原因，也存在著相當多的場外市場活動，以便為那些被排除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人們服務。這種經濟上的解釋乍聽起來頗有道理，其理

論上的簡潔有助於解釋中國改革時代非正規金融業的存在。然而，仍然不清楚的是，場外市場的操作者們是如何能在一黨專制下國家（黨國）的睽睽注目下繁盛起來？換句話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睿智的後輩門生能很好地說明在經濟活動中對額外金融業需求的原因，但其決定論的邏輯卻未能解釋普通的經濟活動者們提供私營金融的能力。為何國家無法摧毀中國繁榮的非正規金融市場？

- 政治是自由市場經濟範式中所缺少的最大一塊困惑。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事實上並不自由，世界上其他大多數的地方也是如此。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以及其他許多的學者都已經觀察到這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那就是最自由化的經濟需要一個規章制度嚴謹的國家的廣泛干預。¹⁰ 美國和英國代表了這種現象的原型的歷史例證。一個自由化的金融體系，需要國家這隻高度可見的手來掌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維護著一個競爭的市場環境，並做為契約交易的最終第三方強制實施者，通過產權受到侵犯時實施懲罰性的追索權，來保證旨在獲利的交易的可靠性。中國的黨國體制尚不足以為私營金融機構敞開合法的大門，也不允許在金融領域開展有規章制度制約的競爭——而且，我認為，人們不應該認定它最終必然會向英美有規章制度約束的自由國家的模式匯合。¹¹

¹⁰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Cf. Steven K. Vogel,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¹ 雖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包括了在五年過渡期的條件下，允許外國銀行自由在華經營，但利率自由化的程度和國內銀行相對自主地經營外匯業務等事仍有待發展。

儘管如此，在改革的過程中，黨國已經建立了日益專業化的機關來管理金融機構。與經濟的自由化及貨幣化相伴隨的是，國家加緊了對其認可的金融仲介機構的標準化管理，商業化其借貸的程序，改革或關閉不順從的經營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時代可以被描述為建立規章制度化國家的時期，它意味著限制了非正規金融交易的空間，正朝著一個更加法人制度化的和政治中立化的商業金融體系邁進。¹²

然而，政治的現實使得管制型國家這個理論上的理念型更為複雜。特別是，即使銀行體系已經經歷了商業化的改革，國有銀行仍然繼續向中央認定要優先發展的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實施「政策性貸款」。與商業性貸款相較，政策性貸款並不是按其是否值得貸、而是基於政治考量的基礎上來實施的。當問及國有銀行貸款業務中大量的政策性貸款時，經理們本能地答道：「支持支柱產業是我們的愛國主義職責」，然而，當進一步問及什麼是「支柱產業」時，大多數信貸官員會承認，當局向銀行施壓，要他們資助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企業。由於這些干涉性的政策以迅速增長的速度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些政治學家把中國引證為東亞成功的發展型國家的又一典範，與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為伍。¹³

¹² 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是，經濟相互作用的新形式激發了國家的管制性干預。Victor Nee,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China,"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f. Vivienne Shue, "State Sprawl: The Regulatory State and Social Life in a Small Chinese City," in D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Urban Spaces and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發展型國家的基本概念意味著，北京（「國家」）的威權主義中心已經顯示了與「社會」的相對自治。對中國而言，社會可以被廣義地解釋為，除了中央國家的領導層與官僚系統的最核心部分之外，所有各階層的利益集團。¹⁴可以有爭議地包括一系列實際上接受官方認可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例如群眾社團、社會組織以及甚至地方政府的部分機關。¹⁵根據國家中心論的觀點，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自主性主要表現在其制訂促進以

¹³ 可參考 Gordon White, ed.,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Cf. Marc Blecher, "Developmental State, Entrepreneurial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Reform in Xinju Municipality and Guanghan County," in Gordon White,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and Ming Xia, *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Brookfield, Vt.: Ashgate, 2000).

¹⁴ 在這個脈絡中，「社會」指的是背離相對自治的國家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不僅是包括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團體、進程及運動的公民社會。要想詳細瞭解區分公民社會與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觀點的辯論，見專題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1993.

¹⁵ 這是國家統合主義體系 (state corporatist systems) 的典型。就其對中國的運用，見 Yijiang Ding, "Corporat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n Overview of the Debate in Recent Years," *China Information* 12, 4 (1998): 44-67;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Corporatism in China A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in Barrett McCormick and Jonathan Unger, eds., *China after Socialism: In the Footsteps of Eastern Europe or East Asi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6), 95-126; Kenneth W. Foster, "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5, 4 (2001);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Migdal, Kohli, and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65-88; and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1996)。「社會團體」(social organizations)，見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1 (March 2000): 124-41.

國民經濟為中心的利益，而不僅是某一重要地區或某一利益集團利益的發展政策的能力。¹⁶ 在發展型國家產業政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即是信貸的分配傾向於由國家所定義的策略經濟部門，而不是受到最多遊說的那些部分。¹⁷ 正如亞歷山大·吉爾森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極力主張的，在後進工業化國家中，國家可能需要通過做出有潛在風險的投資來扮演金融企業主的角色，而這些風險投資是一般的經濟行動者因缺乏資源或膽識而避免的。¹⁸ 因此，德國在19世紀末期發展出了一套眾所周知的銀行體系以資助重工業化；日本在明治時期創辦了銀行來發展軍工產業的複合體。¹⁹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國同樣也建立了或重建了特定的產業銀行，以試圖追趕上更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從這個觀點來看，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更像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型國家。²⁰

10

¹⁶ 此觀點現今的經典闡釋，可參見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37.

¹⁷ 從 Chalmers Johnson 的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後出現了大量的文獻。對發展型國家的研究議程周全的評估，可參考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⁸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¹⁹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關於金融調節的其他模式的討論，見 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3).

²⁰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94).

國家中心論的比較觀點，有助於解釋在中國轉型經濟中黨國的管制以及發展型的角色。特別是，它們加強了國家在正規金融體系中的統轄地位——朝著填補新古典主義框架留下的政治鴻溝的方向更近了一步。但最初的問題仍未得到回答。中國的黨國看起來擁有外在於社會的足夠自主性來重塑金融體系。

²¹ 然而，絕大多數的私營金融機構卻存在於官方許可的經濟活動的範圍之外。私營企業主正在違反官方法律規章去為自己的經營籌款。他們躲避國家法律的規範，創造性地從事著金融業務。

而且，這些企業主在各地不同的官僚機關背後從事金融業務的現象，導致了本書的第二個問題：在全國各地，非正規金融業的規模與範圍為何存在巨大的差異性？有些地區的私營金融機構千奇百怪，相互競爭，甚至和一些正規的金融機構競爭。相較之下，其他地區可以說幾乎沒有私營金融機構。經濟學家們又會推測，非正規金融業在私營經濟占經濟中主要成分的地區繁榮興盛，而私營經濟較少的地方就不會有太大的場外市場，因為其對信貸的需求會相應地有限。但是，事實卻是：有著類似的經濟結構，因此推測起來，對私營金融的需求應有類似水準的地方，在場外市場活動上卻顯示出巨大的差異。

國家中心論的框架的一個更細微的應用，可能會質疑國家金融能力在各地的一致性。如果企業主們正以不同的程度規避

²¹ Kaja Sehrt, "Banks versus Budgets: Credit Allo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4-199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黃亞生對此的主要看法是，認為中央保留著對地方的相當大的權威，證據是貫徹穩定宏觀經濟的措施並不一定符合增長最快省份的利益。Yasheng Huang, *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金融規範，那麼，或許處在北京的、規章日益嚴謹的國家，在全國各地並不實施一致的金融權威。²²事實上，「國家」並非如同人們在「發展型國家」中所期望的那樣，以系統的方式給私營企業分配貸款。雖然中國中央集權的黨國扮演著關鍵的規範與發展的功能，多變的非正規金融業發展正顯示，中國的金融管制在各地並非一致地實施。

打破傳統的國家—社會二分狀態

若不把非正規金融業的長時間存在僅僅視為是市場需求的影響，人們必須考慮到支持其出現和生存的政治環境。具體而言，人們必須分析黨國的行政管理權力，以解釋中國不同地區非正規金融業的差異。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律意義上是單一制國家，而不是聯邦制；黨國實際上在國家、省、市和鄉鎮的層次上，有著多層級的政府和黨的分支機構。同時，「國家」（或「政府」）也由在各個層次上重複的功能型官僚機關組成。認識到這些橫切面的政府機構的組織現實，是解釋中國在經驗層面上自相矛盾之處的第一步。²³

²² 然而，我並不至於說，地理及行政上的區隔會造成蘇聯式崩潰的嚴重危險。對此風險的關注，表現在王紹光、胡鞍綱的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該書同時出版成中文版《中國國家能力報告》(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然而，作者又降低了其立場，見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9), 202.

²³ Kenneth Lieberthal,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 的確，對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最有洞察力的研究，一直是那些系統地分析了政府那時常是多層又相互競爭的層級和部門（「條條」與「塊塊」）的研究成果。它們的視野超越了北京城中精英政治的爭鬥，而關注國家以下層級的經濟發展。²⁴ 不同的省、縣市、鄉鎮，甚至村莊都各自為政地推行政策，導致其後果與中央最初設想的大相徑庭。農業的非集體化、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鄉村工業化、外國投資的湧進，還有國有和集體企業事實上的私有化，都為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有時則是不穩定的加劇）做出了貢獻——而且，重要的意義是，這些發展過程可能要歸功於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選擇性（如果不是徹底地違反）的解釋。²⁵

Limitations,” 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30.

²⁴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nd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2), 關注在精英政治上。

²⁵ Marc J. Blecher and Vivienne Shue, *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T. Y. Cheung, Jae Ho Chung, and Zhimin Lin, 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1 (1992): 99-126;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242-63;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Lynn T. White III,

與此同時，個別的國家官僚機關善盡職責的共同努力也為全國的增長做了貢獻。²⁶ 我們知道，絕大多數的（即使不是全部）垂直組織的政府機關都面臨著財政上的困難，那麼推行那些增加自己物質資源的政策，就符合其自身的經濟利益。即使是非經濟部門的官方機關，例如研究機構和人民解放軍，也都明確地為了賺錢而去經商。²⁷ 因此，中國可被視為一個「企業家式的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因為國家的機關部門都日益涉入營利的經營活動之中。²⁸ 雖然地方政府和各個機關日益介入地方經商活動一事，肯定是伴隨著經濟增長一前一後地發生；我仍主張，不能自動地將其經濟追求與正面的發展成果等同起來。被辯稱為補充預算（和預算外）收入的商業活動和勒索手段，事實上可能更像貪婪的尋租行為。的確，由於過重的攤派而引起農村動亂的紛起以及反腐敗運動，就顯示了經濟自由化不那麼誘人的一面來。²⁹

13

Unstately Power, vol. 1,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²⁶ Blecher, "Developmental State," 265-91; and Jane Duckett,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Real Estat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s in Reform Era Tianjin* (London: Routledge, 1998).

²⁷ James 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Business Complex, 1978-98*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²⁸ Blecher, "Developmental State"; Duckett, *Entrepreneurial State*.

²⁹ Thomas P. Bernstein, "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ar, eds., *The Paradox of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7-219; Thomas P.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Xiaobo Lu, "Booty Socialism, Bureau-preneur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2, 3 (2000): 273-94.

簡而言之，藉由檢視「國家」在行政及官僚機關中的角色，對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政治經濟學的早期研究，已經揭示出一系列原動力來，這些動力在國家以下的層次激發出發展型、企業主式和貪婪掠奪式的行爲。本書基於這些洞識，以一種純粹國家中心論的分析方式來發掘，以披露非正規金融業有意遮掩的運作。爲了理解非正規金融業如何爲中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以及偶爾不穩定的插曲），我們必須檢視互相補充而又互相競爭的機構利益的各個層面。

而且，正如分解國家對於披露政府的條條（縱向機構）、塊塊（橫向機構）行動者的多樣性是重要的一樣；超越傳統的國家—社會分界線中「社會」的既有邊界，對於揭露非正規金融業的奧秘也是至關重要。對於國家—社會關係的分析通常排除了行動者，因爲按照大多數政治學家概念化的方式，這些人的利益不足以有效地集中或組織起來成爲社會中被承認的一部分。兼差、攤販、放高利貸都可以列入這個社會外(extrasocietal)的範疇。然而，排除掉這些明顯是邊緣的行動者的問題在於，在基層他們只可能一個勁地向前走，並躲避金融業的各種管制，而不正式地遊說黨國以求金融自由化。³⁰ 場外市場的行動者通常保持低姿態，以避免討厭的政治關注。如此一來，其難以捉摸的活動也向傳統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據我所知，國家並沒有一份中國所有私營銀行或金融公司的名單。它們是非

³⁰ 在農業聯產承包制分田單幹和躲避計畫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周曉將類似的草根現象稱爲「農民無組織的力量」(unorganized power of the peasants)，可參考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Cf. Daniel Kelliher,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法的，因此它們無法正式地註冊為營利的金融仲介。它們在國家與社會的傳統觀念範疇之外運作。因此，除了對私人企業主進行調查外，我田野研究中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就包括對國有以及非國有金融機構經理、各部門的官員以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訪問。

向草根的行動者學習

我發現，企業主本身對非法金融活動那令人迷惑不解的長盛不衰以及各地的政治經濟差異有著最有價值的洞察力。例如，那位說毛主席從水晶棺裡活過來親自為她請求，也無法從國有銀行借到錢的餐廳老闆；她的說法驗證了北京的金融改革者面臨的最基本的挑戰之一。即使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不可能隻手指揮銀行體系的商業化。財政部曾經嘗試過。國務院也做了嘗試，把充當中央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從財政部分離出來。然後，中國人民銀行自身也嘗試過。實際上，國有銀行再也無力承擔任何無法償還的貸款了；與此同時，每人都知道私營企業面臨著資金困難。甚至連《人民日報》也多次批評過這種無效率的狀況。然而，國有銀行卻繼續給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而不貸給營利的企業，為什麼？

調查資料、官方統計、老闆、銀行經理、金融企業主和幹部的聲音都顯示了地方上的政治經濟情況是如何從根本上影響了國家的政策與規範在基層貫徹的方式。非正規金融業的範圍與規模，依賴於我所謂的「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local logics of economic possibility)。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



在一間鄉鎮企業的門口，毛的石雕像被兩座仙女雕像護衛。

福建省惠安縣，1994年6月。

的態度在描述任何特定一地非正規金融業的輪廓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簡而言之，有些地方政府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非常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它們超出常規地為私營經濟提供了更優惠的條件。然而，在其他的地方，地方政府不那麼支持私營經濟，代之以把精力集中在國有企業，特別是集體部門上。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採取一種又愛又恨的矛盾態度，它們既不公開支持也不公開反對。我認為，這些對私營經濟不同的態度，進而轉變成在任何特定一地對非正規金融活動各種不同程度的默默支持。地方政府可以選擇忽視對於場外市場管制的違反，或是積極地與當地金融企業主合作，或是使他們的經營運作特別不便。

但是，爲什麼各地政府對待私營經濟有如此不同的態度呢？我認爲，地方政府對於發展的態度，主要受到各地從毛時代所繼承下來的路徑依賴經濟結構遺產的結果所影響。³¹ 過去的發展經驗對於形塑經濟改革過程的重要性，從東歐國家和前蘇聯轉型經濟的脈絡中也曾被觀察到。³² 在中國，有些地區因爲戰略地理位置或其他政治原因，共產黨統治下的前30年中被有意剝奪了投資的資金。共黨政權不願意在東南沿海省份建立工業基礎，舉例而言，由於它們較爲鄰近台灣，於是，一旦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面的大戰，這些地方就有可能遭到破壞。諷刺的是，這些相對貧困和孤立的地方，後來反而成爲了從事私營營利活動的較佳環境。即使在正式啓動改革的1978年之前，這些地方的政府就悄悄地允許分田單幹。

16

在浙江省溫州（第四章）的例子，對此過程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溫州曾經被視爲是一個偏僻又荒涼的地方，地少人多幾乎沒有發展前途。然而，在改革的第一個十年中，溫州卻擁有活躍的私營經濟，場外市場也同樣興旺。到1980年代中期，非正規的金融活動達到極盛：私人錢莊以小時計息；借貸的信貸互助會已經墮落成假藉高息之名的詐騙會；高利貸者綁架債戶的親屬；當舖裡滿是欺騙性的房地產抵押憑證；國有銀行的存款大量流失。當地經濟學家估計，溫州流動資金中的

³¹ 關於毛時代的遺產如何影響到鄉村工業在改革時代的產權安排，見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² David Stark and Laszlo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0%至95%與當時的非正規金融業有關。雖然從那時起，事情開始降溫，但地方政府繼續積極熱心地支持私營企業和富有創意的金融活動。

與這些被忽視的地方相對照的是，國家特意發展的工業區域在毛時代的日子要好過得多，但在發展非國有經濟方面要慢得多；因為它們面臨著改造蘇聯式國有企業的負擔，這些企業職工眾多，設備老化。這些地方的政府對於私營經濟的發展既愛又恨。它們樂見私營經濟的增長，但由於更緊迫的經濟挑戰，它們不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私營活動而捨棄國有及集體經濟。在中國中北部的河南省的工業城市（見第五章）爲了競爭發展的需要而搞得焦頭爛額，因此對於其境內的一系列被允許經營的金融機構既愛又恨。所以，中國傳統心臟地帶的場外市場機構被鼓勵以意識形態的巧妙偽裝來掩飾其運作，但是，它們經常受到反腐敗及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的政治運動所衝擊。

政府傾向於不支持私營經濟的地區的經濟情況則處於另一個極端：或是處於極爲貧困，或是在強大的公社、大隊機構領導下發展高度集體化的農村工業。在後一種情況下，地方官員傾向於與集體企業保持密切的關係（或擁有事實上的所有權）。換句話說，集體經濟而不是私人經濟活動成爲他們所偏好的經濟成長動力，因為鄉鎮和村級政權，即以前的公社和大隊，已經習慣於主宰地方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較大型的集體企業享受著現有金融機構的優惠貸款，而小型的集體企業就得自己想辦法去籌措投資和流動資金。在第三章所提供關於福建省的例證，就表現了這種傾向。在全世界都存在的非正規存儲互助組織——信貸互助會，在這些地區的婦女商販中非常流行。

不同於高度集體化的地區，極端貧困地區政府不一定有

集體經濟優於私營經濟的偏見，但是因為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區位過於惡劣或偏僻，以致外出打工成為逃避長期貧困的權宜之計。這些地區，在現在相對較為繁榮的省份，例如福建省（第三章）中也有。

雖然以政治經濟的術語來劃分這些地區是有用的，在現實中，各地區的結構條件和發展態度從1978年以來都已經改變。地方經濟不再是相互分離無聯繫的發展類型，或是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大潮絕緣。它們亦與時俱進。例如，到了1990年代末期，有些以集體經濟占主導地位而著名的地區也開始私有化其鄉鎮企業。³³而且，中國政治及經濟環境的重大轉變，也對基層產生了清晰而深入的影響。諸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鄧小平去世後宣布進一步深化改革國有經濟等重大歷史事件，重新界定了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中央各官僚機構的相對權力平衡等宏觀大環境。儘管如此，中央政策的貫徹執行仍有賴於基層的闡釋。

儘管毛時代留下的遺產確實塑造了各地發展的大勢，但其實際過程卻是動態的、實驗性的，而並非一成不變的。我在結論的一章中詳細闡述了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它與發展型國家自上而下嚴密控制的邏輯或通過明晰的產權而儘量減少經濟不穩定性的新制度經濟邏輯形成鮮明的對照。最終，是要靠國家的各個工作人員來決定是否和如何實施具體的管制、徵收稅費並發放營業執照。³⁴由於各個機關和官員們在執行政策時

18

³³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³⁴ Michael Lipsky,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3); Cf. James Ron, "Savage Restraint: Israeli, Palestine, and the Dialectics of Legal Repression," *Social Problems* 47, 4 (2000): 445-72.



路邊的小資本家。河南省開封市，1996年7月。

並不一致，所以政策的貫徹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執行政策的決策計算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源自其與當地經濟行動者們的互動。企業主可以給國家任命的官員提供物質、就業以及社會的激勵動力。儘管經濟結構影響著當地官員和普通幹部所面臨的直接的政治上的動機，同時明顯的是，私營企業主本身也以其金融策略影響著機關。就企業主的本性來說，他們並非結構限制因素的被動產物，他們是富於創造性的行動者，能依靠現有的資源去為市場創造新產品，為自身創造新生活。這就導致了第三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

分析私營經濟

除了各地的非正規金融業在範圍和規模上的顯著差異之外，我還發現老闆們在選擇金融機制時的巨大不同。這是第三個謎：有些私營企業主主要依靠個人的儲蓄或同儕團體的信貸互助會；其他人則使用著更制度化的場外市場做為信貸來源。經濟學家可能將這種多樣性歸於某一特定地區現有的某些金融機制所致。如同理性選擇的理論家所說，當地非正規金融業的供應限制著私營老闆們的選擇方案。此種觀點的侷限性在於，位於同一地區的企業主在其金融行為上表現了巨大的差異。理性主義者會預期處於相同條件的行動者會做出大致相似的經濟選擇，然而在同一街道上出售同一種商品的兩個老闆可能會採用完全不同的融資策略。 19

我認為，解答第三個問題的方法，在於承認私營企業主有著不同的社會及政治身分。這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獲取非經濟資源和網絡的機會，接著，這些資源及網絡又影響著他們的經濟策略。換句話說，私營企業主做為一個團體即使在同一個地區之內，也不享有進入場外市場的同等機會，因為儘管有著經濟上的相似性，他們事實上在其他重要的領域裡的處境卻不相似。如本書所揭示的，企業主的經濟行為還要依照社會及政治的邏輯來運作。正如在解釋非正規金融業的多樣性引起了地方官員政治上的顧慮一樣，在解釋每個人所使用金融機制時也超越了經濟問題的底線。主導著南方沿海信貸互助會的婦女，在工業大城市中依靠家鄉網絡以滿足自己短期貸款需求的外地商販，以及經營私營金融公司的前中共官員，都是私營企業主，但是，若把他們視為都享有相同的身分、資源和利益，那就過

於簡化了。我發現，老闆們的金融活動，依照其性別、是本地人或外來人口、經營生意的時間長短以及與當地政治關係的強弱而有所不同。例如，有著強大的政治後台的當地男老闆，要比同一地區以相似規模經營生意的外來婦女更會選擇較規範化的金融機制。不同的企業主選擇不同形式的非正規金融業，因為他們依靠不同的人際網絡去創造踏實穩定的和「承諾可信」的地位，而這些東西本來是正規的金融機構和現代產權在理論上應該提供的。非正規的信貸市場即使在草根層面也是區隔著的。對社會及政治資本的獲取，影響著對金融資本的獲取。所謂的資本家階級並非一個統一的整體。

20 分析國有經濟及私有經濟的重要性在於，分析這些廣義的概念類型暴露出政治與經濟行動者們之間在微觀層次上的互動，而這些東西通常會被傳統的經濟觀點或國家中心論的看法所混淆。企業主們和官僚們並非各自僅為營利和執行政策所驅動。他們面對著多重的限制與機會，以及各地不同的動機結構。正因為如此，企業主和國家行動者必須被置於當地的政治經濟脈絡及其個人的網絡來觀察。在這些較低分析層次上的非金融機構，開展了行動者視之為日常理所當然卻並未清晰表達的遊戲規則——而政治學家們卻往往忽視了它。

然而，與此同時，雖然關注的焦點轉向了主要行動者的環境脈絡及其社會鑲嵌，但這種轉移也不應被當成是另一種極端的決定論。³⁵ 遊戲的表面規則並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隨著國家和非國家行動者的互動而不停地被重新談判協商著。指導人

³⁵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vember 1985): 481-510.

們互動的規範不能抽離其日常的再生產過程。³⁶ 每當一個國家公務員將一家私營企業登記為集體企業，或一位餐廳老闆用豪華的盛宴招待一位收稅官員時，某些規範就在其中運作。這些日常的交易不僅是生存的實踐行動或抵抗的象徵行動。³⁷ 它們暗中破壞了正規的、由國家所定義的遊戲規則。它們創造了另類的劇本、動機甚至是制度。它們產生了新的可能性。總而言之，這就是中國的私營經濟發展如何能在缺乏官方信貸來源的情況下籌措到資金的。這就是黨國為何未能壟斷經濟中資本供應的原因。日常的行動和非正規機構能產生出宏觀層次上的結果。

無法控制：黨國的潛在教訓

我的理論關懷除了解釋經驗中的謎題之外，對於現今黨國重申其對金融體系的權威以及通過官方管道減少對私企老闆信貸限制的嘗試，還有著更廣泛的政策含義。管制以及重分配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根據老闆們與各種官員複雜的互動在地方官僚體制中運作的現實，這種政策干預的相對無效性的局面就更可以理解了。北京的政治領袖（以及帝國時期的其他元首）一直都承認在中國這樣廣大、多樣性的國家裡進行規範化治理時

21

³⁶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³⁷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全家人一齊忙。北京，2001年8月。

官僚機構忠實地執行政策以及老百姓順從的局面依舊。這種破綻百出的假設的效力究竟在哪呢？

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大約每隔一年，就要進行一次金融整肅運動，以改革管理不當的銀行，並關閉未經許可的金融機構。這些運動，配合上反腐敗運動，在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增強了力度。中央對金融體系健康狀況的高度關注並不令人吃驚，但是加強監督和整肅紀律的效果卻時常使官員們吃驚：對可疑的金融活動的公開調查引發了對銀行的擠兌，而且，當私人金融公司被關閉時，其客戶上街遊行抗議。爲了理解並且或許是預期管制監督是如何導致地方金融危機的非預期的後果，人們必須回到基本的，然而又是關鍵性的一點，那就是地方上的政治及經濟脈絡非常的重要。官方企圖規範非正

規金融業（或乾脆取締它）的舉動，破壞了當地事先存在的政治及經濟勢力的均衡，導致了短期內不安定的潛在動盪因素。當私營金融業的日常客戶一旦知道地方政府與金融業老闆之間達成的默契被來自上級的外部干預所威脅，他們就驚慌失措——並對國有銀行也喪失了信心。

以市場導向的概念來思考，國有銀行的官員們認為企業主們轉向場外市場是由於正規的金融體系沒有滿足其信貸的需求。因此，按照邏輯，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私營經營者獲得官方借貸的機會。由於強迫銀行按商業化的方式放貸已經被證明是如此困難，因此就按配額的方式向中小私營企業分配款項。諷刺的是，這意味著某些類型的「商業性」貸款也變成了國家操縱的「政策性」貸款的一部分。然而，地方上分割的信貸市場的現實表明，僅僅只通過某一特定的國家機關或金融機構指定小額商業貸款的用途，可能會遺漏掉一大部分值得貸款的民眾。事實上，這樣的信貸措施可能甚至到不了所要施惠的群體。

國家干預非正規金融業的弔詭後果，並非只有中國才有。在小額信貸領域從事國際發展的人們已經觀察到，在其他地區（見第六章），國家指導的信貸面臨著相同的難題。有太多的例子顯示旨在用於農業的信貸被挪用做非農項目，受補貼的小額貸款則落入了當地精英的口袋。這並不是說，國家不能扮演積極的管制與重分配的角色；而是說，以為立意良善政策必定達到理想效果的想法很危險。立法通過的法令不等同於對法律的遵守。

國家政策從裝有冷氣的會議室到基層的貫徹執行之間，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本書在檢視這段扭曲的面向時，也經歷

了相同的過程。第二章將從中國整體發展的困境脈絡中討論非正規金融業的產生，以探討私營企業主在結構上被排除於正規金融體系的政治及經濟原因，並說明我的研究方法。第三章到第五章則專門討論福建、浙江、河南等地特殊的場外市場經驗，藉此說明看似簡明的私營經濟金融問題，是如何涉及了政治及經濟行動者之間複雜的互動網絡。針對各個地區、各種金融機構與企業主的個案研究，則表明了地方政府和私營經濟之間的合作通常可以回溯到私人關係，但是這並非表示非正規金融業只是個人的腐敗表現。場外市場活動所依賴的，不僅僅是親友間親切招呼的隨意行爲；非正規金融業的運作，更像是一家由當地政商利益結構所驅動的地下工廠。當然，即使在有著相同社會及政治經濟結構的地方能觀察到相同類型的生產模式，其運作方式卻不是機械呆板的或可預見的。拖欠發生，事故頻傳，每隔一段，地下工廠就被高層的監管者揭露出其非法的原形，各主要機構因此被關閉。但是在有些地方，當地政府有著強烈的政治理由而有意忽視，地下工廠就設法重組自身並且繼續經營。

非正式的互動與非正規金融業的頑強存在，正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如何能籌措到資金的原因。它不靠國營商業銀行的設立，不靠明晰的產權的確立。在與地方官員之間富創造性的私下合作中，私營企業主建立了更簡易，即使並不總是更可靠，的信貸來源。

第二章

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政治經濟學

妳有從國有銀行借過錢嗎？

24

「你一定是開玩笑吧。」她大笑起來，露出一只金牙。

「銀行是不會借錢給我這樣的小生意人的。」

那麼妳是如何籌措資金來做生意的？

她停了一下。「儲蓄。」

妳是靠有在國有工廠裡工作存下那麼多錢嗎？

老闆壓低了聲音，「嗯，其實我大部分的錢都是從一家私人信貸互助會那裡借的。」

那像是一家私人銀行嗎？

「不太像。私人銀行是非法的。我們在巷子那邊的服飾店後面每個月碰面一次。」

——福建，1996年田野筆記

從1987年11月以來，在中國大陸上已經絕跡了30多年的當鋪業，在各地又死灰復燃了……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內的當鋪業已經和過去的完全不一樣了。昔日的當鋪是在物主貧困交加之時以極低的價格抵押個人財產。然而，現今的這種行業卻代表了商品正常流通的一種媒介……新興的當鋪業旨在為民眾和社會生產服務。

——財政部國際金融研究所，1993年

- 25 審視中國非正規金融業演進的背景脈絡，看一下本書的研究策略，主要發現的總結顯示出對於非正規金融業的整體利用並不因省或地區而相異。而存在於各省內巨大的差異則表明，即使在某一特定的省內，國家並不實施著各層次一致的金融能力。此一發現，向傳統的經濟學說和國家中心論所持的看法提出了挑戰，也為我在每一個特定的田野地點更詳盡地調查非正規金融業的動態時鋪路。

中國在帝國時代的非正規金融業

從革命前時代延續下來的非正規信貸的極少事例，包括了中國史書上記載的最古老的信貸機構：由佛家寺院開辦的當舖。¹ 遠自六朝時代中期（317-589），當舖依靠捐贈的資金向富裕的和貧窮的農民發放信貸。雖然寺院的典當業隨著明朝（1368-1644）、清朝（1644-1911）時期佛教的衰敗而沒落了，民眾仍將當舖視為一門服務社會各階層的生意。然而，隨著18世紀傳統與現代的銀行興起，當舖老闆們做為主要信貸來源的作用也隨之減小了。錢莊首先在寧波和上海出現，做為一種服務於商人的地方性、獨立的商業銀行——不同於山西那些較大的、半官方的銀行能夠辦理跨地區的匯款業務。² 然而，小商販們沒資格使用較高級的錢莊，於是，他們主要與換錢的

¹ Lien-sheng Yang,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71.

² 對於山西票號（銀行）與錢莊的比較，可參考 Susan Mann Jones, "Finance in Ningpo: The 'Ch' ien Chuang,' 1750-188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錢鋪打交道，以便把每天賺得的銅錢換成銀子去做更大的生意。在有些場合，小商販可以從錢鋪借到貸款，利息要比當舖的低一些。³

在唐朝（618-907）時，佛家寺院除了開辦當舖，還開始經營一種合作性質的貸款社團，叫做「社」。最初設立這些社團是為了資助宗教活動，但它們也向會員提供信貸以辦理喪事或旅行的盤纏。除了寺院之外，也有證據表明在南方的湖南省的貧窮農民在唐朝時就參加金融互助會。這些互助會的運作方式，與今日現代社會的存貸互助會相似。會員們每月給大夥的基金總額一定數目的金錢，並抽籤來決定由誰來先用當月湊起的錢來買牛或其他的農產。在互助會一個週期的結束時，一個接著一個，每個會員都購買了一件急需的物品。⁴

26

在上個世紀之交，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極為詳細地記錄了有著不同的名目及運作條款的互助會的利用情況。對這個階段（晚清和民國）各種形式的互助會的描述很有價值，因為本質上相同的類型在近一個世紀之後又在中國和別處出現了。⁵ 基本的互助會規定了每個月或每半年由每位會員向集體基金繳交一定的金額，這些會員通常是朋友或鄰居，累積起來的這筆款項在免利息的前提下由會員輪流使用，這樣最後每位會員都收

University Press, 1972), 47-77.

³ Peng Xinwei, *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 trans. Edward H. Kaplan (Bellingham, Wash.: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3), 814-26.

⁴ 前揭書，頁75-76。

⁵ 對不同類型的「會」的極好分析，見 Thierry Pairault, "Approches tontinières (deuxième partie): Formes et mécanismes tontiniers," *Etudes chinoises* 9, 2 (1990). (Tontine approaches, part 2: Typology and operation of tontines).

回了相同數目的款項。⁶ 它被稱為「輪會」，因為輪流使用每次款項的順序是在第一次聚會時就定下來的。另一種普遍的形式叫做「搖會」（擲骰子以定順序），因為每次開會時搖動兩枚骰子，擲出最高點數的人先用錢。在輪會和搖會中，互助會的組織者（會頭）負責為每次聚會準備一餐宴席，然後由當次用錢者付款。⁷ 在搖會中，擲骰子的程序在飯後進行。⁸ 第三種在華南（廣東、福建）和台灣的文獻中記載的會叫做「標會」：用錢的順序由秘密投標來決定，投標後由願意出最高利息的會員用錢。⁹

- 27 在帝國晚期，需要信貸的人有著現成更廣泛的機構可以選擇。小資本家通常仍依賴較非正規的金融來源。如希爾·蓋茲（Hill Gates）所闡釋的，除了民間借貸和互助會之外，他們還通過「娶媳婦要嫁妝、當舖、借錢、賭博、黑道勒索保護費等

⁶ 當然，這取決於會的長短和當地通貨膨脹的情況，晚用錢的人實際上使用的錢要比他出的會錢少一些。

⁷ 然而，根據 D. H. Kulp 的不同描述，總是由會頭付飯錢的，可參考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Pho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1: 190-96.

⁸ Sidney D.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267-70.

⁹ 這是今日福建省的主要形式，編號第 30 號受訪者（見附錄 B，受訪者及其所屬機構的編號名單；為保護受訪者，未用真名）。例如，若團體的首領在第一個月借了一百個單位的現款，那人可能要交 20% 的利息，在整個會期分期償還，但在第一個月實收 $100 - 100 * I(n-1)$ ，其中， I 是利率， n 是全體會員數。假定利率為常數，平均分期付款，其餘會員每月所收到的錢數如下： $p(n-1) - [I * p(n-1) \div (t-m)]$ ，其中 p 是每位會員的付款， n 為會員數， I 為年利率， t 為每次會周轉的月數， m 為會的月份。最後用錢者不需付息，根據通貨膨脹的情況，實際上或賺取利息或賠錢。

欺詐手段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機制」來籌措資金。¹⁰ 然而，在華北農村，看來大多數的農村信貸都是用於消費或交稅交租，而不是用於生產。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借方與貸方在貸款的生產和消費使用上沒有區別。而且，人們相信互助會的作用就是用於一般婚喪大事等禮儀需求，而非創業或購買土地之類的謀利行為。¹¹ 那些參與會的人也認為自己是出於父系親情的義務在幫助組織者而已。大多數互助會似乎都是圍繞著男性親屬而組織的。正如費孝通在長江三角洲開弦弓村的研究所觀察到的：「只要有一個適當的名目，組織者就會去找親戚：叔伯、兄弟、姐夫、妹夫、舅、丈人等，這些人都有責任入會。即使他們無法認捐，他們也會找些自己的親戚來代替」。¹²

以男性中心為主的入會制度，在革命前的中國，是與當時主宰社會與經濟互動關係的父系規範相一致的；然而，今日互助會在婦女中比在男性中更卻為流行（見第三章）。

毛時代中國的正規和非正規金融業

從共產主義革命以來，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狀況極少受到關注，主要是因為毛時代的私營銀行遭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¹⁰ Hill Gates,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32.

¹¹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264 (citing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2], 62), 267.

¹²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267.

28 的早期，新的銀行體系仿效蘇聯的單一銀行體系被當作工具來使用，以鼓勵商業的社會主義化、農業的公社化和消滅私營企業。¹³ 到1950年代中期，中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銀行除了兩家之外，全被沒收（或關閉）了，轉變成公私合營銀行或合併成中國人民銀行的分行。¹⁴ 儘管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金融業偶爾有些機構上的變更，國有銀行體系仍管理著經濟中信貸的官方供應和分配。事實上，即使對國有企業來說，國有銀行體系也不是固定的信貸來源，因為國有企業的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的需求，主要是透過地方政府的預算支出來籌措的。在1960年代，銀行貸款據說僅供應國有企業流動資金需求的20%（如同被一個配額制度所決定）。¹⁵ 但是，財政撥款與銀行貸款的界限時常被混淆，因為地方銀行的人事安排是由當地黨委會所控制的。正如威廉·比爾德（William Byrd）所說，「這意味著地方銀行只不過是做為『地方政府的金庫』來運作而已」；這個難題一直持續在整個改革開放時代。¹⁶ 不管怎麼

¹³ 蘇聯的單一銀行體系實質上由一家主要國有銀行和幾家輔助性專門金融機構組成。可參考O. Kuschpeta, *The Banking and Credit System of the USSR* (Boston: Nijhoff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1978); Adam Zwass, trans. Michel C. Vale,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79); and William Byrd,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The Changing Role of Bank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41.

¹⁴ 未被沒收的兩家銀行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然而，兩者都受中國人民銀行的管轄。詳情見Cecil R. Dipchand, Zhang Yichun, and Ma Mingjia,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1-18.

¹⁵ 這被稱為「分口」制。Katharine Huang Hsiao,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48 and 76（圖表顯示國家撥款與銀行體系給國有企業提供流動資金在百分比份額上的變化）。

¹⁶ Byrd,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37.

說，地方政府與銀行對官方信貸的聯合壟斷，導致了個人在獲得正規銀行信貸上被拒絕的局面。

在毛時代的大部分時期，由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或是在集體農業中幹活，或是在國有單位裡工作，因此大致可以推論得知，大多數家庭不會因為與生產有關的理由而去求助於非正規金融機制。我的受訪者指出，當農民參與像信貸互助會這樣的非正規的機制時，他們通常是用集體籌措到的資金去辦理婚喪一類的禮儀大事。在城市地區，互助會被稱做「兌會」，有時在工作單位內部被組織起來以做為急難下的一種社會保障，或是資助購買昂貴的消費品。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輛自行車賣到一百多元，這相當於一般工人一整年的平均工資。藉由每個月向工作單位中的兌會交出一至五元，入會者依次可以購買一輛自行車、一支手錶或其他渴望得到的物品。我的受訪者中，沒有誰能記起城市工作單位的入會者中有明顯的性別差異，雖然有人說農村的婦女要比男人更可能參與互助會。

29

後毛時代的革命性變化？

做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動的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中國人民銀行升格為部級單位，並於1984年正式被指定為中國的中央銀行。相關的金融體系改革，還包括成立了工商銀行以接管中國人民銀行的商業金融功能（1984年），重建中國農業銀行（1979年），復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79年）和成立中國投資銀行（1981年）以處理國外交易。此外，一

大批官方指定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的金融機構也成立，以服務於特定的發展目標和市場需求。在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在專業銀行與非銀行的金融機構（諸如信用社和信託投資公司）之間，出現了事實上的功能分工，專業銀行主要給國有企業提供貸款，而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在資助非國有經濟上更為活躍。¹⁷ 表2.1表明，在整個1990年代中，官方認可的金融機構向私營經濟放款的比例仍是極小。表2.2顯示，在1996年，官方信貸中城市信用社占了超過四分之三的比例，貸給了私營經濟，1996年是它們被迫改制為城市商業銀行之前被允許從事經營的最後一年。

30 儘管中央銀行一再鼓勵國有銀行按照商業化的借貸標準去運作，國有銀行仍繼續面臨地方上的政治壓力，被迫向償還希望不大的國有企業貸款。同時，官方的利率被人為地壓低，以
31 控制快速成長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到1993年，銀行體系正歷經著資本向黑市、房地產業和新近建立的股市及其他投機性投資的淨流出。結果，專業銀行的壞帳準備金銳降至巴塞爾國際銀行監理委員會設立的4%的標準以下。雖然這消息還沒有在
中外媒體上被廣泛地公開，但金融體系處於危機之中。¹⁸ 1993年至1995年間，一系列的改革試圖結束銀行間的拆借，並逐步結束專業銀行的政策性貸款，以便它們能像真正的商業銀行一樣地運作，而指定的「政策性銀行」將承擔基於政治及經濟

¹⁷ 要討論1979年至1991年間的中國金融改革，可參考Xiaoping Xu,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rans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¹⁸ 有關1993年金融危機及隨後的改革詳情，可參考Minxin 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nking Reforms in China, 1993-199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7, 18 (1998): 321-50.

發展目標的信貸配置。經由這些改革，正規金融體系的結構如圖2.1所示。

表2.1 官方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1990年至2001年）

年份	國有銀行 ^a (%)	所有官方的 金融機構 ^b (%)	官方提供私營經濟的 貸款總量 (億元人民幣)
1990	0.09	0.23	40.2
1991	0.08	0.23	49.2
1992	0.09	0.26	67.6
1993	0.10	0.33	108.6
1994	0.13	0.38	155.9
1995	0.09	0.39	196.2
1996	0.11	0.46	279.8
1997	0.27	0.52	386.7
1998	0.30	0.54	471.6
1999	0.41	0.62	579.1
2000	0.55	0.66	654.6
2001 ^c	0.59	0.77	797.1

資料來源：各年的《金融統計年鑑》；《中國統計月報》，第5期，2001年6月，北京：中國統計資訊及諮詢服務中心。

a：包括人民銀行、政策性銀行、國有及其他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

b：包括所有的「國有銀行」，加上城市／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機構、金融信託投資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

c：至2001年3月為止。

表 2.2 私營經濟獲得的官方貸款的分析 (1996 年)

貸款類型	數量 (億元)	占總量的百分比 (%)
國有銀行	53.8	19.2
其他銀行 ^a	13.4	4.8
城市信用社	212.6	76.0
總計	279.8	100.0

資料來源：《金融統計年鑑》，1997 年，頁 465。

a：包括光大銀行、華夏金融集團、中國投資銀行、中國民生銀行集團、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中國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福建興業銀行、蚌埠住房銀行和煙台住房銀行。

雖然正規金融體系的制度結構在經濟改革的前 20 年中日益複雜與分化，到了 2001 年，國有銀行仍未能如同以營利為取向的商業銀行般運作。換句話說，當一家國有銀行試圖決定是否向一家企業放款時，它並不考慮企業的盈利、信用紀錄（是否已經負債累累）、經營的專業化程度、運營的效率，還有最重要的是借方的還貸能力等這類是否值得信貸的標準條件。到 1997 年末，國有銀行的帳面上還有超過 20% 的信貸是逾期三個月以上的壞帳，還有 6% 至 7% 收不回來的呆帳。¹⁹ 由於省級人民銀行一貫屈從於當地要它向國有企業貸款補貼的政治壓力，1997 年省級人民銀行被九個區域的人民銀行所取代。²⁰

¹⁹ 這些資料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提供。見 Chu Chia Chien, "Dai Xianglong: China to Establish New Financial System in Three Years," *Wen Wei Po*, November 2, 1998, B16, reported in FBIS-CHI-98-306。Standard & Poor 估計中國有二千億美元的壞帳貸款，占 1997 年總貸款的 25%：Shawn X. Xu, "PBOC Holds Key to Averting Crisi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May 14, 1998。由於規定的標準不嚴格，難以估計無法償還的貸款的實際百分比，見 Nicholas R.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115-26.

²⁰ 這一點部分是受美國聯邦儲備制度的啟發，可參考 "Zhu's Protege



資料來源：拉迪，《中國未完成的經濟革命》，1998年，頁56-76；
《金融年鑑》，1997年。

a：1995年，城市信用社開始轉為城市商業銀行，改造農村信用社的實驗性嘗試始於1998年。

b：中國人民銀行於1998年10月關閉了廣東發展信託投資公司，因其拖欠12億美元債務的償還。整頓其他信託投資公司的計畫此後不久即被宣布。

c：中國人民銀行於1998年6月關閉了海南發展銀行。

■ 2.1 中國正規金融體系結構

根據溫家寶副總理所說，這次金融集中化的目標，是「保護銀行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預，懲罰那些違犯金融法規者，並改善銀行的效率」。²¹ 改革的第二個目標，是增加向中小型企業的貸款。²²

- 33 雖然官方統計報告說銀行貸給非國有經濟的款項很少，由於從正規金融體系的資金不斷地溢出，事實上私營經濟獲得了更多的銀行信貸。甚至人民銀行的副行長劉明康也承認：「中國的金融部門確實發生某些問題。某些銀行的確從事帳外運作、私設小金庫、高息集儲、從事惡性競爭和違規操作。有些貸款甚至未簽合同就貸出去了」。²³

銀行為何對私營企業關上大門

有五個基本的因素說明為何國有銀行體系不給私營經濟更多的貸款：前三個是政治因素；後兩個則關係到銀行體系缺乏貸款給私營經濟的制度經驗和誘因。

第一個而且或許是最重要的原因，由於要減少失業以維持社會安定的政治壓力迫使銀行要繼續優先貸款給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為主的某些地區，許多國企的經營不如同類的集體企

Must Put Together Mainland's Answer to the Fed," *SCMP*, May 14, 1998。這些分行位於天津、瀋陽、上海、南京、武漢、濟南、廣州、成都和西安。

²¹ 〈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改革〉，《新華通訊社》，1998年11月15日，見FBIS-CHI-98-319。

²² Chu Chia-Chien, "Dai Xianglong."

²³ Sun Zhi with Wang Zhenning, "Central Bank Official on Restoring Financial Order," *Ta Kung Pao*, October 12, 1998, 2, reported in BIS-CHI-98-289.

業或私營企業。²⁴ 然而，由於很大比例的勞動力依靠國家就業，因此，地方政府向轄區內的國有銀行施壓，要它們貸款補貼國企，而不是讓國企縮減規模或乾脆破產。河南省的不少地方即屬於這一類例子（見第五章）。雖然1997年10月的中共十五大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措施以改革、關閉或出售前一千大國有企業以外的所有國企，但由於大規模失業所造成的不穩定後果，使得中小型國企的全盤私有化進展得比預期的要慢。²⁵

國有銀行主要貸款給國企的第二個原因，與中央和各省制
訂的重點產業發展戰略有關。例如，某地的決策可能著重於發展汽車工業或投資於高科技產業。²⁶ 發展這些目標產業的壓力就施加給銀行，指示它向特定企業貸款。這些就叫做政策性貸款。這類貸款既不非法，也不腐敗；相反地，它有助於中央與省級政府發展特定的產業。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韓國，

34

²⁴ 此觀點的簡明表述，見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21-58。同時可參考〈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是重大任務〉，《經濟參考報》，1997年12月16日，轉引自FBIS-CHI-98-035。一種更樂觀的看法可參考Edward S. Steinfeld,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⁵ Wang Xiangwei, "Beijing Signals Rethinking on Reform Plans," *SCMP*, July 11, 1998; Nicholas Lardy, "China Chooses Growth Today, Reckoning Tomorrow,"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0, 1998。一篇匿名的社論說：「目前，有些地方『賣工廠』的風氣很厲害，這種行為誤導了國有企業的重組，搞亂了人心，妨害了企業的健康發展，破壞了國企下崗職工的重新就業。在有些地方甚至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應刹住「賣企業」之風〉，《新華通訊社》，1998年8月4日，見FBIS-CHI-98-225。

²⁶ 可參考Eric Thun, "Changing Lanes in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1999"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and Adam Segal, *Digital Dragon: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這種做法非常普遍，當時鋼鐵、汽車和造船工業獲得優先貸款。因為韓國政府認為，這對韓國建立起重工業基礎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日本也有過相似的目標制訂情況。在中國，中央的人民銀行在1999年按區域劃分重組了銀行體系，並且宣布商業銀行不再發放政策性貸款。儘管如此，私營企業（特別是在與地方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相符合的部門中經營的企業）用來獲取銀行信貸的一個策略，就是登記為「集體企業」。

第三，在改革開放初期，追求私人利益並且似乎比他人更為富有的人們受到普遍的歧視。改革是否會繼續進行呢？還是會針對新興資本家進行某種政治上的反擊？在整個1980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把私企老闆當作資本主義滲透的邪惡勢力的例證加以展示。如此一來，國有銀行對貸款給私營企業主一事即感到不安。事實上，許多銀行懷疑私營企業主，擔心與他們做生意會惹上麻煩。當時對最早一批私營企業主的成見認為，他們是一群如同罪犯般不能在國企和國家機關找到正當工作的社會渣滓（有些情況也確實如此）。²⁷ 由於最初對於追求私利的負面意識形態成見，有些貨真價實的私營企業登記為「民營企業」以偽裝其產權結構。與雇傭八人以上的較大型的「私營企業」相比，「民營」的辭彙帶著不那麼赤裸裸資本主義的含義。

35 除了受到貸款給國有及集體經濟的政治壓力外，國有銀行緩慢地朝向基於市場標準進行信貸發放轉型的第四個原因，就是銀行缺乏向私營企業發放貸款的經驗。誠如一位銀行行長所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個人貸款的申請。我們先前所有的貸款都與國有單位有關，所以那怕是

²⁷ 編號第87號受訪者。

變動一下申請表格或是做出一個例外的決定，都會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²⁸ 1949年後中國的信貸官員已經被訓練成官僚，而非商業銀行家，所以幾乎不存在以盈利標準而非以政治為基礎來放貸的先例。而且，直至最近，教育體系還沒有開始從事信貸評估所需的技術培訓。

第五，銀行體系本身仍舊在制度上偏向於貸款給國有單位。信貸官員即使放貸壞帳給國有單位也能指望獲得寬恕，畢竟它們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這個合理化的理由可不能用於貸給私營經濟的壞帳。正如上述的銀行行長進一步地指出：「把款貸給國有單位比貸給個別的陌生人更安全」。在金融上，私人貸款者可能確實要比公家客戶有更高的信貸風險，因為前者缺少像土地這樣常規的抵押物，而土地在法律上是屬於國家的。向高風險客戶徵收較高的利率，是自由化金融環境中商業銀行的標準做法，然而在中國，對於利率上限的規定就限制了國有銀行以商業上可行的方式從事貸款的能力。簡而言之，信貸官員缺乏向私營經濟發放貸款的制度性誘因。

另一個面向：當代中國的非正規金融業

因此，企業主們會成立各種各樣的非政府金融機制和機構一事就毫不令人驚訝了。許多這類的金融活動都沒有得到官方的批准，有些確實還是明顯違法的。當親友間偶爾的借貸行為通常被銀行官員視為無害的互助形式而加以寬容，像信貸互助會和短期行業信用之類的活動就存在於中國的半合法的灰色領

²⁸ 編號第17號受訪者。

36 域。²⁹ 其他金融活動——諸如私人錢莊和高利息的捐客——毫無疑問是被中央銀行所禁止的。論述非銀行金融部門的當代中國著作花了很大氣力去區分「私營」與「民間」信貸活動。民間金融，被視為是一種小規模的非正規運作，它含有互助精神和地方傳統。另一方面，「私營」則典型地指稱那些旨在營利、非公有的金融活動，通常是非法的，因為它們涉及了利息償還。

儘管在稱謂和法律上有這些政治意義重大的差異，中國私營企業主所採用的大多數金融機制，仍舊可以被分類為存在於非正規金融業的領域之內，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場外市場，或有時稱為「無組織的金融業」。³⁰ 但是這個名稱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它所包括的許多金融運作事實上是周密組織和制度化的。因此，我使用「非正規金融業」和「場外市場」這種稱謂以涵蓋位於國家銀行體系之外的整個金融活動和機構（見表2.3）。

絕大多數的私營企業主都依靠場外市場，因為這些金融機制都在官方銀行體系之外運作，所以難以評估其中每一個的實際規模和交易量。一個保守的估計是，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裡，場外市場的活動至少占全部金融交易的四分之一。³¹ 依此

²⁹ 所謂「半合法的灰色領域」，我指的是有些金融活動可能被某些官僚機構所認可，而不被其他的機構所認可；與之相同的是，政府的不同行政管理層次（中央、省、市、縣、鄉鎮、村）在監管本質上相同的活動時，可能會有相互矛盾的規定。

³⁰ 可參考 Alek A. Rozental, "Unorganiz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y,"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1, 4 (1967): 453-60.

³¹ 根據在吉林和江蘇進行農村調查所做的一項研究估計，1980年代，非正規的資金來源占農村全部信貸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Gershon Feder, Lawrence J. Lau, Justin Y. Lin, and Luo Xiaopeng, "Agricultural Credit and Farm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3, 4 (1989): 508-26。一項稍後的估計是，1994年全中國所有商業性金融交易的四分之一發生在國家銀行體系之外，總額超過二千億元（246

而論，非正規金融業在中國經濟中的百分比，與台灣、泰國和韓國在戰後幾十年中快速經濟成長的非正規金融業的規模相似（見第六章）。然而，在私營經濟的金融中，相較於官方來源，非正規金融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如果我們考慮到非國有部門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而且國有銀行對大多數私營企業來說無法利用（包括國有單位的官方銀行信貸向場外市場的違法轉移），那麼，可以想像的是，非正規來源的資金在這20年中占了私營經濟信貸的四分之三。

表2.3 中國場外市場活動一覽

合法	半合法	非法
民間借貸	農村合作基金會 (1996年後非法)	專業高利貸者
行業信用 信貸互助會 (在部分地區)	股份合作企業 紅帽子／掛戶企業	私人錢莊 信貸互助會 (在部分地區)
當舖 (在部分地區)	金融團體／資本互助會、 當舖（在部分地區）	金字塔型的投資結構 (詐騙)

備註：第二、三行中的活動／機構皆非中國人民銀行所認可。在第一行中，只要不收取利息，就為「合法」。「半合法」是指由金融業之外的官僚機關所登記的那些機構。

億美元)：史建平，〈金融立法與銀行體制改革〉，載《中國金融大趨勢1996》，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60-163（二千億元的數額可能包括國家認可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如城鄉信用社，的金融流量）。對1995年非正規借貸量的更保守的估計是三百億元（37億美元）：朱德鄰和胡梅歐，《中國的灰黑色金融——市場風雲與理性思考》，上海：立新會計出版社，1997年，頁44。然而，另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總人口中的20%參與了非正規金融活動，每年至少有七百億元（86億美元）以高息貸款形式流通：黃葦町，《中國的隱形經濟》，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6年，頁252，指出非正規金融的主要參與者是農民和個體戶。

儘管這些估計並不準確，北京的官員清楚地關注著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貨幣規模的概況。而且，從管制的觀點來看，也與私營企業主的金融機制的組織屬性相一致。私營金融業的高度制度化，舉例而言，要比較不制度化的機構更容易受到官方的懲罰。因此，爲了能更清楚地理解，私營企業主的金融活動可以被區分爲「低」、「中」、「高」不同層次。制度化程度較低的金融活動，包括偶爾的民間借貸。在另一端，制度化程度較高的金融活動，採行著組織化的環境中標準化的程序。制度化程度中等的金融活動，可能會有契約，但是缺乏具體的組織結構，參與者的相互關係傾向更爲個人化。³²根據制度化的程度，非正規金融機制的類別請見表2.4。

雖然本書的主要焦點是在金融機構上，非制度化的金融活動所依賴的人際關係，可能會使這些活動逐漸發展成機構。例如，一個沒有政治背景的高利貸者，在經過幾年順利的兼差之後，可能會決定開辦當舖或錢莊。在低制度化與清楚的制度化的金融活動之間，界限並不總是很清楚的，但爲了理解爲什麼有些非正規活動比別的更爲制度化，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會產生私營金融機構，基本的區分還是值得探討的。而且，有些地方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場外市場機制，然而其他地方卻只有普通或微不足道的非正規金融活動。因此，爲了更清楚地理解，我依

³² 我操作與界定「制度化」的方式與Zuckers的「人類學方法論對制度化的見解」相同。她寫道：「行爲並不簡單地制度化或非制度化。一種行爲的意義可被視爲多少是外部的和客觀的，取決於該行爲實施時的情況和／或取決於活動者的地位與角色。例如，基於某一特別特殊行動者的行爲，如同個人的影響一樣，在制度化方面的等級就很低。相反地，基於特定地位或角色的行動者所實施的行爲在制度化方面等級就高」。Lynne G. Zuck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5 (1977): 729.

據當地是否有低、中、高程度的金融機構來劃分地區。

表 2.4 私營企業主的金融活動和機構一覽表

名稱	表現	制度化的程度
民間借貸	親友、鄰居和同事之間的借款	低（無息）
行業信用	由批發商給予零售商的短期商品信貸，通常無息	低—中
仲介、高利貸者、銀背（中間人）	以高息在儲戶與借方中間從事金融高利貸	中
戴紅帽子／掛戶企業	以集體企業的名義從銀行和國有企業那裡籌措資本	高
股份合作企業	通過發放股份在企業間運作和籌措資本	高
信貸互助會		中—高
1. 基本形式（程會、合會、舉會）	1. 在一群同類的人中存借	
a. 輪流式（輪會）	a. 貸款順序按事先設定的輪流次序	
b. 投標式（標會）	b. 貸款順序由投標制來定	
2. 升級式（抬會、排會）	2. 金字塔式連續投機層層增加的投資騙術	
地下錢莊	在非金融活動的偽裝之下提供存貸服務	中
錢莊	提供存貸服務	高
民營企業資金互助社	向私營企業主提供金融服務	高
郊區合作儲蓄基金會	向私營企業主提供金融服務	高
農村合作基金會	在村中運作的存貸機構	高
當舖、典當行	以財產做抵押的借貸	高

研究的組織工作

我圍繞著兩個經驗性的問題組織我的研究：第一、如何解釋各地在非正規金融業上的差異？第二、如何解釋私營企業主在使用非正規金融上的差異？為了解答第一個疑問，我選擇了18個分布在不同發展層級上（城市、郊區和農村）的研究地點：華北的核心省份河南省、東南沿海的福建省和浙江省（表2.5）。然後，我在每一個研究地點對企業老闆進行問卷調查，以回答第二個問題。

我對第一個問題所提出的假設是，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對於地方層級金融制度的供應有著關鍵的影響。既然我並非先驗地知道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也不知道非正規金融活動在各地的發展程度，我選取能涵蓋經濟派（economic-based）和以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兩者差異觀
40 點的研究地點；兩者的自變項分別是，私營商業活動的程度和落實中央政策時的國家能力。

表2.5 按區域及發展程度劃分的研究地點分布

	城市	郊區	農村 ^a
華北（河南）	鄭州（河南） 洛陽（河南）	偃師（河南） 開封（河南）	黃河邊的農村（4）： 南召、虞城
東南沿海 （福建、浙江）	福州（福建） 泉州（福建）	長樂（福建） 惠安（福建） 晉江（福建） 溫州（浙江）	長樂城外的山村（4）： 海興、崇武、安溪

a：雖然我研究了黃河邊的四個村莊和長樂城外的四個山村，但我僅在每一例中的二個做了問卷調查。

表 2.6 研究地點的就業部門分布狀況（1996 年）

研究地點 ^a	國有(%)	集體(%)	其他／私 營(%) ^c	私營商業活 動的程度
晉江市／縣（福建）	24.6 (14.9) ^a	9.0	66.5	多
溫州市（浙江）	40.3 (22.8)	(28.5) ^a	(48.6) ^a	多
泉州城區（福建）	48.5 (25.7)	16.3	35.2	多
長樂縣／市（福建）	49.4	27.7	22.9	多
泉州市（福建）	52.9	19.0	28.2	多
福州城區（福建）	50.9 (57.2)	18.7	22.3	少
偃師市（河南）	62.5	27.8	9.7	少
福州市（福建）	62.7 (60.7)	18.3	19.0	少
鄭州市（河南）	69.1 (49.2)	21.8	9.2	多 ^b
安溪縣（福建）	62.4	9.0	28.6	少
惠安縣（福建）	62.8 (44.6)	26.8	10.4	少
洛陽市（河南）	72.4 (45.6)	24.8	2.8	多 ^b
開封城區（河南）	79.3 (44.0)	19.7	1.0	多 ^b
開封市（河南）	87.3	12.6	0.1	少

資料來源：1997 年福建、河南、浙江三省的統計年鑑。

a：不包括實施了問卷調查的河南與福建的四個村。

b：括弧中的百分比是作者根據地方工商局中私營經濟雇員人數計算得出（福建是 1995 年資料）。

c：根據工商局資料的分類要比一般的省級統計資料較好地反映了私營經濟的實際狀況。

經濟派的解釋邏輯是，私營企業主對信貸有更高需求的地方將發展更廣泛的金融機構。因此，我使用了官方的就業統計數字來評估每一研究地點私營經濟的相對規模。³³ 表 2.6 列舉了

³³ 評估「私營商業活動」程度的其他可能措施有：一、私營經濟對當地經濟的 GDP 或工農業總產值的貢獻；二、從私營經濟徵收的稅款；三、註冊的私營經濟人數；四、當地官方指定的私營市場的數目。第一項可能是達到目的的最佳指標，然而，我沒有使用它，因為對我研究的

相關的數據。正如奧列·歐加德（Ole Odgaard）所指出，中國非國有經濟的官方統計有很嚴重的缺陷。³⁴ 各省統計年鑑上羅列的數字與工商行政管理局編纂的內部資料之間的差異甚大；特別是在工商局登記從事私營經濟的人數要多得多。這令人奇怪，眾所周知，個體戶傾向於低報其全職雇員的數目，因為個體戶的定義就在於它最多只能雇工八人。對這種差別的一個解釋是，繼續接受補貼的國有企業所計算的雇員人數，可能還包括有實際上已經離職而全職從事私營經濟的人。無論如何，爲了計算國有、集體、私營三個部分全職就業人員的實際狀況，我根據工商局的私營經濟數字重新計算了百分比；這些數據被加註星號放在表中的括弧之內。在依據私營經濟（最右行）的規模來劃分地區時，我還考慮到集體經濟的相對規模，因為私營經濟爲了獲取優惠的待遇，有時候會登記成集體經濟。

經濟派預期的是，更龐大的私營商業活動將會帶來更多樣的非正規金融機構；與之相對的是，國家中心論觀點關注中央政府經由正規金融體系對不同省份實施著不同程度的「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city）上。更具體地說，國家中心論觀點預期在國家金融能力相對較小的地方有著更大的金融機構多樣性，而在國家金融能力較大的地方有著較少種類的場外市場機制。這

地點來說，並非都有此資料。第二項可能稍差些，因為它可能把私營經濟的實際規模等同於當地國家的勒索能力（這是另一個問題）。第三、四項在概念上與我最終使用的措施相同，即私營經濟就業狀況，可我選定了集中在私營經濟的就業人數上。

³⁴ Ole Odgaard, "Inadequate and Inaccurate Chinese Statistics: The Case of Private Rural Enterprises," *China Information* 5 (Winter 1990): 29-38。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清楚目前採用的區分經濟組織的分類系統含糊不清而且誤導人。例如，李成瑞，〈目前經濟領域分類及所有制構成的統計問題〉，《經濟研究》，1997年7月20日，頁63-67。

種金融能力上的差異，反映在各省貸與存（loan-to-deposit, L/D）比率的巨大差別上。例如，在國家銀行貸出的款與吸納的存款一樣多時，L/D的比率就是1.0。L/D低於1.0的，表示該省做為一個整體，貸小於存；L/D大於1.0的，代表該省的在貸資本要比其金融機構所吸納的存儲更多。L/D比率上的差異，表示中央正在某些省份實施金融（相對於財政）能力，並且正在重新配置銀行資金給其他省份。因此，資金的淨提供省份，比那些銀行資金淨接受的省份來說，對中央而言，可被視為擁有較小的金融能力。表2.7顯示，從1988年至1999年的各省比率是如何變動。

42

表2.7 國有銀行貸存比率比較：河南、福建和浙江（1988年至1999年）

年份	河南省	福建省	浙江省
1988	1.48	1.23	1.26
1989	1.42	1.18	1.19
1990	1.36	1.07	1.05
1991	1.28	0.96	0.97
1992	1.25	0.88	0.93
1993	1.20	0.95	0.92
1994	1.16	0.90	0.90
1995	1.12	0.83	0.81
1996	1.09	0.78	0.75
1997	1.13	0.75	0.77
1998	1.14	0.79	0.73
1999	1.12	0.79	0.74

資料來源：1988年至1993年的比率由拉迪（Lardy）的《中國未完成的經濟革命》（*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一書第226頁，表A2提供。1994年至1999年的比率由作者根據各年《金融年鑑》資料算出，1997年，第191、199及210頁；1998年，第194、202及213頁；1999年，第126、133及141頁；2000年，第153、160及168頁。

備註：全國平均貸存比率為1.0。

表 2.8 根據經濟派和國家中心派觀點組織的研究地點

經濟派的假說 → 國家中心派假說 ↓	商業活動較少的地區	商業活動較多的地區
國家能力較大的地區	偃師（河南）	洛陽（河南）
	南召（河南）	鄭州（河南）
	黃河邊四個村莊（河南）	開封（河南）
國家能力較小的地區		溫州（浙江）
	福州（福建）	泉州（福建）
	安溪（福建）	晉江（福建）
	長樂城外的四個山村（福建）	長樂（福建）
		惠安（福建）

在受到關注的這些特定省份裡，很明顯 L/D 比率在 1990 年代期間是下降的。然而，整體來說，國家從福建、浙江（東南沿海）比從河南（華北中部）在吸納存款上，顯示出更大的金融能力。河南一直是銀行信貸的淨接受者，而福建、浙江則從 1991 年起一直是國家資金的淨提供者。換句話說，儘管東南沿海較早開始從事經濟改革，中央在這些省份的國有銀行實施著更大的金融能力。³⁵

43 表 2.8 顯示了按照經濟派和國家中心派觀點劃分的研究地點的分布狀況（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北京市與上海市因其在改革開放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而刻意地被排除）。

如同我所期望的，在我提出的自變項中，研究地點也突出了差異性，即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如果當地政府更支持私營經濟，也就更可能認可非政府的金融機構（甚至是中國人民銀行所認定的非法機構）。在國家（譯註：此處「國家」是

³⁵ 「金融能力」不應等同於中央的「財政能力」。在保留財政稅收方面，南方沿海省份要比較窮的省份一直有著較為有利的談判地位。

作者在第一章第二節中提及的「國家—社會」意義上的「國家」，下同）支持私營經濟的地方，人們會預期有著更多樣的金融機構；而在國家不那麼支持私營經濟的地方，金融機構的種類就較少；在國家對私營經濟態度曖昧的地方，就會有中等程度的多樣性。我使用下列指標，來定性地評估地方政府（市、縣、鄉）「支持」私營經濟的程度：一、有一個積極活躍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負責登記和監管私營企業主活動的機構；二、一個積極活躍的個體勞動者協會，它是代表小企業主利益的群眾組織；三、事實上較低的稅率（靠問卷調查私營企業主自報的每月總收入中稅費所占的比例來衡量）；四、支持監管和發展私營經濟的內部政策文件；五、支持私營經濟及有關改革議題的公開輿論（表現在地方傳媒和公眾的政治運動上）；六、針對不同部門官僚與幹部的訪談，顯示對發展私營經濟的高度重視。

這些指標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方法，以評估當地政府在某一特定時間點的態度。然而，由於在1978年至2001年間國家政策環境中的大量變化，還有地方政治中的細微差別，因此可以說，要對某個地方對私營經濟的長期立場做一個總體評估，確實是一件很有挑戰性的事。³⁶ 在全國的層次上，1978年開始的農業改革最終使得個體農戶在完成國家的定額後可以為自己生產。³⁷ 但是直到1984年，自由化的改革才擴展到城市地

44

³⁶ 可參考Richard Baum對辯論的總結，*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5-23; cf.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York: Norton, 1995), 137-44; and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⁷ 注意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分田過程中，可以看到的相當大的地區性差異。

區；然而，在整個1980年代改革過程都是不平衡的和週期循環發展的。1989年的政治危機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標誌著經濟改革確實仍在繼續。2001年江澤民在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七、一」講話則象徵了另一個爭議的轉捩點，江指出私營企業主可以被准許加入共產黨。在某種程度上，改革的興衰變化和北京啟動的緊縮政策，在地方的層次上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動態過程。然而，具說服力的觀點也認為，經濟改革的過程更像是一個「上下顛倒」的過程。無數的研究都表明，經濟創新通常源自於基層，後來才被一個被動反應的中央政府所認可。³⁸ 關於從改革開放開始以來地方在指導當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我同意後一種的觀點。確切地說，地方已經展示了自己在政治不確定、派系主義以及變化不定的監管中的分量。但長時間下來，審視上述的六項指標，就足以讓觀察者知道某地對私營經濟的態度是支持、曖昧或是不支持。因此，經驗性研究的幾個章節呈現了地方上的政治氛圍，也不忽視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時代的整體發展態度。

45 在我的田野研究中，我試圖以一種系統的、理論上一致的方式從每一個研究地點收集相同的資訊。³⁹ 這策略包括了三個

³⁸ Carol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nging Political Patter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Daniel Kelliher,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8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Kristi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242-63; Y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130 (June 1992): 293-316; and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³⁹ 在社會科學中，這被稱為通過個案研究收集資料中的「結構的、聚焦的比較法」：Alexander L. George and Timothy J. McKeown, "Case

部分：第一、進行問卷調查個體戶，以及被選取的私營企業主（ $n=374$ ）；第二、訪問國有銀行、信用社和非正規金融機構的經理，政府官員，工商局及個體勞動者協會的官僚，婦聯幹部，學者和發展規劃者（ $n=186$ ）；以及，第三、收集與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稅務、社會分層、人口流動以及性別議題相關的資料。⁴⁰

因為許多小型企業主並沒有在工商局（負責管理私營經濟的機構）正式註冊登記，我並不依賴它的名單來選取問卷調查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每到一地，我首先取得當地學者或居民的幫助，找到零售中心和批發市場，以及在更邊緣的地方去尋找小徑、路旁、巷道和夜市中的私營商業，以求把未在工商局正式登記的私營經濟包括在內。我注意各個行業中（例如飲食、成衣與電器等）商販們的大致分布及其在規模上的相對差異，後來就將這些與官方有關私營經濟的資料進行比較。爲了要瞭解基層的市場環境，我同時注意到產品的市場區隔（例如僅出售一種產品的專業市場）和商販的社會經濟特徵（例如市場中從特定省份來的外來人口，或來自於某一特定國有工廠的前職工）。

在與當地居民和商販隨意地談及他們對當地市場的一般印象後，研究助理和我開始接觸個別的商販，將其列爲問卷調查的對象。潛在的受訪者被告知，問卷調查只是基於學術研究的目的，並且保證其匿名性。一般而言，將近60%我們所接觸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2 (1985): 21-58.

⁴⁰ 正式的訪談可以回溯到1994年夏天，在我開始此項研究的問卷調查之前。



攤販無奈三冬寒。河北省唐山，2000年1月。

46 的商販願意參與問卷調查。⁴¹ 值得注意的是，抽樣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系統抽樣」。例如，我們並沒有盡可能接觸每一個商販，也沒有採用「滾雪球式」的抽樣法（依賴受訪者去選取下一個受訪者），這樣會使整體的數據產生更多的抽樣誤差（附錄A討論了問卷調查資料中的限制與可能的誤差，以及如何糾正這些缺點）。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問卷調查的問題是口頭提出的，由助理或我本人來記錄回答。⁴² 我還會詢問進一步的問題，以鼓勵老闆們就生意的詳情、過往的經驗，以及幾乎所有一切的事

⁴¹ 回答率的計算如下：願意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主數量／被詢問到是否參與的企業主數量。

⁴² 在374份調查答卷（見附錄C）中，不到十份是由企業主自己完成。他們的教育程度高，覺得由自己核對填寫答案更快些。

情，加以闡述。完成一份問卷調查的時間，從半個小時到幾個小時都有。⁴³ 在一般的情況下，整個調查過程會被平日的商業活動打斷二至三次，約需 45 分鐘。我還會對那些有著特別有趣經歷的老闆進行非正式的進一步拜訪。

與官員、銀行業者和學者的訪談不像問卷調查那樣標準化，因為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專業領域。⁴⁴ 儘管如此，對同一專業領域的受訪者還是要詢問同樣的問題（例如，銀行經理們都被詢問與金融相關的問題）。幾乎所有的訪談都是由省、市、縣、鄉鎮級的官方所安排的，雖然有些是較不正式地通過朋友和熟人安排（與從事半合法或明顯非法經營的金融企業主，如高利貸者的會面，通常是透過非正式途徑安排的）。⁴⁵ 合在一起，與官員的訪談是爲了以這些中國精英對過去和當代的政治、經濟、金融和社會問題的理解來補充問卷調查的發現結果，更具體地說，以評估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中文的出版品（政策文件、學術著作與期刊、報紙、統計彙編）提供了更廣闊的經驗脈絡，我可以在其中建構自己的研究，並且來統整或澄清相互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調查發現。

47

⁴³ 有些問卷調查還會附帶參觀其生產設施或工廠，並且會見其家人，最後以一場宴會結束。

⁴⁴ 在全書中，我使用「問卷調查」(survey) 或「調查」(surveyed) 以指對私營老闆的正式問卷調查，而使用「訪談」(interview) 來指與未填表的不是企業主但是專業的放貸者（也就是金融企業主）的會見。同理，「受問卷調查者」就是指「答卷者」；「受訪者」就是指「資訊提供者」、「被採訪者」。「答卷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區別也見於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⁴⁵ 然而，我對興辦非法金融機構的金融企業主們的訪問，有些是由政府官員、政府雇員所安排的，這表明當地政府知道並默認其運作。有些官員實際上還爲這些從事金融業的機構能獨創心裁地發明出合法的偽裝而自豪。

表 2.9 非正規金融業制度化供應的假說及案例總結

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經驗案例	預測（制度化供應的多樣性）	實際結果
支持	福州（閩）	高（>6種）	高
	長樂（閩）		高
	晉江（閩）		中
	泉州（閩）		高
	溫州（浙）		高
曖昧	開封（豫）	中（4-6種）	中
	洛陽（豫）		低
	偃師（豫）		中
	鄭州（豫）		中
不支持	安溪（閩）	低（0-3種）	低
	海興（閩）		低
	惠安（閩）		低
	南召（豫）		低
	四個村莊（閩、豫）		低

研究發現的總結

如前所述，我主要論點是，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影響了非正規金融業中制度多樣性的程度。表 2.9 顯示，在我的 18 個研究地點中只有兩個不與假設的結果相符：晉江與洛陽，以黑體字表示。⁴⁶ 在所有其他的地區，預期與實際結果是

⁴⁶ 在整個改革開放時代，晉江縣的地方政府一直明確地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然而當地企業主並沒有發明出眾多類型的金融機制——或許是因為晉江的私營經濟已占優勢，較能夠獲得其他地區所無法接觸的國家

相符的：即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相對應於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多樣性。

很快地回頭檢視表 2.8，就會看到雖然經濟派和國家中心論的觀點似乎在表面上頗有說服力，但在幾個重要的個案中卻缺乏解釋力。除了在河南的四個研究地點（偃師、開封市、洛陽和鄭州）之外，如同經濟派假設所期望的，私營經濟更發達的地方確實有著較多樣的非正規金融機構。這也可以部分地說明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與私營經濟規模之間毫不意外的關係。但在討論河南的第五章中顯示的四個特殊案例，實際上強烈地支持著我的觀點，即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政策在影響非正規金融業的擴張或限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上述的每一個個案中，具體決策與政策都可被視為反映著地方政府在更深層次的發展與政治上的優先順序。即使在大部分人口仍在國有經濟中就業的地區，地方官員也默許私人借貸以富有創意的方式運作。

國家中心論在分析非正規金融業的政治學時，會期望私營信貸活動的地區差異能反映出中央的發展戰略在地區或省級的差異。但是，國家中心論的關注焦點太為廣泛，以致無法解釋中央政策與省以下各地經驗現實之間的鴻溝。最終，地方上的政治及經濟行動者會圍繞著中央的國家政策的限制因素來運作，設法將其改造以符合地方的既定利益。

49

地區和省級的差異重要嗎？簡短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不能說明私營金融的制度化供需中所觀察到的地區差異。然而，值

認可的金融機構的信貸。第二個異常的例子是洛陽市，政府有意培育私營經濟，但私營經濟的相對弱小，當地企業主繼續依靠有限的民間借貸和行業信用。

得注意的是，顯著的地區性差異存在於經濟的條件、與中央政府間過往的政治立場以及改革開放時代的歷程之中。

首先，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有些農村地區沿著更社會主義、更法人組織的集體形式而工業化了。主要靠鄉鎮企業完成農村工業化的地區，因江蘇鄉鎮企業的擴展而以「蘇南模式」著稱於世。蘇南的發展模式在毛的集體主義公社政策有很強勢力的地區似乎格外地流行。相反地，在毛的集體主義制度傳統較弱的地區，其工業化就採取了更為法人組織的私營化形式，因為私營企業在沿海浙江省溫州地區重現的特別早而以「溫州模式」著稱。⁴⁷ 這項研究所覆蓋的省份（河南、福建、浙江）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前幾十年裡繼承了相當不同的經濟遺產，這又反過來影響了各自在改革時代的發展。具體地說，河南省不像南方沿海省份，它在毛時代接受了大量的重工業投資。河南做為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和毛的工業發展三線策略的核心省分，發展成為了史達林模式的鋼、煤和軍工產品及設備的生產基地。⁴⁸ 另一方面，福建和浙江卻因其地理位置更靠近潛在的入侵者，而有計畫地不被發展成工業基地。這意味

50

⁴⁷ 對不同發展模式的極好研討，可見吳介民的“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n Socialist Reform: A Case Study of China’s Informal Privatization”(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⁴⁸ 1965年，國家計委為備戰頒布了一項經濟規劃，其中，中央政府集中利用其資源在中國的腹心地帶，即「三線地區」，建設戰略工業基地。它包括四川、雲南、貴州、陝西、青海、寧夏，以及山西、河南、河北和湖南的西部。所謂「一線」，包括沿海地區、新疆和內蒙古；「二線」包括一線與三線之間的地帶。總的來說，「三線建設」一般被視為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因為國家強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而輕視輕工業和農業。而且，專案的規劃與協調也不好。見 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351-86.

著，雖然河南的基礎設施和交通條件在改革開放前夕相對地更為發達，後來卻面臨著改造大型國有企業的包袱。這些大企業每家都有二萬到六萬名職工。除了要吸納因為農業改革而釋放出來的剩餘勞動力外，河南的經濟還要面臨著處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城市工業區失業工人的挑戰。⁴⁹

第二與此相關的，北方內陸與南方沿海省份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有著迥異的政治經歷。⁵⁰ 在後民國時代之初，中共的權力基礎最終是在北方得到鞏固，而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被稱為「反共分子」、「右派」和「反革命」）的運動，即使在新中國正式建立後多年還仍在南方沿海大張旗鼓地進行。⁵¹ 這不是說，北方省份能夠免於反右和其他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而是說，廣東、福建和浙江（它們與非共產黨國家相鄰近）在政治上會受到更大的猜忌，而北京感到與它鄰近的北方省份不那麼有威脅性。

第三（並且做為前兩個差異的後果），經濟改革的實驗特區和吸引外國投資的「開放城市」，首先是在廣東、福建而後

⁴⁹ 1996年夏，當我在河南時，失業工人和被拖欠工資的工人幾乎天天聚集在省市政府門前。在1998年，不滿工人的激烈事件大為增加。見《中國新聞摘要》，1998年1月15日（河南的下崗鐵路工人在北京爆炸自殺）；SCMP，1998年4月17日（有執照與無執照的煤礦工人間的爭鬥，導致河南平頂山發生爆炸，死亡55人）。

⁵⁰ 對中國歷史中長期存在的地區間差異的總體回顧，見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⁵¹ 可參考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浙江等南方沿海省份被批准的。換句話說，南方沿海在各項改革措施上起步的更早，這些措施包括對集體企業和外資企業實行優惠的稅賦待遇、成立出口加工區，甚至成立金融機構以支援這些新的交易。例如，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成立於1985年。⁵²而直到1990年代末期，中部和北部省份的合資銀行才被批准。

- 51 第四，中央政府透過正規金融體系對不同的省份運作著不同程度的「金融能力」。這都反映在上述的貸款／儲蓄比率上。

重要的是要具體指出，這些地區差異中的哪些部分在地方信貸市場上具有相關的經驗含義。⁵³主要的問題是，是否福建、浙江為一方、河南為另一方，兩者之間那些受國家所影響的省際差異，說明了非正規金融業的金融機制多樣性與私營企業主的融資策略的差異。如果真的是如此，那麼國家中心論的假設，就可以獲得驗證，因為省際差異能夠回溯到中央具體的國家政策；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就有必要檢視其他可能的原因。

在正規金融體系那巨大的地區差異中，南方沿海省份較早開始發展區域性的銀行以及其他受國家批准以吸引外資為目的的機構。而在非正規金融業中金融制度的多樣性方面，同樣存在著一個時間差。例如，在1978年至1984年的改革初期，南方沿海的某些地區很明顯已經發展（或恢復）了很大範圍的富於創造性的金融機構，以服務於當地的私營經濟，然而華北和

⁵² Kazuhiko Shimizu, "Breaching the Great Wall," *Institutional Investor* (June 1998), 95.

⁵³ 可參考，吳介民，"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n Socialist Reform."

華中的省份尚未產生超過鄉村地區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機構。這種差異當然可以歸因於南方沿海地區私營經濟發展較早的事實。然而，直到我進行田野研究時，福建與河南之間私營經濟發展的差距已經有所縮小。而且，在私營經濟發展和金融制度多樣性上的省內差異，和更廣泛的省際或地區間的差異一樣顯著了，如果不是更甚的話。福建（第三章）也有著金融選擇嚴重受限制的地區。同理，在河南（第五章）某些地方的非正規金融機構的類別與南方沿海地點的那些機構相比毫不遜色。更確切地說，河南的私營金融機構因為當地政策的限制而採取了些許不同的法人形式；儘管如此，多樣性仍然存在。如同表2.9所示，金融制度高度多樣性的地區確實位於南方沿海，然而金融制度多樣性程度較低的地區可以在南方和北方都看到。

區域內部存在的金融制度多樣性差異，對國家中心論觀點的解釋力提出了質疑，因為它期望著國家實施相對較小金融能力的地區有更大的多樣性。相反地，在國家實施較大金融能力的地區則預期有著較少類型的金融制度。簡而言之，國家中心論的觀點可以解釋金融制度多樣性的高等對中等水平的地區之間的差異，但這兩種省份中都存在金融制度多樣性極少的地區一事複雜化了這問題。這就需要比國家中心論觀點更符合實際的解釋來說明這樣的地區間差異。因此，本書就由檢視特定的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來補充分析中央政策及各地區在國家能力上的差異。

52

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可以解釋不同地區非正規金融業制度性供應的差異性；但是，決定私營企業主對金融機構的選擇的需求面問題，則涉及了要考慮企業主本身的個人特點。總體來說，在我所問卷調查的私營企業主中，有70%承

認參與了某種形式的非正規金融業。在有場外市場經驗的答卷者中，有80%使用過較不制度化的金融形式，37%使用過中等程度制度化（如信貸互助會）的非正規信貸機制，11%從更高等級制度化的場外市場來源獲得信貸。這些百分比加在一起超過了100%，因為20%的受訪者使用過低、中級兩種形式的貸款；5.7%使用過中、高等級制度化的形式；2.6%參與過非正規金融業的全部形式。儘管相互重疊，還是值得在傾向於高級或較低級制度化融資策略的企業主間做一區分，以澄清每一種非正規金融業的吸引力和運作邏輯。例如，為什麼有些企業主主要依賴高利貸，而其他人卻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仲介公司，這對於理解地方層次的市場區隔有著理論上與現實上的意義。具體的研究問題是，在特定的地區之內造成制度選擇差異的原因為何？經濟派的假設會認為，較高收入的私營老闆比較低收入的老闆更可能使用更加制度化的信貸來源——其含義是，掌握著較多經濟資源的老闆會更有條件來符合更加制度化的信貸運作所要求的更加標準化或更嚴格的成員資格。相反地，國家中心論的假設則採取更寬闊的視野，認為在國家擁有較小金融能力地區的企業主會使用更為制度化的金融活動。

- 53 此處提出的論點則是，在某一特定地區的私營企業主可能會選擇不同的金融機制，這取決於他們的個人特點。問卷調查資料確實表明，企業主融資策略上的差異取決於他們經營的時間長短、政治關係的強度、原居住地與性別。這些因素使他們能夠進入不同種類的網絡，這些網絡反過來又影響了對他們所能獲得的金融機制類型。表2.10中的雙變項關係顯示，私營企業主若有強大的政治關係、基礎良好的經營狀況、較高的收入並在本地經營，就更可能去選用高度制度化的金融機制。此

外，婦女和北方的企業主要比男人和南方的企業主更少使用高度制度化的金融機制。然而，請注意把企業主的收入水準與更加制度化的信貸形式聯繫在一起的經濟派的假設，表現出比其他指標較弱的顯著水準，這些指標顯示較低收入的企業主並不必然被排除在更有組織的金融仲介公司之外。除了收入水準外，企業主的其他社會和政治因素也影響著他們對場外市場金融的使用。

雖然雙變項關係顯示在表 2.10 中的所有變項都與代表金融制度化程度的變項有著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但其中沒有一個與後者有強烈的線性關係（linear relationship）。在雙變項關係中使用的皮爾森檢定（Pearson）產生的關聯係數（ r ）的範圍是從 +1 到 -1， r 的零值表示缺乏有系統的線性關係聯繫，而兩端的 +1 和 -1 表示有完全的線性關係。簡而言之，這些結果表示在代表金融制度化程度的變項與每個變項之間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但是卻缺乏線性關係。個別來看，沒有一個變項是私營企業主在選擇金融機構時從低級（1）到高級（2），或從中級（2）到高級（3）的直接原因。關聯的非線性關係表示了個別的私營企業主是依賴大環境而運作的。換句話說，影響私營企業主融資策略的具體因素，決定於每一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上。

54

比較北方（河南）和南方（福建、浙江）私營企業主所採取的金融機制制度化的描述性統計顯示，顯示存有地區差異的金融機制主要類別，是那些被分類為中等程度制度化的：即信貸互助會。具體而言，互助會在南方比在北方流行：問卷調查的企業主中，有 28 % 的南方企業主參與或正在參與某種形式的互助會，而北方只有 8 %。

表 2.10 雙變項關係單尾檢定的結果

影響金融制度化程度的變項	R	樣本數	含義
政治關係的強度	0.1570***	264	在強政治關係與高度制度化金融機制之間有高度的顯著關係
原居住地	-0.0872**	372	當地人顯著地傾向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機制
經營年數	0.2177***	263	有經驗的經營者顯著地傾向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機制
性別	0.1235**	264	男人更可能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機制
年度總收入	0.0991*	372	較高收入的企業主更傾向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機制
省份	0.1179**	374	南方的企業主更傾向使用更制度化的金融機制

備註：參考附錄 A 對這些變項的測量

*** 在 1 % 或低於 1 % 的顯著水準。

** 在 5 % 或低於 5 % 的顯著水準。

* 在 10 % 或低於 10 % 的顯著水準。

雖然有些觀察者可能想把當代河南省相對缺乏信貸互助會一事歸因於「文化」上的差異，但是文化的解釋站不住腳，因為河南和其他中、北部省份的人在改革時代之前確實參與了互助會。如前所述，最早有關互助會的文獻記載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的佛教寺院。在 20 世紀初期，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也會在不同的中、北部省份中觀察到使用互助會從事經濟活動以及辦理婚喪等社會和禮儀大事。雖然私營金融業在毛時代不准合法地經營，非正規的存貸團體卻常在單位的制度界線內存在，以提供工人急難救助的資金，或是用於資助購買昂貴的消費品。正如河南一位年老的布攤商販所說：「在毛的那個年代，

我們當鐵路工人每月只賺45元，但腳踏車和手錶一類的東西卻要一百多元，因此每個人就湊一小筆錢放在一起，然後根據需要輪流使用」。⁵⁴ 在各自單位參加過互助會的其他小販和受訪者，也表達了相似的感受。⁵⁵

既然河南省信貸互助會的活動直至文化大革命還存在，那就讓人好奇私營企業主為何不採用互助會來做為取得信貸的方便手段。然而，當考慮到單位的公共性質與私營企業主的個體性質兩者的差異，河南省私營企業主中互助會的相對缺乏就不令人意外了。在南方沿海，互助會在發展中的農村和郊區的婦女中特別流行——而非在前單位職工中。⁵⁶ 在河南，大多數問卷調查的受訪企業主都是城市人，他們原先都在國家單位工作，現在或是一邊上班一邊兼差，或是從國有單位下崗的職工。既然如此，先前的單位職工缺乏其他也需要信貸的人員所組成的關係網絡，也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農民的關係網絡中卻充滿了需要信貸的人們。⁵⁷

⁵⁴ 編號第26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在這位答卷者的鐵路單位裡，互助會很流行。每個會由七到八個人所組成，每人每個月出20元。當時因為有補貼，食物很便宜，但是消費品稀少且價昂。當問及他用這筆錢幹什麼用了，他說：「我當然記得清清楚楚，我用了150元買了輛腳踏車」。

⁵⁵ 在北方，這些包括編號第45、92、94號受訪者，以及問卷調查受訪者第195、199、202、217、239、245、261、262和291之中。

⁵⁶ 當然，福建省原本的單位工人要少於河南。

⁵⁷ 例如，可參考Yunxiang Yan,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3, 237。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河南被調查的個體戶代表了那些經歷過單位的共產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又選擇了本質上是私人性質的發財致富之路的人士。這些過去依賴國家的人士敢於脫離公共單位去爭取個人更高的生活水準。我猜想這些拒絕集體活動方式的行動（自覺或不自覺）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個體戶不組織會來籌措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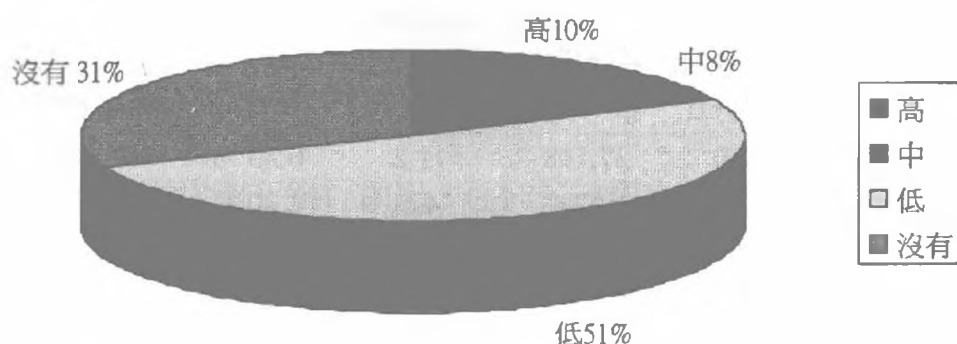
當我問河南的小販為什麼互助會在單位中不再流行，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因為人們比過去更有錢了。⁵⁸ 即便如此，事實依舊是許多私營企業主的資金卡在存貨上而一直面臨資金流動的限制。而且，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河南的企業主較其南方的同業們更依賴正規的金融機構來存錢，卻與南方同業一樣從事非正規的借貸（儘管不是以互助會的形式）。因此，雖然上述關於互助會參與的地區差異的解釋仍屬推測，但它基本上不影響整個觀點的邏輯。

56 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的，都從事某種非正規金融活動。而且，北方的問卷調查受訪企業主在取得高度制度化的信貸來源上（10%的北方受訪者，11%的南方受訪者）、或是根本不借貸上（北方是31%，南方是27%）都和南方同行差不多。這表示，參與非正規金融業的整體水平並不因省份而有差異（見圖2.2和圖2.3）。

如表2.11所示，南方和北方的問卷調查受訪企業主中，有62%的人曾經借錢給別人；問卷調查受訪的個體戶中，北方的有59%，南方的有近44%曾向親友、鄰居或同事借過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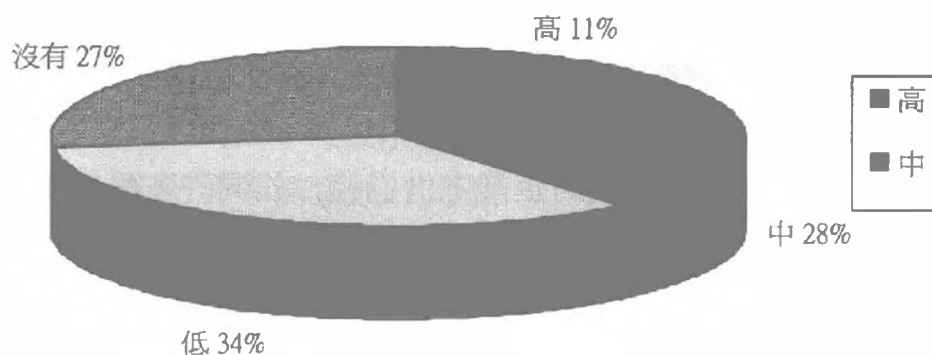
57 民間借貸的地區差異在數量、時間長短和利率上是顯著的。表2.11顯示，北方的貸方據統計貸出的金額要比南方的平均高出151%（每筆貸款27,118元對10,792元），在時間上也較長（11.2月對4.5月），然而利率卻較低（每月0.83%對2.8%）。而在借方（表2.12），貸款規模的地區差異卻是相反的：北方人提供較大的貸款，但卻借進較小的金額；南方人貸出的金額較小，但卻借進較大的金額。這種顯著的差異，可以歸因

⁵⁸ 布店老闆補充道：「只要毛不從墳裡重新還陽，人們就會繼續賺錢」。



資料來源：作者的問卷調查（1996年至1997年）。

圖 2.2 北方私營企業主金融活動的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的問卷調查（1996年至1997年）。

圖 2.3 南方私營企業主金融活動的分布

於許多因素。例如，大家都知道談論非正規借貸行為的資金細節具有潛在的敏感性，我的答卷者可能會低估貸款的數量；然而，如果這種誤差確實存在，各個地區應該都是一致的。另一種可能是，自稱借錢給別人的問卷調查受訪企業主沒有從同一批問卷調查受訪企業主那裡借過錢，或是相反的情況。換句話說，平均貸款規模43,003元的南方借貸者，可能並沒有向那些

表 2.11 描述性的統計：非正規貸款的區域比較

地區	有貸出經驗 的百分比	平均貸出 量（元）	平均貸出 期限（月）	平均利率 （月）	對貸出經驗 的滿意度
北方	62.0	27,118	11.2	0.83 %	77.0 %
南方	62.5	10,792	4.5	2.80 %	76.4 %

資料來源：作者的問卷調查（1996年至1997年）。

表 2.12 描述性的統計：非正規借款的區域比較

地區	有借款經驗 的百分比	平均借款 量（元）	平均借款 期限（月）	平均利率 （月）	對借錢經歷 的滿意度
北方	59.0	18,863	10.5	0.32 %	74.5 %
南方	43.6	43,003	6.1	1.14 %	83.8 %

資料來源：作者的調查（1996年至1997年）。

自稱借出平均 10,792 元的企業主借過錢。如同許多受訪者所說，「如果我手頭有錢借給別人，我就不會向別人借錢」。的確，曾有過既借出又借入貸款經歷的企業主只占受訪者的 43 %（北方）和 36 %（南方）。

然而，不論平均貸款規模的多少，南方企業主之間的民間借貸明顯地比起北方，傾向於期限更短、利息更高。這部分地
58 反映了南方沿海省份企業主之間的人際關係更為商業化。雖然向親友索取貸款利息遠不是中國的一般做法，日常需要流動資金並且明白銀行存款生息一事的私營企業主，逐漸更願意向民間借貸收取利息。他們對自己是否索取（或被索取）非正規貸款利息一事的反應，是明顯地兩極化的。大多數人（從事無息貸款的 93 % 貸方和 72 % 的借方）似乎對此問題吃驚：「你不能向需要錢的親友索取利息，那太難為情了」。索息和付息的答卷者（各自占問卷調查受訪者的 7 % 和 28 %）像別人一樣地

回答問題，只是在回憶借貸期限時稍停片刻。許多企業主和銀行業者指出，當中央銀行大幅削減存款利息時，民間借貸索取利息的情況就逐漸增加。這種現象的理論基礎是，投機取巧的存戶會把錢從國有銀行領出，而向緊缺現金的企業主提供高息貸款以賺更多的錢。當然，中央銀行將此類行為視同非法的高利貸加以譴責。⁵⁹

至於企業主對於參與非正規金融活動的一般看法，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問卷調查受訪小販，對於曾借錢給他人的經歷表示滿意。許多受訪者這樣說：「我不介意幫助其他的生意人」。但是，民間借貸並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無關痛癢或平安無事。談到自己借錢給親友時所受到的社會壓力，許多受訪者在問卷中補充了自己的看法，幾位小販指出：「借錢給別人確實不是個『滿意』或是『不滿意』的問題」。「即使你不想借錢，當熟人向你借錢時，你也沒法兒拒絕」。有些小販明確地對在社會壓力下借款一事「不滿」：「我不得不借，當別人知道你有錢時，拒絕別人很尷尬，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滿意這種事情，我在做生意，所以我手頭上必須能靈活週轉」。對非正規借貸一事不滿的人，往往遭遇過拖欠和賴帳。即使在借、貸雙方之間借款的期限並不總是確定的，但一旦貸方看到借方仍沒還錢卻在積累財產或購買奢侈品（辦理婚事除外）時，妒恨的情緒就會開始滋長。一家便利商店老闆抱怨說：「我不明白債務人欠了我三年的錢沒還，卻厚著臉皮在我面前騎一輛新摩托車招搖。我出於好心幫忙朋友，可是他甚至連還錢的意願都沒有。」至

59

⁵⁹ 例如，1996年5月，中央銀行削減存款利率後，報紙報導資金從銀行逃逸，伴隨著地下高利貸的增加。據報導，非正規金融業的利率要比官方銀行利率高30%至100%。〈警惕社會集資熱重新抬頭〉，《報刊文摘》，1996年6月10日，摘自《人民日報》，1996年6月30日。

於債務人或（互助會）會頭不打聲招呼就從城裡消失一事，就更讓人不滿了。

只要國有銀行體系仍舊是需要持續補貼的國有企業這個社會主義遺產的抵押品，私營企業主就無法獲得正規的信貸來源。儘管中央政府努力減少國有銀行政策導向的貸款，地方政府仍持續面對當地的政治壓力以防止大規模的失業，並指示銀行貸款向戰略性產業傾斜。

小型企業主無法從官方銀行借貸一事，並不侷限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在中國歷史上，小生意一直是依賴著非正規金融機制；即使是在毛的時代，當私營活動被嚴厲限制時，個人會轉向基層的信貸活動去籌措其消費（如果不是為了生產）所需。然而，毛時代中國非正規金融業那分散零星的財力，與1970年代末以來為私營經濟服務的金融機構持續不斷的增長相比，就顯得太微弱了。為了理解為何這種增長在地方層次上如此不均衡，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本能地轉向中央去尋找在國家導向下經濟扭曲的證據。

經濟發展條件的巨大地區差異，可能確實能追溯到具體特定的國家政策；在毛時代，國家投入了更多的資本在北方的內陸地區；在後毛時代，則允許南方沿海地區從事較大的經濟試驗。儘管如此，即使像河南這樣的重工業地區也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多種場外市場機構，此一發現表明非正規金融業的重新出現並非只是國家導向發展政策的結果。的確，私營經濟發展的重大地區內差異、非正規經濟金融制度多樣性的程度、私營企業主對金融機制的選擇等，都向國家嚴密控制觀點的解釋力提出了挑戰，並要求對於地方政治經濟條件進行更為豐富的脈絡分析。

第三章

福建省金融業的性別世界

張先生這個團體的30位成員應邀於7月18日到他家聚會。他們如約而至……以幫張先生解決籌錢的急需，他為他們準備了一餐宴席。資金互助會以後每次聚會都有一次宴席，但是在第一次宴會之後，每個成員就各付各的。 60

——悉尼·甘布（Sidney D. Gamble）

《中國存儲互助會》，1944年

男人們通常不入會，因為他們覺得為了一筆小錢犯不著費這麼多麻煩事。婦女們則有更多的時間去組織這類會……月會也提供了她們互相認識的機會。

——男性受訪者，福建，1996年田野筆記

發展的多樣性使得南方沿海的福建省成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的縮影。在一端，經濟自由化和外國（台灣的）直接投資的巨大影響在東部沿海一帶隨處可見：經濟高速增長，大興土木的工程項目，其典型就是廈門經濟特區。在另一端，福建省內陸山區一大片農村卻依然貧窮。¹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散 61

¹ 即使福建省的總體貧窮率自從改革開放初期以來已經降低，這樣的現象仍舊存在。請參考Thomas P. Lyons, *China's War on Poverty: A Case*

布著許多城市和縣城正在模仿它們富裕的鄰居靠發展非國有經濟和吸引外資的成功經驗。²除了這些經濟結構差異的複雜性之外，福建還是中國在人文上最為豐富多樣的省份之一。考慮到經濟和人口上的差異，可以形成一個有力的方法論上的觀點：福建應該被放在省內比較的視野下研究，而非將其僅僅視為一個代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個案研究。³概述福建幾乎就像把中國當作一個整體來概述一樣困難、引起爭論。

省內私營經濟發展差異的現實，有助於解釋我在福建訪問過企業主和官員的幾個地區金融制度多樣性的不同程度。具體來說，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態度影響著非正規金融業的發展。福建的有些地方明確地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福州、長樂、泉州、晉江）；其他的地方則不那麼支持或更著重於促進集體經濟（海星村、惠安、安溪）。每一地所產生的大量場外市場機制，與其說是市場的邏輯，不如說是當地政府優先發展策略的反映。換句話說，地方私營商業的存在，並不意味著非正規金融機構就會像經濟派假設所預期的那樣會自動地湧現。

在方程式的需求這一方，較不顯眼的基層現象一直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婦女對於信貸互助會的主宰。我的研究顯示，這些互助會在福建婦女中的流行程度，會隨著當地經濟結構與人口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1985-199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但是在1997年中，福建省有12個縣與209個鄉鎮仍被官方列為「貧困縣」。福建省政府計畫於1997年底前提高507,000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請參考1998年11月福建省政府網頁：

<http://www.china-window.com/Fujianw?jianjie/2010/w/20104k.htm>

² 請參考 Thomas P. Lyon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Fujian: A Sourcebook*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³ 參見 Thomas P. Lyons, "Fujian: Challenge to the East Asia Development Model?" *American Asian Review* 16, 1(1998): 3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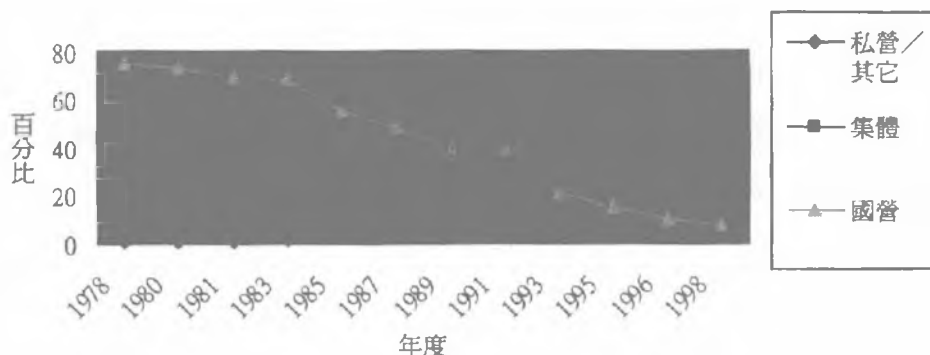
趨勢而有所不同。此一發現與更廣泛視野的觀點的邏輯相一致，該觀點認為社會及政治的因素重要地影響了小企業主們融資的手段。即使在資本稀缺的環境中，企業主的身分和資源也有很大的差異，這就足以形成地方上信貸市場的區隔。

福建的經濟與金融環境

首先，值得重申的是，福建的許多地方有著高於全國平均增長率的工業產值和人均GNP（每年約高出20%至25%）。⁴ 62 這種增長通常都可以回溯到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擴張、海外華人的投資、輕工業產品與成衣的出口。諸多因素綜合的效應在省級統計報表上清楚地顯示了工業產值中非國有經濟份額的增長，以及向第三產業（服務業）比重增加的結構轉變（見圖3.1及圖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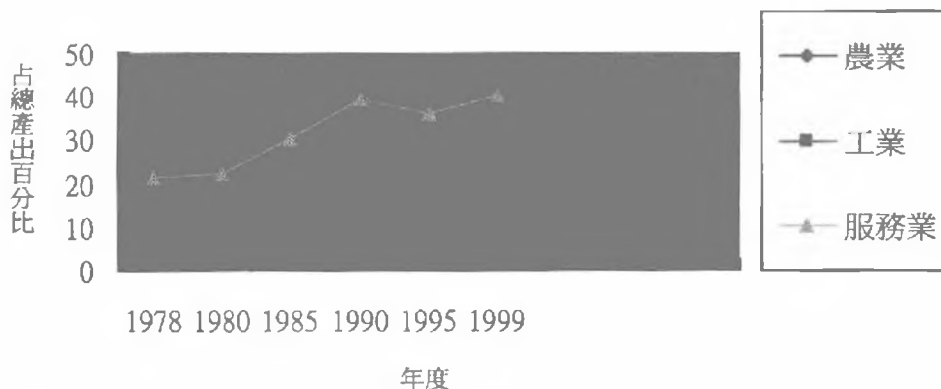
大多數本地經濟學家都將南方沿海省份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成功歸因於毛時代此地的未開發，當時由於這些南方沿海省份靠近台灣，被視為戰略地理上的敏感地區，因此中央把主要投資集中於北方的內陸省份。他們認為，1970年代末期改

⁴ 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較為富庶的南方沿海省份，例如福建，在生活水準上也存在重大的省內差異。請參考Zhao Hui and Wei Yu, "Zhanwang weilai, renzhong daoyuan: Fujian juxing jiti gongsi" 〈展望未來，任重道遠：福建巨興集體公司〉，《發展研究》，1996年，第8期，頁6-11。Zhou Ji and Liu Bingwen, "Shilun Fujian pingkun diqu de kedai fazhan" 〈試論福建貧困地區的替代發展〉，《發展研究》，1996年，第2期，頁32-33。1980年代一個在安溪關於扶貧的成功個案研究，請參考Thomas P. Lyons, *Poverty and Growth in a South China County: Anxi, Fujian, 1949-1922*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4)。



資料來源：《福建統計年鑑》，2000年。

圖 3.1 福建省工業產值中各種所有制形式所占份額 (1978年至1999年)



資料來源：《福建統計年鑑》，2000年。

圖 3.2 福建省三大產業的產值比例 (1979年至1999年)

63 革開放的到來，釋放了幾十年來企業主被壓抑的活動能量。改革開放時代造成南方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區域增長差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由於中央政府的開放政策指定了某些沿海地區做為經濟改革的經濟特區。⁵ 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成立於1980

⁵ 相關的綜合討論，可參考George T. Cr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年，它們是廣東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的廈門。表3.1顯示了福建省外資的大幅增長。到了1995年，外國直接投資（FDI）占了幾乎一半的全省固定資產投資，而外國直接投資的80%都來自於香港和台灣的投資者。⁶經濟特區的存在增強了這些省及鄰近地區政府的意識，即偏離社會主義經濟規範的做法是可被容許的，特別是當北京的領導人視察了特區並讚揚其進步時，更會加強它們的這種感受。例如，1988年初趙紫陽視察福建後，就帶來了閩南一系列增加開放縣和區的改革措施；此後不久，全省都變成了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官方改革試驗區。⁷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高層領導人每年的視察也有利於加強此次由鄧的著名南巡所引發的經濟自由化的綠燈效

64

Chong-dong Pak,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ir Impact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7); and Xuiping Sun, *New Progress i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7).

⁶ 官方的統計數據只間接地反映了香港做為台灣與福建之間貿易中介的事實，官方的數據顯示在1980年至1985年間香港從福建進口的總量增加了42.9%，但是在1985年至1991年間，當台灣與福建之間的直接貿易較為正常後，上述的總量就衰退到14.2%。在同一時期，福建從台灣進口的總量每年成長超過34%（是早期的三倍之多）。可參考Robert F. Ash and Y. Y. Kueh,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Greater 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betwee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China Quarterly* 136 (December 1993): 711-45.

⁷ *Fujian ribao* (《福建日報》), January 29, 1988, cited in Shawn Shieh,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Reforms in Fujian Province," in Peter T. Y. Cheung, Jae Ho Chung, and Zhimin Lin, eds., *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316。對於福建在1979年至1989年間經濟改革經驗的更多討論，可參考Shawn Shieh,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1978-90"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應。⁸

在這種更寬容、對市場更友善的政治態度下，福建省與其他省份相比，就有了比平均水平更多種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以1995年而言，福建省正式登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就有信託投資公司（1,034家分社）、農村信用社（948家）、城市信用社（115家）、保險公司（105家）、郵政儲蓄（471家）和當舖（21家）。⁹此外，成立於1988年的合資股份商業銀行，福州興業銀行，到了1998年已經擁有225家分行。¹⁰該省還自稱有21家合資或全部外資的銀行在廈門、福州和泉州設有辦事處。然而，除了當舖和郵政儲蓄外，這些金融機構旨在為外資或大型工業企業服務，而不是為較小的企業服務。而且，如表3.2中所示，總的來說，私營企業只能獲得極小一部分的官方短期銀行貸款。以1996年為例，福建的個體和私營企業僅獲得1.6%的短期銀行貸款——雖高於當年0.5%的全國平均水準，但仍比不上私營經濟對福建工業產值的貢獻：1996年，私營企業至少占工業產值中的15%，如果把偽裝成集體企業或其他種類的私營經濟都計算在內的話，可能高達70%。

雖然私營企業主只獲得銀行貸款的一小部分，但較大規模的私營經濟已經想出了一些獲取銀行資本的融資策略（見第四

⁸ 李鵬分別在1993年與1995年視察，接下來的江澤民於1994年，楊尚昆在1996年，喬石在1997年，李瑞環在1998年視察。如同在中國新聞界的習慣，這些高層的視察在全國與地方上都廣為報導。請參考，FBIS-CHI-94-124，95-029，97-099，96-019，97-349，98-320。

⁹ 《金融統計年鑑》，1997年，頁198。在1997年城市信用社開始正式轉型為商業銀行，其正式名稱為城市合作銀行。

¹⁰ 大部分分行位於福建，但是在上海與深圳也擁有分行，並在北京設有辦事處。可參考“Fujian Industrial Bank Reports Rapid Asset Growth,” Xinhua News Agency, September 1, 1998, reported in FBIS-CHI-98-244.

章)。簡而言之，包括登記成「集體」企業、利用一個外國人（但不擁有資本）的名字登記成「合資企業」，以較高的利息向能獲得銀行資金的國有企業借錢。然而，較小的生意就不太可能依靠這種策略，因為他們經營的規模不可能擔保定期的大筆資金，或是無法解釋在使用這些欺騙性手段時所涉及的潛在風險。個體戶採取極端手段以獲取貸款的意願因地而異，也受到當地官員故意忽視（或甚至寬容）這種活動的意願所影響。

表 3.1 福建省的外國直接投資（1979 年至 1999 年）（百萬美元）

年份	外國直接投資合同金額	外國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金額
1979	1.05	0.83
1980	4.64	3.63
1981	19.06	1.50
1982	16.12	1.21
1983	21.20	14.38
1984	200.97	48.28
1985	376.81	117.82
1986	64.56	61.49
1987	117.53	51.39
1988	462.60	130.17
1989	902.58	328.80
1990	1161.83	290.02
1991	1448.71	644.49
1992	6351.01	1416.33
1993	11336.17	2867.45
1994	7179.46	3712.00
1995	8906.47	4038.81
1996	6535.72	4078.76
1997	4537.51	4196.66
1998	5001.50	4212.11
1999	4899.96	4024.03

資料來源：《福建統計年鑑》，2000 年，頁 293。

表 3.2 福建省短期銀行信貸的分布（1993 年至 1996 年）

貸款類型	1993	1994	1995	1996
國有工業	32.6%	31.6%	30.9%	30.7%
國有商業	29.0%	29.6%	29.8%	28.6%
國有建築業	2.9%	2.8%	2.9%	3.9%
農業	6.5%	5.9%	5.9%	5.8%
鄉鎮企業	8.1%	8.2%	7.9%	7.9%
私營企業	1.1%	1.2%	1.5%	1.6%
「三資企業」 ^a	10.7%	9.3%	9.7%	10.4%
其他	9.1%	11.4%	11.3%	11.0%
總貸款（10億元人民幣）	55.41	69.89	86.15	106.0

資料來源：《福建統計年鑑》，1997年，頁33（直到1993年的省級年鑑中才出現「短期貸款」這一項。1996年後，《福建統計年鑑》中從此表中刪去國有建築業、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其他的短期貸款）。

a：中文「三資企業」指的是三種部分或全部由外國擁有的企業：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經營及外國獨資企業。1979年7月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資及外國獨資企業法》批准了這三類企業。

福州市：歡迎外資和私人資本

做為福建的省會，福州是閩北地區的商業中心。從改革開放開始，它就從台灣吸引了大筆的資金，並從安徽、江蘇、四川、河南等貧困省份引入大量的民工。¹¹ 1984年，福州被批准為「開放城市」。¹² 從那時起，根據官方統計，當地經濟在

¹¹ 在1995年，根據官方統計，福州最高峰時期擁有超過60萬的流動人口，但是其中只有26萬人是合法登記的。可參考《福州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頁176。在1995年終，福州市擁有560萬人口，其中約140萬人住在市區。

¹² 國務院批准了福州做為沿海開放城市後，1985年1月成立了馬尾經

工業產值、出口總值和外國直接投資金額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速率（見圖 3.3 及圖 3.4）。而且，市政府日益積極地改善基礎建設項目，使該市對外國投資更具吸引力。當我進行研究時，福州的市容已經從狹窄的街道、兩層木板房屋和低矮水泥樓房，轉變成高聳的新城區商業高樓、西方速食連鎖店遍布、居住小區的樓房鑲嵌著白瓷磚和天藍色的窗戶、寬廣的馬路以及其他正在大興土木的建築展示著它最近增加的財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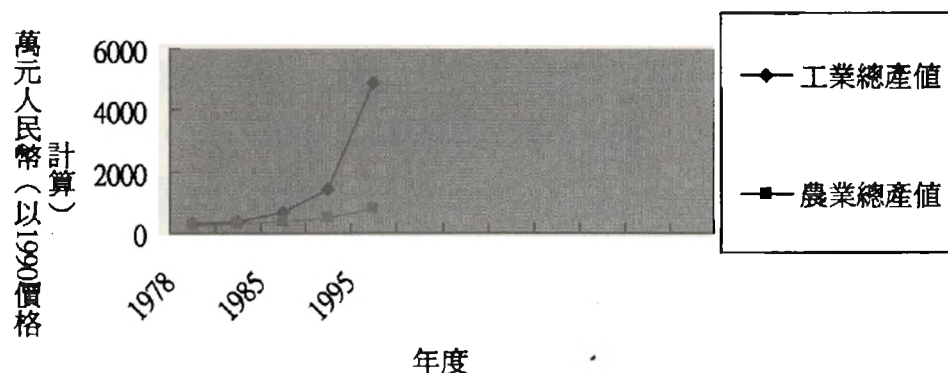
當地政府也鼓勵全市私營批發零售市場的發展，這些市場吸引了鄰近農村和郊區的個體戶們。從 1993 年年中起，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興建了一些專業批發市場，其中有鋼鐵產品市場、建築材料市場、汽車零件、海鮮市場和糧食市場。五個區級的工商局（鼓樓、台江、蒼山、馬尾和金安區）也為批發零售交易設立了專業市場的區域。到 1997 年末，整個福州市有 377 個商品交易市場。¹³雖然工商局批准設立的市場對其所驅趕的（至少是暫時的）未登記的無照經營來說，可以說是破壞性的，但是一旦市場興辦起來並營運下去，這些市場就會提供個體戶們一定程度的庇護，使他們免受那些流動小販經常遭受的強徵暴斂。例如，在福州的一個典型果菜零售市場，每一個攤位每個月都必須繳交一定的攤位費，其中包括工商稅和治安稅。然而在街上游走的水果小販可能要交五倍之多；因為各種機構的辦事人員可能紛紛前來徵收各自的稅費，而不去考慮小販身上累積的「稅收」負擔。這種既是發展型又是掠奪型的

67

68

濟技術開發區。在鄧小平南巡之後，馬尾又成立了另外四個經濟開發區，包括農業科技園區，福州保稅區、福州科技園區。福清也同時成立了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

¹³ 福建網，http://www.china.org.cn/Fujian_w/cityFuzhou/fzgl/ea-5.htm，1999 年 3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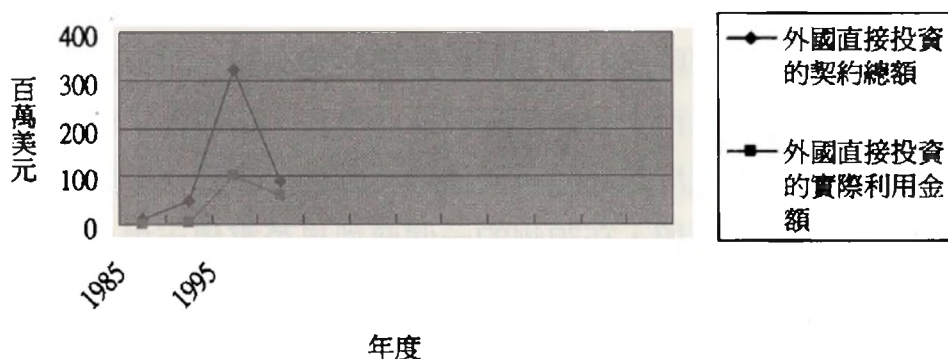


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978年至1995年）：45.2%

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978年至1995年）：9.8%

資料來源：《福州統計年鑑》，1996年，頁270-271。1995年後，《福州統計年鑑》停止以1990年不變價格來計算工農業總產值。

■ 3.3 福州市工農業產值一覽表（1978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福州統計年鑑》，2000年。

■ 3.4 福州市的外國直接投資（1985年至1999年）

弔詭共處的地方政府狀態，將在之後的章節中進一步探討。至於現在，雖由工商局和市政府興建的官方市場絕非毫無問題，但總的說來，這些市場代表了為私營企業主和國家地方官吏之

間提供更規範（而不是個人化）的互動關係邁出的第一步。

雖然地方政府積極地建構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並強化對私營企業主的管理，特別是在1990年代後期，但是在促進私營經濟獲得官方信貸一事上卻一直不那麼主動。這並不是說，私營企業主不可能獲得銀行貸款，而是說官方批准的金融機構缺乏經驗和制度授權以滿足小型生意的資金需求。在實際情況中，個體戶在貸款程序中面臨了各種官僚主義的刁難。如果申請貸款者與銀行內部的人有較強的社會關係的話，這些障礙可能會多少減少些。但是除非這個內部關係人是信貸官員或是高層管理人士，否則，整個貸款過程還是相當麻煩的。

69

例如，一位農民想從中國農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來養鴨。1996年，張先生是位51歲的不識字農民。¹⁴ 他與妻子以及兩個兒子整日種田，直到1991年時，他決定從事養鴨業。1993年，他在台江中心批發市場肉禽區上租到一個攤位，年租金八千元（966美元），另外還有其他的費和稅。他對於自己在攤位上幹半天（從清晨六點到中午）、下午就回家去養鴨的工作狀況很滿意。然而，張先生覺得自己的生意並不太賺錢，經營鴨子生意的發展並不容易。當他最初養鴨時，他需用錢來修建一道籬笆，以便圍住他那破舊失修的房子，還有孵鴨蛋的溫控室。他向一些朋友借錢，包括一位曾在中國農業銀行當地分行的低級職位上幹過幾年的朋友。那位朋友將張先生介紹給負責的信貸官員，為他說幾句好話，並幫他填寫貸款申請表。張先生申請了一年期的一萬元貸款。信貸官員想要親眼看看他養了多少隻鴨以及養鴨的狀況。由於信貸官員頭幾次來訪的印象不

¹⁴ 編號第99號問卷調查受訪者。為了保護答卷者的真實身分，所有的名字都使用假名代替。

佳，張先生先從親友那裡借了兩萬元來修建必要的設施，又買了一台電孵化器。當然，借這筆錢的目的首先是想加強自己的生產能力。但是他對於是否能順利得到貸款卻也沒有自信。經過了八個月的申請流程、審查開會、實地調查，農業銀行最後貸給了他一筆八個月期限的八千元貸款。爲了償還農業銀行的貸款，張先生向親友又借了三萬元。回想起來，張先生認爲農業銀行不值得他花這麼多時間，同時也靠不住。

雖然從事小額信貸的人普遍認爲，官方銀行不與個體戶打交道是由於小型貸款涉及許多的交易成本，值得強調的是，個體戶的資金需求還是相當大的。張先生最初低估了養鴨的成本，最後卻在兩年內借了總計達五萬八千元（7,006美元）的資金。

- 70 另一位出身農民的老闆萬先生從一開始就知道，他需要一大筆錢去購買設備，然而他在試圖獲得銀行貸款上卻頗爲灰心。¹⁵ 1986年，萬先生這位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民種田剛好夠養活一家四口人。由於他週遭的農民似乎都離開土地去做小生意，萬先生決定試著賣日用百貨，但是發現太多的人都在賣同樣的物品。1994年他做出一個轉換經營戰略的大膽舉動，開發新的市場——電子遊樂場。他的理由是，嬌生慣養的城市孩子都有零用錢，願意花在不昂貴的電子遊戲機上。他設想在鎮中心租一家店面，擺上十幾台彩色遊戲機。或許父母忙碌時，會把孩子放在他的小店裡消磨時間，而大一點兒的孩子也會在放學後來到店裡玩遊戲機。問題是每台遊戲機價值四、五千元，這對當時月收入徘徊在三百元左右的他來說，是一筆天文數字。他想去工商銀行借一筆創業資金，但是妹夫告訴他，國

¹⁵ 編號第49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有銀行是不會借錢給他去買投幣遊戲機的，因為遊戲機被認為是變相的賭博。¹⁶ 萬先生最後以24%的年息（比銀行利率高得多）向親戚借了四萬元（4,832美元）。

到了1996年中，52歲的萬先生在城裡交通方便的街上租了一間不大的店面並且僱了三個人。他的15台遊戲機每週七天，一天營業15個小時。他解釋說，每次遊戲三毛錢，他的顧客通常一次花10元到40元，因為每次遊戲很短，孩子們站在遊戲機前一玩就是幾小時。然而，儘管生意很好，萬先生還是擔心無法還清債務。他每個月的收入約在4000元左右，但扣除了他的利息（800元）以及運營費用（房租500元，電費600元，工商稅50元，營業稅200元，還有工資1500元），他只有淨賺約350元。

如同鴨販張先生的經驗，福州市大多數的小企業主並不會自找麻煩去申請國有銀行的貸款。他們反而是像萬先生那樣去向親友借錢，並依靠其他非正規來源，例如鄰里的高利貸、地下錢莊、當舖或是信貸互助會。這些來源通常要索取比國有銀行更高的利息（1996年為月息約1.2%），但是利率取決於貸款金額以及借、貸雙方的關係。例如，少於一千元的借款，親友就傾向於不收任何利息，但如果貸款超過一萬元，那麼受訪者認為，他們感到有責任付給貸方至少和銀行存款一樣的利息，以補償親友在利息上的實際損失。正如許多小販所指出的：「現在人人都需要錢，因此你不要想利用親友的慷慨來借錢去發財，然後還錢時又不給利息。那有點忘恩負義，你也會沒有

71

¹⁶ 電子遊戲機和其他與賭博相關的遊戲事實上成為反賭博運動打擊的對象，可參考〈福建打擊賣淫與賭博〉，《中國新聞社》，1995年10月31日。

面子」。另一方面，通過高利貸者或錢莊借款，也避免了親友間不好決定合適利息的潛在尷尬，而高利貸者本來就是要索取高息的。一位賣海鮮的小販曾經從高利貸者手中借過十萬多元，他解釋說，依靠他們做為營運資金的經常來源（月息甚至高達11%）較為容易，因為他不想每次需要進一大批海鮮貨物時都去麻煩親友。¹⁷

至於參與輪流用款的信貸互助會，無息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在傳統的「輪會」中，集體的錢輪流使用，每個人都有一次機會。這意味著，其中有的人必須等幾個月才輪到自己；當代的互助會通常向先用錢的人收取較高的利息，而後用錢的人則獲得這些利息。另一種收取利息的「標會」，是今日福州最主要的使用形式。即使互助會給人不正規的外觀，但會員們都很認真地遵守規則，通常都以契約書的形式記下具體的規定，每個人都要在上面簽名。

福州標會的規則是由一位經營餅乾和乾果的小販提供的。通常是讓會頭第一個月用錢。在這之後，基本的概念是，每個月會員們秘密地寫下他們的「投標」——他們願意付給他人的利息。誰出的標價最高（願意付最高的利息），誰就得標可以使用當月的錢。書面的規則如下：

標會的啓始日為1995年4月20日。會員每人繳納兩千元。包括會頭在內，標會中共有37人。每月例會定於單月的10日、雙月的5日和20日，一年共聚會18次。例會當日下午兩點還不開會就算無效。最低的標金為350元，得標者應與其保證人一同來取錢。

¹⁷ 編號第10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在無法預料的情況下或是會員在投標後三日之內不能交出會款，其保證人應對此負責，並代其交納。會員應在投標後兩日內交出會款，得標者應在投標後的第三日前來取錢。¹⁸

規章的其他部分還包括所有會員及其保證人的姓名以及過往會議的財務記錄。

在福州，入會者似乎都集中在特定的外來企業主中。許多本地人甚至不熟悉這種做法，而是依賴向親友直接借錢；但大量入會者存在於福建其他各地的外來戶占據的市場。例如，從連江縣來的成衣商販多在市郊洪山鎮，來自長樂的皮件批發商、來自福清的乾貨食品批發商在台江批發市場組織互助會。如同福建省其他地方一樣，婦女在互助會中占了大多數，這反映了家庭經營的性別分工，丈夫外出補貨，而妻子顧店和管帳。¹⁹ 因為這麼多的個體戶，特別是婦女，幾乎一整天都待在店裡，會頭通常會直接到店裡去收每個月的會錢。²⁰ 如此一來，有些會員從來沒有見過面。²¹

老闆們常對會頭「上門服務」的便利性表示滿意。例如，冰女士1996年時是一位26歲小學畢業的老闆，她和丈夫一起經營一家送外賣的速食店。²² 夫妻兩人1995年離開福清到福

73

¹⁸ 第12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的補充。

¹⁹ 在農戶中，這種角色可能會相反：丈夫會待在家並在田裡工作，而妻子則到市場販售農產品。可參考對第14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的調查。

²⁰ 根據141個福州個體戶有效問卷調查受訪者的回答，這些店一天平均營業12個小時。

²¹ 17%的福州問卷調查受訪會員指出，他們並不認識互助會中所有的會員。

州市的台江批發中心開始做生意。光線昏暗的二手批發市場式的綜合市場裡，五英尺寬八英尺長的攤位的簡樸景象使你想不到他們批發生意所需的資金規模。他們每個月的經營成本是28,360元（3,426美元），每個月還要花二萬至三萬元來添購存貨。²³ 夫妻兩人經常面臨資金緊缺的問題。他們曾經從當地的工商銀行借過一萬元，但是決定以後再也不從那裡借了，因為貸款需要複雜的手續並有一萬元的上限。冰女士說，她寧願向朋友、高利貸或地下錢莊借錢，一次可以借到三萬元。此外，她還加入了有50至60名會員的互助會，每人每個月繳交一千元，這就意味著當她用錢時，就有五、六萬元的現金（6,040美元至7,248美元）。冰女士最喜歡互助會的優點是，她甚至不需要出席每月和每半月的例會。會頭會直接到她市場的店裡去收每月的會錢。而且，即使這意味著她並不認識互助會的所有會員，她也不用擔心其他人有拖欠的可能，因為會頭是她的一位好朋友。

總而言之，福州市積極促進外國投資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反映在相對來說範圍廣泛的官方批准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例如，信用社）上。然而，從個體戶的角度來看，問題在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並不為小型的私營經濟服務。這些個體戶轉而去尋求種類繁多的非正規金融機制，其中包括民間借貸，從高利貸、信貸互助會、地下錢莊等處借款。重要的是，當地官員知道福州這些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存在，但是並不去干涉其運作，

²² 編號第120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²³ 同前註。每個月28,360元的開支包括租金（15,000元）、電費（60元）、工商費（800元）、營業稅（4,500元），以及儲藏設備費用（8,000元）。

因為這些機構是地方經濟重要的一部分。

長樂縣／市：私營企業和私營金融

長樂屬於福州市管轄，直到1990年代初，它還只不過是一個貧窮的漁村而已。²⁴ 1995年，由於城市人口與財政的增加，福建省把長樂由「縣」升級為「市」。在改革開放的前15年中，長樂的GNP增加了8.2倍；工業總產值增加了58.3倍；農業產值與工業產值的比率由7：3變成了2：8。²⁵ 表3.3顯示了長樂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在1990年至1999年間也增長了。

與福建沿海的其他城市化地區一樣，1992年後，經濟增長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擴展上。1990年至1995年間，國有企業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3.5%；鄉鎮企業為46.3%；而對外出口則增加了38.7%。²⁶ 新的農村工業包括紡織廠、鞋廠、飲料罐廠、一家醫藥研究所、建築業、電子零件廠，還有一些輕、重工業的工廠。除此之外，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還利用長樂沿海的資源，集中發展與漁業有關的生意。海星村的例子就顯示了一個長樂市行政村典型鄉鎮企業的發展動態。²⁷

²⁴ 長樂的行政中心位於福州南邊40公里處。

²⁵ 《長樂》，福州：海豐出版社，1994年，頁11。

²⁶ 《福州統計年鑑》，1996年，頁199-201；《福建年鑑》，1996年，頁299。

²⁷ 編號第145號問卷調查受訪者以及第79號受訪者。

表 3.3 福建長樂三大產業的分布（1990年至1999年）

部門類別	1990	1995	1999
農業	35.1%	25.4%	19.5%
工業	47.8%	47.8%	52.9%
服務業	17.1%	26.8%	27.6%
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福州統計年鑑》，1996年，頁299；2000年，頁338。

海星村有人口1900人，400戶人家，由於它環水，也為水所阻隔，地方經濟集中在漁業、水產加工和其他水產養殖。根據村委會主任所說，在1949年「解放」前，居民靠漁船為生，因為土地稀缺不夠種田。現在則有了其他的經濟機會。村裡辦了一家造船廠、一家修船企業、一家魚丸加工廠和一家水產冷凍出口公司。後者是由海星村的56歲村委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夏主任開辦的。中學畢業的夏主任說，1984年福州市批准海星村從事漁產加工業，並提供一百萬的初期資金建了一個廠。這個鄉鎮企業涉及了冷凍水產經營的全部三個階段：派船到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去捕魚；冷凍捕到的魚蝦；出口冷凍水產到日本（以及少量地出口到美國）。雖然鄉鎮企業對於冷凍非常專業，它也送活魚和蔬菜去日本。「我們使生產適應市場需求」，夏自豪地解釋說，例如，去除頭及內臟的蝦仁和蝦仁罐頭出口去美國。從財力上說，企業將總收入的7%做為稅上交長樂市政府。在1994年至1995年財政年度，總產值達八千萬元，因為它出口大量漁產去日本。鄉鎮企業獲得「明星企業」的光榮稱號，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受到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的視察。

在生產過程中，鄉鎮企業僱用了154名工人，其中15名是

正式的管理和會計人員（大多數是18歲至30歲的男子），還有135名女臨時工。當需要人手時（當漁船從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返航），企業就用村裡的擴音器招募臨時工從事簡單的生產加工，例如按大小挑選蝦並處理加工蝦。夏主任說，在改革開放之前，海星村的婦女待在家裡製作魚丸；現在，企業利用她們的「剩餘勞動力」。他補充說明，企業有先招募村裡現有的工人，然後才招收外來勞工的政策。

當被問及海星村是否有個體戶，夏主任表示在1984年以前不多，但是現在漁船已經賣給個人去捕魚。例如，一條船可能以三百萬元的價格賣給36個人集體使用（典型的一艘船可以容納18個人）。有時候中國農業銀行也願意提供這類專案貸款。雖然漁民現在每年能賺五萬多元，捕魚仍被視為一個艱苦的職業。受過教育的人不再願意以捕魚為生，而搬到長樂去找更能賺錢的工作。夏主任又說，現在年輕的一代至少都上過中學，村裡還有十個人從大專畢業。

除了可見的長樂集體經濟發展，1997年開航的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取代了福州軍用機場，成為閩北所有商業航班的民用機場，這進一步證明了長樂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²⁸ 當地官員很快地指出，長樂人總是嚮往出國謀生。官方統計估計有超過30萬的長樂人已經合法地移民全世界40個國家及地區，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去了台灣。²⁹ 長樂現有人口約66萬（1995年為

76

²⁸ 在長樂國際機場啓用前，來往福州的航班都使用最初做為軍用目的較小的義序機場。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飛往福州的民航機時常延遲。從那時候起，福州機場就恢復了軍事的用途。

²⁹ 第76號受訪者。到台灣的移民大多數都是經由非法管道。可參考，例如〈中國大陸非法移民被遣返〉，《台灣中央通訊社》，1999年2月14日。

656,780人)，這就意味著將近三分之一的長樂總人口居住在世界各地，雖說難以估計最近外移的人口比例；這些人外出後仍有強烈的鄉土觀念。當地幹部承認，過去長樂的非法偷渡的確是一個問題；官方的說法是只有極少數人是利用地下管道非法出境的。³⁰ 儘管如此，福建省當局不斷進行反偷渡運動的事實，表示這個問題仍舊存在。³¹

相對於政府官員，當地企業主非常坦率地承認，長樂是福建非法偷渡的主要口岸，其中就包括1993年載運286名企圖移民美國的惡名昭彰的黃金冒險號貨輪。³² 一位美國社會學家估計，1990年代偷渡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中95%來自長樂。³³ 而且這些飄泊海外的長樂人，主要是來自福州周圍的三個縣（長樂、福清和亭江）。³⁴ 知道了從長樂外移的人口規模，很明顯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親人的匯款，對於近十年長樂的發展出

77

³⁰ 然而在偶然的交談中，一位當地幹部承認仍舊存在非法移民的情況。

³¹ 福建省黨委會、福建人民政府與公安局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以逮捕偷渡客。在1993年至1997年間，福州邊防單位逮捕了將近一千名偷渡組織者與運輸者，包括從國外的50多人。在1993年至1996年間，約有4500名非法移民遭到逮捕，超過一萬六千人被遣返回國。可參考江寶章（音譯）〈福建戰鬥偷渡現象〉，《人民日報》，1997年5月24日，頁5。

³² 這艘船駛進紐約州皇后區的Rockaway半島，有十個人死於跳船。可參考Seth Faison, "Hunt Goes On for Smugglers in Fatal Trip," *New York Times*, July 18, 1993, 27。原來286位想成為美國移民的偷渡客，有118名被遣返回長樂，可參考*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0, 1994, 12。

³³ 可參考Ko-Lin Chin, *Chinatown Gangs: Extortion, Enterprise, and the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Peter Kwong, *Forbidden Workers: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Press, 1997)。

³⁴ 可參考Seth Faison, "With Eye on Dollar, Chinese Are Blind to Dang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1995, 2。

力不小。長樂與最近出境的移民的聯繫仍很密切。一位地方官員聲稱，僅僅在1995年長樂就收到在海外打工的長樂人寄回來的三億多美元。³⁵ 平日當地銀行就收到一、二百份來自海外銀行的現金電匯寄到私人的儲蓄帳戶上。偷渡出境的移民已經成為長樂地方經濟有機的一部分，這也反映在互助會的規模和數量上：73%入會的受訪者說自己入會是爲了還「蛇頭」的債。蛇頭是專門從事非法偷渡活動的組織者。送一位親人去海外，成本可能高達五萬美金，雖然現在的行情似乎在三至四萬美金之間。不同於福州的入會者每月交一百至一千元；在長樂，每月的會錢可能高達一萬元。如此龐大的資金洪流，是由同時參加多個會以及每月靠欺騙的現金交易來維持的，其方式不禁令人想起美國瘋狂的消費信貸。

雖然沒有非法偷渡者的統計資料，我的受訪者異口同聲地宣稱，出境的移民超過90%是男性：「航程會拖上六個月，許多男人還活不下來，所以婦女肯定熬不過在船上那麼長時間……條件那麼惡劣，有時會有暴力事件發生」。長樂的婦女一般都留下來，靠組織大型的互助會去籌措丈夫、兒子和其他男性親屬的偷渡費用，並應付如此龐大的現金交易所帶來的風險。³⁶

³⁵ 編號第64號受訪者。

³⁶ 至少有四個少女參與了在1993年的黃金冒險號行程。美國移民局官員大意地將她們釋放給協助她們偷渡的歹徒，導致她們在航程中遭受到集體的強暴。可參考“Chinese Girls Released to Gang,” *Newsday*, June 21, 1993, 6。在1998年5月，一艘機動船載運了23名來自長樂的中國男子，目的地是美國紐澤西。他們原本是一群乘坐「東方一號」50人團體中的一分子，「東方一號」是一艘從委內瑞拉出發的近岸貨船，在蘇利南莫河（Suriname）接這一群人，其他的人都在巴哈馬群島附近遇難了。可參考Kevin McCoy, “First Inside Look at Smuggling Ring,” *New York*

陳女士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96年時，她是一位53歲不識字的菜販。³⁷ 陳女士原是一位會頭，直到1991年時當其他會員（也是婦女）拖欠會錢並躲藏不見後，她就失去了畢生的積蓄。她原來組織互助會是爲了送自己的直系男性親屬出國。

78 最後，在1993年她的兒子21歲時坐船到了美國，她付給蛇頭二萬一千至二萬二千元。到1996年時，她的兒子在美國某地的「鄉下」幹活，一年寄給她四千至五千美金。

她的女婿兩次嘗試坐船出境。1992年，他第一次乘的船幾乎沉到海裡去，但是他被日本海岸防衛隊救了，並遣返回長樂。然而四個月後，他成功了。當我問及他到了美國哪裡，她回答說：「哦，他得坐在卡車後面四個小時才能到達紐約」。1996年時，他正住在紐約，從事房屋裝修（油漆和裝修浴室等），每個月寄回家五百美金。陳女士還告訴我們，一位朋友的兒子被美國海岸防衛隊捉到送上法庭，被判企圖非法入境罪並被遣送了回來。她們都爲之哭泣。現在大多數的人坐飛機去，被索價三萬六千美金（陳女士特別提到，她的兒子第一次偷渡時，她「僅需要」付一千美金，因爲他沒有抵達目的地。通常到了之後才交付全部費用）。

當婦女們忙著欺瞞互助會以送其男性親屬出國，蛇頭們正發明新的海空航線以從事人口販運，當地經濟的其他部分像福建沿海其他地方一樣地迅速發展。大興土木導致道路塵土飛揚或泥濘不堪；嶄新的白瓷磚房子與相鄰的低舊木造建築對比鮮

Daily News, July 2, 1998, 38；以及 Robert D. McFadden, "22 Illegal Immigrants Seized after a Jersey Shore Landing," *New York Times*, June 1, 1998, 1.

³⁷ 編號第165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明；工廠散布在山坡上，商業市場區域開始顯得有些規範化了。與此同時，舞廳與卡拉OK廳——東亞大眾文化現代性的標誌——在全城四處湧現。眾所周知，在長樂，日益增加的年輕男子正在國外或旅途之中，似乎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為客人提供女陪侍的卡拉OK「歌舞廳」的生意也很好。很明顯地，在長樂還有足夠的男人來維持當地的娛樂業，甚至還從更貧窮的地區吸引婦女來從事此業。³⁸ 在長樂存在的多種經濟現實之中，其中一項是年長的婦女正在工作以送男人出國，而年輕的婦女則賣身給留下來的男人取樂。

我對一位出身教師的舞廳經理的深夜訪談，提供了許多資訊。雖然我們在1996年見面時葛先生已經當舞廳經理一年多了，人們仍稱他「葛老師」，因為他曾在當地一所中學當了近30年的合唱團老師。³⁹ 他家中的其他人也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妻子是他任職過學校的數學教研組組長；女兒是廈門大學的畢業生，現在在香港工作；兒子是一位醫生。由於葛先生有音樂的背景，地方政府聘他做為集體企業歌舞俱樂部的經理。當我問及他轄下俱樂部的營運，葛先生公開地聲稱它在幹部和成功的企業主中很受歡迎。「在長樂，每個人都努力地賺錢」，他解釋說：「因此俱樂部給了他們一個放鬆和娛樂的機會」。雖然有錢的女企業主有時也會帶一群客戶到俱樂部來，招待他們坐在舞池和卡拉OK台邊的桌子上喝茶，絕大多數葛

79

³⁸ 有周期性地打擊福建的「開放城市」的娼妓。包括福州、廈門、漳州、泉州、莆田等地。但是較小型的新興地區，例如長樂，則不在這類目標之中。參照報紙的報導，以及其他類型政治運動的模式，這一類打擊行動似乎是「配額導向」(quota-driven)的。可參考，例如〈福建打擊娼妓與賭博〉。

³⁹ 第77號受訪者（為了匿名，我已經隱去了個人的資料特徵）。

先生的客人還是些男人，他們來找職業的「公關小姐」或「坐檯小姐」喝酒、唱歌和跳舞。私人包廂也是現成的。

葛先生說，大約有20名年輕女子長期住在俱樂部的宿舍，每人每個月一般賺二千至三千元。他不限制她們的收入，雖然他也不洩露他與這些女子間的財務關係。每天晚上，陪酒小姐平均賺約一百元，從中午12點半工作到下午四點半，然後從晚上七點直到午夜。俱樂部在半夜12點半關門，但陪我的幹部講，人們經常在那裡混到凌晨。葛先生估計，90%的陪酒小姐來自福建以外的省份，包括來自江西、湖北、江蘇和河南的年輕女子。

除了信貸互助會、高利貸和蛇頭，長樂也有制度化的私營金融來源，諸如「民生企業經濟服務部」和「民生企業經濟有限公司」。儘管這些名稱含糊不清，當地官員和私營企業主都明白，這些機構做為金融仲介經辦著私營企業及偷渡所涉及的大筆金錢。到1996年，當地官員仍合作共謀地允許事實上的私營金融機構從事經營；然而，它們的活動受到省級和中央的銀行官員的注意，這就意味著這些機構可能受到上級的「整肅」。⁴⁰

山村：貧困與人口流失

80 當長樂的市中心（以前的縣城）到處大興土木、商業繁榮時，它西部邊陲的山區卻依舊貧困如昔。擋住公路開發計畫的山頭正有條不紊地被炸掉，轟隆隆的爆炸聲即使在市區也能夠

⁴⁰ 《金融統計年鑑》，1997年，頁197。

聽到。然而，最近幾年，交通更不方便的山區一直面臨著人口大量流失的局面。我們訪問了長樂縣界上的四個偏遠山村——石岩、石屏、高湖和燕洋。⁴¹ 這四個村莊的人口都非常地稀少。正如長樂的居民把福州當成購物與就業最近的市中心，山村的村民也把長樂視為他們心目中的市中心——留下來的成年勞動力每月都會去的地方。長樂與福州，山村與長樂，兩方面各自聯繫上的差別，就在於福州與長樂之間的交通運輸現在方便得很，然而極少有車輛能夠駛進分隔長樂與山村的崎嶇陡峭山路。此外，當許多長樂人渴望移民到美國，而山裡人只盼著自己或孩子們有朝一日能夠搬到長樂城裡去——空房子和無人耕種的田地，令人不安地證明了許多人確實已經搬走了。例如，在1996年中，石岩村只剩下二百人，而兩年前這裡有五百居民。同樣，石屏村的六千人口中只剩下了一千八百人，燕洋村的90戶人家中只剩下27戶，高湖村實際上已經被廢棄了。即使村「政府」辦公室（他們仍稱它為「大隊」）也空了。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們仍留在這些村子裡。當我們問到，為什麼還有青壯年人留在村裡，他們回答說，因為教育程度低，無法在長樂城裡幹活，或是他們要留下來照顧親人。

毫不奇怪，這些村子的經濟蕭條。村民們的收成一般只夠溫飽。我們找到一戶在當地賣糧食和牲口的人家也承認，收入其實並不穩定。事實上，大多數家庭依靠各戶之間的以物易物才有了花樣不同的食物。只有下山去城裡打工的年輕人賺一點點錢，才有錢花。在石岩村，一點一滴積蓄的錢是如何花用的可以一目了然：除了一座新漆過的廟，全村的房屋都破舊不堪。

⁴¹ 我在長樂的研究助理在那獨特的山區長大，所以我們能租到四輪的貨車並請司機直接載我們去那些村子。

泉州市：為爭取外資的資本主義競爭

81 千百年來，泉州(在中古世紀西方文獻中被稱作「刺桐城」)是華南最活躍的貿易港口之一。宋、元(西元960年至1368年)朝代，移民從這裡出發前往台灣和東南亞，馬可·勃羅(Marco Polo)和其他外國商人在絲路終點的泉州來來往往，收購中國的商品出口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和中亞。⁴² 有些商人定居在泉州，泉州至今仍是福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人口達630萬。⁴³ 據當地官員稱，在毛時代，泉州人的商業激情受到遏制但從未被熄滅過。即使在1978年改革開放正式啟動之前，當地的企業主就開始興辦事實上的私人零售業和工廠。而且，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之共同合謀，允許私營企業主登記為「集體企業」，並允許較小的生意不用正式登記就可以經營。1978年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設立。代表私營企業主利益的群眾組織，個體勞動者協會，在1982年年中復興⁴⁴——早期僅與農村有關，當時並不清楚改革最終會擴展到城市。即使在中央政府發出對非國有經濟更寬容的信號並建立管制機構以管理非國有經濟之前，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就一直發展得很

⁴² 泉州也擁有華東最古老的清真寺，由當地的穆斯林建於1009年。

⁴³ 1995年終的市區人口達到6,259,200人，其中有521,130人(8.3%)住在市區。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6年，頁440。

⁴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泉州在1951年舉行了第一屆的小商販代表會議，接下來在1954年又舉辦了第二屆。一直到1964年後都不再運作，直到1982年7月才又正式地恢復。1984年，個體勞動者協會在泉州市轄下的其他縣份建立了分會，包括南安、惠安、永春、德化、晉江與安溪。可參考，唐山(音譯)，〈輝煌的歷史，光彩的事業〉，《十載光彩路》，頁351。

快。圖3.5、圖3.6和圖3.7顯示了1981年至1995年間泉州登記的私營企業數，私營企業就業人數，私營企業上報的總資本、產值和利潤的增長比較。除了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動盪之外，增長一直是穩定的。更有趣的是，1985年2月，國務院將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定為福建東南沿海的「經濟開放區」一事，並未在泉州私營經濟的增長幅度上產生任何顯著的變化。然而，1985年後更寬鬆的投資環境（特別是1992年後）確實增加了官方出口的數量和外資的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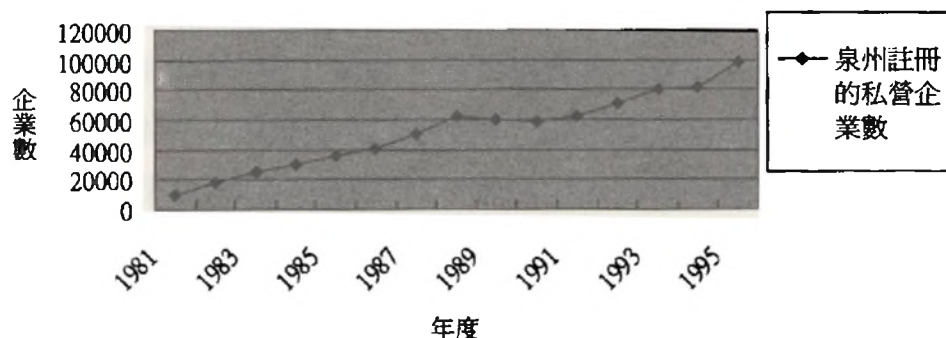
82

泉州集體、私營與外國投資（主要來自台灣）的增長，導致了產業結構從農業生產到輕工業與服務業的轉型。這個轉變是巨大的，改革開放之初有超過90%的人口被劃歸為農業人口，在某些地方的經濟生產已經十分地專業化，舉例來說，石獅鎮以成衣廠聞名，陳埭鎮的製鞋，磁灶鎮的陶瓷，東石鎮的織造，青陽鎮的食品加工，命蒼鎮的衛浴設備。泉州市區（1985年以後稱為曆城區）裡也能見到輕工業的工廠——過去舊市區裡的小企業與歷史遺跡比鄰，如今新的建設項目夷平了舊市區的許多房屋。⁴⁵ 儘管如此，每天沿街散布的零售市場仍舊繁盛，泉州繼續從農村和其他省份吸引做生意的移民。估計約有五萬的外來人口擠進了有20萬永久居民的七平方公里市區中。⁴⁶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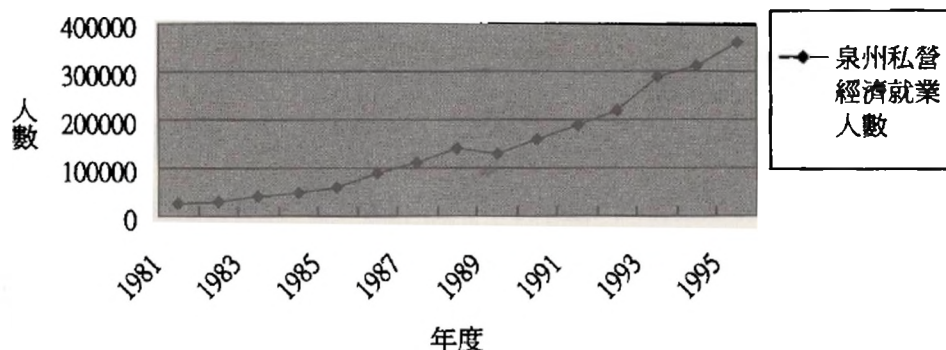
⁴⁵ 在保存泉州歷史古蹟與建設現代化的城市之間存在著張力。可參考 Michael Leaf et al., *Planning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in Quanzhou, Fujian, China*, Asian Urban Research Networking Paper No. 5 (Vancouver: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School of Commun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5)；文中提及官方發布命令中止在城中最早的區域周圍建築（開元寺可以追溯到1009年），但是在我訪問泉州的1994年夏季、1996年秋季與1997年春季中，建築計畫仍舊持續地進行。

⁴⁶ 同前註，頁5、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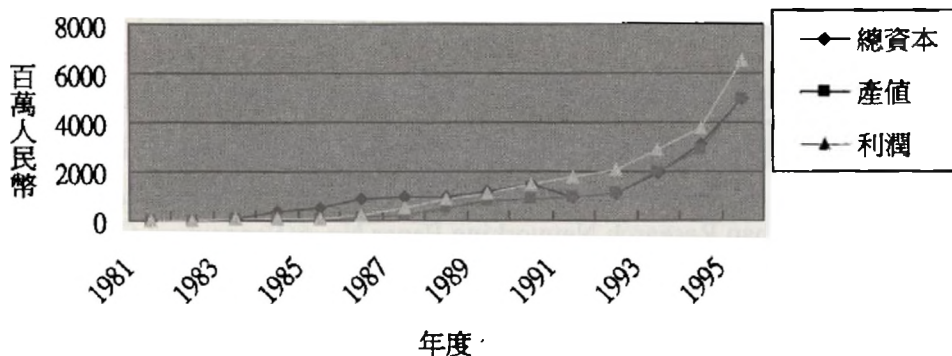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0-562。

■ 3.5 泉州註冊的私營企業數 (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58-559。

■ 3.6 泉州私營經濟就業人數 (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58-559。

■ 3.7 泉州上報的私營經濟總資本、產值與利潤 (1981年至1995年)

我對一對夫婦的採訪很典型，他們找了好多地方想尋找一個開餐館的合適場所。1996年，范先生是一位37歲小學畢業的小餐廳老闆。這家餐館離泉州第一家披薩店不遠。⁴⁷他與原籍安徽農村的妻子，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決定把土地留給親戚而從事餐飲業。他們沒有足夠的錢租門面，也無法購買必須的餐飲用品和廚具，以經營一家完善的餐館。於是，他們用一輛三輪車勉強辦起了一家室外速食攤。他們發覺安徽的餐飲業生意蕭條（至少在老家當地），於是1984年夫婦兩人決定搬到河南省會鄭州。雖然在鄭州的生意稍有起色，但冬天太冷不適合經營室外速食。1990年至1991年間，夫婦倆在北京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在湖北試過了幾個地方之後，其間回過幾次老家，他們聽親戚說泉州的私營經濟很發達。1993年起，范先生與妻子，還有自己的弟弟，在泉州合夥開了一家餐館，剛開始時小規模地經營了一年，然後擴展到目前的地點。「我們終於在泉州賺了點錢」，他說：「這正是我們在其他地方想做的事」。儘管如此，范先生並不認為生意的狀況很理想，因為競爭逐年激烈，他們一天工作17個小時（從早上七點到晚上11點）。最後，他希望他們能存夠錢回老家與留在安徽的十歲兒子團聚。

在范先生這樣爲了更好的生活而終日辛勞的外來商販中，泉州更高級的商業、工業和高科技區的建設正在興起。例如，1994年，中共晉江區委和當地政府擬訂了一個工業發展戰略：「建支柱（產業），擴（經濟）規模，創名牌，爭第一」。「支柱產業」包括化工、紡織、陶瓷、食品、房地產和旅遊業。此戰略也號召政府支援產品創新、獨立的科技研究和各種

⁴⁷ 編號第324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電子產業。48

- 85 然而，總的來說，市政府更著重於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以鼓勵投資者將泉州做為策略性貿易港，使其能夠利用該市各縣現有的或潛在的工業能力。49 1996年泉州規劃了四條經濟帶，以引導發展符合當地「區情」的產業。50 在市區和鄰近農村與郊區間實施這種經濟分工的部分理由是，當地政府確實希望利用千百萬祖籍泉州的華僑的資金，其中包括相當一部分和閩南人說著一樣方言的台灣資金。51 在這方面，泉州必須與廈門和福州競爭：廈門同樣享有與台灣在文化和語言上的聯繫，並有特殊的經濟地位；同時，做為福建的省會，福州對海外投資者來說，它自然是福建投資的優選之地。52 然而，正如

48 另一個1990年代中期宣傳的戰略是建立七類市場以做為區經濟的基礎。被稱為「七大」計畫，優先的部門是商品糧、水果、蔬菜、水產品、養鳥、植栽與旅遊業。

49 厝城區本身不反對基礎建設，但如前所述，它本身有更重要的目標，區級的基礎建設包括將1994年訂為「道路建設年」，將1995年訂為「城鎮建設年」。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4年，頁285；《福建統計年鑑》，1995年，頁326。值得一提的是，私營企業日益地介入基礎建設經濟中。舉例而言，在泉州的名流公司，投資了二億五千萬元興建了一座跨越晉江的1,530公尺大橋。可參考〈中國：私營企業瞄準基礎建設〉，《中國新聞社》，1998年3月15日。

50 〈福建泉州市開展新發展戰略〉，《中國新聞社》，1996年3月26日。

51 據估計，超過八百萬的台灣人祖籍為泉州。〈僑鄉泉州巨變〉，《福建奮進的四十年》，福州：福建省統計局，1989年，頁207。另一個數據宣稱在台灣44.8%，九百萬的漢人是泉州人的後代。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85年，頁470。後者的數據同時在福建省的網頁中被引用。可參考：http://www.china-window.com/Fujian_w/cityquanzhou/c-index-1.html，1999年2月。

52 廈門與福州也舉辦了更多與商業和投資相關的展覽和會議。1998年12月，泉州終於舉辦了高規格的中國全國旅遊及貿易展。由國家旅遊局與福

一位泉州人所說，泉州的貿易歷史要比福州或廈門悠久得多，這一點毋庸置疑。⁵³ 儘管有著省內競爭和嫉妒的問題，泉州日益努力去突出自己是外資的理想之地也源於實際的發展考量：當地經濟中資金缺乏的現實。 86

在1980年代，全市中小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這些非國有經濟的資金，來自個人儲蓄、親友借貸、行業信用、信貸互助會和各種各樣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例如當舖和農村合作基金會。到1980年代中期，有些較為成功的企業主轉向經營專業的借貸業：那就是介於尋求高息回報的存戶與願意付出較高利息以獲得現金的人之間的經紀業。有些這樣的經紀人甚至悄悄地辦起了私營銀行，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從事他們的金融業務。在私營經濟擴張和出現非官方的金融基礎設施以支持其增長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一個促進的角色。僱用八個以上雇工的註冊個體戶不再被視為違犯官方法律，而是受到鼓勵去登記為集體企業。同理，私營金融機構也被告知，要向公眾出售股份以符合信用「合作社」的資格。⁵⁴ 但這種干預大多是表面上的，只要人們從事營利活動，就會增加當地的稅收，沒有什麼直接的理由讓當地政府去打擊這種看來是經濟增長一 87

建省政府主辦，年會展示了旅遊與商業的投資機會。可參考〈中國：泉州舉辦中國全國旅遊及貿易展〉，《中國新聞社》，1998年4月30日。

⁵³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泉州列為全國第三大歷史名城，列於北京與西安之後。一個當地人說到泉州城的歷史價值時表示：「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泉州：歷史文化名城》，1995年，頁7。除了馬可·勃羅的遺跡，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同時設有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的海上絲路研究中心。

⁵⁴ 在一份1985年關於泉州經濟情勢的官方公開報告中，真的可以查到市政府鼓勵「私營金融企業」將其股份買回的資料。可參考《福建地區經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533。



踩腳踏車以謀生。福建省泉州，1996年11月。

部分的金融活動。⁵⁵

然而，在1990年代初期，因為有意忽視這隻金融「貓」的顏色的默許「政策」，市區經歷了一場恐慌。隨著信貸互助會（特別是「標會」）在泉州的個體戶中極為流行，規模急劇膨脹，導致有些互助會開始崩潰；會員拖欠會錢，會頭捲款潛逃。官方對這場危機的解讀似乎是，當初做為基層的一種健康

⁵⁵ 最近，泉州工商局與對外經貿委員會對於外資企業採取了更加干預的角色，甚至在1997年關閉了三百家違反審計與註冊登記規定的公司。可參考〈福建省關閉三百家外資企業〉，《中國新聞社》，1997年3月4日。週期性地打擊非法商業活動也時常發生，舉例而言，公安官員搜查一家每天生產三萬片盜版CD的小型工廠，它們靠僱用來自廣東、江西、與湖南等地的外來農民工為維持大量的生產。公安逮捕了11個人，並且沒收了超過八萬件成品與半成品CD。可參考〈福建關閉盜版光碟生產線〉，《中國新聞社》，1998年9月29日。

的互助形式，突變成爲邪惡的投機，其動力就是資本主義的貪婪。因此，1994年年中，市政府發動了一場掃蕩互助會的運動。⁵⁶因爲互助會造成那麼多人破產，於是市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和起訴惡名昭彰的會頭，並且籌措資金來補償破產的互助會受害者，但大多數人還是賠了錢。

其中一個例子是董女士，她是位很不幸的入會者，雖然有足夠的錢在一個標會中得到好幾個會份，但從來沒有機會拿到她該享受的會錢。⁵⁷在上完小學二年級的十歲時，董女士就開始下田幹活了。她解釋道，做爲五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已經習慣於承擔多重的責任了。1996年41歲那年，她在曆城區一個蔬菜零售市場上已經有了固定的攤位。董女士和丈夫以及兩個十多歲的孩子一同住在一棟三層樓房裡，家裡有各種現代化的電器，例如彩色電視機、光碟播放機、洗衣機等，甚至還有一輛摩托車。她賣了超過15年的菜，才擁有一個相當舒適的生活，然而她仍然努力工作：每天早晨，她三、四點鐘就起床，從很遠的蔬菜批發商那裡批菜，然後她顧著攤子直到傍晚七點。她的丈夫是個退伍的士兵，幫忙她洗菜、切菜、整菜，但所有生意上的重大決定都由她來處理，因爲她比較有經驗。

1993年，也正是她下定決心開始參加標會那一年。董女士被她的妹妹介紹入會，她的妹妹則是由自己丈夫的大姐引薦入會的。她們都不會直接認識會頭，但她們並不擔心。因爲當時她們的大多數熟人和朋友也都參加了標會。事後看來，她們應該小心點的。會頭是個35歲的無業男子，他除了從別的標會中籌錢之外，是沒有辦法償還會員的。隨著他的金錢來往越

⁵⁶ 訪問編號第7、18、142、143號受訪者。

⁵⁷ 編號第322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來越複雜，他不得不在幾個會中拖欠。董女士最後損失了大約15萬元，本來她希望用這筆錢蓋間新房子，供兒子結婚用。當會員把會頭舉報給市政府，會頭就自殺了。

當地官員聲稱，在目睹了信貸互助會所帶來的破壞之後，大多數人都害怕入會了。儘管如此，根據1996年的調查，仍有超過半數的泉州企業主參加了互助會（其中90%是婦女）；入會者說，違約拖欠的風險並不能阻止他們繼續入會，因為他們相信其他的會員，而且基本上也覺得自己沒有其他的融資管道。⁵⁸ 例如，一位我稱為李女士的前會員因入會賠了一大筆錢。⁵⁹ 然而與董女士不同的是，她對自己入會一事憤恨不已，因為金錢上的損失造成家庭生活中的摩擦，並損害了她做生意的信心。

在一家國營工廠幹了15年後，李女士在1993年決定自己下海單幹。她的女兒已經12歲可以照顧自己了，所有的朋友似乎都因為做生意而發了財。回憶起來，李女士說，她的發財計畫問題出在她的天真和學歷不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只讀過四年小學，不懂得如何去做生意。她貨架上的商品布滿灰塵、雜亂：錄音帶與肥皂、洗髮精、計算機，還有生鏽的鑰匙圈放在一塊販賣。店裡最賺錢的東西看來是公用電話，每月能有三、四百元的進帳。李女士一天營業14個小時（從早上七

⁵⁸ 同樣的現象也在台灣發生。當在1983年至1985年間發生大規模的倒會事件，標會的參與者大幅地減少了，直到1991年恢復到大約1977年的水準（即20%至30%的家庭參與）。可參考Alec R. Levenson and Timothy Besley, "The Anatomy of a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 Rosca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 1 (1996): 45-68.

⁵⁹ 編號第32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點到晚上十點)，稅後的月收入大約是四、五百元。

老闆辛酸地提及她幫助朋友的事，她代朋友以30%的年利率借錢，結果虧了一萬元。雪上加霜的是，她丈夫的姐妹介紹她入會後，在1993年她又因為被倒了四個會而賠了一萬二千元（在最多的時候，她加入了七個會）。當泉州設立了標會受害者救濟辦公室時，互助會的受害者被告知市政府會支付他們一半的損失。但到最後，政府僅補償了李女士10%。爲了還債，他們不得不賣掉她丈夫的摩托車。這些天，她丈夫還在責怪她，說她傻，賠了這麼多錢。

晉江縣／市：從家庭工廠到世界市場

在1985年以前，福建東南部被目前的「泉州市」所包括的地區實際上是一個單獨的專區，叫晉江區。晉江在行政區劃上的悄然降級，不是由於它的經濟狀況，它的經濟狀況一直是很傑出的，而是由於泉州被命名爲沿海開放城市。泉州做爲市政府所在地一事，強化了它被定爲開放城市的邏輯，這反映了自由化浪潮就要從沿海湧向內陸的農業縣。泉州市下屬的六個縣中，晉江縣的非國有經濟發展得最早。到1981年，晉江已經有了4,361家登記的私營企業——是泉州市區（2,287家）的兩倍，幾乎是泉州全市私營企業（9,651家）的一半。⁶⁰ 從圖3.8、圖3.9和圖3.10中，可知晉江的私營企業數、私企雇員人數、私企的註冊資本額從1981年至1995年期間，除了兩位數

⁶⁰ 《十載光彩路》，頁563。

的通貨膨脹和政治不穩定的1988年和1989年兩年外，都是逐年增長的。

除了相對多的官方登記的私營企業數目外，晉江市還有與其人口不相稱的高比例的台資合作企業。⁶¹單從數目上看，四分之一的泉州市私營企業與外資合作企業都在晉江，以1995年為例，這些企業占有注入晉江的外資的63.7%。⁶²該市外國「投資」的其他表現，採取了海外華僑直接捐贈生產工具和設備的形式；該項目在1996年總價值達1.1億港元，占泉州全市這類捐贈總數的55%。⁶³晉江人以與故鄉保持特別強烈的宗族與親屬關係而著稱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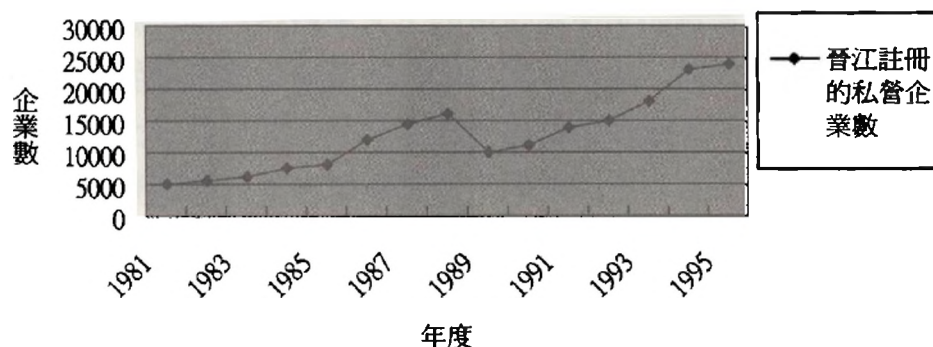
雖然晉江的總體經濟形勢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企業的典型狀況卻並非如此。其經濟的發展軌跡已經以「晉江模式」聞名於世，它與「溫州模式」相似，只在晉江長期受益於海外華人的投資這一點上有所不同。簡而言之，絕大多數的晉江私營經濟是小型的（在1995年有87%是個體戶），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生產。例如，在陳埭鎮，私營經濟主要是（陳姓）家庭工廠，或是生產運動鞋，或是加工運動鞋生產所需的材料。⁶⁴我們走訪的這些小工廠，大多數的工作環境都擁擠不

⁶¹ 以1995年為例，晉江有人口970,700人，占了泉州市總人口數（630萬人）的15.4%。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6年，頁440。

⁶² 《十載光彩路》，頁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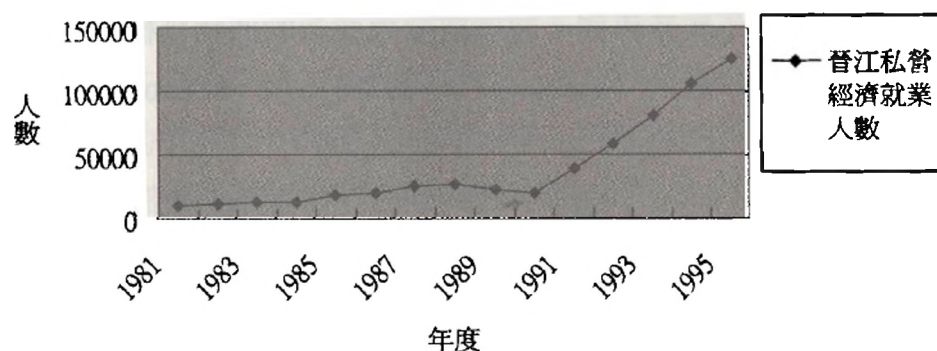
⁶³ 同前註，頁20-21。

⁶⁴ 其他的產業包括成衣製造、商業或服務業。可參考Chih-Jou Jay Chen, "Local Instit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Southern Fujian,"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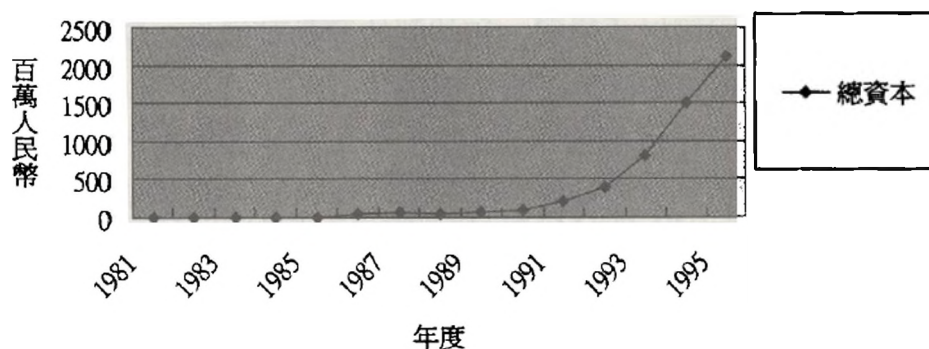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8 晉江註冊的私營企業數 (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9 晉江私營經濟就業人數 (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0 晉江私營企業每年註冊資本額 (1981年至1995年)

堪，也不安全；例如，使用噴燈的工人不戴護目鏡，房間裡還堆滿了可燃的物品，連接生產車間的狹窄過道裡儘是生產的廢料。⁶⁵ 比較大的工廠則顯得較有秩序些。

有趣的是，有些更成功的工廠開始時要更為簡陋。例如，1981年，11家生產運動鞋不同部件的個體戶決定集資開一家聯戶工廠，以生產整雙的運動鞋。⁶⁶ 每一戶交幾百元，經過一年的經營，每一戶參與創業者能分到二千多元。第二年後，創業者之一的朱女士買下了其餘的所有股份，繼續經營。到1990年代中期，工廠全力生產用於出口的「名牌」鞋，賣到羅馬尼亞、波蘭和菲律賓。玻璃櫥窗裡展示的運動鞋樣品，包括有故意拼錯字母的「abibas」、「MIKE」和「beebok」等牌子。

93 雖然朱女士從未上過全日制的學校（當她十幾歲時上過約三年的夜校），她說沒有上學並沒有妨礙她做事，因為她請人當會計、出納以及處理商業書信。現在她的四個孩子都已經20多歲了，她可以靠他們幫忙打理生意。早年她一個人走遍大江南北，以掌握運動鞋的最新市場訊息。她參訪北京、東北、山東、成都、廣州、深圳和昆明等地的商展與批發市場，為她的工廠帶回可以「學習」和仿製的運動鞋樣品。現在，她主要依靠產品目錄來發展新的生產線。

1996年時，工廠僱用了160個人，主要是外地民工。她解釋說，當地許多人家都有自己的工廠，所以晉江的大多數工廠

⁶⁵ 就在我進行田野訪問的1997年不久前，一間晉江的鞋廠燒毀了，32個工人因為困在鐵門窗內而喪生，還有兩個人重傷。可參考〈中國鞋廠大火，32人喪生〉，《中國新聞社》，1997年9月22日。

⁶⁶ 編號第314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得從更貧困的地區招募工人。⁶⁷ 朱女士得出結論，在這個意義上，晉江是運動鞋和就業的淨產出之地。因為她親眼目睹了她自己鎮上基礎建設的變化，她不在乎繳納每個月一萬五千元各種稅費開支：「一切都是地方經營的——醫院、學校、衛生設施——政府總得在某些地方找錢」。朱女士也與當地的中國農業銀行有穩固的來往，她從農行定期借到四個月為期、限額為15萬元的貸款。

由於晉江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相對的重要性，在1996年年中，它由「縣」升格為「市」。⁶⁸ 晉江的政府官員覺得早就應該要升格了；他們早就積極地吸引外國投資者，甚至遠渡重洋到國外去宣傳晉江經濟的重要性。⁶⁹ 此外，當地經濟已經以相對獨立的方式悄悄地繁榮了許多年。在改革開放之初，晉江還很窮，完全是農村。到1986年，原來的18家國有工廠中的14家已經實行了廠長責任制，廠長對生產決策有實際上的控制，有二家已經包租出去了。⁷⁰ 到1990年代中期，福建的其他地方已經聽說它的私營農村企業的成功。當福建其他地方的私營經濟還要被迫假冒登記為集體企業之時，在晉江這種「紅帽子」的註冊登記方式已經只有相對很低的比例了。⁷¹ 地方政府對私

94

⁶⁷ 比較官方統計數據中受僱於泉州市私營企業的人口比例，六個下轄縣的平均是5.6%。而晉江則是213.5%，這表示有超過晉江戶籍總人數的人在私營企業中工作。可參考《十載光彩路》，頁563。

⁶⁸ 晉江機場也在1996年底開始營運。晉江與香港之間的直航班機於1998年底開航。可參考〈包機往來晉江與香港〉，《中國新聞社》，1999年1月21日。

⁶⁹ 可參考，例如〈小企業，大世界〉，《十載光彩路》，頁44-46。

⁷⁰ 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87年，頁628。

⁷¹ 晉江政治上對於私營企業的接受同時也被陳志柔所強調。可參考

營企業主一直採取一種明確的不干預的立場，而且當地的農村合作基金會和農村信用社對於其大多數客戶是私營經濟的事實並不辯解。

惠安縣：在邊緣的私營零賣

惠安縣也屬於泉州市的行政劃分之下。直到最近，惠安的經濟主要還是依靠漁業、農業和零星的幾家石雕廠。惠安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歷在農村工業化模式的某些方式上很典型，正是農村工業化改變了中國各地貧困縣的生活水平。⁷² 在當地政府指導下發展的鄉鎮企業，享有專門提供給當地集體企業的貸款和賦稅優惠。1995年，鄉鎮企業占全縣工業產值的90%，然而絕大多數的勞動力在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⁷³ 然而，惠安也企圖利用與台灣人的文化與歷史關係來吸引外資，就這一點上來說，惠安的發展軌跡偏離了所謂的「蘇南模式」。⁷⁴ 和晉

Chih-Jou Jay Chen, "Property Rights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Lo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h.D. diss., Duke University, 1997), 52-61.

⁷² 1985年至1995年間，農村收入平均增長了近七倍（從384元增長到2,723元）。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86年，頁627；《福建統計年鑑》，1995年，頁329。

⁷³ 在1995年，鄉鎮企業在工業總產值的74億中，占了67億。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6年，頁328。雖然在省年鑑中找不到關於受僱於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就業統計資料，在《十載光彩路》，頁563，中指出在1995年時，私營企業只占了2.4%的就業人數。

⁷⁴ 根據當地政府估計，大約有90萬台灣人的祖籍在惠安。可參考〈惠安縣人民政府與惠安縣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中國惠安》，惠安：惠安石藝藝術出版社，1993年，頁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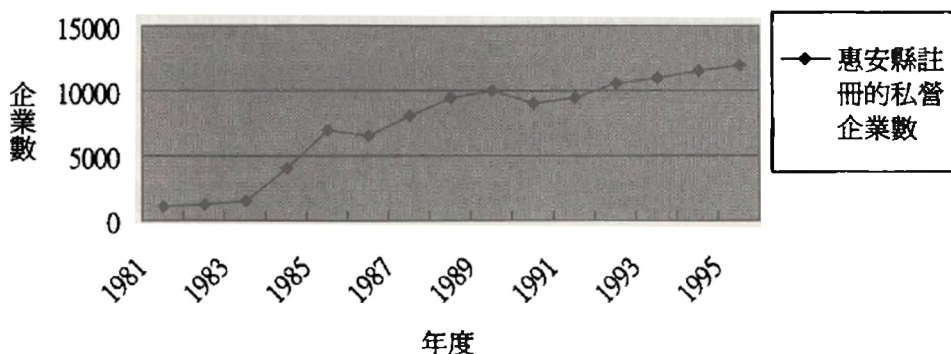
江一樣，許多惠安的農村以出口導向的企業和房地產項目的形式接受了大量台資的輸入。同時，新的道路與橋樑的建設也使得惠安到最近的都市泉州更為方便。

儘管國有部門仍持續地占有主要地位以及近年來集體企業的發展，惠安的小型私營企業也發展得很快。然而，圖 3.11、圖 3.12 和圖 3.13 顯示官方的增長紀錄相當地不穩定。統計上某些 95
逐年的巨大波動可能源於政府對於私營經濟登記和記錄方式的改變。私營企業的登記戶數、就業人數以及註冊資本額在 1983 年至 1984 年間有特別大的增加，可能是由於惠安縣直到 1984 年 96
才建立個體勞動者協會。1989 年私營經濟的收縮與 1992 年後的重重新擴張，更與全國改革開放的政治氛圍的轉變直接有關。

雖然惠安的私營經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確實是增長的，但是國營經濟，特別是集體經濟卻持續主宰地方經濟。效益最好的國有和鄉鎮企業從事石雕、全國名牌啤酒（惠泉啤酒）、自行車、機製糖、民用玻璃和皮鞋的生產。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全縣一直有對投資和流動資金的需求，因此積極地鼓勵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增長來資助其發展。已知這些金融機構致力於從村民中吸收存款並貸給集體和國有企業，惠安的私營經濟主要依賴民間借貸和輪流使用信貸的「互助會」。我在惠安縣普查的個體戶中近 90% 入過會，近 70% 的會員是婦女。即使是這幾年，與泉州市區的情況一樣，會頭捲款潛逃的事件逐漸增多，互助會在私營小販中仍是一種普遍的融資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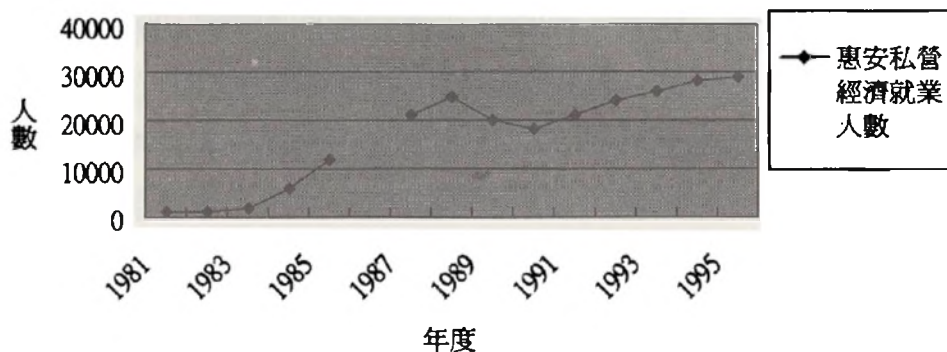
有些個體戶對多年來的艱辛和挫折感到辛酸。例如謝女士決定賣鞋而不是退休待在家裡。⁷⁵ 謝女士是惠安縣城中一位

⁷⁵ 編號第 347 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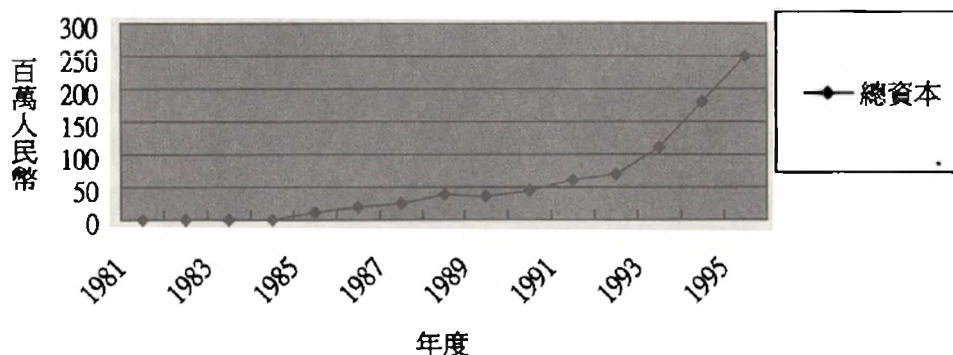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1 惠安縣註冊的私營企業數（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2 惠安縣私營經濟就業人數（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3 惠安縣私營經濟每年註冊資本額（1981年至1995年）

60歲的小鞋店老闆。她從沒上過學，但卻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個國有食品飲料店的工作，在那她做了30年。與此同時，她丈夫在另一家國有企業當麵包師傅。1980年代中期，他倆都失去了自己在國有企業的工作：她被迫提前退休，丈夫的國企破產了。這之後不久，他們單位的房子又被拆除了，他們被迫租新的房子。想到他們唯一的收入就是她每個月220元的退休金，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想再去找工作，謝女士就決定做生意。從朋友那聽說鞋子容易賣，她就參加了一個互助會，籌到一萬元來租賃並整理一家小店面，申請營業執照，從晉江、泉州和廣東的鞋批發商那裡進貨。

到1996年，謝女士與她的一個兒子已經營鞋店九年了。雖然家中的生活水準在改革開放時代確實提高了（例如家中的電器有彩色電視機、電話和冰箱），她卻說生意一直不順。首先，營業時間太長，店鋪從早上七點開到晚上九點，她整天待在店裡，因為這比每月花五百元僱人看店省錢。第二，向私營經濟徵收的費用逐日增多。除了一般的工商稅、營業稅，她還得交衛生費、一種地方稅、個體勞協費和其他多種雜費。第三，入會也不像過去那樣安全。當互助會在1970年代中期再次於惠安流行時，人們不需要擔心錢的安全問題，但現在某個會員捲款潛逃的可能性也更大了。謝女士在入會後損失了約五千元，但她說許多親戚損失的錢比她還多。她入的最後一個會的不誠實會頭現在「正坐在家裡養肥」，因為會員都認為不值得花力氣去向警察檢舉。謝女士總結說：「不能再相信任何人了」。

互助會的性別參與差異，部分地反映了勞動中的性別分工。惠安與長樂一樣，男人們多出外到更富裕的地區打工或到

98 遠洋去捕魚，而婚齡婦女（20多歲和更年長的）就留在家裡照料田地、養孩子和持家。⁷⁶ 惠安縣婦聯估計，婦女占當地工業勞動力的70%，農業勞動力的80%，個體戶的90%多。⁷⁷ 勞動婦女與離家男人的不對稱的比率，即便是肉眼也看得出：在惠安縣，到處都可以看到婦女在建築工地工作、在田裡耕種、在露天市場賣蔬菜和海產、在路上駕駛三輪車。

這種現象的典型，是像桑女士這樣的人。桑女士是惠安崇武鎮上一位32歲不識字的三輪摩托車司機。⁷⁸ 她的丈夫每次離家都要兩、三年，因為他工作在運送民工去台灣和其他國家的船上。他有機會時便每月寄350元回家。然而，既然他長期在外，桑女士就認為她自己是家長。一旦她的兒女長大結婚後自立門戶，她就決定不再賣蝦，投資六千元買了輛三輪摩托車。這種工作很累，因為她每天大概要花十個小時來往在崇武鎮那顛簸的路上，但利潤很高（每月平均賺一千元）。她覺得這個工作比蹲在當地市場上一大籃蝦子後面等待顧客來買要好。當問及她做為女三輪車司機是否擔心自己的個人安全時，她回答說這不是個問題，因為她通常選擇搭載女客人。桑女士也曾入過會，但當她需要一萬元去籌辦大伯的葬禮時，她去找了高利貸者（年息36%），因為她買摩托車時已在互助會中用過了錢。

這裡的人口狀況在中國的許多農村地區是很典型的，但當地的傳統使惠安女與福建其他地方的婦女有別。除了以勤勞著

⁷⁶ 孟憲凡，〈「男工女耕」與中國農村女性的發展〉，《婦女研究》，1995年，第4期，頁48-51。

⁷⁷ 編號第22、24號受訪者。

⁷⁸ 編號第340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稱外——閩南地區的婦女都是如此——惠安女的一系列習俗吸引了中外人類學家的關注。⁷⁹ 首先，崇武鎮沿海村莊的婦女都戴一個寬大鮮亮的花頭巾，把整個頭都包住，還戴一頂寬邊、尖頂的黃色竹帽，短上衣僅僅達到肚臍，下身是長及腳踝的寬大褲子，腰間繫著一條刺繡的或銀的寬帶子。第二，新婚的新娘有「長住娘家」的傳統，結婚後的年輕妻子繼續住在娘家，每月乘半夜時與丈夫相會，直到生下第一個孩子為止。⁸⁰ 現在看來，這種特殊的習俗大部分已經讓位給更常規的生活習慣，新婚夫婦或是成立小家庭自立門戶，或是住在夫家。第三，惠安女繼續在她們之中組織「姐妹會」，做為一種對付不幸福婚姻、惡婆婆以及生兒子壓力的手段。⁸¹ 當地也有幾例「姐妹集體自殺」的記載，二至八名婦女從海邊懸崖上集體跳海自殺。

99

安溪縣：藉由集體企業脫貧

位於福建省西南部的安溪縣以山區為主。⁸² 在新中國的大

⁷⁹ 惠安人被分類為漢族。可參考期刊《崇武文學》、《崇武研究》、《惠東人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可進一步參考Sara Friedman, "Reluctant Brides and Prosperity's Daughters: Marriage,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southeastern China's Hui'an County"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2000).

⁸⁰ 編號第22、45、142、143號受訪者。

⁸¹ 一位人類學家也發現有些婦女每晚膜拜一組小木偶，並將這些木偶放在她們的枕頭下，祈求她們的不滿在睡夢中可以減輕。編號第45號受訪者。

⁸² 安溪的土地可以區分為「中山」(24.6%)，「低山」(38.4%)，「高丘」(22.2%)，「低丘」(14.8%)。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87年，頁633。

部分歷史中，它也一直是福建最不發達的縣。1985年，當中央政府開始消除貧困的運動時，安溪正式被列為福建的14個貧困縣之一。⁸³ 隨後，當地政府依靠促進教育與技術培訓、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海外華僑與台灣的投資、⁸⁴ 扶持農村專業戶和集體鄉鎮企業來積極實現國家及福建省的脫貧目標。⁸⁵ 最後一個策略特別有效。到1995年，鄉鎮企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90%以上。⁸⁶ 雖然安溪的發展策略一直是增加其傳統產品（包括60種不同的茶葉、藤製傢俱和籃子、香菇和各種水果）的生產，但也不斷地努力擴展例如水電設備之類更加技術密集型的生產。

集體企業的資金主要來自於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根據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專業的國有銀行（包括中國農業銀行）將要轉型為從事商業行為的借貸，而不再承擔「政策性貸款」的老業務；所謂「政策性貸款」就是按照政治上規定的發展目標，而不是根據其商業上的條件來貸款。⁸⁷ 該法計畫將四大專業銀行改造成真

⁸³ 在改革開放之初，安溪的平均年農業收入只有50元至60元。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86年，頁628。

⁸⁴ 官方統計估計安溪有55萬的海外華僑，散布在香港、澳門與東南亞等地（特別是新加坡、印尼與馬來西亞）。除此之外，安溪也宣稱在台灣有180萬人的祖籍在安溪。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7年，頁633。

⁸⁵ 關於安溪致力於脫貧的分析，可參考Lyons, *Poverty and Growth in a South China County*.

⁸⁶ 在1995年，鄉鎮企業占了安溪工農業總產值38億中的34億。可參考《福建統計年鑑》，1996年，頁329。

⁸⁷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

正的「商業」銀行，而那些諸如農業發展銀行之類的「發展型銀行」將被創辦起來，以提供政策性貸款。安溪是福建省最晚建立農業發展銀行的縣。到1996年末，中國農業銀行仍為農村工業、茶葉生產、畜牧業以及其他優先領域提供政策性貸款。⁸⁸ 農村信用社比中國農業銀行更遵循商業化的規則運作。它們是由農村信用社的「聯社」來管理的，而聯社又由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儘管如此，農村信用社仍承受了地方政治的壓力。雖然人民銀行不承認農村合作基金會為合法的金融機構（而且在1999年取締了它），它對安溪的農村發展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一位官員所說：「農村合作基金會填補了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在基層留下的空隙」。⁸⁹ 由於農村合作基金會是由鄉鎮政府和村委會興辦的，它的貸款活動也反映了地方政策的優先性。

安溪和上述討論過的其他縣不一樣，它有一個扶貧辦公室，負責向貧困的農戶發放低利貸款。然而，實際上，補貼性的貸款不一定能夠貸給最貧窮的農戶，而是貸給了那些已經顯示自己有生產能力的農戶。⁹⁰ 婦聯也會協助那些有還款能力的貸款戶，這反映了中國政府扶貧的方法是尋找那些能定量的、短期內生效的項目，以完成上級下達的配額。此外，命名和宣傳「示範戶」是給外來的參訪者和視察者提供當地政府政績的可見證據，表示地方政府成功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活水準。安溪縣長和婦聯主任就曾經陪我到湖頭鄉的一個示範戶

101

⁸⁸ 在1996年11月，我聽說安溪的農業發展銀行將在1997年5月開幕。編號第145號受訪者。

⁸⁹ 編號第146號受訪者。

⁹⁰ 編號第138、143號受訪者。

去參觀。

1991年，朱女士就是婦聯爲了提高婦女的知識和技能而發起的「雙學雙賽」運動的參加者。⁹¹由於她的表現特別突出，婦聯決定貸給她五百元的扶貧貸款去買飼料，這樣就可以養更多的鴨子。朱女士的小型鴨場被證明是一項好的投資。當她丈夫看到這項生意如此興旺，就放棄了他一個人剛開始經營的成衣生意，也全力地參與進來。婦聯繼續提供她五千至一萬元的低利貸款。到1996年，這夫婦忙著養鴨、雞和豬；剛投資了三萬元建小豬的水泥產房，建好了保溫的豬圈，這樣到了冬天他們也可以繼續養小豬。

相對於泉州市的其他縣份，安溪的私營經濟最不發達。到1995年，只有1.8%的人口從事私營經濟，私營經濟的平均就業人數和註冊資本仍然很小（見圖3.14、圖3.15和圖3.16）。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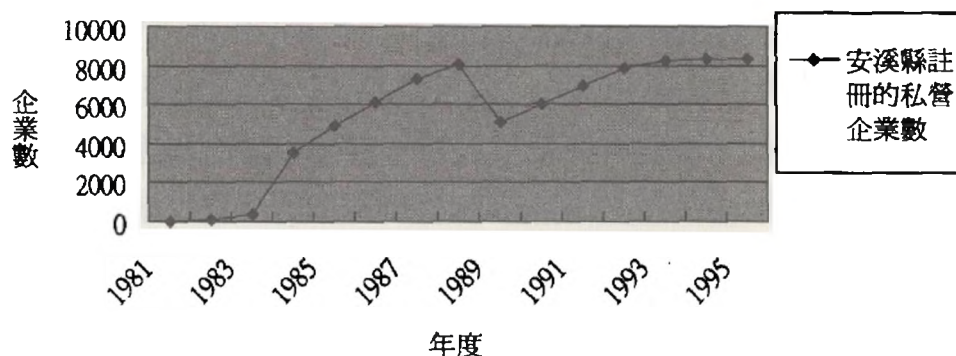
安溪的工商局報告指出，70%的個體戶都以男性的名字登記註冊。⁹³實際上，70%至80%的小生意都是由婦女經營的。和福州、泉州一樣，安溪勞動的性別分工，是婦女顧店，男人處理登記註冊、進貨和發貨的事。⁹⁴然而，與後兩地不同的是，互助會在安溪的個體戶中並不普遍，只有14%的受訪企業主入過會；71%問卷調查的受訪小販，反而依靠從親友和鄰居那邊的非正規借貸。

⁹¹ 編號第141、149號受訪者。

⁹² 到了1995年，私營經濟的平均就業人數爲2.1人，平均註冊總資本爲16,030元（1,955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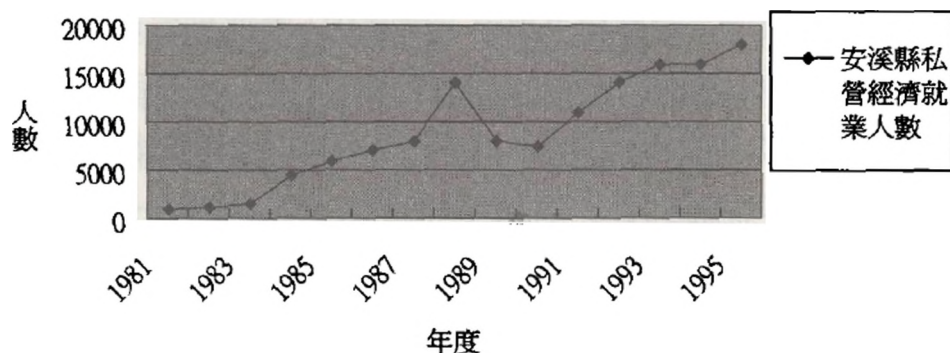
⁹³ 編號第147號受訪者。超過95%的大型私營企業是登記註冊在男性的名字之下。

⁹⁴ 編號第154號受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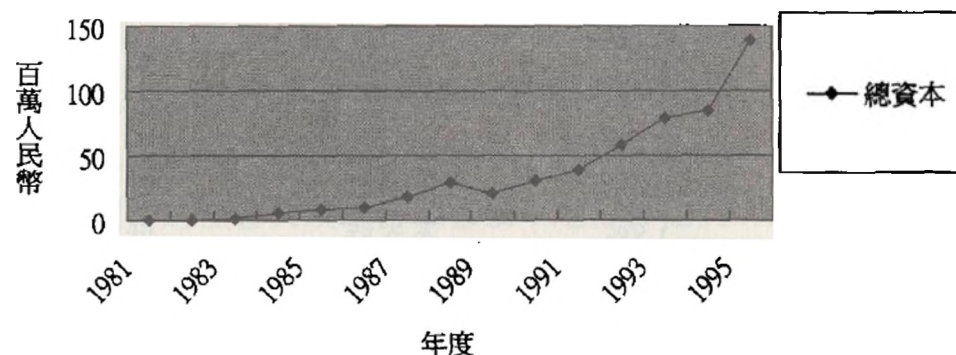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4 安溪縣註冊的私營企業數（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5 安溪縣私營經濟就業人數（1981年至1995年）



資料來源：泉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十載光彩路》，1996年，頁563。

■ 3.16 安溪縣私營企業每年註冊資本額（1981年至1995年）

福建研究地點的總結性比較

102 表 3.4 提供了福建省在就業分布、當地政府對私營經濟的
態度、非正規金融業金融機構多樣性的程度的各種比較。

如表所示，私營經濟主導的地區更容易有較高的金融制度
多樣性的經濟派觀點，只受到部分的經驗證據支持。似乎只有
惠安和安溪證明了這樣的經濟邏輯：私營企業主比例較少的地
103 方，非正規金融業也會較不發達。已知泉州全市只有 5.6% 的
勞動力從事私營經濟，經濟派的觀點會預期到金融制度多樣性
的程度低，然而，事實卻正相反。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不一致，
在晉江和長樂城外的山村也很明顯；而福州和長樂則為經濟派
的假說提供了不確定的證據。相反地，我主張當地政府對私營
104 經濟的態度是金融制度多樣性的一個較好的預測指標，倒是與

表 3.4 福建研究地點的總結性比較

研究地點	私營經濟僱用的 勞動力	當地政府對私營 經濟的態度	制度多樣性程度
福州市	22.3%	支持	高
長樂縣／市	22.9%	支持	高
長樂城外山村	100.0% ^a	不支持	低
泉州市	5.6%	支持	高
晉江縣／市	213.5% ^b	支持	中
惠安縣	2.4%	不支持	低
安溪縣	1.8%	不支持	低

a：留在村裡的農民都從事小規模的個體耕種。

b：此計算以晉江私營經濟就業總人數除以有晉江的戶口人數；百分比超過 100% 是因為晉江是一個純吸收外地民工之地，雇主向工商局申報時都列為「私營經濟雇工」。

表3.4上所提供的證據更一致。晉江是與此觀點相異的唯一例證；當地政府高度支持私營經濟，然而供私營經濟使用的非正規仲介公司的種類卻很有限。在晉江的個案中，當地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支持態度並未產生與預期相符的結果，原因是非國有經濟主導了地方經濟，使得私營企業主相對容易取得正規信貸來源。

經濟派的邏輯缺乏解釋力，可能有三個原因。首先，依賴官方統計來估計每一地私營經濟的相對規模，這本身就有問題。例如，泉州龐大的私營經濟廣為人知，但市一級的統計卻未能反映這個事實，因為許多私營企業被登記為集體企業，或根本就不登記。第二，受僱於私營經濟的勞動力此一指標，未能反映出經濟環境中特定某地非正規金融業的具體狀況。留在長樂城外山村中的每一個人可能都從事私人耕作，但土地太貧瘠以致現金並未當成主要的交易媒介。第三，經濟派觀點並未考慮到當地政府調節私營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即使統計顯示在福州與長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從事私營商業，兩地的政府都一直積極地為私營生意建立官方的市場區域，而且對非正規金融活動表現了相對的寬容。

正如非正規金融機構的供應不僅是由純粹的經濟邏輯所支配，私營企業主對金融機構的選擇同樣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缺乏完全競爭、非歧視性的信貸市場的情況下，個人的社會與政治特徵會根本地影響他們所採取的金融選擇。從經濟上來說，場外市場是「區隔」(segmented)的，而且在信貸互助會中，性別已經成為入會的一項明確指標。

信貸互助會中重現的性別差異

105 在田野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婦女個體戶比男性個體戶更可能參與信貸互助會。⁹⁵ 具體來說，在90個問卷調查的參與某種互助會的個體戶中，64%（或58人）是婦女。⁹⁶ 在個體戶入會比例較高的地區，婦女的比例甚至更高。而且，我發現婦女特別積極參與經濟生產的地區與互助會的普及程度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關聯，也就是說，互助會在閩南更流行。

在福建省內，南部說閩南話的地區中關於勤婆娘（嫁懶丈夫）的刻板印象很盛；而在北部省會福州，據說男人怕老婆，比南部男人要做更多的家事。當然，這只是性別角色上的地區差異，到目前為止，其真實性還沒有被有系統地研究過。⁹⁷ 我

⁹⁵ 這特別地令人困惑，因為早期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指出當地組成的信貸團體，例如信貸互助會，在共產中國以前是由男性所主導。早期的研究包括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9); Sidney D. Gamble, "A Chinese Mutual Saving Society" *Far Eastern Quarterly* 4 (1944): 41-52; J. H. Goh, "A Note on the Chinese Lun-Hui or Rotating Credit Society," *Economic* 5, 1 (1964): 64-72; Emile W. Jacques, "A Chinese Loan Society," *Man* 31 (1931): 225-26; Daniel H.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Pho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vol.1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⁹⁶ 這個計算基於華南的273個有效樣本，「性別」與「入會」（測量入會的變項）之間的雙變項關係，其相關係數在0.5的顯著水準下為-0.1356。相關係數的負值表示婦女比男性有更高的入會比例。

⁹⁷ 1990年關於婦女社會地位的全省調查，重點放在城鄉的差異而非南北的區域差異。可參考，《福建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福建：中國婦女出版社，1995年。為了籌備1995年在北京主辦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所進行的全國調查，同樣地將焦點放在城鄉之間的差異。可參考，例如，陶春芳、蔣永萍，《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概觀》，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當代中國婦女地位抽樣

自己的調查研究發現，入會的現象在閩南更為普遍，那裡的婦女傳統上在經濟生產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也就不必然受到某些儒家陋習如纏足的束縛。⁹⁸

的確，與大多數的西方看法認為中國傳統儒家社會中婦女屈從的角色相反，福建的民間故事早在宋朝（西元960年至1279年）就披露出福建婦女並非柔順的普遍形象。事實上，正如卡任·簡內特（Karen Gernant）所指出，天高皇帝遠，再加上福建貧窮，導致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與男尊女卑的儒家理想模式有很大的差異。福建一般的婦女也必須參與經濟生產，民間傳說中提供了許多故事，描述婦女出巧主意幫助家庭趨吉避凶之事。以下有兩個傳說中婦女積極正面形象的例子。

106

《金杯與百葉》講述了家住漳州南村的一對兄妹的故事。當地人依靠圍繞長生湖種花、種果樹和優質大米為生。有一天，一場颶風把一座山吹倒在長生湖上，隨後村莊連年大旱。哥哥金杯夢見一個老人告訴他如何從山上取水，他決定出門挖水來拯救全村。一年後，他仍未回家。妹妹百葉出外尋找，發現他手中拿著鐵錘凍死了。她儘管悲痛，卻日夜不停地繼續挖山，最後終於鑿開了山，使泉水流了出來。全村因而

調查資料》，北京：國際出版社，1994年。關於婦聯與人口研究所調查結果的概述，可參考Jean K. M. Hung, "The Family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1990s," in Lo Chi Kin, Suzanne Pepper, and Tsui Kai Yuen, eds., *China Review 1995* (Shati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 12.

⁹⁸ 關於客家傳統對於惠安與其他地方性別規範的影響，可進一步參考，李泳集，《性別與文化：客家婦女研究的新視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富裕如初，逃荒外出的人們紛紛返回。百葉爲了百姓而獻出了生命。

《寡婦塔》是講述俯視福清縣上井港的龜峰上是如何建起一座七層花崗石塔的故事。每年春天，林姓的18家男人會在他們共同建造的船上裝滿蘇杭的絲綢，飄洋過海到南洋去做生意。在春節以前，男人們會滿載南洋的貨物，與家人團聚一起過年。有一年，他們的船沒有回來，船夫的妻子們得知船出了事。船長的妻子歐大姐認爲，這種悲劇不應該阻止他人到南洋去闖蕩。因此，她提議用自己的積蓄在龜峰上建一座燈塔，並說服其他17位寡婦也捐出自己的積蓄。她們用大夥的積蓄和鄰村的募款，僱了惠安的石匠並監督著施工。燈塔造好後，每晚18位寡婦會爬上九百英尺高的塔頂去點燈，這樣過往的船隻就可以安全航行。⁹⁹

- 107 然而，最後我發現，互助會普及的程度往往與當地的經濟結構和人口特徵相對應。如表3.5所示，個體戶入會的情況在長樂、泉州和惠安特別踴躍，而在福州就不那麼普及。¹⁰⁰ 第四行顯示，四個地區的大多數入會者都是婦女。

⁹⁹ 錄自 Karen Gernant, *Imagining Women: Fujian Folk Talks* (New York: Interlink Books, 1995).

¹⁰⁰ 特定的「地點」與「入會」之間的雙變項關係，其相關係數在0.01的顯著水準下爲0.2200。

表 3.5 信貸互助會參與情況一覽表

福建的研究地點	互助會的當地名稱	總體入會率	婦女入會率	樣本數
福州	標會	20.7%	64.4%	145
長樂縣／市	標會	42.2%	68.4%	46
泉州	標會、互助會	55.6%	90.0%	14
惠安縣	標會、互助會	88.0%	68.1%	25

資料來源：作者的調查（1996年至1997年）。

該表不包括晉江、安溪和長樂城外的村莊，因為入會現象在這些地方很少：後兩者整體而言缺乏非正規金融業；晉江的企業主依靠的是高利息的民間借貸、高利貸和更正規的信貸來源，如農村合作基金會和農村信用社。

為什麼華南的婦女比男人更容易組織信貸互助會？¹⁰¹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並沒有具體地去解釋非正規金融業和性別差異在市場行為中的動態；但是從結構及文化觀點的解釋，為婦女主導互助會的現象提供了跨學科的解釋觀點。

婦女取得正規信貸的結構性障礙

為何婦女比男人更容易依賴信貸互助會的一個基本原因，可能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婦女和男人很明顯地有著不同的資金來源，也就是說，或許婦女轉而求助於信貸互助會是因為官方銀行的男性客戶更多，婦女比男人擁有較少可被接受的抵押品。相對而言，較高的文盲率也阻止了婦女申請貸款，她們可

108

¹⁰¹ 由婦女所主導的信貸互助組織不僅是中國獨有的；附錄E中提供了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比較分析。

能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從事為籌資目的的互助。或者，男性信貸官員也會出於習慣歧視女客戶。現實也是如此，幾乎我訪問的所有銀行和信用社的經理們都說，前來貸款的客戶大多數都是男人——雖然許多人也刻意指出一些「典型」的例外，即和金融機構保持良好關係的一些特別成功的女企業主。我的問卷調查結果證實了我的訪談發現：18.2%的男性受訪者從官方金融機構取得過貸款，而女性受訪者僅有6.4%。換句話說，從官方銀行貸過款的受訪者中70%是男性。¹⁰²

如果婦女在非正規金融業中普遍比男人更為積極活躍，結構性的解釋似乎就更為合理。然而，問卷調查的結果並不完全支持這一點。事實上，資料顯示，男人和女人在非正規的借貸上幾乎有相同的次數。具體來說，56.8%的女性和57.5%的男性受訪者從非正規來源借過錢（樣本數為263）。考慮到計算中的可能誤差，0.7的百分比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在非正規的放貸方面，借給親友熟人或其他商人金錢的男人比女人更多：70.2%的男性受訪者對比56.3%的女性受訪者。¹⁰³ 放貸行為上的差異，可能源於一種替代的效應，即婦女其實和男人一樣確實經常「借」給別人錢，但更多地是在信貸互助會的機構範圍內，而不是一種嚴格的雙邊的基礎上。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總的來說，婦女並不比男人更可能獲取非正規信貸，即便在正規金融部門婦女面臨著更大的結構障礙。

¹⁰² 性別與正規信貸經驗之間的雙變項關係，在顯著水準0.01之下，相關係數為0.1823。

¹⁰³ 在性別與參與非正規放貸之間的雙變項關係，在顯著水準0.01之下，相關係數為0.1685。若是控制了收入水準這一個變項，在性別與參與非正規放貸之間的雙變項關係，在顯著水準0.01之下，在統計上仍然顯著，相關係數為0.1378。

依性別而分的經濟文化

婦女主導信貸互助會的第二個可能的解釋，可以被廣義地歸類於文化上的，即千百年來中國的男女有著不同的性別建構。¹⁰⁴ 儘管在毛時代中的意識形態與群眾運動接連不斷，總的來說，中國社會還是重男輕女，而這也影響了在經濟中的性別分工。從1970年代末期以來，改革開放重振了以家庭為中心的農村生產，在許多地方，婦女也被鼓勵直接參與家庭的副業生產。不同於小型的商品生產，家庭副業「僅利用家庭中的空閒時間與剩餘勞動力去從事服務於公眾利益的生產」，是婦女的工作。¹⁰⁵ 在許多農村，將近80%的農婦除了農活，還從事編織、刺繡和其他手工業勞動。眾所周知，中國的婦女承擔著很多雖然不一定有高價值的生產勞動，但是還不清楚歧視婦女的偏見是如何轉化成為更高的入會率的。如同結構性的解釋，文化的觀點告訴我們在開發官方信貸來源上男人為何可能比婦女更有優勢，但是無法解釋婦女為何要比男人更能組織與參加民間自發的信貸團體。即使解釋了，粗糙的文化觀點反而可能會預測出相反的結果，即男性在互助會中占優勢，因為不

109

¹⁰⁴ 關於西方與中國學者對於性別建構的一系列精采討論（從16世紀至今），可參考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No. 1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⁰⁵ Elisabeth J. Croll,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London: Zed Books, 1983) 31-32; Barbara Entwisle, Gail E. Henderson, Susan E. Short, Jill Bouma, and Zhai Fengying, "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February 1995): 36-57; and Tamara Jack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可能期望婦女會採取主動聯合其他家庭去成立這種經濟合作組織。

一種把文化考慮進去的更加政治經濟觀學的觀點，會檢視在缺乏第三者力量的情況下，當地條件是如何促進這種以集體行動來解決問題的自發進展。大多數理論家強調信任和互惠等規範，視之為能使人們克服集體行動困難的文化因素，然後將其溯及個人與社會的網絡。¹⁰⁶ 換句話說，中國婦女有可能比
110 男人更會組織互助會，因為她們比男人擁有更強的人際間的信任和更強烈的社區感。¹⁰⁷ 民族誌的研究顯示，由於現在農村地區的經濟生產是以家戶為基礎，而不是在社區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一般來說，比起集體生產時代，農民更少可能與其他村民有密切的關係。¹⁰⁸ 這種發展趨勢的例外，是那些在村內外有著政治或商業地位的個人，通常是男人。但他們之間的合作

¹⁰⁶ 舉例而言，Mark Granovetter 認為人群中信任的程度與其互動的「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 有關。可參考“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vember 1985): 481-510。關於早期對於鑲嵌理論的闡述，可參考Karl Polanyi,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chap. 4;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Cf.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分別討論了基於信任所產生的不同行動方式。

¹⁰⁷ 在另一本書中，Robert D. Putnam 主張由於有更大量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存在於義大利北部，所以民間結社與其他社區組織（包括信貸互助會）在義大利北部更為普遍。可參考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關於社會資本，可參考James C.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¹⁰⁸ 可參考Ellen R. Judd, *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8-9。



賣得香料去，供孫好讀書。福建省泉州，1996年11月。

類型，多是沿著特定的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ties），而不是平行的合作。其次是當地未婚的年輕婦女，她們在家鄉的村莊中往往有著良好的社會網絡；比起已婚婦女，她們也更有可能從事合作經營的商業活動。例如，一群年輕姑娘可能會外出到鄰近地區去大批進貨或做生意。家中至少有一位兒媳的年長婦女也被發現對戶外的社會經濟活動擁有相對高的自主性。已婚的育齡婦女通常擁有最不發達的社會聯帶（social ties），因為她們嫁入夫家的村莊，參與戶外活動的時間又較少。然而，我發現城郊地區已婚帶孩子的婦女也最有可能組織或參與信貸互助會。

儘管戶內及戶外關係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歷著日益商業化的變化，村民之間仍存在著一種互惠感。¹⁰⁹ 鄰里之間在婚喪

¹⁰⁹ 沙吉才，《當代中國婦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可參考Nahid Aslanbeigui and Gale Summerfield, "Impact of the

嫁娶以及蓋新房（例如為兒子結婚之用）之事上，還是要慷慨解囊予以資助的。¹¹⁰ 愛琳·久德（Ellen Judd）指出：「這些是家家戶戶都會遇到的事……因此互相捐錢解困的互惠情況還是存在的」。¹¹¹ 對流動資金和相關的家戶投資的需求，似乎也在「家家戶戶都會遇到的事」之列，然而弔詭的情況依然存在：為了滿足上述目的，婦女比男人更容易參與地方上的信貸團體以取得融資。我認為，在互助會中信任和互惠是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另外三個補充信任與互惠的變項，與中國性別的父權建構有關：一是能為每月還款做出可信的承諾，二是在非正規基層組織中的表現，三是進入婦女支配的網絡的社會成本。

在基層信貸中做出可信的承諾

對一般集體行動以及專門對信貸互助會的研究已經指出，有能力做出令人可信的承諾——或至少能表明可信性——對於契約的交換至關重要。¹¹² 很諷刺地，事實是：正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在父權制家庭中身分的強化，婦女比男人在做出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Sen's Theory of Entitlements," *World Development* 17, 3 (1989): 343-50。他們援引 Amartya Sen 的理論說明，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度之下，婦女可支配的收入可能會與其在家戶內或外的生產投入存在差異。

¹¹⁰ 可參考 Yunxiang Yan,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¹¹ Judd, *Gender and Power*, p. 205.

¹¹² 例如 Michael Hechter, *Principle of Group Solida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07-11.

可信承諾上居於更佳的位置。在長樂和惠安這類地方，（已婚）婦女占常年勞動力的70%到80%以上，因為婦女一旦結了婚，就比男人更不可能離開村莊去接受教育或追求其他形式的就業。¹¹³ 因此，已婚婦女的相對不流動性就減少了她們在互助會中拖欠的風險，因為互助會通常是每月都聚會的。¹¹⁴ 此外，如同對互助會的其他研究所發現的，會員事實上是被排除在正規金融機構和官僚機關渠道之外的人，她們往往更有可能組織信貸互助會。¹¹⁵ 在農村合作基金會1999年被關閉之前，它們是由鄉、村政府經辦的，代表著中國鄉村私人營利活動取

¹¹³ 這一種現象也在以下研究中獲得證實，Croll,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31-32; 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3-11。然而，在來自溫州商人的例子中，全家傾向於同時搬遷，因為他們生意的本質依賴於婦女和孩童的勞動。可參考Li Zhang, "The Interplay of Gender, Space, and Work 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ail Henderson and Barbara Entwistle,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¹¹⁴ 婦女占了中國鄉村銀行（Chinese Grameen Bank）中90%的存戶，因為她們被認為比男人有更好的信用。編號第42、158-66號受訪者。

¹¹⁵ 被排除在外的主要因素是因為貧窮與其他社會邊緣化的指標，例如性別與族群。例如可參考F. J. A. Bouman, "Rotating and Accumul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23, 3 (1995): 371-84; 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Interest Rates and Rationality: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mong Seoul Women,"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6 (1988); Donald V. Kurtz,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n Adaption to Poverty," *Human Organization* 32, 1 (1973): 49-58; Edward S. Maynard, "The Translocation of a West African Banking System: The Yoruba Esusu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1, 1 (1996): 99-107; and David Y. H. Wu, "To Kill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of the Papua New Guinea," *American Ethnologist* 1 (1974): 565-84.

得正規信貸的主要來源。但缺乏當地婦聯的中間調節，婦女們無法經常使用合作基金會和更高層級的銀行。¹¹⁶ 對於沒有正式政治地位的婦女，參加信貸互助會（而非向親戚借錢）就成了她們融資的主要來源。眾所周知，婦女所獲得的信貸來源有限，合理的選擇就是要在社區中保持良好的信譽，這是對信譽重要性的公認解釋。因為在一家互助會拖欠，就會妨礙自己參加別的互助會。¹¹⁷

在基層組織中的主動表現

- 113 在社區中待的更長久以及缺乏制度上的另類選擇，可能支持了婦女的信譽，但是她們在可信度上的優勢，並未能解釋為何婦女會真的採取集體行動。結構派觀點經常忽視的第二個變項，人的能動性：個人做為自主行動者的自我認知，他們並不消極地受結構的限制，而是發明出各種辦法來渡過難關。西方許多學者和記者的描述中，一直把中國婦女描寫成長期受國家政策壓迫的受害者，因此暗示婦女本身並未（或不能）制定出改善自身日常生活的策略。¹¹⁸ 相反地，1980年代末期久德在

¹¹⁶ 農村合作基金會是在1978年由農業部所成立的，目的在提供基層農戶的信貸來源；然而，中國人民營行並不承認它合法金融機構的地位。

¹¹⁷ Sidney Ardener闡述了這個論點，可參考Sidney Ardene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y*, no. 94 (1964): 201-29; and Hechter,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108-11.

¹¹⁸ 中國有全世界最高婦女自殺率的事實強化了這一種理解。中國婦女占了所有56.6%的自殺率，中國是唯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高過男性的國家。可參考Lijia MacLeod, "The Dying Fiel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1 (1998): 62-63. Cf. Sing Lee and Arthur Kleinman, "Suicide as

(華北)山東所做的民族誌研究，卻對婦女所披露出來的能動性提供了有趣的洞察。首先，在政治和商業的公共領域中占據公認的位置的婦女，對於自身的成就是謙遜的，認為男人們更有能力。然而，這種相對的自卑感指的只是這兩個具體受到高度評價的領域，婦女是一直被排斥出這兩個男人支配的網絡的。久德寫道：「我相信當一位女人有能力經營一家農村工業企業時，涉及供銷等關鍵涉外業務卻得由男人去做……而且由於習俗的壓力，這得是個有親戚關係的男人」。其次，居領導地位的婦女自視為行動者，「但只是相對於其他婦女而言，而不是與其他男人的關係上，才是如此」。相對於地方政府，在婦女組織中出類拔萃，不僅僅是更可能，而且也更會產生婦女的能動性。第三，在家庭層次上，婦女的權威是被默默地認可的，俗語說，「男主外，女主內」。¹¹⁹ 然而，婦女在公共領域確實扮演著突出的角色：由於許多村莊在結構上靠宗族維繫，婦女做為媒人或「介紹人」的角色似乎相當重要。然而，這種網絡形式似乎在婦女的能動性或公眾認可上並不產生太多優勢。¹²⁰

114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1-38.

¹¹⁹ Judd, *Gender and Power*, 212-39; and Ellen R. Judd, “‘Men Are More Able’: Rural Chinese Women’s Conceptions of Gender and Agency,” *Pacific Affairs* 63, 1 (1990): 40-61。關於婦女在城市地區的相關經驗與敘述可參考Emily Honing and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Ford Foundation, *Reflections and Resonance: 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Preparatory Activities for the 1995 NGO Forum on Women* (Beijing: Ford Foundation, 1995).

¹²⁰ 在韓國，Laurel Kendall發現對於婦女做為媒人一事存在著兩極的看

另一方面，在村裡大量男人出外打工的地方，婦女們實際上承擔著領導的角色。在有些村子裡，代表著婦女的婦聯動員她們參加經濟生產，尋找未開發的資源，推薦增加家庭收入且不妨礙男人生產活動的門路。事實上，一種「女性化」的政治經濟利基正在某些村莊湧現。久德提供了重要的觀察：

國外有人擔心，集體經濟解體後，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中婦女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相反地，有跡象顯示，中國農村婦女發現與大規模的集體生產相比，現在的家庭承包制中遇到的難題更少。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中國婦女在集體經濟中純是婦女的勞動團體裡所得的好處，似乎不為中國農村婦女所賞識，她們並不認為這些團體是支持她們、提高她們地位所必須的東西。¹²¹

確實如此，不管特定的男女的全年比率，有指標顯示，源於家庭副業生產成功的婦女的能動性可能表現在「來自於下面」的組織。¹²² 在婦聯及其他精英組織之外，或許婦女能動性的

法，不是惡魔就是好媒人。然而她們在集權的家庭婚嫁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可參考Laurel Kendall (curato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adjunct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mbiguous Heroines or What Korean Matchmakers Taught Me About the Crisi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December 12, 1994).

¹²¹ Judd, "Men Are More Able," 55.

¹²² 可參考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在另一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一個被限制在農村中小規模生產的婦女，如何卻能增強其自信並在勞動隊伍中參與組織的發展。可參考Gillian Hart, "Engendering Everyday Resistance: Gender,

最佳展現——即使僅相對於其他婦女而言——就是她們的信貸互助會了。¹²³ 我訪問過的會頭並不「只因為好玩」而做這件事。她們需要資金來做生意，就策略地尋找也缺乏流動資金的婦女，並說服她們參與以有組織地方式來互相幫助。她們確實具備能動性。¹²⁴ 115

收集散錢的社會成本

婦女做出可信承諾的能力與其能動性結合起來，僅為女性主導互助會的現象提供了部分的解釋。為什麼終年待在村裡的男人不自己組織互助會呢？他們不是和女人一樣擁有（如果不是更大的話）能動性嗎？在我的訪問中，男人之中對於互助會在女人中流行的普遍看法是，婦女有更多的時間和耐心來節省多餘的零錢，並隨時關心互助會中複雜的金錢來往。男性受訪者通常感覺不值得花時間去理會這樣「小筆」的錢財。但如同

Patronage, and the Production in Rural Malays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 1 (1991): 93-121。Hart發現男人比女人更屈從於他們的老闆，因為男人們處於政治上的侍從關係中，並且擔心無法滿足社會上對於男性家戶責任的期待。

¹²³ 近來大多數女性組織運作的非政府組織（NGOs）加入了許多成功的女性企業主或是領袖，她們試圖幫助其他的婦女以分享資訊並保障其利益與權利。關於中國婦女非政府組織的名單，可參考Ford Foundation, *Interim Direction of Chinese Women's Organizations* (Beijing: Ford Foundation, 1995);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ompendium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Donors* (Beijing: UNDP, 1998).

¹²⁴ 我並不假定能動性必然會導致對於行動者正面的結果。舉例而言，惠安的婦女同樣地具有能動性以組織姊妹會，姊妹會是彼此慰藉的來源也象徵著婦女間的愛與忠誠，但是卻也導致集體自殺的後果。

對會員的個案研究中顯示，每個月的會錢可並不像這類回答所說的那麼小。籌錢資助非法偷渡可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籌錢購買奢華汽車相比了。小老闆經常入會，正是因為集體的會錢可高達幾萬元。簡而言之，互助會在男人中相對而言不那麼流行，所謂的小錢並不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答案。

根據女性受訪者的回答，一個複雜但重要的因素是，男人們有時鼓勵妻子去入會，這樣他們自己就不會失去面子。最終，男人們也可以享受會錢的好處——特別是這筆錢用於家庭生意的再投資上時。不管這個解釋是否在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意義上合理，很明顯男人們丟面子的社會成本高到足以阻止他們入會。¹²⁵ 對於婦女是否也會因入會而感到丟臉的問題，一個典型帶著輕視又藉口逃避的男性回答是：「婦女可以入會，反正她們掌握著家中的經濟大權」。¹²⁶ 即使
116 婦女更可能掌管著家庭的財務（例如在丈夫不在家時），社會成本中的性別差異依然存在。¹²⁷ 要精確地掌握社會成本的本質是具有挑戰性。它的一部分是透過外部壓力起作用的：例如，在參加互助會一事上，男人比婦女可能要面對更多的社會制裁，村民們會嘲笑、說閒話或異樣地待他。正如一位男性受訪者所說：「當我去年加入了一個會，會裡只有另外一個男

¹²⁵ 關於情感因素與自利計算之間的偏差，可參考 Adam Smith 與 David Hume 的討論，或是參考 Stephen Holm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Self-Interest," in Jane J.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7-286，特別是頁 275-280 的討論。

¹²⁶ 一個 1992 年至 1993 年的問卷調查發現，在城市地區比在農村地區更可能出現這一種現象。可參考 Xu Yang, "Chinese Women Enjoy Equal Say," *China Daily*, January 15, 1994, 3.

¹²⁷ 在 Kendall 的 "Ambiguous Heroines" 一文中也提到了社會成本的問題，以解釋為何婦女較男性更為可能在韓國社會中扮演媒人的角色。

人，人們會問我們為什麼和一群鄰居老太太攪在一起浪費時間……人們看不起我們做這件事」。¹²⁸ 社會成本的觀念也可能被內化，使男人們多少受到與互助會相關的羞辱與丟臉所影響。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喬恩·艾斯特（Jon Elster）曾表示：「羞恥，或對它的預期，足以構成內心的制裁……人們有一個內心的陀螺儀，能使他們穩守規範，而不受他人當下反應的影響」。¹²⁹ 若是這樣，那麼首先它與檢查「內心陀螺儀」的社會建構有關，或許中國婦女經過千百年的社會邊緣化後已經沒有什麼面子可丟了。婦女在互助會活動中會經歷較少的風險，因為婦女不被期待去保留已經所剩無幾的面子。然而，丟臉的成本不能只依照感受到的數量的單一面向去衡量。例如，婚前的貞節對婦女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女人被大家知道有婚前或婚外性行為，全家都會失去面子。即使是遭受強暴，婦女也會被逼迫到自殺的處境。¹³⁰ 簡而言之，婦女確有面子可丟，但方式與男人相異，而且這些差異直接反映了中國性別的父權建構。¹³¹ 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雖然性別規範仍舊是父權式的，例如一般與男人相關的活動和行為要比與女人相關的那些更受到重視，然而事實上，性別規範已經與時俱變了。在互助

¹²⁸ 編號第83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¹²⁹ Jon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1.

¹³⁰ 可參考 Christina Gilmarti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nathan L. Stevan Lipman and Harre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203-26; and Honig and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277-86.

¹³¹ 可參考 Kellee S. Tsai, "Women and the State in Post-1949 Rural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9, 2 (1996): 493-524，一文中的引註。

會中性別的翻轉只是其中一個表現，即一個過去為男人所主導的活動，現在是如何已被視為婦女的活動。

117 改革開放時代互助會參與中性別區隔的諷刺意味在於，有些婦女確實因為參與非正規金融，可能危及而不是提升家庭的經濟而丟了「面子」。每一次會頭捲款潛逃或某個會員拖欠會錢，互助會的活動就成為非法。在泉州（和下一章的溫州）等地，互助會的崩潰造成了危機，互助會所憑藉的信任和互惠紐帶也因此被削弱，以致繼續入會的婦女被視為自投火坑。

福建的多種現實

上述的討論也與中國的其他非正規信貸機構有關。雖然可信度、能動性和社會成本的特定解釋作用與對信貸互助會的描述有明顯的不同，但在一個社會建構的環境中，潛在的能動性邏輯依然如舊。例如，不是父權家庭中的性別角色，而是其他權威的社會建構和規範性的制裁，舉例來說，第三力量具體表現在現存國家機構（諸如單位結構或由村委會經辦的農村合作基金會）之上，可能會影響信貸的方式。最終，經濟行動者不得不比展示能動性做得更多以尋求或取得信貸。他們也必須向實施金融交易的機構或個人盡力呈現其可信度。性別只是諸多影響貸方「計算」可信度，以決定是否發放貸款的社會因素的其中一種。

例如，我們看到，在福州城區互助會的使用侷限在外來私營企業主的領域中。與能夠獲得更制度化的融資來源（例如，信用社和私營銀行）的福州當地的私營小老闆不同，福建其他地方的外來老闆幾乎全都依賴較非正規的金融機制。政治關係

也限制了維持各種金融機制中所涉及的網絡性質。

福建研究地點的生態分析，展現了私營經濟發展中廣泛的省內差異和金融制度的多樣性。即使福建全省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有著兩位數的成長率，更詳細地觀察就會發現各地在產值、經濟結構和人均收入方面存在著大量的差異。而有一些差異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很明顯。例如，這裡所討論的縣級各地，福州和泉州是排名最富有的十個城市之一，其人均總產值在1978年至1980年間就超過了一千元。在另一端，安溪的人均總產值卻只有165元，是最窮的68個縣之一，惠安則是倒數第四。¹³² 到1990年代末，在人均總產值上，福州和泉州仍然名列前茅，並發展了大量的私營經濟；而安溪仍相對落後。然而，一些縣已經從縣級排名最低升到中間或更高處了。換句話說，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條件是和有些地方的發展表現相關聯的，但並非所有的地方。

118

檢視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對於理解在明顯相似的宏觀政策條件下發展的多樣性是極為重要的。即使在同一省內，不同的發展路徑也是清晰可辨的。首先，在改革開放之初，與台灣隔海相望的所有沿海城市 and 縣的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都極為有限。然而，在實施開放政策以及台海軍事局勢緩和之後，這些地方的政府積極地鼓勵外資和台資對地方工業投資，同時又允許小型私人企業和多種多樣的「民間」金融機制蓬勃發展。毫不意外，福州、泉州和廈門經濟特區等城市中心地區的私營經濟發展規模超過了其他沿海地區。然而，沒想到的

¹³² Thomas P. Lyons, "Regional Inequality," in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Fujian: A Coastal Province i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hatin, N. 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0.

是，長樂和晉江等農業縣份的地方政府利用當地與海外華人的親情關係，吸引到大筆資金投資於地方基礎設施和私營經濟。在這些地方，工廠、祠堂、學校、診所甚至道路都驕傲地刻印著海外慈善僑胞的名字。實際上，長樂與晉江的每一家私營企業都得益於這種資本——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場外市場活動受益。

第二，與此同時，在私營企業劇增和海外資本大量湧入的大潮中，有些地方很明顯地落後了。在閩北和西南的偏遠地區，貧窮依舊。¹³³ 而且，貧窮的無底洞甚至能在東部沿海縣份的山區發現。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並不反對私營經濟的發展，但是留下來從事僅夠溫飽的農業生產的成年勞動力卻希望到外地去打工，而不願在幾乎不存在的地方經濟中投入時間與精力。

119 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福建只有很少國家指導的三線工業，稱為「小三線」。為了備戰，省內重工業都集中在建陽、三明、永安和龍岩等內陸縣，這意味著在1970年代末，這些地區總計占福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1%，而沿海縣只占29%。¹³⁴ 然而，因為它們以國有經濟為主，非國有工業和私營商業要比先前居劣勢的沿海地區發展得慢得多。到1990年，沿海縣市已占全省GDP的80%。雖然我並未在福建的內陸工業地區進行研究，根據我在河南三線主要集中地的發現（第五章），我可以估計到福建「小三線」地區的當地政府在改造大型國有企業、重新安置國有職工的壓力

¹³³ 嚴格地說，在1995年福建省沒有任何一個縣是人均年收入低於人民幣750元的貧窮縣（大約為91塊美金），然而其他官方所認可的發展指標則顯示，西南的四個縣與閩北的四個縣是貧困縣。同前註，頁346。

¹³⁴ Toyojiro Maruya, "An Economic Overview," in Yeung and Chu, eds., *Fujian*, 183.

下，也會允許私營經濟以創造性的方式發展。

第四和最後一點，福建有些地區已經沿著與蘇南模式（江蘇南部無錫一帶發展集體鄉鎮企業的模式）相似的集體發展道路演進。例如，山區的安溪縣已經從官方認定的貧困縣發展到集體企業占當地工農業產值的90%——儘管總的規模並不大。由於官方的信貸來源都用於鄉鎮企業上，安溪的私營經濟與沿海鄰縣泉州和廈門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與此同時，惠安縣的地方政府把官方銀行信貸和海外資本都導向集體企業，而婦女個體戶則主要依賴信貸互助會。

這四種大致劃分的發展路徑，顯示了當地政府對待私營經濟的態度如何影響基層場外市場金融的特徵。這種劃分並未掌握到各地之間更細微的差異，例如族族組成（例如漢人、客家、畬族等）或是社會組織（單姓村、多姓村）等。¹³⁵ 即便如此，重點是關注當地政府對於私營經濟的態度要比純粹的經濟解釋有更好的預測能力。然而，政治上的錯綜複雜——即使是在似乎有益於非正規金融仲介機制產生的情況下——也大大地使之複雜化了。

¹³⁵ 福建以其特別繁盛的父系親族家庭而著稱，例如可以觀察到單性村的普遍存在，可參考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6).

第四章

溫州的金融創新與管制*

我國不允許成立私營銀行。我們必須繼續調查並且制裁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高利貸者。這是我們確保整個金融體系秩序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120

——中國人民銀行北京總行

由溫州（未經批准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信貸服務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至關重要的……私人錢莊應被視為合法的「民間」信貸活動……應該允許私人錢莊從地下浮現出來並在基層經營。使其合法化。應該公開承認它們的存在。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

在浙江南部沿海地區的溫州，當地政府一般總是支持私營企業的。由於這種支持，人們會預期存在著範圍廣泛的非正規金融仲介公司。確實如此，早在中國由國家控制的銀行體系宣布商業化改革的前幾年，溫州的當地官員就對私營經濟的發展

* 本章的初稿為“Curbed Market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Involution in China's Coastal South”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98-6,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998).

121

抱持著容許的態度，農村企業主就在運用著眾多類型的儲蓄與信貸機制。但是，這些金融設施的創建、經營、被管制甚至有時被關閉的每一個過程中都充滿了政治上的驚濤駭浪，因為大多數的金融創新在最初都不被當時的中央金融政策所認可。最初在企業主與溫州官僚之間就金融制度問題而產生的地方爭議，後來便升級為就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範圍與進程的全國性大辯論。¹ 另外，正如本章開頭引用的兩段文字所暗示的，溫州明顯無視國家銀行管制一事，強化了中央政府的焦慮，擔心在快速發展與分權的經濟中維持金融秩序的能力。² 到1980年代末，在發展金融創新之處出現了一種雙軌制，中央的管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或是試圖禁止這種罕見的金融活動；或是認可它們，彷彿是中央首先提出了這種先進的改革。在第一種情況下，溫州的例子表明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的動態關係正在向地方傾斜，因為即使被宣布非法後場外市場的活動仍在流行。³ 第二種情況暴露出經濟改革過程的實驗性、漸進性和反

¹ 1986年由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成員所寫的文章後來被翻譯成英文並編輯成以下這本書：Peter Nolan and Dong Fureng, eds., *Market Forces in China: Competition and Smal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 (London: Zed Books, 1989)。關於早期的新聞討論，可參考《經濟日報》，1986年7月，1988年新聞報紙中的相關文章收錄於余世章等編著，《溫州改革模式新印象》，溫州：中共溫州市文化宣傳局，1989年。

² 可參考，黃葦町，《中國的隱性經濟》，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頁259。以及，高楓等著，〈溫州民間信用調研〉，《金融研究》，第2期，1993年2月，頁71。

³ 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更多的爭論，可參考Jia Hao and Lin Zhimin, eds.,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Dali L. Yang, "Reform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作用性；像溫州這些地方，某些經濟創新事物在基層的出現遠在它們能被北京正式承認之前。⁴如同一位當地幹部所說：「如果我們一直等待中央政府來許可某些活動，那就不是經濟改革了」。⁵

迄今為止，對溫州的大多數學術分析都只是突出其改革經歷的地方性，並強調溫州人經商和規避中央監管的鮮明獨特的文化癖性。這些大部分是描述性的文章捕捉到了經濟改革之初溫州的政治微妙棘手之處，但由於它們集中在溫州的叛逆個性上，僅提供了有限的比較性觀點。中國的其他城市和南方沿海地區都在類似的政策環境下運作，也都施展著它們各自的政治經濟的謀略。⁶事實上，大多數的轉型經濟大概都有地方上主動的錦囊妙計，以戲弄對付管制的干預。正因為如此，本章並不聚焦在溫州為何如此特別，而是專注於那些社區金融機構的產生邏輯，以及這些機構之所以被允許繁榮興旺、或是受到管制干預的基本政治經濟條件。更簡要地說，這些地方金融制度的起源是什麼？一旦它們被創辦起來，為何有些經營得更長久？進而，企業主們的政治聯帶對於其選擇金融設施時的影響是什麼。

122

⁴ 這樣的發展順序與 Barry Naughton 所描述的改革模式相一致，可參考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⁵ 編號第 160 號受訪者。

⁶ 可參考，例如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溫州和它的謎

在整個中華民國時代，溫州都是一個繁忙的商港。⁷ 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30年，其經濟停滯，生活水準無論從總量還是人均數量上都算貧窮。溫州的低度發展並非偶然。溫州和其他南方沿海城市一樣，靠近台灣使它在戰略地理位置上成爲一個高風險區域。因此，無論是中央還是省（浙江）政府都不想把有限的資源用於溫州的基礎設施和工業發展。⁸ 雖然溫州占浙江省土地面積的11%，人口的15%，在整個毛的時代，它所獲得的固定資產投資只占全省的1%。⁹ 除了官方的忽視外，雪上加霜的是溫州缺乏可耕地：人均僅0.42畝，與之相對的是，全省人均0.65畝，全國1.4畝。¹⁰ 溫州人地比

⁷ 在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沿海的口岸除了寧波、溫州與其他少數地方之外都被封鎖了，結果，溫州因此迅速地發展成爲該省的主要港口。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嘗試對上海實施經濟封鎖，但是上海與溫州之間的商貿仍舊持續進行，可參考張震宇、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61-62。

⁸ 儘管溫州自改革開放以來有著驚人的經濟發展，當地的官員與生意人們對他們發展的歷程仍抱持著既痛苦又驕傲的心情。因爲週遭環繞著山嶺與黃海，在過去，距離上海500公里航程的水路是抵達溫州主要的聯外途徑，直到一座小型機場在1990年興建後（以私人的資本）才改變。從溫州到浙江金華市的鐵路在1998年開通，連接了溫州與浙江省中西部，還有江西、湖南與福建部分地區。

⁹ 可參考Wang Yongfen and Li Ning, "Buttons Work Miracle in Wenzhou," *Beijing Review*, no. 42 (October 20, 1986): 14, cited in Keith Forster, "The Wenzhou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essions," *China Information* 5, 3 (1990-91), 56 n. 14.

¹⁰ 只有2%的溫州土地面積用作農耕，因爲其山區的地形限制。可參考Forster, "The Wenzhou Model," 56; and Chris Bramall, "The Wenzhou 'Miracle': An Assessment," in Nolan and Dong, *Market Forces in China*,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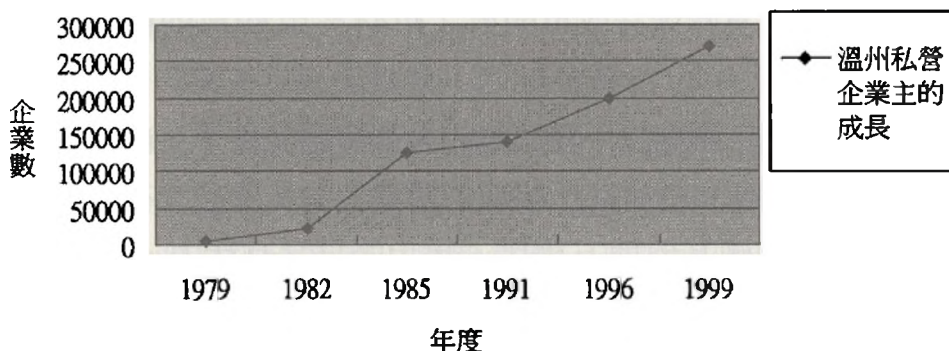
的生態限制，意味著在改革開放之初44%至49%的農村勞動力（180萬勞力中的79萬至88萬）是無業或半失業的。¹¹

當地官員自豪地說，在這樣的發展資源條件下，由小商品生產者、零售商和批發商所組成的事實上的私營經濟在溫州市的出現，與中國其他地方相比，起步既早又有活力。在1979年農村改革正式開始之時，據估計該地區早已存在1,844家個體戶；三年之後，這個數目增加了11倍，達到20,363個企業主。¹² 儘管其私營經濟生氣勃勃，國有銀行體系既不願意、在法律上也不能夠滿足新一代個體企業主的信貸需求。

最終，溫州的私營經濟與其非正規金融業先後一起繁榮興旺，名揚天下，兩者都既挑戰正規的金融機構又與之競爭。在1980年代中期，當溫州的私人金融業引起國內的極大關注，企業主採用的融資策略也升級換代，從親友、鄰居和當地商人之間特定的無息借貸，演進到更制度化和更有爭議的措施，例如一周七天、一天24小時營業的私人錢莊。如果說1980年代初期是溫州的非政府金融創新，那麼十年後，最初的創新正在被溫州市的上級行政機構頒布的金融體制改革所控制、合併或改制。這並不是說，官方的改革政策阻撓了1990年代其他的創新發展。而是說，經濟行動者所置身的市場和金融機構環境都已經改變了。這場變革的最後結果，就是重新界定了經濟場域的遊戲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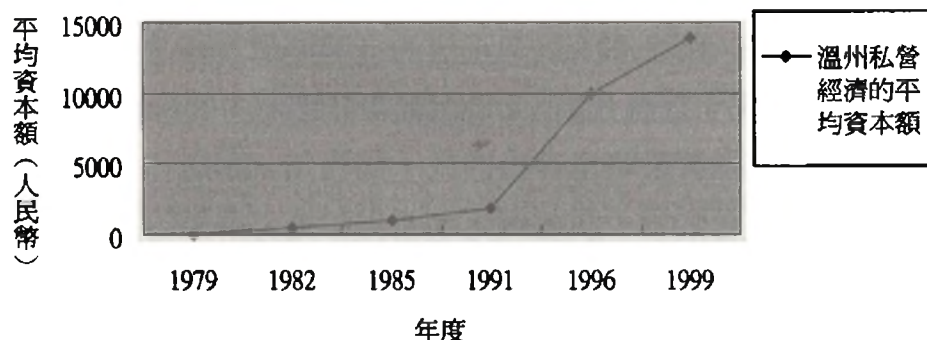
¹¹ Bramall, "The Wenzhou Miracle," 81; Zhang Lin, "Developing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Rural Areas," in Nolan and Dong, *Market Forces in China*, 97.

¹² 相較之下，北京遲至到了1980年才有私營經濟的活動存在，可參考《北京市改革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頁936。到了1982年，北京有13,210家註冊的私營企業，可參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概況：1981-1985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頁228。



資料來源：各年的《溫州統計年鑑》。

■ 4.1 溫州私營企業主的增長 (1979年至1999年)



資料來源：各年的《溫州統計年鑑》。

■ 4.2 溫州私營經濟的平均資本額 (1979年至1999年)

124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圖4.1利用官方統計的時間劃分，顯示私營企業主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前六年內（1979-1985）有大量的增加，1986年至1991年間的擴張速度稍慢，在1990年代，又稍有加快。¹³ 圖4.2顯示私營運作的資本密集度在1980

¹³ 以下的統計時期劃分是取自於本章註1的資料來源，以及作者個人在1997年3月對溫州市工商局的訪問。雖然私營企業的登記數目以及其資本額無疑地自改革開放以來有快速的增長，這一些數據可能高估了私營企業的成長率（並且或許低估了其名目上的數量），因為早期的私營

年代中期經歷了增長，在該十年的後期又有所下降。然而，不同於在1990年代私營企業數目不多的增長，人均資本卻增加的很多；到1999年，私營經濟占了超過96%的全市工業生產。¹⁴ 兩幅圖相較，生動地說明了企業主的增長與其平均資本額增長水平之間的差異。

雖然難以證實來自於非政府提供的信貸數量，中國的經濟學家估計，往高處說，1983年至1985年間溫州95%的資金流動發生在非政府金融行動者及機構中間。¹⁵ 即使往低處說，同一時期做為溫州資本總量一部分的非正規金融業的估計份額為80%。¹⁶ 溫州的非政府金融活動及機制，包括有行業信用；職業貸款者，中間人，即銀背；冒充集體企業（戴紅帽子或掛戶企業）從銀行和國有企業籌錢；以股份合作企業的形式籌措資本並發行股票；信貸互助會（輪會、標會、抬會等）；私人錢莊；農村合作基金會和當舖。

125

各式各樣的非政府金融機制能夠發展的局面，是與一種廣

企業都是不登記的。換句話說，私營企業數量的成長可能來自於既存企業的事後登記，而不是因為私營企業有突發性地成長。

¹⁴ 根據2000年《溫州統計年鑑》，在1999年國營企業只占了溫州工業總產值的3.4%。在1997年，溫州的私營經濟部門占了超過90%的工業總產值，而相較於浙江省的比例是38.8%。可參考〈浙江個體經濟會議〉，《浙江日報》，1998年10月24日。

¹⁵ Y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130 (June 1992): 298.

¹⁶ 部分的中國經濟學家區分「經理人私募資金」與「民間信貸」。舉例來說，在1992年溫州中國人民銀行的經濟學家估計銀行與城市信用社提供了溫州總資本的20%；「經理人私募資金」占了40%；「民間信貸」占了40%。可參考Gao et al., "Wenzhou," 66; and Zhang and Mao, *Wenzhou*, 9.

126

泛的論點相一致的，這種論點認為凡是政府一直支持私營經濟的地方就會有種類眾多的金融機制。溫州的案例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供深入研究導致這樣一個結果的地方政治經濟動態。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既不是一個單一的行動者，也不是一個總能抵制上級政府政策監管的獨立行政實體。在國家銀行體系試圖壟斷經濟中的信貸供應的情況下，非正規金融機構幾乎總冒著官方干預的風險。官方對私營金融活動的干預，事實上已在溫州發生，但是是以一種選擇性的方式，由選擇性的政府實體來干預。

此外，在某些制度創新一直受到管制的情況下，金融企業主們發明出創造性的方法來規避或適應管制的限制，這些舉動又導致了進一步的管制。¹⁷ 因此，在最廣泛的層次上，一種創新（I）與管制（R）的循環動態在某些案例上清晰可見： $I \rightarrow R \rightarrow I' \rightarrow R'$ ，一直循環下去。但是，並非所有的創新都導致管制的干預，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管制舉措都失敗了。為了解釋金融創新與官方干預兩者的更細微的變化，人們可以期望，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政府幹部最有可能去施展其管制權威並干預私營金融活動，是在當（1）他們無法從金融企業主那裡收到稅；（2）金融活動大張旗鼓地進行；（3）他們擁有清晰的信號：若實施管制權在政治上會大有好處。這些子假設（sub-hypotheses）是要把關於制度出現的廣泛的論點落實在具體的金融活動上，並給分析增添世俗的因素。具體而言，私營金融

¹⁷ 在討論關於美國銀行業的管制措施中，Edward J. Kane將這一種現象稱之為「管制的辨證」（regulatory dialectic）。可參考“Impact of Regulation on Economic Behavior: Accelerating Inf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g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36, 2 (1981): 355-93.

機構的存在可被視為官方干預的一個函數。另一種經濟派的觀點認為，金融機構的存在決定於利潤之上，是否有利潤肯定與金融生意的日常發展有關；但對一個金融機構在政治上的容忍，則會對其生存機會有著更強的影響力。在需求方面，溫州的例子說明了當地政治關係在形塑私營企業主金融選擇上的重要性。再一次地，假如其他各種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與官方幹部有密切關係的私營企業主或企業主本身就是幹部，就更有可能採用高度制度化的金融活動，而極少有政治聯繫的人則更可能使用中低度制度化的金融活動。

要說明這些論點，需要檢視各種私人金融策略發展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後續政府對其的反應。在許多個案中，對特定形式的私營金融的供給和需求是緊密相聯的。私營企業主必須圍繞著政治的和管制的限制因素以設計發明金融機制。同時，國家的官僚既有執行其管制命令的政治動機，也有與企圖逃避管制的私營企業主合作的經濟動力。換句話說，某些非正規金融機構可被視為產生於尋利的經濟行動者與尋租的管制者之間互相監視的反覆過程之中。考慮到企業主與幹部之間的互動，將整件事情更複雜化了。但這正是理解某些金融活動比其他更盛行的關鍵。

127

從被勒索的和諧到幹部的名利追求

現在知名的「溫州發展模式」從改革開放以來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79-1985、1986-1991、1992至今）。在第一個階段，私營經濟集中在手工業的家庭生產。這種生產需要極

少的資金，因為它使用簡單的生產設備和極少的固定資產。當農村的這些專業戶準備增加其生產規模時，他們依靠私人借貸，有時靠金融仲介人或銀背來方便其事。

在這方面，李先生的經歷很典型。¹⁸ 像甌海縣的大多數中年人一樣，他在貧困中長大。他和五個兄弟一起住在半間房子中，直到11歲才有機會讀小學。17歲從小學畢業後，在文革期間從1967年到1970年當了三年的兵，然後在一個公社工作，直到1982年他決定從事非農活動。由於李先生在公社的工資是每月只有42元，他以4%的利息借了為期一年的四千元來創業，一個小型的電子零件廠。他的奶奶為他充當仲介人從各處籌措貸款；很明顯地，她從1949年以來一直是個非正規的放貸者，在社區中擁有良好的信譽。雖然第一年中他的產值就達到十萬元，但是直到1984年他才為自己的工廠註冊登記。

128

除了從放貸者手中借錢外，溫州最早的企業主也參與信貸互助會。在不同的地區，互助會最基本的類型被稱為「程會」、「合會」或「舉會」，它們可以被翻譯成「提供優惠的會」、「合同的會」和「合作的會」。儘管這三種會在當地方言中細微的差異，其機制卻都十分相似：10到15個人同意每月都出固定的錢做為集體資金；會頭在第一次會上收取所有的錢；以後幾個月，集體資金或是如「輪會」一樣，按照預先訂出的日程表依次向其他會員發放；或是如「標會」一樣，由提供最高的利息的會員先使用。¹⁹ 小型零售商在創業或重要的擴張階段，為了辦證（以及相關的支出費用）和購置固定資產之時，最有可能入會。然而，在日常的經營階段，他們的短期資

¹⁸ 編號第185號受訪者。

¹⁹ 這一種方式在第三章中做過討論。

本需求最好用行業信用來滿足，也就是說，由批發商先提供商品，然後過幾個小時、幾天甚至幾周後再收錢，他們靠發展與批發商這種持續的關係來維持經營。

在1980年代早期，私人信貸活動諸如互助會和金融放債者仍舊是分散的，侷限在相互隔離的農村企業主的社會網絡中。溫州和杭州（浙江省省會）的官員通常保持著一種放手的態度，即使流言傳說溫州農村的小資本主正在從事非法的高利貸活動時也是如此。上層的官員懷著好奇心看待溫州，把它當作在偏遠的沿海地區明顯是自我驅動的資本主義實驗。看到早期企業主的生活有了顯著變化的地方幹部，似乎更有意於為自己分一杯羹，而不是干預這些非正規的金融活動。²⁰ 換句話說，私營企業主為了確保政治上的保護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是藉由事實上被幹部敲詐勒索的方式，這種行為可以說是犯法，是要比企業主們以地方性的資金互助對廣義的法律框架更嚴重惡劣的違犯。藉由各自支付和收受這種租金，企業主和幹部在腐敗中糾纏在一起，一旦腐敗被揭穿，就會給雙方造成災難性的後果。²¹ 結果，企業主寧願行賄，而不願去檢舉幹部們的腐

129

²⁰ 除了各種稅費的獨斷徵收，尋租也以財貨或勞務的方式顯露出來。在中國，腐敗的尋租行為與工具性的培養社會關係之間的界線有時候並不容易區別，但是在實際上出於工具性動機的送禮與基於人情的動機卻有重要的不同。可參考 Mayfair Yang,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Cf. Yunxiang Yan,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¹ 近年來，持續進行的反腐敗運動將焦點集中在地方官員與幹部上。舉例來說，在1997年反腐敗運動主要集中打擊「收受賄賂、侵占公款、行政、司法以及經濟部門中掌管金融事務的官員與幹部的奢靡生活方式」。可參考〈溫州反腐敗運動的成果〉，《中國新聞社》，1997年10月24日。

敗行徑，免得舉報了，反而招惹起他人對自己發財行動的注意，而幹部也寧願從企業主那受賄獲利，而不去干預這個有利可圖的尋租來源。²²

在改革開放之初，這種情況並非只發生在溫州。正如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所觀察到的：「看到一個賺外快的機會，市政府的各個部門，包括衛生、城市建設、交通運輸、度量衡等都向公司行號徵收各種不同的費用，有時幾乎與商號所得的純利潤總數相當」。²³ 儘管如此，對於以前找不到工作的農民來說，能繼續在私人從事的買賣中有一份微薄的收入，也覺得比種地強。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自報的利潤也相對地比「微薄」要更多。²⁴

²² 這種情況如同 Lisa L. Martin 對於「強迫難題」（coercion problem）的概念化。「強迫難題」均衡的結果是雙方的合作，但是因為較強的一方（幹部）採用了強制的手段（勒索）以確保最佳的結果。可參考 *Coercive Cooperation: 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²³ Dorothy J. Solinger, "The Private Sector: The Regulation of Small Rural Traders," in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1949-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96 n. 147, 引自瀟湘子，〈中國個體經濟發展的障礙〉，《爭鳴》，總第48期，1981年10月、《市場》，第20期，1980年7月25日。Cf. Ole Odgaard, "Collective Contro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J. Delman, C. S. Østergaard, and F. Christiansen, eds., *Remaking Peasant China: Problem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at the Start of the 1990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6-24; and Jean C. Oi, "Market Reforms and Corruption in Rural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2-3 (1989): 221-34。我發現相同的做法在福建和河南省繼續存在（第三章與第五章）。甚至現在公開在香港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國有企業也蒙受這種明顯的歧視性稅收。見 Edward S. Steinfeld,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4-64.

在第二階段（1986年至1991年），隨著全國其他地方的高度通貨膨脹，特別是1988年那次，私營經濟的發展停滯了下來。1989年的政治危機，對溫州的私營經濟有著突發的短期影響，經濟及政治的行動者們對於中央政府是否堅持繼續改革面臨著新的不確定局面。「六、四」之後，許多企業主減少了他們的生產規模，把生產資本化做儲蓄存進了銀行以賺取利息。相對地，民間信貸的規模也縮小了，靠放高利貸為生的人見到市場蕭條，就把他們的錢放進銀行，特別是存在城市信用社。從1989年到1991年底，城市的儲蓄額增加了32億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增加最大的一次。溫州的中國人民銀行將增加額的50%歸因於以前投資在私營企業的現金和來自私營金融業的資金。²⁵

130

然而，從1992年開始的第三階段，隨著產品品質的改善，生產變得更為資本密集，家庭工業擴大了規模，專業市場繁榮興旺，溫州開始從中國的欠發達地區吸引廉價勞動力。²⁶接下來的幾節中，將要分析這三個時期金融機制的發展動態：私營企業和股份公司登記為公有或集體企業；當舖的興衰；信貸互助會變化為金字塔型的投資架構（抬會／排會）及其以後的多米諾骨牌式（domino-style）的崩潰；私人錢莊的出現；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半合法化。

²⁴ 1998年溫州的人均GNP要比中國城市人平均高出75%。“Boom Time in Capitalist Wenzhou,” *Economist*, May 30, 1998, 43.

²⁵ 高風等，《溫州民間信用活動調查》，頁70。

²⁶ 在1997年溫州有超過80萬的外地民工。可參考〈溫州市不怕失業〉，《新華社》，1997年10月30日。

紅帽子偽裝、掛戶企業和股份合作社

當地企業主想出些奇招妙計來從官方銀行體系籌措資金，藉由掛靠在公有企業和登記為集體企業，即使它們是貨真價實的私營企業。採用前者策略的被稱為「掛戶企業」，因為它們掛靠在國有企業上，付錢給國有企業以使用其名稱、信箋、信封、發票和帳號，來逃稅和規避對私企（相對於國企）更嚴厲的其他要求。那些選擇登記為居委會或村委會企業的私營企業被稱為「戴紅帽子」，它們掛集體的招牌只是為了能獲得銀行貸款、稅收優惠待遇以及私企所不能享受的其他好處。²⁷ 到 131 1980年代中期，溫州市約有62%的家庭企業是掛戶企業，80%的居委會的和區屬的企業是戴紅帽子的私營企業。²⁸

戴紅帽子的企業和掛戶家庭企業代表了最少張揚的融資策略，因為它基本上保證了獲得銀行貸款所必須的登記企業的地位。「假集體」的老闆典型的情況是，要麼本身就是政治幹部（這使得紅帽子更紅了），要麼是在社會關係上或通過家族關係與地方幹部有良好的關係。²⁹ 第一種情況下的私營企業主與那

²⁷ 僱有八名或以上工人的私營企業登記為集體企業特別有利，因為私營企業直到1988年才被國務院認可為合法組織。即使在那時它們還要交35%的稅，並要求稅後收入的一半投入到再生產中去。儘管鄧小平的黑貓白貓一說常被引用，以鼓勵經濟實用主義壓倒意識形態，但貓（帽子）的顏色依然重要。

²⁸ 在有些地方，據估計90%的家庭企業是掛戶企業：黃佳新，〈溫州掛戶企業管理問題〉，《浙江學刊》，第2期，1986年，頁16，引自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245-46 n. 15。還可見《經濟日報》，1987年11月26日，第2版。

²⁹ 可參考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些在政治及經濟上關係亨通者的差異是，後者藉由同意遊戲的舊規則（集體／合作／公有制）和減少與之合作的幹部因承認捲入此事危及自己那份租金的動機，可能會繞過私營企業主—政治幹部的互動。與第一種情況不同，私營企業主與幹部（或國企經理）對於互相通報的淨成本或利潤都是不確定的，在此情況下互相依賴可能會更深並有更大的利害關係。兩種互動模式或（理性選擇的或鄉土的）遊戲可被分辨出來。第一種實質上是紅帽子和諧的遊戲，其中互相合作是雙方行動者的主要策略，它不像強迫勒索的和諧，企業主為合作所付出的代價是談判而非被強制性地榨取出來的。³⁰紅帽子的和諧並不一定意味著靜態的運作局面。例如，幹部與掛戶企業的企業主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演變成國有企業與私人承包者簽訂合同的狀況，在雙方同意下，即使掛戶協定的公有部分也會日益私有化。³¹

132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991): 267-82; David L. Wank,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53-83; and Victor Nee,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China,"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7-207。然而，在企業主中的幹部和前幹部的比例可能不會有一般假定的那麼高，因為「幹部」中包括著無政治特權的專業人員，見 Ole Odgaard, "Entrepreneurs and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8 (July 1992): 89-108。在幹部對不同種類的農村私營企業主的態度的調查中，他發現聯戶企業最受幹部支持，個體企業也受到廣大幹部的支援，大型的私營企業最受與其無特殊關係的幹部的批評。

³⁰ 可參考 David L. Wank 「共生庇護關係」(symbiotic clientelism) 的概念，in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³¹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247。然而，最終的所有權問題依然模糊。

在這種安排下，國有企業會同意將其生產的管理責任交給私營企業主，以換取一種統一的月費，而私營企業主會把其餘的利潤裝進口袋。³²

在第二種遊戲中，國企經理或地方幹部允許出售紅帽子，可能是企圖增加紅帽子的代價（即保護的價格）或堅持私營經濟要戴一頂紅帽子。³³同理，企業主則會威脅終止與公有企業的關係，改找另一家紅色保護者。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發生在幹部本身又是企業主的局面。因此，假如幹部與企業主並不擁有相互依存的實用功能，紅帽子關係是否在代價上和策略上不相稱的升級，取決於紅帽子企業的流動性，以及基層政府或公有企業（紅帽子保護者）對特定私營企業的相對依賴性，而這要由私營企業的市場效力（market availability）來衡量。³⁴

假如其他條件都相同之下，會出現兩種局面。第一，紅帽子企業越流動，它與紅帽子提供者的談判中就擁有越大的力量，反之亦真；第二，紅帽子提供者越依賴紅帽子企業，在與紅帽子企業的關係上，它擁有的力量越小，反之亦真。圖4.3中的矩陣就顯示了兩者之間的幾種可能關係。

流動性和依賴性這兩個面向提供了一個基本的預測手段，它預測了紅帽子交易最粗略層次上相對的討價還價力量和潛在的結果：意即，合作可能產生相互關係，以及在均衡狀態下賄

³² 這反映了農村改革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集體的土地被分掉了，農戶按照合同上交一定數額的糧食，農民可以在市場上賣掉多餘的糧食。

³³ 地方政府對集體企業中的經理和工人參與私營經濟所採用的懲罰措施，對這些案例的討論，可見David Zweig, "Rural People, the Politicians, and Power," *China Journal* 38 (July 1997): 153-68.

³⁴ 可參考Jeffry A. Frieden 對於資產明確性的分析，*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紅帽子的流動性	
		低	高
對紅帽子保護 者的依賴性	低	勒索的和諧 ^a	紅帽子和諧
	高	紅帽子和諧	企業家有力量

a：由於紅帽子保護者在這種情況下比企業主更有力量，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勒索的和諧。

■ 4.3 紅帽子發展情況一覽

賂的不對稱程度。然而，如果私營企業主有力量的話（右下角方框的情況），他們並不指明該企業主將要選擇的制度化形式。除了掛戶和合同交易外，在溫州掛著集體招牌的其他半合法法人形式還有合夥戶、股份合作企業和股份合作公司。合夥戶是由現存的社會或家族聯帶的兩人或兩人以上私人所擁有的。股份企業有時涉及在公司的幾個股東之間股權的實際分配，而股東不一定就參與經營；和在現代法人企業一樣，董事會選出一名經理，經理負責業務經營和最終的股票市場價格。³⁵ 其他的股份合作社實際上與合夥一樣，即它們由一個或兩個負責人所擁有和經營。³⁶ 簡而言之，溫州和中國各地的「集體」

³⁵ 當然，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並不發行公開交易的股票，但其所有制結構頗有爭議。一直到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才鼓勵發行股份的公有法人企業以做為改革國有企業的一種形式。

³⁶ 對於股份合作企業在產權上如何變得比「假集體」企業有更可靠的登記地位，詳見Susan H. Whiting, "The Regional Evolution of Ownership

經濟包括著（和繼續包括著）範圍廣泛的制度化表現形式，代表著其資本化的不同含義。³⁷ 檢視一家企業的特定稱號並不是評估其實際所有權結構的可靠方式。

- 134 因為紅帽子策略屬於最少「可見」的融資策略，人們可以預期在紅帽子企業中極少有官方干預。然而，官方的干預也是尋租機會的一個函數，使得此一預期更複雜化了。依賴性和流動性兩個面向，表示紅帽子交易中幹部和企業主產生的利益可能不同。換句話說，維持低調姿態的成本並不是一個常數。如果一個企業主並未擁有與幹部的密切政治聯帶關係，那麼爲了要瞭解造成紅帽子偽裝的本質，看一看幹部與企業主所面臨的機會結構是恰當的。在企業主與幹部之間的互動超過了勒索的和諧、幹部的名利追求、紅帽子的和諧的層次的形勢下，有必要從不同的官僚等級上檢視幹部之間更廣闊的一套關係。此外，官方對場外市場活動的干預也是其可見性的一個函數。甚至在缺乏直接租金的情況下，如果某些金融機制威脅到當地經濟穩定（如下述的信貸互助會），肆無忌憚地違犯國家銀行法（錢莊），官員們就可能施展其管制的權威，或者僅需謹慎的監

Forms: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nd Rural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Wenzhou,"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1-200.

³⁷ 可參考，例如 Victor Ne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992): 1-27; Su Si-jin, "Hybrid Organizational Forms in South China: One Firm, Two Systems," in Thomas P. Lyons and Victor Nee, ed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Era*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Series, 1994), 199-213；以及胡雄飛，《企業組織結構研究》，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6年。

督（當舖、農村合作基金會）。正如政治行動者可能調節（或乘機利用）經濟制度的發展，金融制度的經濟表現可能也會激起政治的干預。

從信貸互助會到金字塔型投資詐騙手段

如上所述，信貸互助會做為基層向農戶提供社區中存貸來源的策略，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重新出現。在溫州，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戶轉向小商品生產，互助會變成了向固定資產、大批採購原料和其他與生產有關的成本進行投資的重要資本來源。互助會的融資規模急劇增加。最初，每位會員每月的會錢一般是每月一百元到五百元；到1980年代中期，每月的會錢攀升到一千元、五千元，甚至高達一萬元。³⁸與此同時，互助會基金的使用也從消費金融需求和投資於生產用資產演變成爲賺取利息本身。

135

會頭很快就明白，他們可以靠再借出自己在第一個月收到的會錢來賺取利息。例如，以一個由11個人參加的一萬元的程會為例，程會中，會頭收取第一個月的錢，而且辦會之初就定下了其他十個月用錢的順序。在第一次聚會上，十名會員要根據其在會中用錢的次序各自交納六百元至一千五百元，即第二個月用錢者要交一千五百元，第三個月用錢者要交一千四五百元，第四個月用錢者要交一千三百元，最後一個月用錢者要交

³⁸ 在1985年，即使每月付1,000元也是極高的了，當時浙江省農村年工資人均僅547元，溫州則是527元。可參考《浙江經濟年鑑-1986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46。

六百元。這就意味著會頭在第一個月份會收到的總錢數是一萬零五百元。如果她以期限半年、月息三分的利率把錢再借出去，她會收到1890元的利息，扣除第二個月她要交出的一千五百元的會費，淨利潤為390元。³⁹ 如果會頭把一萬零五百元本金加上每六個月賺取的利息繼續借出去，在五年半內，她會賺到27,185元（23,547+3,638元，見表4.1）。⁴⁰

在這個例子中，如果第二位用錢者同樣也將錢再借出去，她會收到17,936元（16,472+1,464），扣除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會錢，淨得16,436元。這實際上是每月1.8分的利率（或21.6%的年息），它要比市場上的利率低，但比國有銀行（約為0.5-1%的月息）的利率高。從理論上說，一個標準的程會或舉會的會員都能從信貸互助會中營利，只要會中沒有人拖欠就行。

當某些會頭開始同時經辦幾個「會」並陷入短期的資金流動緊張局面之時，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一個會頭拖欠了，會影響到成百上千家。例如，根據1984年「黃花」一案的案例，一位姓南的人在1977年開始興辦舉會，以減輕樂清縣黃花鎮的貧困。到1982年，南氏捲入幾個「會」，失去了維持它們的能力，到了年底徹底周轉不動了。儘管如此，南氏繼續參與互助會，以資助其他的「會」。到1984年春，這些「會」徹底崩潰，造成367家110萬元的集體債務。到1991年，南氏60%的債務仍未解決。⁴¹

³⁹ 可參考，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16-18中的例子。

⁴⁰ 當時有一句俗語來描述這一種會頭的利潤，稱之為「無本萬利」。

⁴¹ 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21。

表 4.1 一家萬元程會的會頭資金一覽表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收到的現金（累計）	10,500	10,890	11,450	12,211	13,209	14,487	16,095	18,092	20,548	23,547
收到的利息 ^a	1,890	1,960	2,061	2,189	2,378	2,608	2,897	3,256	3,699	4,238
交納的份子錢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每半年的純收入	390	560	761	998	1,278	1,608	1,997	2,456	2,999	3,638

a：假定利息為月息3%，以半年為期。

資料來源：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16-18。

這種多米諾骨牌式的金融崩潰最嚴重的案例，涉及抬會和排會。這兩種混雜的「會」原來都是相對無害的、以社區為中心的互助組織，現在已經變異成一種潛在危害更大、更不穩定的形式：金字塔型的投資詐騙手段。不同於程會和舉會依賴於會員之間的互惠，來提供一種免於官僚主義的存貸手段；抬會和排會（字面上意義是「抬升會」和「排隊會」）是基於會頭與投資者之間的雙邊關係，會頭答應給最初的投資有特別高的回報率。這些變形的難題在於，資金並沒有真正投資在生產性的經營中；預期的「投資者」實際上是投機者，他們被快速發財的美夢所誘騙。表4.2提供了1985年溫州曾有過的不同形式的抬會的例子。

沿著最右邊一行看下去，顯示出回報或是極端膨脹的，或是投資者在中期就會蒙受損失。

典型的抬會會頭本來並不是商業企業主，而是一種「皮包商」。這些皮包商往往是教育程度很低的農村婦女，她們本身沒有任何資本，依靠社會網絡去招攬投資者。⁴² 既然「投資」的基礎不是建立在有形的生產上，好幾層的會頭冒出來以維持龐大的付款洪流。舉例來說，在抬會的第三種類型，會頭從每位入會者處籌11,600元，到了第六個月，會冒出來22個會頭，到了第12個月，將有691個會頭，到第18個月，將會有20,883個會頭。

⁴² 研究過樂清縣抬會發展與崩潰的一位當地作者，發現80%的抬會會員是婦女。對李濤先生的訪問，溫州，1997年3月18日。他曾與人合著過一部記述樂清抬會危機的記實性小說：許光月、李濤，《怪胎》，浙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更廣泛的研究發現，最大型的會（超過一千萬元）的會頭「遠遠超過一半」是婦女，12個最大型的會頭中有11個是文盲或半文盲。可參考，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23。

表 4.2 溫州抬會的主要形式（1985 年）

類型	最初投資	從第 2 個月 開始向投資 者付的利息	投資的期中 回報	另外的 投資	投資的最終 回報 ^a
一	30,800	9,000	到第 10 個月投資者已收回 9 萬 = 163%，或 16.3%/月	從第 11 個月起 1500 元/月	第 90 個月：總投資 13.5 萬；總回報是負數
二	50,000	9,000	負數	負數	第 8 個月：投資者收回 7.2 萬 = 44% 或 5.5%/月
三	11,600	9,000	到第 12 個月投資者已收回 10.8 萬 = 831%，或 69.3%/月	從第 13 個月起 3000 元	第 88 個月：總投資 26 萬；總回報是負數
四	12,000	9,000	負數	負數	第 3 個月：投資者已收回 1.8 萬 = 50% 或 16.7%/月

資料來源：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 21-22。

a：由作者計算。

隨著 1985 年至 1986 年春抬會指數般地增長，溫州的非正規金融業一片混亂，樂清、平陽、蒼南、永嘉、洞頭、台州和麗水諸縣特別嚴重。涉及的資本累計超過一億元（當時約為三千三百萬美元）。最後，各階層的民眾都受到波及，包括工人、農民、醫生、教師，甚至員警和幹部也未能倖免。一旦投資者開始經辦自己的抬會，以參與更高利息的集儲，大多數參與者到最後包括會頭和投資者也都欠了別人的債。

1986年初，正當抬會大規模崩潰之際，參加排會（抬會的近親）者達到它的高峰。⁴³和抬會一樣，排會開始時，會頭與每個入會的投資者之間也是一種雙邊關係。但是在當時，它在結構上變得日益複雜，大多數複雜的排會由會頭、會肚和會尾所組成。每一部分的會員到最後都有非常不同的金融結果；會頭是第一個用錢的人。排會的時間長短與金錢數額各自不同，如表4.3所示。此外，排會與其他的「會」不一樣，它並不總是以現金結帳的，有時利率是在債務上計算複利的。⁴⁴例如，在一個有21位「雙萬會」的排會中，捲入15,297元，會頭將獲得20,283元，第二、三位將共賺到32,555元；會肚（第四至第13位）將得25,904元；會尾（第14至第18位）則賠63,445元。當然，會尾並不知道他們正在上當受騙；爲了維持其較早繳納的會錢，會尾則去組織另外的會，當了會頭將使他們處於金錢上有利的地位。結果，債主與債戶的關係越來越複雜。

139

在1986年5月和6月，平陽縣和蒼南縣的排會開始崩潰。平陽有17萬排會參加者，會中捲入1.04億（3,010萬美元）；在蒼南，三萬五千名排會參加者的9,100萬元（2,640萬美元）

⁴³ 排會源自當地流行的一種信貸互助形式，它叫做「三年、四會」和「千元、雙月、雙萬會」。

⁴⁴ 例如一個「18股加七股」的抬會案例，每一時期會錢總額是20,400元（每股1,200元）。當會頭在第一個收錢時，吃「第二、三份」的成員（會肚）以4.5%的月息（378元）寫下字據交給會頭8,400元的信貸。在第二次會上，第二、三位會員在紙上收會錢，會頭回交8,400元的信貸加378元的利息，這就把每位會員的會錢減至6,600元。到最後，第二、三位會員只收到純收入5,022元，因為他們還得交6,600元。在第二個月，第二、三位會員的純收入計算如下：〔會錢總數（20,400元）〕－〔向會交的（6,600）〕－〔重新交給會頭的貸款＋利息（8,400+378）〕＝5,022。

表4.3 溫州排會的主要形式（1986年）

股份數	期限	每股成本	排會總資金	其他名稱
18	4年，3個月	600或1,200	10,200或20,400	無
21	3年，4個月	500	10,500	萬元會
21	3年，4個月	1,000	21,000	雙萬會

處在危險之中。各縣政府企圖以內部處理的方式來處理各個會頭，但是排會繼續在擴展，難以遏止。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干預反而起了促進入會的反作用。曾有一份禁止入會的印刷公告出現在樂清縣，但上面沒有正式黨政檔案上都有的紅印；換句話說，這種警告只是半官方的。儘管如此，當地民眾明顯地視之為反映了黨的路線，卻反其道而行之，理由是凡是中國共產黨反對的都能賺錢。⁴⁵ 人們確實是用車拉著十元的鈔票去找會頭，而其他的人則從橫貫溫州的運河裡用船送錢。會頭不再需要出門去動員別人來入會了。陌生人手裡捧著現金來找知名的會頭，急於參加這樁明顯的金融奇蹟。記帳也變得漫不經心了，大筆的交易就隨手記在破紙片上，會計變得極端複雜。此時，這些錢一分也沒有投資到生產性的經營上。假定的投資回報只是靠操縱其他的「會」來維持。

據估計到了1986年，超過95%的溫州家戶都參加了「會」（北部兩個小縣的人除外）。⁴⁶ 規模如此龐大，當個別的人開始拖欠會錢時，整個「會」的參與者網絡都被推向破產。⁴⁷ 因為會

⁴⁵ 編號第164號受訪者。

⁴⁶ 李宇，〈金融萬花筒〉，見余世章，《溫州改革模式新印象》，頁49-62。

⁴⁷ 例如，如果一家萬元會的會頭拖欠，至少11戶受影響。如果一家百萬元會的會頭拖欠，那麼至少50家萬元會（至少550戶）也被拖累。據報導，最大的會涉及十萬人和一億（近三千萬美元）。可參考，馬金

頭欠了那麼多人的錢，會頭及其家人成為摧殘、綁架、拷打、性侵犯的對象，雖然沒有人實際上想要殺掉會頭本人。1986年舉行審判會頭的法院公審大會時，約有25人自殺，幾個會頭的家屬被殺害。⁴⁸ 在專責危機管理的運動中，溫州成立了「清會辦公室」，按階級運動的方式處理；辦公室儘可能地從會頭和會員那裡把全部錢查抄乾淨，然後平均分配給「會」的所有受害者。諷刺的是，在受害者繼續扣押住會頭要求償還的情況下，叫做「救命會」和「單萬會」的一次性「會」又興辦起來了。⁴⁹

儘管溫州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慘狀如此，「會」崩潰的消息卻從未在官方的報紙上披露過。⁵⁰ 對當地幹部來說，這是件尷尬之事。銀行系統的高層官員還是知道了這件事，溫州接待了源源不斷的來自北京、杭州和上海的高層幹部和經濟學家，他們既想瞭解非正規金融機制如何能滾雪球地產生如此大的混亂，又想取締「會」這種活動。根據當地知識分子和幹部所說，在1980年代初期，溫州許多人說金融改革必須伴隨經濟改革進行，但沒有人聽。⁵¹ 回首往事，當地的觀察家相信，總得鬧出些像「會」崩潰這樣極端的大亂子，才能刺激官方重新考慮改革的政策及其後果。

龍，〈溫州金融市場〉，收錄於張旭和鄭達穹編，《溫州市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414。

⁴⁸ 編號第160、164號受訪者。

⁴⁹ 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31。

⁵⁰ 會的累積規模達十億元（3.3億多美元）。但會的崩潰並未在當地報紙上披露，因為該事件「內部處理」了。根據《怪胎》的合著者之一李濤講，一家上海的電視台想把他的書改編成一部電影，但溫州市政府不允許。

⁵¹ 編號第160、161、162、163、164號受訪者。

從分析上來看，政府對「會」干預的性質，是與前面所描述過的子假設相一致的。當「會」的參與者侷限在女企業主的小型網絡之中，而且把錢用於生產的目的時，「會」的可見度就低，當地幹部缺乏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動機去干預它們的運作。然而，當溫州的廣大民眾捲入抬會和排會的投機熱潮時，「會」就變成高度可見並影響安定的事了。既使主要是抬會和排會造成了嚴重的麻煩，當地政府卻禁止了所有形式的「會」，用以防範非正規金融市場上將來爆發混亂。

沒帽子、紅帽子、硬帽子

30歲的方佩林是如何離開他在醫院的行政工作，並於1984年9月29日在溫州一個農村小縣裡開辦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的經歷，已經成為關於溫州經濟創造性的當地傳說的核心。⁵² 它也可以被視為對官僚機制及中央—地方政治

141

⁵² 溫州的錢莊或本地銀行史可以回溯到19世紀中葉，那時它們實質上是政府的「官銀號」，負責收當地稅金、接受存款、並充當地方的銀櫃。到20世紀初，許多銀號已經演化成真正的私人錢莊，給商人、官僚士紳和地主提供商業金融服務。可參考，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55-66。參見Susan Mann Jones, "Finance in Ningpo: The ch'ien chuang, 1750-188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4-77; Lien-Sheng Yang,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chap. 8.

Jones 引用Frank Tamagna對於「錢莊」的定義：「由一個家庭、家族的成員或一夥封閉的朋友圈子，做為單一的業主或同夥，為了處理存款、借貸、匯款或換錢而興辦的金融公司，並由業主及股東的所有財產承擔無限責任」。可參考*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57.

的個案研究。蒼南縣錢庫鎮升達錢莊被高層金融官員勒令關閉前才開張了五年。儘管如此，方的錢莊對於溫州及溫州之外的官方金融機構的商業活動都有持續性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初期，僱傭超過八個工人的私人企業看起來都顯得過激（可被官方視為資本家和剝削），⁵³那麼，公開制度化的營利私人金融服務似乎就更激進更極端了。而且，中共對封建帝國時期私人錢莊的判斷是，它們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貪婪與控制。做為中共統治下第一家註冊的私營錢莊的創辦人，方佩林試圖依靠1984年一項擴大改革範圍的中央政策文件，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他發現一個句子在解釋上特別有彈性：「鼓勵農民集資來興辦各種實業，特別是在開放的行業」。⁵⁴他推理說，「集資」涉及發行「股份」，而且按照定義來說，股份就可以發放股息；因此，獲得股息是一項合法的活動。按照他的邏輯，如果股息是合法的，而且實際上和利息是一樣的，那麼賺取利息也應該是合法的。⁵⁵

142 當地方官員最初聽到方佩林的計畫，他們說政府不太可能允許建立錢莊，因為中共一直是把錢莊詆毀為「舊中國的封建殘餘」。然而，一開始，他似乎成功地獲得了在政府機關裡當官的朋友（錢庫鎮黨委書記和蒼南縣長）的同意。但是，後來臨到關頭，前者又害怕了，建議他徵求更上一級的同意或至少

⁵³ 其意識形態的基本根據即為馬克思的《資本論》，書中規定雇工超過八人的企業即為從事剝削。

⁵⁴ 張和平，〈錢莊「老闆」方佩林〉，收錄於張志仁編，《溫州潮》，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頁90-110。

⁵⁵ 當然，在稅收待遇、公司鑑價和資本結構上，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的付息與分紅都有著明顯的不同。1984年時，這些東西在中國都缺乏，然而，也可以認為兩種金融流動的形式似乎有同一邏輯。

出示一張官方的紅頭文件。由於縣政府拒絕下發文件，他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正規的營業執照，並得到了執照。這個正式的、資格完備的、為營利而同意的大印，就意味著升達錢莊被註冊登記為一家私營企業，而不是一家金融機構——負責商業的行政機構同意了在法律上嚴格地說是隸屬於金融行政機構的營運。換句話說，工商局忽視了治理金融活動的政策和程序。回首往事，人們猜測方佩林或是與工商局官員有密切的關係，或是比一般領執照者多花了錢。⁵⁶毫不奇怪，一旦錢莊開始營業，溫州市農業銀行四位最高領導人立即警告他說，中央政府還沒有下達正式政策批准私營銀行的設立。方佩林大膽地反駁說，銀行人士非常清楚溫州正在流行的地下信貸活動的規模；他所打算做的，只不過是把地下的活動公開。他指責官員：「看不見牛正走，卻盯著虱在爬」。意思是說，他的錢莊的規模比起正在溫州盛行的其他所有非政府金融活動來說，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無論如何，錢莊在一個非常灰色的合法區域內運作——工商局批准了，銀行官僚體系卻不准。⁵⁷

方佩林的錢莊開張時，只有流動資本五千元（2,155美元），註冊資本十萬元（43,103美元）。然而，他的經營規模增加的很快。錢莊吸引了金融需求不被國家銀行滿足的基本客戶群。根據「時間就是金錢」的（資本主義）觀念，他以小時為基準計算利息，創造了「時間就是利益」的格言。銀行和信用社一天只營業八小時，⁵⁸而錢莊一周七天，一天營業24小時。他

143

⁵⁶ 編號第160、164號受訪者。

⁵⁷ 在地方爭議中，值得指出，方佩林興辦錢莊早於把經濟改革推進到城市地區的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

⁵⁸ 實際上，它們或許一天只營業六個小時，因為政府辦公室中午要用

注意到，借款主要集中在上午，而人們存錢最常見的時間是在傍晚；因此，他以適合當地商人借、存週期的方式來運作。他在手頭有餘錢的人與需要錢的人中間充當仲介，因此把「死錢」變成了「活錢」（生息的錢）。⁵⁹ 而且錢莊的利率利用當地資金供需中的市場差價，其存款利率比銀行的利率略高，而貸款利率又低於其他非政府金融形式（見表4.4）。這樣，他的資金因有利的利差而有迅速的流通，高峰時，一天內錢莊的交易量達到70萬元，月儲蓄達一百多萬元，月收入超過六千元。⁶⁰

1986年5月，方佩林的錢莊開張二年之後，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視察了溫州，責怪溫州人民銀行未能更嚴格地控制當時正在崩潰的諸如抬會的非法金融活動。⁶¹ 他還公開地宣布國家銀行法不允許政府、企業和私人經辦金融機構。⁶² 儘管有此警告，私營錢莊仍舊繼續公開地經營生意，又幹了三年。直到1989年地方上才取締它們，那時全國性政治危機引發了一個時期的經濟緊縮和對於改革前景的不確定。在那時，錢莊在溫州被有效地禁止時，已經有了27家，人們公開稱之為「私人銀行」。⁶³

二小時吃午飯、午休。

⁵⁹ 例如，一位客戶可能在早上十點打電話來，要借一萬元；如果方佩林手頭上沒有足夠的現金，他就會去向確實有錢的人借，因為他正等著在那天下午二點付給另外某人一萬。方佩林就會取走這筆錢，借出去，到下午二點，他不僅信守承諾歸還這一萬元，而且已將此錢用了三次：〈以正面方式鑽漏洞〉，載歐仁等編，《南商與北商》，鄭州：海南國際信息出版社，1996年，頁70-77。

⁶⁰ 李宇，《金融萬花筒》，頁51。

⁶¹ 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8。

⁶² 張和平，《錢莊「老闆」方佩林》，頁110。

⁶³ 〈溫州人辦起中國首家私營銀行〉，收錄於余世章，《溫州改革模式新印象》，頁63-64。

表 4.4 月惠利率一覽表

金融服務	方的錢莊	國有銀行／信用社	差距（基本點） ^a
儲蓄—通知存款	1%	0.24%	83
儲蓄—定期，三個月	1.2%	1%	20
借貸	3%-5%	1.5%	15-35

a：基本點是衡量金融上利率差距和債券收益差別的標準單位，一個基本點相當於1%的1%（0.01%）。

推遲關閉錢莊並未阻止銀行業者們在此期間企圖破壞其經營。例如，就在方佩林開業後不久，錢庫鎮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經理們就曾秘密盤算著如何「消滅」錢莊。他們決定在三天之內收回國有單位所有長期的貸款，借此以貸款申請衝垮錢莊。方佩林的客戶和朋友幫他籌集十萬用於維持借貸。但是，當時農村信用社歸還了方佩林的五萬元存款並中止了他的借款權利，並宣稱他們之間存在著商業上的「衝突」。信用社經理解釋說：「『一輛車』，意指金融體系，『不能有兩個方向盤』」。⁶⁴ 當方佩林指出信用社有書面政策指明儲戶有權使用貸款，經理回答說，他的借款習慣太麻煩：他一次只借兩三天，而且每個月裡要有多達十次借款的交易。事實上，他們是在說，因為他生意的次數和金額，為他服務的成本高得無利可圖。他反駁說，他的生意類型需要資金迅速而經常的流通，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嫉妒，因為他願意為客戶提供官方銀行認為太麻煩的服務，而且還能獲得高的利潤。在錢莊營業這五年內，各級銀行管理部門的人員多次企圖來限制錢莊的活動。然而，工商局堅定地保護著他。

由於官方銀行對錢莊的反對，金融企業主們就轉向一種爭

⁶⁴ 同前註，頁113。

議較少的方式來從事金融仲介。他們不去從事合法性有問題的法人團體來直接對抗金融體系的各級官員，而去選擇一種更合正規金融部門口味的組織形式：信用社。如同私營企業認為自己在政治上登記為集體企業更為方便，想當錢莊經理的人就組織起來以信用社來運作。因為信用社結構上是發行股票的金融機構，即使其實際股份僅由兩三個人（也正好是有關的人）控制，它也有一個集體興辦的機構外表。理論上，他們的營運狀況會直接影響城市信用社的股東和職工的工資。

溫州是在1984年才成立城市信用社的。在1989年，共有26家，其中16家在城區；到了1992年，有43家信用社，其中包括14家「農村金融服務社」，這些服務社占了浙江全省總數的三分之一。⁶⁵和錢莊一樣，它們超時工作以滿足私營經濟的需要。而且，它們提供的利率也和錢莊一樣有競爭力，即使它們還得受到國家銀行體系規定的利率限制。銀行業者、官員和商人們都明白，城市信用社登記為集體金融組織，事實上它們是私人擁有的。它們不向其他國家單位彙報，自己籌措資金，像獨立的會計單位一樣運作，完全自負盈虧。城市信用社在整個1980年代享受了一個相對自主和靈活運作的時期。

然而，在1990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調查了城市信用社，發現了一些案例，其中經理們的薪酬太高，或是沒有適當地給股東們分紅。一年後，人行溫州分行發布了一項政策，規定將城市信用社和農村金融服務社置於人行的管理之下。但是，當地官員公開承認，城市信用社仍繼續獨立經營：其利率

⁶⁵ 未署名的香港報紙報導，〈信用合作社應運而生〉，1998年11月28日，收錄於余世章，《溫州改革模式新印象》，頁65-66；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124。

仍高於國有銀行；在人事任用和貸款決策上仍然保持自主，本質上仍像往常一樣經營業務。⁶⁶

1997年3月，上級金融機構再一次試圖更嚴厲地管理城市信用社，把它們轉型成城市合作銀行，視之為發行股份的商業銀行。⁶⁷ 上級金融機構這種創造的所謂理論根據是，通過合併使它們成為標準的商業銀行，以提高城市信用社的效率。隨著城市合作銀行的設立，銀行業者和地方官員都相信，事實上由私人經營的城市信用社，做為私人錢莊的產物，最終將不得不放棄大多數股份和自主經營的局面。⁶⁸ 原來城市信用社的老闆被告知，他們可以保留新實體中50%至60%的股份；地方政府將持有30%的股份，其餘的10%至20%則歸其他個人或單位。⁶⁹ 而且，由於城市合作銀行是合併了溫州所有的城市信用社所形成的，城市合作銀行的各分行現在得向監管其經營和業務的總行彙報工作。事實上，奢望當錢莊經理的人為了規避官方干預而戴的紅帽子，如今變成了一頂難受的硬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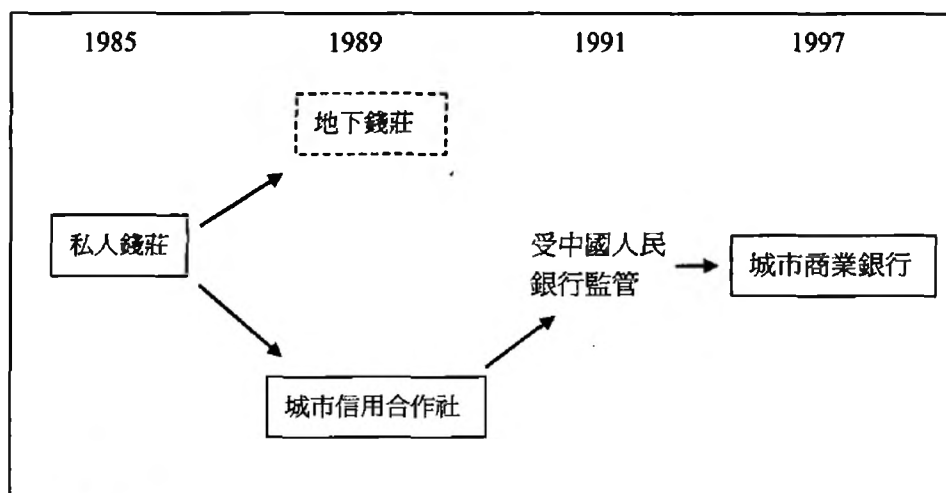
146

⁶⁶ 然而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採訪時，一位傑出的城市信用社主任描述溫州的城市信用社為「銀行中的土八路」，然後又說城市信用社不再競爭存款，並把其借貸活動限制在四個月的流動資金貸款上，並且以房地產購買價的50%做為借貸的抵押。可參考“Policies: Too Hot to Hand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8, 1993, 39.

⁶⁷ 第一家城市合作（商業）銀行是在1995年6月靠聯合已有的16家城市信用社的資金成立於深圳。可參考〈第一家城市合作銀行在深圳成立〉，《新華社》，1995年6月28日。另四個被選來首先建立城市合作銀行的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和石家莊。可參考〈興辦城市合作銀行以取代私營銀行〉，1995年7月6日，見FBIS-CHI-95-129。

⁶⁸ 編號第160、161、162、163、164號受訪者。

⁶⁹ 〈溫州接納城市合作銀行〉，《新華社》，1997年3月15日，見FBIS-CHI-97-073。



■ 4.4 沒帽子→紅帽子→硬帽子：溫州私人錢莊的命運

圖 4.4 總結了錢莊多年來的組織發展過程。它們在溫州引起高度爭議的歷史有兩點重要的含義。首先，那些足智多謀、善於在銀行官僚體系之外培養政治關係的金融企業主可以通過在其他機關登記而建立私人的金融機構（下一章還有新的例證）。第二，政治關係可以幫助他們越過最初的官僚體系的障礙去興辦一個新的金融機構，但也可能不足以保障該機構的倖存。當私營金融機構到了有目共睹的程度——就像溫州的私人錢莊——它們非常規的金融活動就一定會激起銀行當局的干預。這並不意味著金融企業主就此甘休，不再從事私營金融業（許多私人錢莊仍在地下活動）。但是，不披上政府批准的偽裝而公開興辦一家非政府的金融機構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實際上，在河南省（見第五章）經營的所有金融機構都戴著某種合法的帽子。

典當業的週期性循環發展

興辦當舖代表著溫州的金融企業主採取的另一種嘗試，去選擇一個不像錢莊那樣引起爭議的組織形式，能給當地商人提供非政府的金融服務。因為不允許單人擁有當舖，他們就得登記為集體企業。從組織上說，當舖似乎與其他的紅帽子企業沒有什麼區別：它們也有一個董事會、一位經理、一個鑑定估價室和其他專門的辦公室，大約有10至12位職員。當舖的創辦人一般都來自其他商業企業的高層並擁有廣泛的商界朋友網絡。這些聯繫也使得當舖老闆處於公然地違犯某些法律的地位，例如，包括從客戶那裡接受房地產證、從信用社借錢、為日常的儲戶充當保管機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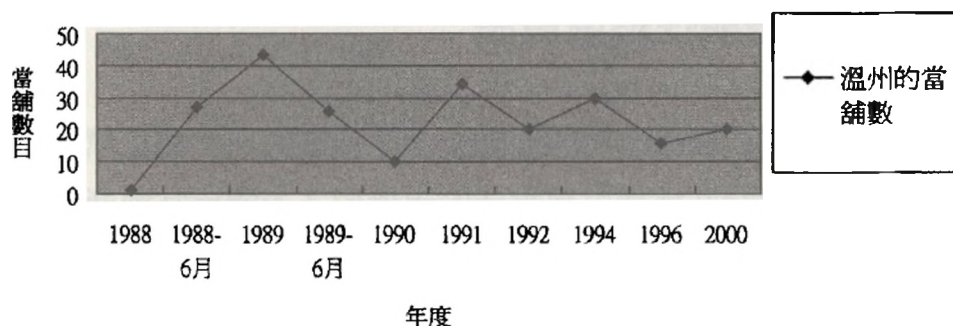
因為按定義來說當舖提供的是有抵押的貸款，其活動看起來要比金融仲介和錢莊老闆承擔的風險要小。而且，不像共產黨統治之前中國的當舖，它們主要的客源是相對富裕的生意人而不是貧困的農民。⁷⁰ 根據對1990年代初當舖的普查，約有97.9%的客戶利用現金來從事生產性或經營性的活動；只有2.1%的典當物品是用於減輕日常生活中的現金困難。⁷¹ 然而，從1988年初第一家當舖開張以來，它們在溫州的經營一直是週期性循環的。⁷² 到1988年末，42家在溫州工商局登記

148

⁷⁰ 關於當舖的當代著作很清楚地區分過去當舖的「高利貸活動」與今日為小生意人服務的方法。例如，孫曉村，《近代中國當舖業》，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辛京，《典當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

⁷¹ 高風等，《溫州民間信用活動調查》，頁70。然而，2001年初當我對當舖進行追蹤訪問時，發現外省民工也用它來籌足回家過年的現金。

⁷² 溫州的第一家當舖於1988年2月9日開張，當地人稱它離在四川開張



資料來源：溫州人民銀行（1993年），頁67-73；馬金龍，《溫州》（1995年），頁415；編號第160、186號受訪者。

■ 4.5 溫州的典當舖（1988年至2000年）

註冊的當舖，占了當時中國所有當舖的20%——但在一年之內其中15家關了門。到1991年初，當舖的數目升到了34家，1992年時又跌至19家，只是到了1994年才又升到30家（見圖4.5）。

149 當舖經營不規則表現的近因，可以回溯到其無力兌現債務負擔上。研究溫州當舖的當地經濟學家表明，其不穩定根植於基本經營上的缺陷。首先，固定資產的估價很差。當舖經辦最大宗的抵押品是些非法的房地產，這使它們冒很大的風險。當

的新中國第一家當舖僅一個月。見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66。實際上，根據北京的國際金融研究所，第一家當舖是1987年11月在湖南邵陽開張，見《中國的銀行體系》，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1993年，頁240。然而，如同討論過的其他非政府金融機構一樣，當舖在中國歷史上根本不「新」。中國最早的當舖叫質庫，是由北朝時的佛教廟宇開辦的。1935年的部分統計估計，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其他八大城市，約有1,100百家當舖，農村地區還有3,500家。1949年後，當舖被迫關閉。儘管有這個歷史，1988年溫州第一家當舖的創辦人決定嘗試典當業，首先是他在一本《世界之窗》的雜誌上讀到義大利流行典當舖，後來又聽到更多關於墨西哥當舖的情況後才動手的。李宇，《金融萬花筒》，頁62。

鋪專注於關注典當抵押品本身，而不是關注抵押的人，在房地產案例中，客戶們時常甚至並不擁有產權（即在中國是使用的收益權），或可能提供假的證明，或典當的建築物的法律地位尚有爭議。

第二，一味地追求營業額時常遮蔽了當舖店主的眼光，使之忽略了客戶典當物品的理由，造成他們忽視貸款的安全。特別是在經營的最初階段，店主關心擴大其營業規模，以求增加利潤。在某些情況下，當舖甚至剛開張幾天就貸出幾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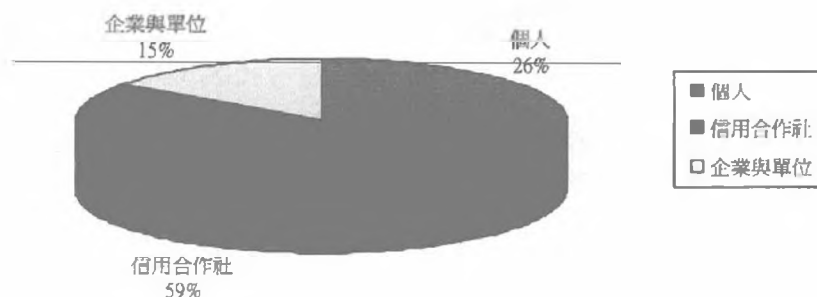
第三，內部運作程序經常出現不良狀況，因為僱來的職員往往是店主的親友，並不勝任業務。店員把鍍金件當做真金件的錯事層出不窮，當家的會計弄不清抵押物品的貸方與借方。

爲了籌措經營的資金，當舖一般依靠諸如城市信用社和農村金融服務社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從企業和國家單位非正規地借內部金，從有錢商人手裡借現金。這些來源的份額見圖4.6的一覽表。⁷³

爲了維持當舖的運營，許多當舖使用其資金基礎來償還債務，而且引起正規金融體系更大關注的是，它們從私營企業主那裡吸收存款，以保持資金的周轉流通。例如，蒼南縣的一家店鋪完全依靠存款來充當其80萬的註冊資本。在另一家當舖，超過82%的資本來自存款（約七百萬元），這比當地農村金融團體存款水準高出75%。⁷⁴當舖的存款利率比城市信用社和農村金融服務社高22至66個基本點（每月的利息爲0.9%至1.2%對0.24%至1.0%），這使得它們具有競爭力，正如私人錢莊相對於官方金融機構一樣。

⁷³ 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74。

⁷⁴ 同前註。



資料來源：溫州中國人民銀行（1993），頁 74。

圖 4.6 溫州當舖獲取貸款的來源

150 就在當舖發展的最初高潮後不久，溫州市政府、浙江省中國人民銀行和溫州市中國人民銀行同意發布管理當舖經營的新規定。⁷⁵ 1988年9月，溫州市政府發布第209號政策文件，正式將監管當舖的責任委派給溫州市人民銀行，禁止所有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向當舖提供額外的信貸，並規定當舖不得向社會籌資。兩個月後，溫州市人民銀行發布了第427號政策文件，重申市政府第209號文件的精神，奉命對所有現存的當舖進行一次徹底的調查，以確保它們遵守金融法規和營運規則。然而，一直到1989年7月，浙江省人民銀行才實際頒布自己的第12號政策文件，監管全省的所有當舖——當時由於1989年的政治及經濟鎮壓，溫州和其他地方大多數的當舖甚至沒有開張營業。當地人民銀行在遵照中央人民銀行的指令禁止私人錢莊一事上一直遲緩，但在此處，市政府卻更積極地對一種「新」的金融活動設立一項官方政策；而省政府卻遲遲落後。回想起來，雖然省人民銀行的拖延似乎看來並不重要，它最終還是發布了規定的事實，就說明了當時政治大環境的狀況。最初，中

⁷⁵ 本段取自高風等，《溫州民間信用活動調查》，頁 80-85。



溫州最早當舖的日夜服務。浙江省溫州，2001年1月。

國人民銀行滿足於把監理當舖的責任下放給溫州金融機關。然而，隨著1988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受到壓力的各省都重新集中對當地經濟活動的監管權，或至少藉由頒布政策文件來表示自己的企圖。

總的來說，溫州當舖的經驗顯示，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也取決於其賺取利潤的能力，這正如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派觀點所預期的。金融經營業務的範圍和規模的波動，並不總是根源於政治。然而，與此同時，溫州當舖的經營表現確實如此異常，這導致了當地人民銀行更急於設計出規章來管制它們。這種管制舉措發生在「會」的災難性崩潰之後，是做為對私營金融（特別是錢莊）進行大規模整肅的一部分。⁷⁶

151

⁷⁶ 2000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經貿委聯合發布了〈典當業管理責

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

152 農村信用社做爲毛時代合作化運動遺留下來的機構，要比城市信用社經歷了來自整個非政府金融機制的更多的競爭，這主要是因爲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大部分還是農村。1980年，當私營企業主的隊伍在溫州的農村社會中以指數般的高速增長時，83%的農村信用社都在虧損經營。與此同時，金融仲介與會頭們正在忙於欺騙性地經營著存、貸客戶的巨大網絡。農村信用社知道它們的利率相對來說要比就在自家門外經營的非正規金融市場所提供的利率要低的多。蒼南縣金鄉鎮的農村信用社不與上級銀行商量，就擅自於10月成立了第一家浮動利率的正規金融機構。對個人儲戶來說，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從4.5%上調到10%，貸給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年利率由6%上調到15%。⁷⁷ 到年底，金鄉鎮農村信用社又能夠收支平衡了。其他地方的農村信用社看到它的突然成功，紛紛效法。到1986年，溫州地區88%的農村信用社都實行了浮動利率。然而，中央的人民銀行一直到1989年9月才批准溫州做爲利率改革的試點地區。⁷⁸ 又一次，官方政策不是引導而是尾隨自由化改革的方向。

即使農村信用社意圖做爲中國農業銀行向當地提供貸款的

任轉移的通知》，宣布當舖不再被視爲「金融機構」，而是一種「特殊的工商企業」，見〈中國重新界定當舖〉，《經濟日報》，2000年8月7日。

⁷⁷ 馬金龍，《溫州金融市場》，頁416。

⁷⁸ 到1985年夏天，中國農業銀行開始浮動其存款利率，到1987年後，專業銀行把一年期存款利率提高到國家規定的上限的兩倍。可參考，高風等，《溫州民間信用活動調查》，頁70。

工具，它們也不能滿足農村信貸的需求。在蒼南縣經濟改革委員會於1992年8月發布〈農業信用股份基金會試行意見〉的公告後，農村合作基金會做為溫州農村商業金融的一支新增加的參賽者發展起來了。⁷⁹ 農村合作基金會和農村信用社不一樣，信用社於1996年歸中國人民銀行管制之前在法律上歸中國農業銀行監管，農村合作基金會由於最初是由農業部批准的，甚至不被視為「金融機構」。基金會歸鄉、村兩級政府管轄，依據各地的情況，它們分別被縣級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鄉級農業局、村級村委會乃至工會等各級行政部門所批准。它們也有許多種的名字，但在結構上它們都是做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組織興辦的。如同在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一樣，股份集中在幾個人的手中。農村合作基金會在數量和規模上增長得甚至比錢莊或當舖還要快——而且這種增長的猛勁實際發生在1993年中央政府發布了緊縮的宏觀調控之後。到當年年底，設立了89個農基會，累計持有存款六億多元（約合當時的1.03億美元）。⁸⁰ 當緊縮的貨幣政策從上面推行下來後，溫州的官方銀行還是能夠吸引到存款，但在貸出的規模上仍受限制。到1993年，它們的存貸差達到56億元（9.65多億美元）。⁸¹ 當地政府擔心「會」的又一次爆發，就給農基會開了綠燈，讓它去補救資金的短缺。⁸² 即使農基會像銀行機構提供同樣的

⁷⁹ 陳國興，〈溫州農村合作基金會調查報告〉，《農村金融研究》，1993年，第11期，頁25。

⁸⁰ 馬金龍，《溫州金融市場》，頁415。在1993年第四季，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

⁸¹ 陳國興，《溫州農村合作基金會調查報告》，頁25。

⁸² 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貸款量急劇增加。僅1993年，蒼南縣的18個會就比縣級的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現改稱中國建設銀行）的貸款多三倍，相

服務，它們仍規避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並避免使用金融術語。例如，貸款稱作「代管金」，存款稱為「投放金」，利息稱為「資金調劑費率」或「資金占用費率」。⁸³ 然而，農基會這些委婉的說法並沒有改變對當地企業主的經濟吸引力。

在其他省份，或是規範化農基會或是取締它的企圖不斷發生。因為在中國的中央銀行眼中，它們一直是非法的。⁸⁴ 在溫州，銀行業者與經濟學家就如何改造農基會也有爭議。一方面，它們提供了基層信貸急需的資金；另一方面，若無人監管，它們就會繼續提供更高的利率，並且吸收不受官方銀行部門保護的存款。⁸⁵ 做為中央政府企圖使金融體制合理化的部分措施，1999年3月，國務院宣布農基會將被關閉或由農村信用社接管。這項宣布至少在四省一市（四川、湖南、河南、廣西和重慶）激起了抗議。⁸⁶ 相反地，溫州的225家農基會到1999年底被「改造」完畢，並未引起社會動亂，因為大多數的溫州農基會有能力補償其存戶。⁸⁷

當於當地農業銀行的約一半，約和工商銀行一樣多。在農基會1999年被關閉之前，蒼南縣第一家農基會的資本額超過了當地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的資金額。

⁸³ 農村合作基金會首先出現在1985年，可參考，匡旭中、夏宗禹，〈加強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管理勢在必行〉，《農村金融研究》，1993年，第9期，頁33-38。從1988年起，它們在四川省發展的特別快，在那裡它們也使用了委婉的術語來偽裝其金融交易。見郭曉明，〈農村合作基金會在四川的出現和發展〉，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所，1996年10月。

⁸⁴ 大多數爭議集中在四川。

⁸⁵ 張慧如，〈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障礙及對策〉，《當代經濟科學》，1996年，第1期，頁92-95。

⁸⁶ 〈中國關閉信用合作社〉，《合眾社電訊》，1999年3月22日。

⁸⁷ 《溫州年鑑：2000年》，頁254。

在合理化改革的日程中，下一個就是農村信用社。有些農業銀行官員提議以「一行兩制」的解決辦法，把農村信用社改造成農村合作銀行，在縣級以上，它應享受國有商業銀行的待遇；在縣一級，它應是一個「結合部」，由農業銀行和基層的合作金融組織共同資助；在縣以下，它應是一個合作金融組織。同時，有些地方政府寧願把農村信用社改成當地的商業銀行，以促進當地的經濟利益。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說：「每個人都從自身如何從中獲利的角度來討論改造農村信用社一事，而不是如何把農村信用社改革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組織，以最好地服務農村商業經濟的發展」。⁸⁸

官方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干預與管制

1980年代初，在幹部的合作與背叛的最初週期之後，幹部與企業主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更微妙，成了特定的問題。隨著私營金融策略更多樣地出現，地方幹部的干預或不干預保持著同樣的受利益驅動的邏輯，但正如我在不同的金融機制所試圖說明的，這些利益被不同層次制度環境中寄居的行動者規定的更詳細了。更具體地說，在本章之初提出的子假設，官方對私營金融活動的干預會取決於：第一、尋租的機會；第二、金融活動的可見性；第三、干預的政治利益。

155

根據經驗，每一種金融機制對官方干預所處的形勢，都總結在表4.5中。租金的機會與干預的性質的迅速比較表明，前

⁸⁸ 韓雷，〈關於農村信用社改革與建立農村合作銀行問題〉，《農村經濟與金融》，1996年，第6期，頁5。

者並不是缺乏政府干預的一個特別健全的指數。換句話說，金融企業主可能付租金給各個官僚機關以尋求保護，但是當其活動變得高度可見或引起爭議時，承受要進行干預的政治壓力的負責機關就會發現，它無法繼續視若無睹了。重要的是還要重申，對溫州場外市場的管制干預浪潮發生在有著激烈競爭的場外市場內部和正規與非正規金融業之間。換句話說，對每一種特定的金融機制干預的本質，都應被視為地方政府和銀行當局極力縮小金融投機並促進當地經濟穩定的眾多舉措的一部分。禁止所有的「會」就是一例，可以看出抬會和排會所造成的混亂對更「規範」的會的形象和管制有著怎樣的連累。在解析那些進入監管金融機制的官僚行動者（政府、銀行業者、工業和商業）之前（以及它們這樣做的理論基礎），值得重申上述的每一種私營金融活動，都先於官方當局之間關於其特定功能或侵害現行政策一事的任何辯論。因此，政府機關干預的邏輯，是根據察覺到的每一種活動對各方面官員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影響。

由於銀行並不向私營經濟提供信貸，存款水準就代表了非政府形式金融對當地國有銀行純經濟影響的中心指標。根據從溫州人民銀行收集到的資料，圖4.7表明官方銀行的儲蓄率在1980年代確實經常波動。⁸⁹ 當非政府金融業中的存款和投資機會最容易獲得的時候，官方銀行中的存款就下降；結果官方銀行就採用浮動利率，以與私營金融業者競爭。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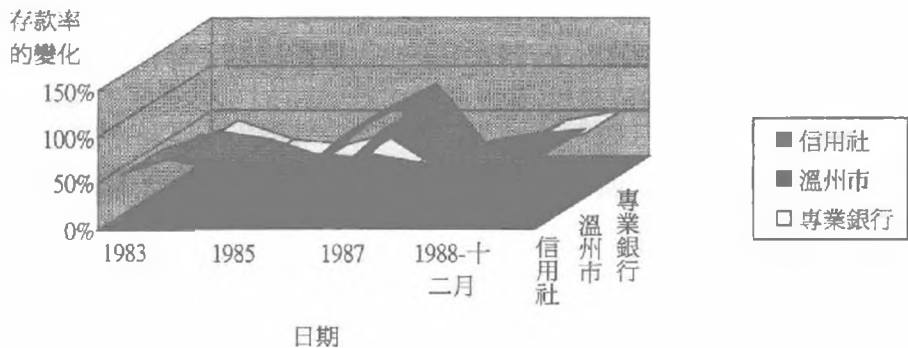
⁸⁹ 張振甯、毛春華，《溫州金融現象透視》，頁第111。資料中只可以查到存款率的變動。

⁹⁰ 這可以稱之為「如果你打不過他們，那就和他們一夥」的策略。

表 4.5 官方對私營金融機構管制一覽表

金融機制	尋租的 機會	金融活動 的可見性	要干預的 政治壓力	負責機關	干預的性質
行業信用	無	低	無	無	無
中間商	無	低	無	無	無
紅帽子／ 掛戶企業	有	低	無	縣、鄉政府	無
股份合作社	有	低	無	縣、鄉政府	無
信貸互助會	無	低／中	無	無	禁止
金字塔式的 投資騙局	無	高	有	無；後為縣政府	禁止
私人錢莊	有	高	有	工商局；後為人 民銀行	改成城市信 用社；與城 市合作銀行 合併
當舖	有	高	有	工商局；縣政府 ；後為人行	正規監管
農村合作 基金會	有	高	有	農業部；鄉、村 政府	解散或與農 信用社合併

圖 4.7 除了說明累計存款水準的週期性變化，還表明了與信用社相較，各專業銀行中存款波動的不同影響。最終，信用社經歷了最激烈的資金進出波動，然而正是國有銀行最極力地反對非政府金融行動者地下或偽裝的金融活動。由於信用社本身事實上的所有權是近於私有，或完全私有的，毫不奇怪其主任們在動盪的金融變遷中保持沉默。當他們也按官方標準提供膨脹的利率時，他們不能理直氣壯地抱怨私人貸款的錢商與高利貸者。然而，不太清楚的是，為什麼有著軟預算約束的國有銀行會關注私營金融對其自身營運的影響。換句話說，既然在他們各自的銀行裡實際上有終身的就業保障，為什麼還要關心其銀行的利潤高低呢？



資料來源：溫州中國人民銀行（1993年），頁111。

圖4.7 溫州銀行與信用社中的存款波動

首先，當地國有銀行「發言」的程度不同。⁹¹ 它取決於非政府金融活動擁有的制度上正規的程度，以及銀行能夠為允許例外的金融活動負責的行政層級。例如，他們並不抱怨給當地金融市場造成明顯重大破壞的抬會和排會。但當第一批錢莊僅在最初的籌備階段時，農業銀行就撤回了它的支持，人民銀行也不承認它們是合法的金融機構。做為官方銀行體系的行動者，他們不能直接批准事實上的私營銀行的興辦，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辦不到，否則就會招致上級責怪的風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行長親自從北京南下訓誡溫州的國有銀行人員。

然而，地方銀行可以並且確實做的，是用一種聰明的遊說功夫，說服上級銀行，非政府的「民間」金融對當地經濟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⁹² 藉由我所謂的「聰明的遊說功夫」，當

⁹¹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⁹² 從事這種研究和政策建議的主要智庫之一，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地銀行官員和經理們在期刊（如《農村金融研究》、《浙江學刊》和《金融研究》等）上發表理論文章，「客觀地」分析了溫州的金融環境，並就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提出政策建議。他們論述道，如果錢莊可以公開地經營，那麼正規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比方說要求一定比例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存在國有銀行中來監管它們，或是錢莊以更透明的方式與銀行共享其客戶基礎。事實上，紅帽子企業更有可能使用國有銀行的金融服務，而沒帽子的就依賴（非法的）私營銀行。這種遊說也間接地喚起了對所覺察到的現有銀行體系缺陷的關注。它們基本上是在更明白地說，如果你不允許我們直接滿足私營企業主的信貸需求，那麼就讓其他的機構在我們的監管下來做，我們想這樣做，但缺少授權和基礎設施；而現實是私營企業主新發展壯大的市場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確實存在。藉由呼籲對錢莊的承認合法，銀行希望能被授予監管它們的正式權力，伴隨著從制度上（雖然是非法地）獲取租金。

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從高度制度化的金融實體（即包括錢莊和當舖在內的註冊的私營經濟）那裡獲得租金的主要受益者。工商局肯定不抱怨在它那裡註冊過的企業的金融活動，因為這個官僚機關可以從勒索的和諧中獲得穩定的回報。⁹³ 同樣地，溫州的銀行也拖延著消滅錢莊，因為它們覺察到把錢莊納入自己的行政管轄之內的經濟利益，它們藉著破壞的手段試圖侵占

的深入分析，見 Catherine H. Keyser,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making in Post-Mao*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⁹³ 可參見 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Bribery in Chinese Enterprise Licensing,"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2 (April 1996): 167-95.

錢莊的市場占有率，當此舉影響有限時，它們就遊說上級，力爭獲得管轄錢莊經營的權力。⁹⁴ 最終，溫州銀行機關成功地消滅了已註冊的私人錢莊。1989年全國範圍的政治經濟緊縮迫使私營企業主就範，把自己經營的資本改存進國有銀行機構。

當先前的錢莊老闆重起爐灶興辦起城市信用社，溫州的銀行滿足於提高自己的利率，以做為旗鼓相當的對手在當地金融市場上競爭。只要它們能從自己的行政下屬（城市信用社，現在的城市合作銀行）那裡榨取到租金，它們就心滿意足了。另一方面，上級銀行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增長，視之為侵害了它對經濟中資本規模和成本的控制。中央級的銀行一再地試圖執行國務院在通貨膨脹時期關於限制信貸的指令，但是來自日益市場化地區（如溫州）的回應被證實是挑戰性的，因為下級銀行瞭解持續經濟擴張的地方動力，也明白限制官方信貸來源的後果。⁹⁵

在地方政府（市、縣、鄉、村）干預的情況中，處理不同金融機構的各個層面上的策略取決於其制度及經濟上的利益。例如，鄉、村政府對於農村合作基金會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支持其運作。市、縣政府從更高的銀行層級的角度知道它們問題叢生；但是他們同時也瞭解為何農基會得以存在（即市場需求），於是默默地讓層層金融機構承擔改造它們的負擔。除非它們能把農基會置於自己的直接管轄之下，否則它們就缺乏管制農基會的動力。同理，只要鄉、村級幹部直接地涉入了將

⁹⁴ 編號第160號受訪者。

⁹⁵ 一位前任銀行業者披露說，銀行深知城市信用社相對於國家專業銀行的比較優勢；例如，在1994年，城市信用社僅有2.6%的拖欠率，而溫州專業銀行的超貸率超過10%。編號第160號受訪者。

私營企業登記為集體企業，就不要指望他們去揭穿紅帽子。在紅帽子的和諧中，他們實際上是出售集體的招牌以換得一筆錢，方便地稱之為集體企業管理費。在私人錢莊的案例中，大多數的鄉鎮和縣政府不願意登記這些公然有爭議的企業，但是也不公開地反對它們，因為幹部—企業主網絡足以相互依賴，以確保一種合作的平衡。例如，正如私人錢莊一度曾跨越了銀行的等級制度而在工商局註冊，紅帽子企業則可以聲稱自己是集體所有制而規避工商局。

最終，地方政府從不反對有利於私營經濟及財政收入繼續增長的金融機制，因為當地的增長有利於其經濟利益。⁹⁶ 然而，當金融活動威脅到基層的社會秩序時，例如抬會和排會那樣，縣、鄉政府就會試圖減少其破壞，從而恢復社會秩序，並防止更高層政府捲入其中。溫州市當然插手、確實逮捕法辦了最大「會」的會頭，並發動了一場清剿「會」的運動。但是，高層官員和學者的來訪，卻只是讓城市官員強調允許私營金融機構以一種更制度化更透明的方式經營的重要性。

160

最近幾年，市政府實際上鼓勵了私營企業籌集資本的創造性手段，只要他們不公然違法就可以。當中共溫州市委和人民政府在1994年初發起「二次創業」發展高潮的運動時，政策文件清楚地宣布其目標，提倡繼續發展不同的金融機制。⁹⁷ 二

⁹⁶ 政治上，搞臭溫州資本家並不總是有利之事。但在限制性時期，市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鸚鵡學舌般地重複說當地資本家高利貸剝削的陳腔濫調，一直等到國家又轉回優先發展經濟的立場上來才為止。

⁹⁷ 溫州發展的「二次創業」階段是為了加強城市的技術基礎、改善交通及基礎設施、提高產品品質而提出的發展戰略。決議於1994年1月5日由溫州市委和市政府以1號政策文件正式通過，收錄於張旭和鄭達穹編，《溫州市場》，頁180-185；張明浩，〈溫州第二次創業考察〉，《社會學研究》，1996年5月20日，第4期，頁64-74。

次創業戰略除了推動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在北京、上海、天津和石家莊等地創辦城市合作銀行之前就轉制為商業銀行之外，還鼓勵當地企業公開發放可轉讓的股份和債券，以改其過去地下運作的方式。然而，這項政策的頒布已是在溫州國際信託公司1992年11月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首次上市兩年後的事了：當時早已有三萬三千萬家溫州其他公司發放過股票了。到1994年，溫州市的公司已經累計發放1.8億元可轉讓的債券了，它們在27家當地市場上交易。⁹⁸

溫州的企業主雖有在金融上大膽創新的聲譽，但他們並沒有像杭州、上海等其他城市一樣興起投入股市的浪潮。相反地，組織緊密的股份制合作企業和股份制企業湧現出來，成了他們所選擇的法人企業形式。從1990年代末期以來，浙江省的決策者與學者之間的爭論就更多地集中在經營轉型年代中所遭遇到的管理問題，而不是其相對的合法性和行政管理上的忠順問題了。⁹⁹ 同時，國有銀行的地方分行已經擴展，爭奪存款的競爭正在加劇，這使一位官員驚歎：「城中的銀行比廁所還多」。¹⁰⁰

⁹⁸ 馬金龍，《溫州金融市場》，頁417。

⁹⁹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農村股份合作制研究課題組，〈浙江省農村股份合作制的崛起背景與運作方式〉，《浙江學刊》，1996年，第1期，頁48-57。

¹⁰⁰ 編號第157號受訪者。

私營企業主對金融機制的選擇

擁有較強政治關係的企業主將會選擇制度化程度更高的金融機制的預期，在溫州的最基層得到了證實。這個論點的邏輯是，擁有較好政治關係的企業主將會以註冊企業的形式制度化其金融設施，以尋求較低的交易成本和較小的不確定性。因此，值得簡要地強調對私營企業主來說決定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的一些主要變項。

162

首先，企業主中最基本的差異點，是其註冊地位。比起沒有掛集體招牌的企業，由私人所有但註冊為集體的企業要有更多的機會去使用國有企業所享有的國有銀行和其他資源。上述關於紅帽子企業的討論表明，紅帽子關係的穩定性取決於相對紅帽子提供者的**流動性**和**相對依賴性**兩個面向。如果紅帽子提供者試圖增加保護的成本，而且企業也能相對流動，那麼所採取的替代選項就並不一定是轉向另一家不同的紅帽子保護者，而是與其他私營企業把資源集中在一起，形成股份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隨著多年來針對私營企業的攻擊已經緩和，以及溫州絕大多數居民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涉入私營經濟活動，這個策略變得日益流行。在1980年代，戴紅帽子有一個公開的庇護人會帶來很多好處。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許多大型企業事實上已經成長壯大，掙脫了紅帽子的關係，發現自己與同樣心態的其他企業主合作以接觸專業銀行去獲取貸款會更有效。¹⁰¹

¹⁰¹ 對1990年代私有化的更廣泛探討，見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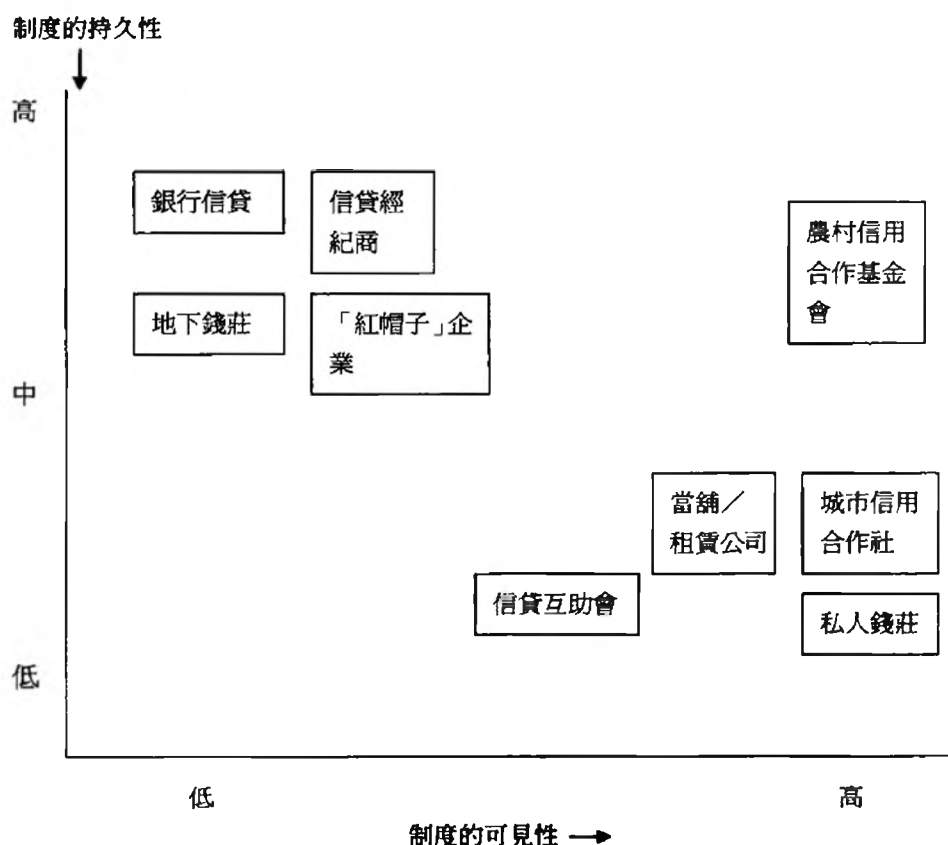


圖 4.8 制度的持久性與制度的可見性的關係

永中鎮一位35歲的皮件廠老闆皮先生的案例表明，廣博的經營經驗和良好的政治關係的結合就使得企業主甚至能開發官方的信貸來源。¹⁰² 在興辦目前這家皮件廠之前，皮先生曾經從事過許多非農的活動。1983年，他和三個兄弟集資六千元開始從事小生意。多年來，他們賣過木材、鋼鐵零件、自行車和其他東西。1998年，皮先生和六個合夥人興辦了一家皮件廠，註冊為股份企業，註冊資本為358萬元。最初，他出了

¹⁰² 編號第184號受訪者。

四百萬元，朋友和親戚出了250萬元。後來，工廠能從農業銀行借到五百萬元的貸款（半年期，年息為5.5%），又從農村信用社借了一百萬（四個月期，年息為5.8%）。到2001年，工廠擁有136名員工，其中包括皮先生的配偶和五個親戚，總產值在2000年超過六千萬元。七個合夥人每人每月從工廠以工資形式領取一千五百元，其他的利潤自動轉入再投資。

皮先生在當地關係好，受尊重。他是當地皮件商會的會長。商會處理諸如行銷和定價等與行業有關的事務。同時，他的父親是當地個體勞動者協會的會長，他的許多親戚在政府工作，是中共黨員（皮先生本人不是黨員，但他的三個兄弟正忙著申請入黨）。幫助工廠最多的政府機關是銀行、村委會和鎮政府。舉例來說，鎮政府官員每年走訪他的工廠兩次。 163

雖然皮件廠從農業銀行獲得貸款沒有困難，皮先生和他的合夥人繼續使用非正規金融來源，包括私人錢莊，以滿足短期流動資金的需求。他解釋說：「它們仍然比申請一筆正規的銀行貸款要快，也更方便」。

在1980年代初期，註冊為「個體戶」的小型生意通常擁有較少制度上的選擇。他們更可能依賴親友的非正規貸款，或是與放債人和提供行業信用的批發商搞好雙邊關係，而不是試圖去討好國有銀行的信貸官員。許多小販覺得，確實不值得花時間去填表辦手續、送禮並且等待，才能借來一筆抵押貸款。 164

¹⁰³ 隨著基層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發展，個別的企業主在使用它們的服務上也更放心。不僅是因為這些機構就是

¹⁰³ 潛在的借方送給信貸官員的禮品經常會超過貸款本身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默契是即使還貸，也不會按時還。編號第101號受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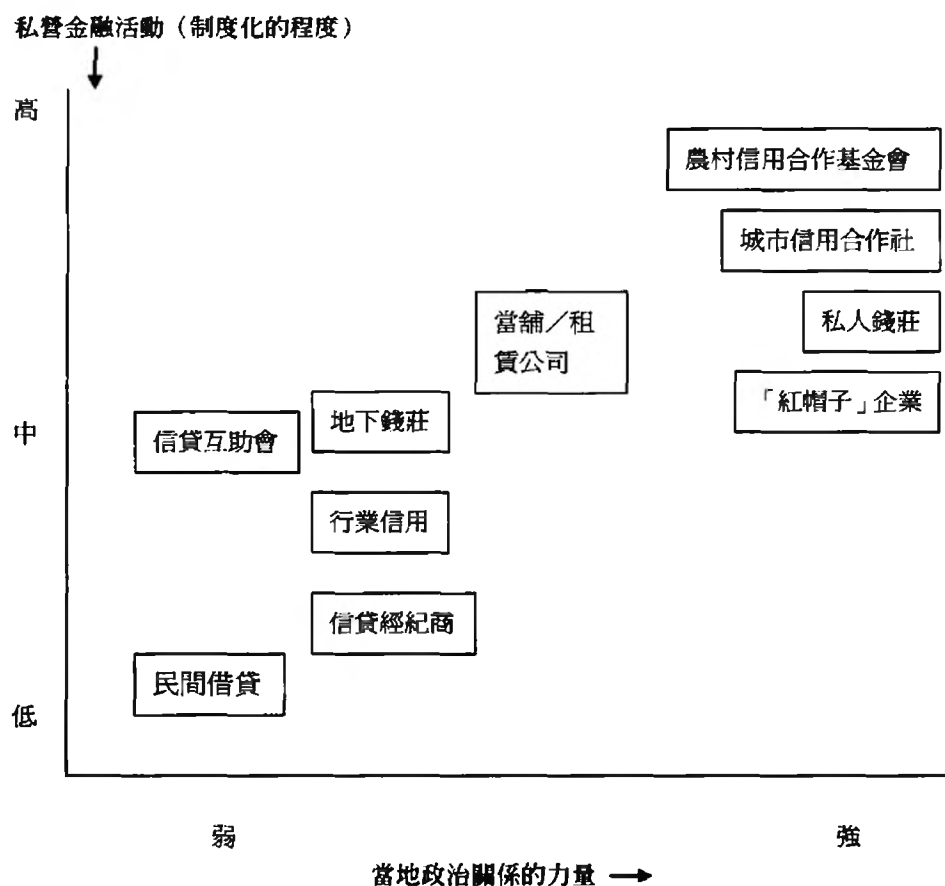


圖 4.9 當地政治關係與私營金融制度化的相關關係

專門要為當地的私營經濟服務的，而且私營老闆也更可能與當地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理和職員早就有社會關係。因此，給當地農村合作基金會的信貸官員送禮並不一定要在貸款批准之前，也可在其後，這樣就會更被視為是一種感激與好意的表示，而不是賄賂。即使是禮品或宴請農基會信貸官員所花費的金額大致與，比方說，從縣級工商銀行獲得貸款所需的相等，這筆交易的感覺也會有根本上的不同。這並不是說，農民企業主珍視「友誼」到了不考慮經濟利益的地步；但是，接觸一家

特定的金融機構以獲取服務時的社會舒適自在感，確實成為他們默默計算交易成本時考慮的因素。

驅動各種非政府金融機構興辦的邏輯，部分取決於管制的環境，這種環境管轄著各種經濟部門中資金的可得性。在諸如溫州這樣迅速發展的地區，資金的稀缺可能是轉向非官方信貸來源的最初經濟動力。但是，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在促進或阻礙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出現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制度的供應和維持的過程本質上是政治性的，雖然實際上機構的經濟表現也影響其能否長期存活的能力。在需求面，經濟行動者所選擇的特定金融活動和機構，取決於他們所理解的選擇上。在溫州所出現的一系列金融機制顯示出，私營企業主對金融設施的選擇，取決於其規模和獲取當地政治及社會資源的相對能力。例如，市場上的婦女在籌措生意資金上，就與關係亨通的幹部或私下兼職的國有企業經理極為不同。

而且，在追逐各種金融選擇的過程中，這些企業主聚集起來的主動行為也改變了當地的金融制度環境，並且影響了更廣泛層面上金融改革措施的實施。一句關於中國改革過程的流行諺語深動地描述了這個動態的本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溫州，地方經濟活動也招致了上級行政機關的應對策略。¹⁰⁴ 由於社會主義的發展要受制於中央的計畫，來自上級的監管改革的制度傾向仍舊存在。然而，中國和其他轉型經濟的實際經驗表明，改革過程充滿了不可預見的後果。理由之一是，相互競爭的官僚機關的行動者們對政策相互歧異的解釋和執行，對於地方層級上原有的及新的企業主來說就有了不同的影響；他們可能先發制人，提前行動或甚至激發其他的改革手

165

¹⁰⁴ 可參考 Kane, "Impact of Regulation"; and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段。在這種環境中，特定金融機構生存的能力，取決於每個行動者在危急關頭有什麼籌碼，以及有什麼資源可以改造舊的交換關係以適應新的遊戲規則。

下一章將轉向一個省，那裡的當地政府雖然在對待私營經濟發展上比溫州更含糊不清，非正規金融業仍在聰明的偽裝下湧現出來，而這些偽裝形式是被金融體制之外的官僚機構所認可的。

第五章

河南省有創意的資本家

河南省是中華文明的搖籃。絲綢之路就從這裡開始。古代
四大發明從這裡向外傳播。歡迎您到河南來投資、觀光。

——河南省網頁，1998年

166

「北方人比南方沿海人更保守。我們不像南方商人那樣敢
冒風險或有事業心」。

為什麼？

修自行車的小販微笑了，耐心地解釋：「北方人更重視自
己的家庭和土地，因此他們不願意長久離開家——即使這
意味著發財。南方人認為我們很友善，但我們基本上還是
鄉下土包子。南方人做生意很精明」。

你認為自己是個「鄉下土包子」嗎？

「我自己幹這個小生意，一直挺好。在這兒，我有一群固
定的客戶，他們只在我這個街角腳踏車鋪裡修車。我沒有
理由去上海那樣的花花世界。我聽說，他們那兒甚至不再
騎自行車了。因此，我猜想你也會說我在這兒還是穩當
些」。

但是你說經由當地的一家信用社在期貨上投資，那不要冒
點風險嗎？

「不要緊。每個人都在玩，因此，不在股市上玩一把會更有風險」。

——摘自鄭州的田野筆記，河南，1996年

167 在南方沿海地區，地方政府和幹部看到了從發動和推行經濟改革之中，所得要大於所失。在毛的時代，由於中國的北方內陸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著力之處，標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會預期這些地區的幹部對市場化的改革會有更多的抗拒。即使像在河南這樣的地方，這裡的幹部似乎在維護國家補貼的特權上有著更為攸關的私利，但在許多情況下，地方幹部都與企業主成功地達成了雙贏的交易。更確切地說，南方沿海與北方內陸省份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的結構差異，但這樣的地區差異並無損關於金融制度發展的主要邏輯。若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河南私營企業主興辦的金融機構的範圍甚至更強烈地證實了這觀點，乃至要比以實驗與探索傾向著稱的溫州一類聲名狼藉的例外地方還明顯。眾所周知，由於沿海南方省份靠近台灣與香港，所以毫不奇怪它們比國內其他地區更為商業化。同樣地，南方沿海地區創造性的金融機制的存在，與商業經濟繁榮地區更可能需要和產生私營金融設施的經濟邏輯是一致的。相反地，河南這樣北方中部省份的企業主就不會被預期發明這樣有創造性的金融形式，當地政府對私營金融的態度也不被預期會那麼寬容。畢竟，在毛的史達林式工業發展戰略的年代，河南是個核心省份，在大躍進年代（1958-1961）曾被視為模範典型。這並不是說，河南並未在毛的政策下蒙受巨大災難。它實在是損失慘重。¹ 但在共產黨統治下，河南比南方沿海省份

¹ 有關河南省在1958年至1961年間的悲劇，見Jasper Becker, *China's*

有著更保守（或更「左」）的名聲。² 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在新中國的頭十年裡，「政治上，鄭州（河南省省會）僅是北京的一個郊區」。³ 換句話說，省領導人對中央的政治和要求特別敏感。⁴ 於是在我的研究設計中，河南被視為一個在比較中「最不可能的案例」。⁵

河南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挑戰

如圖 5.1 所示，在改革開放前夕，河南的經濟生產以工業和農業為主，這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然而，到 1992 年，服務業超過了農業對河南經濟產值的比例。注意，工業產值的份額在後毛時代實際上還稍有增長。但工業生產的增長並不是來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112-29。估計該省餓死二百至八百萬人。諷刺的是，饑饉最嚴重的地區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信陽，最保守的估計該地餓死一百萬人，占當時總人口的八分之一。

² 中共在北方中部省份鞏固政權時，也面臨較少的困難。就河南而言，見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³ 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trans. A. M. Berret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58.

⁴ 楊大力指出，大躍進在河南如此悲慘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在該省的根基較弱，因此省領導人特別迎合北京的意圖，可參考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⁵ Harry Eckstein,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Political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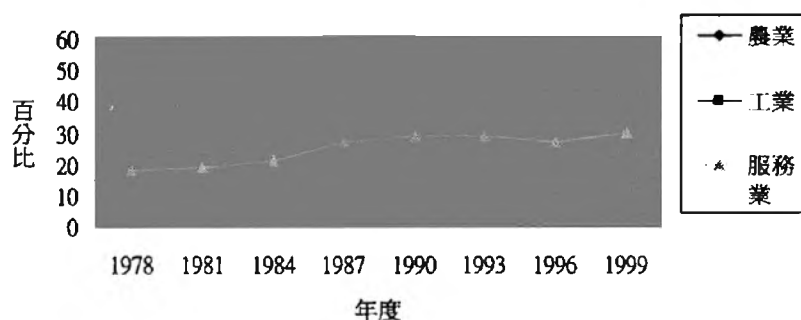
自國有經濟。如圖 5.2 所示，在改革開放開始之後，反而是集體和私營企業在工業生產中扮演日益重要的作用。國有經濟從 1978 年占工業產值中的 74 % 下降到 1998 年的 28.8 %。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的頭 20 年內，河南的非國有經濟增長至超過 70 % 的工業生產。

169 河南私營經濟的興起，在消費零售業中最為明顯。在 1978 年，私營企業僅占零售業的 0.2 %，而國有企業占 69.7 %。到了 1998 年，私營經濟已經增加到 48.1 %——大於國有（18.8 %）、集體（16.1 %）和其他商業（16.9 %）。雖然集體經濟在河南的工業生產中從改革開放初期以來占了更大的份額，但在零售業中，它實際下降了超過 12 %，從 1978 年的 28.3 %，下降到 1998 年的 16.1 %（見圖 5.3）。改革開放之後出現在河南官方統計中的「其他」種類，包括了在法律上被分類為「外資企業」的合資企業。直到 1994 年，河南省才通過了有關外國投資的規定。⁶

170 根據河南省的統計，到 2000 年初，「個體工商戶」（低於八個雇工的小企業）的數目達到 204 萬，比 1995 年增長了 62.5 %，在此五年間，每年平均增長 12.5 %。⁷ 1990 年代後期，小企業的註冊資本也增長到了更高的水準：個體戶的總註冊資本從 62 億上升到 134 億元，五年間平均年增長 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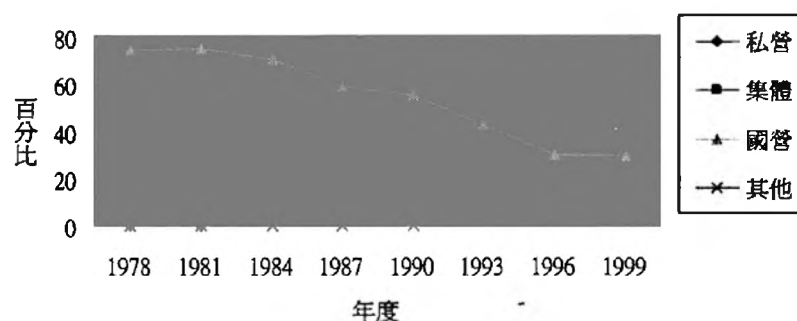
⁶ 〈河南省關於鼓勵外國投資的規定〉，1994 年 6 月 23 日由河南省第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它可在網路上查到：http://china-window.com/Henan_w/finance/framele.htm，1998 年 12 月 17 日。

⁷ 郭玲玲、胡國雷，〈我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態勢良好〉，《河南日報》，1998 年 3 月 18 日；《河南年鑑》，1999 年、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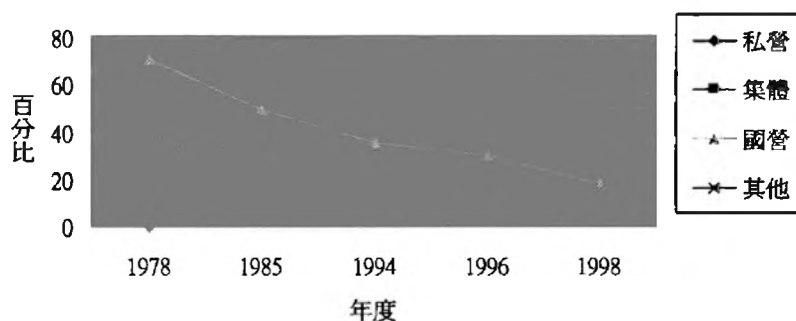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鑑》，2000年。

圖 5.1 河南各種經濟成分的生產份額（1978年至1999年）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鑑》，2000年。

圖 5.2 河南按所有制劃分的工業生產（1978年至1999年）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鑑》，2000年。

圖 5.3 河南按所有制劃分的消費零售業（1978年至1999年）

與此同時，「私營企業」（雇工超過八人）的數目甚至增長的更快。到2000年，已有45,172家註冊的私營企業，從1995年以來增長了73.3%，年均增長14.7%。較大型的企業在資本密集度上也增加很多：私營企業的總註冊資本從1995年來的116億元，上升到2000年初的287億，四年間年均增長36.9%。⁸ 1998年，《河南日報》報導該省私營經濟發展的步伐名列全國前十名。到1997年末，河南在全國30個省市（即22個省、三個直轄市和五個自治區）的個體戶發展中名列第五，在私營企業發展中名列第九。⁹

171 雖然到1998年非國有經濟已經占了超過70%的工業勞動力，省政府仍敏銳地知道河南在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吸引外資方面處於落後於全國的水準。¹⁰ 前一個難題最生動的證明就是近幾年國企職工罷工與抗議的事件增多——外國投資則被視為能夠解決大規模失業的萬能藥方。¹¹ 在1998年對外開放的會議上，當時的省委書記兼省長馬忠臣說：

目前我們經濟生活中所出現的問題，是長期積累矛盾的集中表現，這表明我省經濟處於體制與結構轉型的

⁸ 然而，值得指出較大型的私營企業並未變得更加勞動密集型，同期私營企業中僱傭的人數僅增加年均3.8%，而個體經濟僱傭的人數年均卻增加14.9%。見各年的《河南年鑑》。

⁹ 《河南日報》，1998年3月18日。

¹⁰ 〈河南非國有產業欣欣向榮〉，《新華通訊社》，1998年9月17日，見FBIS-CHI-98-260。

¹¹ 根據河南省總工會辦公室，在1998年，河南省發生了247次上街遊行示威，參與人數33,318——在抗議次數上比上一年增加了100.8%，在人數上增加79.4%，可參考《工會新聞》，1999年，第4期。

困難時期……〔因此〕我們應該大力引進國外資金，
並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重組。¹²

然而，馬省長又說河南面臨著吸引外資的挑戰，因為「我省缺乏投資熱點，基本需求不足，就業矛盾突出」。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讓河南成為國際旅遊勝地，以提高河南的吸引力，而且持續舉辦國際投資交易會。¹³

除了最近吸引外資的舉措外，在改革開放時代，河南更集中在從內部找辦法以解決內部發展的困難。河南人口九千二百多萬，1997年重慶從四川省分離出來成為直轄市以來，河南就成為全國人口第一大省。當年河南的經濟總產值在全國名列第七，然而其人均GDP則低至第20名。¹⁴正如《河南日報》記者所說：「眾多的人口就像一個巨大而殘酷的『分母』」。¹⁵由於其龐大的人口和平庸的經濟狀況之間的差距在1992年10

172

¹² 〈河南舉行對外開放會議〉，《河南日報》，1998年5月28日，1-2版。

¹³ 例如，河南在1996年開始舉辦商品交易會，從此還主辦了許多其他專業的展銷會。可參考〈鄭州市交易會吸引外資〉，《新華通訊社》，1996年9月3日，見FBIS-CHI-96-171。

¹⁴ 《河南之窗》，見http://china-window.com/Henan_w/finance/zhsle.htm，1998年12月17日。

¹⁵ 李鵬、王雪飛、王冰龍，〈中共十五大上展示新成就：「一高一低」的輝煌業績〉，《河南日報》，1997年8月23日，1-2版。參見，孫傑、王阿敏，〈河南省委書記論河南成為中國人口第一大省〉，《新華通訊社》，1997年3月14日，見FBIS-CHI-97-081。

工作。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河南宣布其人口成長率已經降至全國平均以下、經濟成長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成就。到1998年末，它的貧困人口已從1980年代末的二千五百萬降至316萬。¹⁶ 儘管如此，其人均產值低下的狀況依舊。

鄭州市

鄭州做為商代（1766-1122）的都城，已經有了四千多年的歷史。它最早的遺址可以溯及西元前2100年。隨後，鄰近的安陽成為帝都；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州做為河南省會又振興起來。¹⁷ 1898年外國修建的兩條重要鐵路，南北向的京廣鐵路和東西向的隴海鐵路在鄭州交會，它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工業中心。由於其做為鐵路樞紐的重要性，日本在1937年開始的侵華戰爭中曾以它為目標。從1949年起，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城市西郊的巨大蘇聯式工廠一個接一個地排在路邊。這些工廠生產電力設備、紡織機械、農用機具和鋁製品。在大躍進的饑荒中，鄭州的市民和其他省會的市

173

¹⁶ 從1996年起，河南已經將17億多元（二億美元）用於扶貧。可參考〈河南省推行扶貧計畫〉，《新華通訊社》，2001年2月26日，見FBIS-CHI-2001-0226。中央政府的貧困線是年人均550元，可參考〈河南在扶貧運動中的成就〉，《新華通訊社》，1999年8月2日，見FBIS-CHI-1999-0801。〈河南報導脫貧中的成功〉，《新華通訊社》，1998年1月26日，見FBIS-CHI-98-025。然而，河南定的目標稍低，年人均450元至500元為貧困線。這反映了當地的物價和消費水準，可參考〈河南設立農民最低貧困線〉，《新華通訊社》，1997年7月6日，見FBIS-CHI-97-187。

¹⁷ 鄭州在1948年10月22日被中共正式解放。河南省政府在1954年由開封遷往鄭州。

民一樣，並不像河南鄉下人一樣受那麼大的苦。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重工業化的明顯好處給他們帶來發展上的困境。在改革的第一階段，農業的聯產承包制分田到戶，它使得鄭州的大街小巷充滿了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¹⁸ 最早的流入人口是賣菜的、小商販，還有許多當地人稱之為「罪犯」的人。

雖然河南省官方認可私營企業要晚於南方沿海省份，鄭州市政府在頒布管理重新湧現的私營企業主的規定上仍比中央政府早幾步。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於1979年恢復，代表個體戶利益的群眾組織個體勞動者協會於1984年成立。到2000年初，鄭州市工商局統計全市有158,378家個體戶，6,631家私營企業，比1995年的數目增加了一倍以上。¹⁹ 個體戶與私營企業註冊的總資本在2000年初分別為20億和32億7千萬元，從1995年以來平均年遞增約20%。

儘管鄭州有著毛時代重工業大型廠礦基地之稱，改革開放的自由化浪潮從遍及全市的專業批發市場和商業零售市場上可見一斑。過去容納蘇聯式機器的破舊廠房已被分隔成一個個攤位，租給個體戶小販。為大市區服務的批發市場在全城建立起來，專業批發水果、蔬菜、肉、乾果、飲料、點心、書籍、成衣、鞋、摩托車、煤炭、農用機具、建築材料、電器設備和各式日用品。²⁰ 城市有些商業零售業也專業化了：一條街可能全

174

¹⁸ 鄭州市下轄六個區和六個農業縣。鄭州市六百萬人口（不包括平常的約60萬外地民工）中，近70%是農村人口。〈鄭州市成為區域商業中心〉，《新華社》，1998年6月20日，見FBIS-CHI-98-171。

¹⁹ 《鄭州統計年鑑》，2000年。

²⁰ 到1996年，鄭州有102個批發市場；1990年之前，僅有九個。1996年，約有三分之一被定為生產資料市場，超過一半是消費工業品市場，20%是農副產品市場。它們通常由下列實體興辦：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是戶外的服裝鞋襪攤，下一個街區只有果菜攤販，而其他的市場擁有相對均衡的各類消費品，但是由來自同一外地的私營企業主所主導。

雖然鄭州市工商局努力地為私營企業主建立市場，來自鄉下的季節性個體戶時常寧願繞過在工商局登記並租用一個官方指定的攤位所需的官僚程序。四處游走的小販有時就在一座大商場的門口擺下攤子，販售與隔壁專業市場一樣的商品。例如，在1996年中期，在一個水果批發市場大門外，我的研究助理和我看到五、六個小販正從三輪車車廂裡賣桃子和蘋果。後來才知道，他們全都來自鄭州市區外中牟縣的同一個村。²¹農民們解釋說，對他們而言若是在批發市場裡租一個固定攤位太不划算，因為一個月要交五百元，他們通常一個月只能賺三百元，因為他們不能像專業批發商那樣大規模地賣水果。當問及他們是否曾經考慮過把自己生產的水果湊在一起，共同租一個攤位。小販們回答說，在市場裡租一個攤位很難，因為他們都沒有城市戶口，教育程度不高，也不會填寫所需的表格。這群人中教育程度最高的是一位50歲的婦女，她讀完了小學；其他人僅讀過幾年的小學。他們從未想到工商局註冊是一個現實的可行選擇。相反地，農民們想他們可以很簡單地騎著三輪車進城，隨意賣幾個小時的水果，然後騎車回家。

閒置地皮的工業企業；國有企業；市／鄉／村政府與街道居委會聯辦；國家、省、市級聯辦，可參考，何永新，〈鄭州市批發市場發展情況〉，《經濟研究參考》，1996年1月26日，第15期，頁34-37；參見，鄭州貿易城建設課題組，〈關於鄭州市批發市場發展對策研究〉，《經濟研究參考》，1996年1月1日，第1期，頁2-5；鄭州貿易城建設課題組，〈關於加快鄭州貿易城建設的思考〉，《商業經濟，商業企業管理》，1993年，第4期，頁117-120。

²¹ 他們的家鄉張村只有六千人。編號第279、280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他們很快地發現，流動攤販的生活頗為艱難，有時候還很危險。工商局管理「流動攤販」的政策是，他們每天賣東西要交三元的費。同樣地，衛生局也要收流動個體戶每天二元的衛生費，理由是他們弄髒了街道。實際上，這意味著當工商局和衛生局的幹部每天巡查流動攤販時，他們自動地就要收走每日的費用。然而，如果收費者「不高興」或不滿意個體戶的態度，那麼他們就可能處罰一個小販從20元到200元不等的罰款，另外還照收那微不足道的二元至三元費。當小販當場不願意或是不能交時，收費者就可能會訴諸暴力並沒收三輪車。在這種情況下，失去車子的小販只能一路步行回家拿錢。等交了罰款，領回車子，車上的水果早就全爛掉了，做了三天的生意等於白幹。

鄭州市內其他的「個體戶聚集區」裡聚集著來自更遠地方的商販。例如，農業西路的一個商場裡有著從浙江省義烏縣來的外地生意人。²² 在1995年年中，一位來自義烏縣的企業主到了鄭州，想看看是否能在此地辦起一個市場，把南方沿海的產品運到北方內地來賣。在一位鄭州交通警察朋友的幫助下，他找到了城外邙山區化工廠旁的一塊廢棄地，並租下了整片土地。²³ 然後，他回到義烏，招募了當地的企業主，承諾他們以低租金開發一個新市場。²⁴ 1995年11月8日，義烏小商品市

²² 編號第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²³ 當地報紙對興建市場的報導稍有不同。貸款分別給了義烏和鄭州工商局的最高領導人。見，文勇、曉旭、建玲，〈江南明珠耀中原——義烏小商品市場鄭州分市場發展記實〉，《河南日報》，1996年7月17日，6版。

²⁴ 他將他的見解與北京的浙江村做了比較，見，項飏，〈北京有個「浙江村」〉，《社會學與社會調查》，1993年，第3期，頁36-39；項飏

場開幕了。約三百名小商販每人先付一萬元現金預租各自 12×15 英呎的零售攤位，租期五年（第一年優惠免稅）。他們帶著產自浙江、福建和廣東的各類廉價商品來到了。

176 當我在1996年夏天第一次訪問義烏市場時，生意蕭條；1996年10月、1997年5月我追蹤訪問時，仍停滯如一潭死水。與鄭州市中心車水馬龍的市場區不一樣，義烏市場明顯是賣家多於買家。我問卷調查的小販證實了他們在浙江的生意要比在河南的好得多；許多人說，如果情況不再好轉，他們就準備在幾個月後回家，即使這意味著他們損失掉最初那一萬元的投資。小販們除了購置零售店面的成本和拋下他們在老家生意的成本，還要繼續交納在鄭州經營的每月各種費用，包括平均25元的水電費、20元工商費和100元的銷售稅。因為生意太差，該市場的浙江商人想回家探親時，其他的小販得籌措現金，借錢給他，以免他空著手回家。

到2001年6月，商販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五年期的租金已經漲到一萬五千元。²⁵ 大多數的義烏小販離去，市場上滿是來自江蘇、山東或其他省份的外來企業主。儘管情況並不理想，在我1996年第一次訪問時就明顯看到，非義烏的生意人往往沒有像義烏同行那麼沮喪。義烏商人似乎比那些商業不如浙江發達的地區的人有更高的期望。例如，我訪問了一位來自西安的山區

〈傳統與新社會空間的生成〉，《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頁99-111；Li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⁵ 2001年6月，我的一位研究助理進行了一次追蹤訪問，訪問了幾位小販，流言傳說市場最初不是由浙江義烏的企業主興辦的，而是來自新疆烏魯木齊的老闆興辦的。

鄉下的流動速食攤販，她到鄭州後四處做生意養家糊口。²⁶ 在1996年年中，這位35歲不識字的婦女已經賣了五個月的小吃（涼皮），1.8元一碗。她的丈夫留在家裡用豆子製作涼皮，而她每天平均工作11個小時，一碗一碗地賣。她花了五百元購買流動的涼皮攤，但她一個月的純利潤就是五百元，所以投資還是值得的。在西安的老家，他們的田地產出只夠糊口。她弟弟曾以30%的利率借給他們夫婦一千元以做為到鄭州的路費和創業資金。

除了外來企業主在市場上聚集之外，許多專業市場是由某些特定工廠先前職工的網絡所興辦的。在鄭州經常會發現，占據了一個街區的市場裡全是原為同一家工廠的下崗工人的私營企業主。他們出售的產品就是原來工廠生產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共同的單位經驗可能會增強商販們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的能力，諸如其他市場上老闆所面臨的共同不滿。我對一個傳統中國工藝品市場的訪問就顯示了這個動態過程。 177

1996年年中，華太太是一位50歲、中學教育程度的傳統中國工藝品店的老闆。²⁷ 她在一家國有企業當玉石雕刻工幹了30年，但是提前在官方退休年齡的前二年退休，因為工廠很明顯地破產了——雖然廠裡還能設法為提前退休的工人每月發四百元。這個單位的許多退休工人就在這個街區開起商店，並出售同樣的產品。

1996年初，工藝品商販們遭受到自稱是收稅員的各種穿制服的官員的不斷騷擾。²⁸ 收費似乎完全是隨意的，店主也不

²⁶ 編號第198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²⁷ 編號第251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²⁸ 這也為市場上的其他商販所證實，編號第252、253、254、255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清楚這些費用是否應該收。華太太舉了一系列費用的名稱：「衛生費20元，環境費10元，賣工藝品的執照費30元，『市容費』15元，孝敬這些收費者的吸煙費50元，等等」。工藝品商販們受不了這些無止境的隨意勒索，就一起去找工商局要求局裡每月只派一位官員來徵收他們應交給市裡的合法稅費。工商局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六個月後我去訪問時，商販們說他們從那時起已經成功地趕跑了來揩油水或腐敗的幹部。

開封市

開封在歷史上是七個朝代的帝都，在北宋年間達到其鼎盛時期（960-1127）。幾千名穆斯林從烏茲別克的布哈拉遷來，並於1070年定居在開封。北方的女真族在1126年入侵汴京（開封），在中國北方建立了金朝，杭州成為南宋王朝（1127-1179）的首都。與此同時，地中海沿岸的猶太移民從杭州遷移到開封，並在14世紀、15世紀的銀行業及商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²⁹ 開封在明（1368-1644）、清（1644-1911）王朝時

²⁹ 中國歷史學者王一沙承認猶太人有可能是在第一或第二世紀時經由絲綢之路首次到達中國，但更有力的證據（據猶太教堂的碑文），猶太棉布商人最初是在北宋時期定居在開封：王一沙，〈開封猶太人的後裔〉，收錄於Sidney Shapiro, ed., *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4), 167-88。參見，江青香、肖國梁，〈宋都汴梁城市經濟一瞥〉，收錄於Shapiro, *Jews in Old China*, 103-17。Marcus N. Alder總結耶穌教士的記載得出結論說，猶太人定居在中國要更早些，在漢朝（220_{B.C.}-220_{A.D.}），大約在西元34年猶太人在巴比倫被全部處決之後，見“Chinese Jew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Jews' College Literary Society, Queen Square House, London, June 17, 1900), in Hyman Kublin, ed., *Jews in Old China: Some Western Views* (New York:

期是河南的省會。在明、清王朝更替的1644年，地方官員掘開黃河大堤以阻擋滿州人的入侵，此造成了河水沖進開封，淹死了30萬人。從1949年起，開封發展成一個中等的工業城市，除了麵粉廠和食用油加工廠之外，還有電子、化工和農機廠等。然而，當地人公開承認，即使在毛時代，開封人的經商本能也從未完全熄滅過，那時商人被貶低成中共社會中最低的階層之一，因此在單位制度中受到不利的對待。然而在開封，有事業心的穆斯林們受國家這種歧視性的就業安排衝擊最嚴重。結果，在1990年代末期，開封市街上的許多個體戶是來自有過世代自我僱傭經驗的家庭。

李太太的案例很典型，她是用三輪車賣中東風味糕點的年長穆斯林婦女。³⁰ 她在18歲（1940年，在抗日戰爭期間）時被父母許配給一個比她大21歲的男人，那個人已經有了一個妻子。在傳統中國的習俗裡，她直到結婚之時才知道丈夫的長相。按照傳統穆斯林習俗，做為二房，她不許在家中說話，整天都用於照顧九個孩子（三個女兒是大妻所生，五個女兒是她所生，還有一個養子）。她的丈夫經營一家茶葉店，但人民解放軍在革命中毀掉了它。解放後，她和丈夫靠拉運垃圾車謀生，每人一天賺一元。1960年的大饑荒過後，她開始在街口賣羊腦湯養家。現在，她和一個女兒和兒子住在一起，還繼續幹活，因為他們的收入不足以養家。

儘管像李太太一樣的小販經濟困難，當地居民大體上都把

Paragon, 1971), 94-117。最近幾年，開封的領導人明顯地試圖利用開封與猶太教的悠久聯繫來吸引外資，可參考“China: A Jewish Question,” *Economist*, December 3, 1994, 46.

³⁰ 編號第216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回族人視為相對富裕的人。從改革開放以來，回民餐館和商店在沿街的面積上和夜市上擴展的很快，清真寺也用昂貴的建築材料重建起來。

- 179 開封的私營經濟穩步成長。在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小型和大型私營企業的年增長率平均分別為20%和33%。³¹ 到2000年，共有114,800家註冊的個體戶和1,955家私營企業，比1995年時分別增加了75.1%和244.6%。³² 雖然這些增長聽起來很大，但開封市工商局宣稱私營經濟的增長仍慢於預定的計畫，而且地區分布不平均。例如，在我1996年年中第一次訪問時，私營經濟的增長主要集中在開封市區和城郊，而在農村的私營經濟參與實際上卻呈現下降的趨勢。官方的統計對於追溯開封企業主的遷徙並沒有相關的資料，但是明顯的是，鄰近農村的人一直遷往開封城，開封的城市商人則流向鄭州一類更大的城市。

其中一例是王先生，1996年時他是一位34歲高中教育程度的老闆，在鄭州開了一家六個月的店，他出售稀有的外國觀賞魚（不是吃的魚）。³³ 雖然他和家人在開封是農村戶口，他可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個體戶。從1984年至1986年，他經營一家大型餐館。1986年他從農村信用社以9%的利率借到三千元以從事賣布，又幹了六年，然後進入珠寶生意，幹了幾年，然後用一萬元的積蓄開了這家觀賞魚店。王先生從天津、廣州、北京、蘇州甚至巴西進口魚。該店每月通常至少賺一千元，有

³¹ 開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編號第201號），〈關於全市上半年個體經營發展情況的通報〉，1996年7月10日。

³² 《河南年鑑》，2000年。

³³ 編號第253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時多達五千元。王先生的父母還留在開封，弟弟耕種著家中共有的八畝責任田，田地實際零星四散地分布。他們種地只足供家庭消費，雖然他11歲的女兒和八歲的兒子說，他們還養豬和牛，並擁有一匹馬，一隻驢。³⁴

在文化大革命後和改革開放初年出生的一代人中，不乏雄心勃勃的企業主。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中成長，經歷了生活水準的持續增長，耳聞目睹使這一代人深知，自我僱傭無論對個人前途上還是賺錢上，都是相當值得的。農村居民可能看到他們那些到城裡打工的親戚在假期回家時帶回來大量的錢，而城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看到了許許多多私人賺錢的機會。我在城區訪問過的許多年輕老闆都經歷過新中國的傳統就業管道，即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在一家國家單位工作，然後便開始另外兼職做生意。

180

我們1996年遇到的一位特別活躍的企業主是張先生，22歲的他在開封的市中心開了一家KTV（卡拉OK）俱樂部。³⁵雖然週末星期五傍晚六點對於這樣一家店來說，營業還顯得有點早，他已經站在門口親切地歡迎我的助理和我。店裡面的擺設很明顯地並不只是一家簡單的卡拉OK娛樂場所。氣味難聞的昏暗大廳兩邊滿是寬敞的半隱密包廂，如果拉上污漬斑斑的橙色天鵝絨掛簾，就會顯得更加隱密。在我們還未轉身離去或是自我介紹之前，張先生就示意一位年輕女人給我們端來茶水和荔枝。我們的這位主人聽說我們是學者而不是他所預期的便衣官員時，感到驚訝。很明顯地，一位朋友透露給他說，當天

³⁴ 王家因為超生第二胎，在1988年付了五百元的罰款。他說，現在超生的罰款要交一萬元。

³⁵ 編號第232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晚上有幹部要巡視卡拉OK店，查訪是否有「非法的女陪侍」。他解釋：「督查人員一般過了晚上10點20分才會到我的店，但是我想或許有人會幫我的忙，在我的平常客人到來之前就送他們過來走一下過場」。我們對他的坦誠很吃驚，看了他的名片後就更為吃驚，上面羅列著，開封香煙廠的經理、一家私人期貨貿易公司的股東和卡拉OK店的老闆。用一張名片羅列如此五花八門的職務似乎很怪。後來才知道，這些頭銜反映了張先生的自信，人們會尊敬他如此年輕（很明顯，他從17歲就開始工作了）就有能力擁有這麼多頭銜。幾個小時的訪問後，他聲稱還有一個頭銜他沒列在名片上——便衣的公安。³⁶

181 不管當時他說的是真是假，他告訴我們關於經營卡拉OK店的情況很有啟發性（也與其他經營此種生意者的說法相一致）。在訪問時，他的店才開張十個月。張先生解釋，實際店面是國有的，但他能夠從交通局以每月二千二百元的租金租到手，因為他曾在那裡工作過。由於他從事期貨交易存了幾千元，他開這家店時不需要去向銀行或朋友借錢。他只是從存摺中取出三千元去租店面，然後從當地勞務市場上招收低工資的雇員。他的店聘僱了三名全職女招待和16名兼職。全日工每月底薪三百元，外加「陪客費」每位20元。有些兼職服務員是河南大學的學生暑假來打工的，每小時平均賺30元；生意好的晚上，小姐們可以賺二百元外加小費。在生意的高峰期，卡拉OK店能淨賺一萬多元。但張先生像其他企業主一樣地說：「你得知道，這是季節性生意——春、秋兩季最好，一直火到春節前後」。正當他開始解釋三陪女需求的季節奧妙時，

³⁶ 在初次訪問後約九個月，我們發現他是不同類型的幹部。我更改了他的經歷細節以為他保密。

一位穿制服的公安局幹部進了店，和我們一起坐在圍成圓圈的皮沙發上。張先生簡短地介紹了他的朋友，繼續討論經營這種生意所面臨的挑戰。他解釋道，他想開一家更大更時尚的店，但是感到在那之前還需要更多的經驗。我問他「經驗」是否指的就是「關係」，他微笑著點點頭。

洛陽市

雖然洛陽市豐富的歷史遺跡在今日已經寥寥無幾，但它的過去即使超不過開封，也與開封在伯仲之間。洛陽可以回溯到西元前1200年，做過十個朝代的皇城。洛陽也是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的地點和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天文學家和作家的故鄉。但自從西元937年後晉把都城遷往汴京（今日的開封）之後，洛陽就相對沒落了。中國共產黨把洛陽建成史達林式的工業中心後又復興了它。由於它位於河谷盆地，四面環山，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和三線工業建設時期都是工業基地。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在防備美國帝國主義入侵方面，洛陽是安全的」。³⁷ 解放軍在洛陽維持著穩固的基礎，這在成片龐大的重工業工廠上可見，化工廠、玻璃廠、紡織廠，還有許多只有編號而沒有正式名稱的機器製造廠。鄭州的工廠與洛陽的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有些洛陽的大工廠甚至僱用了五萬名職工。

182

在許多方面，1990年代中期的洛陽看起來好像經濟改革

³⁷ 編號第87號受訪者。洛陽位於西安至鄭州的鐵路線路上，因此它的交通比河南許多其他地方更方便。

還沒有深入到內地似的。在我1996年8月訪問期間，自行車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塵土飛揚的泥濘路上僅有的機動車輛是破舊的公共汽車、藍色的貨運卡車和黃色的麵包計程車。³⁸一尊18英尺高的毛主席塑像仍矗立在有十個街區那麼長的第一拖拉機製造廠（也被稱為「東方紅拖拉機廠」）的大門口，它不久前還在為軍隊生產坦克。在公開場合，人們仍互稱「同志」；每隔一條街的街角上，還可以見到鼓吹革命口號的看板。然而，儘管這種最初給人留下改革前景象的市容，更仔細地觀察會發現個體戶排在單調的灰色工廠大樓的牆邊上，還有工廠之間長長的巷道兩側。根據洛陽工商局的統計，註冊的私營企業數目正在持續增加，雖然不像該市希望得那麼快。在1995年與1996年之間，註冊的個體戶增加了26.8%，註冊的私營企業增加了62.2%。

在1996年年中的進度報告中，工商局也強調了一些發展趨勢。³⁹第一，它指出私營經濟的發展集中在服務業：從事農業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加私營）只占註冊的企業主總數（94,774家）的0.05%，從事製造業的占12.1%，但在服務業的占87.9%。第二，註冊企業主絕對數量的明顯增長應從關門數（負）與新開張（正）的總和來理解。換句話說，註冊企業主總和名目上的增加，可能源自於更少的人退出經營（1996年上半年只有4,527戶私營企業倒閉，而1995年同期有9,199家倒閉）。1996年新註冊的數目，實際上是比前一年下降了（1996年上半年新增7,473家，而1995年同期為7,787家）。這

³⁸ 由於麵包車的安全標準不足，該型車輛在當時的北京早已被禁用。

³⁹ 洛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半年情況通報〉，1996年7月3日。

也就是說，在1995年，倒閉數是新開張數的1.2倍；而在1996年，宣布倒閉的數量僅占了新開張的60.6%。儘管這種明顯的增長，年中報告承認，若將倒閉戶算進去，私營企業的實際增長只比去年增加了2.8%——遠低於工商局22%的增長目標。

然而，到了2000年初，洛陽已有179,746家註冊的個體戶和7,499家私營企業，這意味著其私營經濟的發展已在1990年代末期趕上了鄭州或開封。的確，在1995年與2000年初之間，註冊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數目年均增長分別為29.7%和60.6%。這種明顯的增長可能歸功於工商局日益增加的努力，這是在1997年末中共十五大上宣布的國有經濟改革一旦承認了私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工商局就努力地為更大型的私營企業設立及註冊的結果。

眾所周知，毛時代洛陽的重工業占絕對優勢，所以毫不奇怪我訪問的大多數小販都是前國有企業和行政單位的職工。有些企業主做生意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已經從工廠下崗了（即不再發放工資）。其他則是厭倦了他們的工作，決定「下海」賺更多的錢。舒先生的經歷就是後者的一個典型。

舒先生在一家政府機關當了11年的中級會計後，31歲的他決定停薪留職去做生意。⁴⁰事實上，他從來沒打算再回單位，但他當時不直接辭職是爲了給上級一個面子。到1996年時，他認爲自己有兩年不上班，他們就不會再想起他來了。他辦公室的工作忙碌又無趣，由於他寧願每天看書而不願花時間在16行的分類帳上，他決定開一家書店。他從一位中學同班同學那裡聽說，過去他們看革命戰爭電影的舊戲院已經被改造成一系列開放的私人市場攤位——都用於賣書。在我訪問期

⁴⁰ 編號第265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間，以前的戲院確實擠滿了書販，販售各式各樣的出版物，從兒童讀物、運動雜誌到精裝的古典詩集、毛澤東思想和新中國的稅法。⁴¹ 舒先生租他的攤位每月要五百元，另外每月還要
 184 付：40元電費、10元衛生費、150元的工商費、15元的保安費和50元的稅。雖然舒先生覺得稅費的名目太多，但他承認自己有時比相鄰的有些書販交得要少些，因為他之前的工作，關係比較好。政府的職位不僅可以少交點稅，也使他從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那裡借到流動的資金。最初，舒先生做為個別的企業主申請貸款時，各家銀行都拒絕了他。只有當他說服自己的原單位出面擔保，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才同意了他的貸款申請。做生意肯定比他過去的工作更具有挑戰性，但是從收入上來說，舒先生覺得這些困難都值得。他的妻子是一家冷凍廠的體力工人，每個月只賺五百元，他現在賺的是她的三倍。由於從事書店的生意，他希望能把七歲的兒子供養到上大學。

在國有職工下崗的案例中，自我僱傭的態度多少就不那麼積極。例如，殷小姐這樣一位初中畢業生1996年時30歲，在洛陽老城商業區一家戶外攤位上賣飲料。⁴² 1994年她工作了十年的國有百貨公司草率地關門了。下崗員工沒得到任何形式的失業補償，甚至退休年紀的職工也失去了退休金。由於她的丈夫做為一名鐵路工人每月只賺350元，他們還有一個五歲的兒子，殷小姐知道她必須立即找到另一個活兒幹。於是，她花

⁴¹ 按照美國的標準，這個戲院確實有火災的危險，兩個出口中的一個被高高堆著的報紙擋著。而且由於頭頂的燈早就壞了，每個攤位都在臨時拼湊的書架中間拉出條電線以懸掛一盞日光燈。

⁴² 編號第268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去了家中六千元的全部積蓄，購買了一台移動冰櫃和各種飲料。最初的投資很快就有了回報。在暑期，她的淨收入月平均一千五百元，即使在冬季，她賺的也比以前每月的三百元多。儘管如此，殷女士還是不滿意自己的生活。她的工作時間是過去的兩倍（一天12個小時，與以前國有單位上班時的悠閒相比，實在忙累），還要不斷地擔心她的飲料生意是否還能幹下去。「我不是自願單幹的」，她解釋，「我是被迫下海的」。

正如在其他研究地點，洛陽的個體戶很明顯也承受著不同官僚機構的各種稅費的勒索。工商局有權管理私營經濟，因此藍制服的工商局人員實際上是有權以各種手段任意收費的。由於小販們並不總是能夠預期工商局人員何時才會出現，他們經常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被捉，他們或是沒有現金繳費，或是乾脆就不交。一旦小販拒絕了工商局的要求，收稅者就可能沒收他的貨品直到交了費，或是亂砸一氣讓別的小販看一看抗拒的下場。在洛陽，工商局人員實際上是集體出巡的，有些人開著藍色的小卡車，還有的騎著摩托車。一群人出巡的理由很明顯，當我們看到工商局的一群幹部穿過一個街角，兩邊全是賣菜、賣便宜商品的小販，12個工商局幹部中的六個走近了個體戶，要求每個人交十元罰金，因為他們賣東西時不出示工商局頒發的註冊執照（無照經營）。一位小販拒絕交錢，說居委會同意他們使用這片特定的街角來賣東西。這個理由不充足，工商局幹部示意等候在小卡車裡的其他人，他們開始沒收小販的商品，並把它們裝上卡車車箱，許多個體戶動手抵抗這種查抄行動，但在人數上就被壓倒了。甚至連孱弱的年長商販也未能倖免。⁴³

185

⁴³ 在五個研究地點，各種的受訪者都做出這樣的評論：「即使國民黨

貧困縣

186 在1996年，洛陽比起北京、鄭州這樣的都市，可以被視為「尚未改革」之地，但是它至少還有毛時代的資本投資。相對地，河南許多偏遠的農村地區仍處於一貧如洗的未發展狀況，或如中國人常說的「落後」地區。河南省政府根據省級標準：按1990年不變價，人均年收入低於五百元，全家資產不足八千元，宣布河南的34個縣為正式的貧困縣。因為外國人仍不准進入上述大多數地區，我只能夠走訪那些受益於國際和政府支持的小額貸款項目（詳述如下）的地區，特別是省東部的虞城縣和西南的南召縣。正如所預期的，在啟動這些貸款專案之前，這些地區的私營經濟很有限。雖然我沒有在虞城和南召進行市場調查，很清楚地，這些地區的絕大多數村民並不像城裡人那樣看到改革帶來的經濟利益。農業上的分田單幹使得部分能幹的年輕農民有機會外出，到省內更富庶的地區打工，但留下來的農民在得不到貸款的情況下，極少能找到可賺錢的工作。

然而，隨著小額貸款專案的實施，例如在虞城縣丁莊，有些接受了一千元貸款的農戶用這筆錢養豬，養成後在鎮上一頭能賣七、八百元。其他農民用貸款購買原料來編籃子和其他手

也沒有今天的幹部這麼腐敗」。有些甚至把工商局幹部比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某種程度上，收取當地的費是供地方政府資助當地公共事務，但也有清楚的腐敗例證。清朝和南京政府時代的地方財政與改革開放時代的地方財政的討論，見 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及 Elizabeth Justine Remick, "Cadres, Clerks, and Tax Farmers: State Building in Rural China, 1927-1937 and 1982-1992"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96).

工藝品。在南召縣山區的羊屎溝村，越來越多的農民從事編織裝飾用的絲毯，這工序非常地費時，因為絲毯精緻的圖案需要複雜的色彩絲線的搭配。在一幅絲毯上工作了四個月的一位貸款者說，材料也很貴，一幅毯的彩線和圖案需要三百元，但她很自信這塊毯子可以在山腳下的鎮上賣到八、九百元。由於她得照顧五歲的兒子和常年臥病的丈夫，和家中的1.5畝地，還要餵養三隻雞和二頭豬，像大多數村中其他織毯的婦女一樣，她無法全天工作織毯。她估計最後她得花費一整年來織成一幅毯子。在這期間，她靠賣菜來還貸款。⁴⁴ 羊屎溝村參與小額貸款項目的其他人，則從事著絲毯生產的「上游」產業：養蠶業，在桑樹上養蠶和賣生絲。

河南非國有部門經濟的融資

河南的正規金融業和國內大多數地方一樣，主要向國有、集體企業而不是向私營經濟提供貸款。⁴⁵ 在官方批准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有銀行向私營商業的貸款占其短期貸款的最低比例。在河南，整個19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私人商業貸款只占整個國有銀行貸款的0.1%，而且在1998年和1999年僅增加到0.2%。⁴⁶ 城市信用社提供給私營企業主的信

187

⁴⁴ 編號第180號受訪者。

⁴⁵ 即便如此，國有企業仍難以獲得另外的貸款。可參考，王同、朱瑟利，〈我省金融部門出台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新舉措：企業資金緊缺狀況近期可望改觀〉，《河南日報》，1996年7月14日，1版。

⁴⁶ 《河南年鑑》，2000年。



扶貧貸款資助出這些手織絲毯。河南省南召，1997年5月。

貸要多一些，但百分比仍然相對地偏低，而且在整個改革開放年代中實際上是下降的——從1989年貸款紀錄的最高點10.4%，下降到1996年的2.8%，然後到1999年的3.6%。⁴⁷

的確，在河南接受問卷調查的私營企業主中，93%說他們從未從官方金融機構（例如國有銀行、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借過貸款，而且將近60%的生意人從非國有金融機構來源借過錢。換句話說，是非正規金融業而非正規金融業，做為私營企業主資金的主要來源。即使政府的出版物也承認私營經濟官方信貸來源的短缺，以及地下金融活動的存在。⁴⁸但即

⁴⁷ 各年的《河南年鑑》。

⁴⁸ 例如，一篇讚揚河南私營企業快速增長的文章也提及，這種增長大部分是靠「民間資金」或非正規金融的，因為政府沒有資金貸給私營經濟。可參考，郭玲玲和、國雷，〈我省非國有制經濟〉。

使如此，還是值得指出，國有銀行和信用社更有可能貸給註冊為「集體企業」而實際上是私人經營的企業。⁴⁹ 鄉鎮企業從國有銀行和信用社獲得的貸款，要比私人商業貸款為多。1999年，國有銀行貸款的4.6%和農村信用社貸款的21.3%是貸給鄉鎮企業的。結果，私營經濟要想獲得正規金融業的服務，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上偽裝成集體的性質。即使如此，國有銀行的貸款紀錄中，國有企業的份額繼續壓倒非國有經濟（私營的和集體的）；例如在1999年，國有企業占了國有銀行貸款的63.6%。

因此，大多數私營老闆依靠非正規信貸來源。除了民間借貸之外，河南企業主使用著許多我稱之為「紅帽子」或「灰帽子」的金融機構，它們指的是沒有獲得中國人民銀行的明確同意卻在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註冊法人實體。**紅帽子機構**註冊從事按人民銀行要求來說法律上合法的業務，諸如溫州那些實際由私人經辦的城市信用社。另一方面，**灰帽子機構**是註冊做為私營經濟或其他種類的社會團體，但從事金融仲介服務。列入灰帽子種類的機構，包括當舖、農村合作基金會、私人團體和資金互助會以及政府主辦的小額貸款專案。

當舖

當舖歸工商行政管理局，而不歸中國人民銀行管轄。雖然河南的當舖比起中國更商業化的地區（例如上海、北京和溫州），沒有那麼興盛，但它們在停歇40年後於1992年又重新出現在河南。第一家在鄭州開幕，接著是新鄉、安陽，特別是開

⁴⁹ 在河南，私營企業主和銀行業者都承認戴紅帽子是個常用的策略。

封。省工商局很樂意地承認它們確實應該被劃作「金融機構」，因為它們實際上是以高息提供抵押貸款。⁵⁰ 而且，它們主要在私營企業主需要創業或流動資金時為其服務，收取必要的手續費以賺取正常的利潤。除了按照市場利率之外，它們還
 189 收取管理費和安全費、保險費和儲存費。我訪問過的小販沒有一個使用過當舖的服務，但是當舖確實回到了河南。

農村合作基金會

農村合作基金會也處於半合法的灰色地帶。它們最初是由農業部興辦的，但被中國人民銀行視為非法。我試圖去弄清楚哪一個政府部門最終負責河南省的農基會，此舉暴露出它們合法存在的難以捉摸性。首先，我的助理和我去了鄭州市的民政局，因為我們在河南全省見到的農基會展示的登記執照，表明它們在法律上是「社會團體」。⁵¹ 民政局說，農基會應該在他們那裡登記註冊的，但卻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接著，我們穿過城區到了省農業廳（即下述的農業辦公室），在改革開放初年，是農業部創辦了農基會。負責農基會的主任最初吞吞吐吐地與我們交談，但後來聽說我們是學者而不是政府幹部時，她的態度就改變了。⁵² 她解釋說，農業辦公室是農基會的保護者，因為農基會確實在農村地區的金融仲介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認為，對像我們這些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學者來

⁵⁰ 劉桂英、趙雅山，〈推開「當舖」神秘的大門〉，《河南工商界》，1995年，第7期，頁17-19。

⁵¹ 換句話說，農村合作基金會很明顯地不是中國人行下屬的合法興辦銀行的一部分。

說，瞭解這一點很重要。很明顯地，人民銀行官員和鄭州市政府一直因為農基會的非法性及其日益流行一事來她的辦公室找她麻煩。「如果妳來自人行，那麼我就會給妳一套不同的數字；市政府則會得到另一套數字」，她一邊說，一邊取出了筆記本，上面有著「更為準確的統計數字」。⁵³ 根據農業辦公室的私下統計，到1996年年中，在河南有65家農基會，貸給農戶的金額占其總貸款的70.7%，貸給鄉鎮企業和農村服務業的分別占25.34%和3.9%。⁵⁴

主任區分了農基會產生的三種情況。首先，河南近三分之一的農基會是做為真正的「合作」組織按照規定經營的。換句話說，它們是由城鎮（不是村）管理的，只貸給有存款在農基會的會員。會員的貸款從幾百元到一萬多元不等，但是大多數平均是在一萬元左右。第二，河南省內經歷了快速商業化的地區，在興辦農基會上比窮困地區更積極穩固。主任具體地指出，在著名的經濟快速發展地區如鞏義市和新密市，股份公司在數目上已經超過了合作社，市場對資金的需求大。在1996年的上半年，僅鞏義一地就占了所有河南新成立的15家農基會。而且，在鞏義，由村、鎮兩級管理的農基會的規模遠遠超過了鄭州市政府所要求的最低規模。根據市的要求，村辦的農基會最低必須有五萬元資本，由鄉鎮或市管理的至少要有十萬元。然而，在鞏義，農基會的資金規模超過四千萬，而且它們大多數都是由村委會興辦的。⁵⁵ 第三類河南的農基會包括鄭州

190

⁵² 編號第185號受訪者。

⁵³ 在向當地人行彙報時，主任就省去了沒有正式註冊的農基會。

⁵⁴ 編號第185號受訪者。

⁵⁵ 鞏義市政府僅管理所有農基會資金中的一百萬。

郊區的那些。主任解釋說：「最初，在市中心以外就沒有任何銀行，因此，農基會基本上扮演著農業信用社的作用」。農基會最早於1991年出現在鄭州郊區；幾年之內，每一個鄉鎮都興辦了一個。隨著鄭州周圍的農田都租給了私營企業主（包括那些偽裝成集體的）用於工業發展，城市四周繁榮了起來，農基會的規模也擴大了。1996年年中，鄭州郊區的農基會平均資本有四、五千萬元。

可以理解的是，中國人民銀行對不斷增長的農基會開始有了戒心（並於1999年下令關閉了它）。除了在政治上和金融上對國有銀行造成了競爭之外，農基會實際上還不受管轄，這意味著大型農基會一旦崩潰，最終會使得人民銀行無法維持經濟中金融的健康運行。農業辦公室通常是支持農基會的，但也承受著要積極地監管它的政治壓力。具體而言，這涉及發布政策文件（上面蓋著政府的紅印，或「官印」），宣布執行國務院、人民銀行和農業部先前發布的紅頭文件精神的重要性。爲了製造聲勢以顯示對監管農基會官方規定的尊重，農業辦公室編輯了從1983年國務院首次批准農基會以來關於農基會的所有中央級、省級政策文件的彙編——並於1995年印刷成書做爲內部參考。⁵⁶ 書中包括有1995年4月農業部發布的7號文件，關於確保農基會能正當地在縣級農業辦公室進行登記。⁵⁷ 文件甚至指出政府機關應該關注的問題——包括有些組織自稱農基會卻並未登記註冊——並重申社團的目標：農基會是為了給農村

⁵⁶ 河南省農業廳，《農村合作基金會政策法規彙編》，鄭州：河南省農業廳，1995年。

⁵⁷ 同前註，農業部文件（7號），〈關於發展農村合作基金會登記工作的通知〉，1995年4月20日。

持股者提供服務、而不是要以高息賺錢的生意。農業部還把七號政策文件的副本報送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稅務總局。

該書還包括了由河南省農業廳、中國人民銀行河南分行、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省稅務局和民政廳聯合頒發的8號文件。⁵⁸ 它回應了農業部對於妥善管理農基會的關注，並列出11點要則，反映出管理方面的問題：

1. 雖然農基會歸農業部管轄，但它們應該遵守中國人民銀行的規範。
2. 農基會應該在縣級或更高的機關登記。
3. 農基會是爲了向集體企業、合作股份制企業和鄉鎮企業提供短期流動資金的。其資金不應投放在非農活動、建築、房地產項目或在股市上投資或用作未登記的私人合股企業的股金。
4. 股東繳納的資金至少在一年內不得動用，也不得應用做生息的儲蓄。
5. 存款應存放在當地的國有銀行，而不應存放在農基會中。
6. 農基會應實行民主管理，上級黨的領導成員不得擔任董事會主席（名譽職務除外）。
7. 農基會必須設立妥善的信貸、財務和人事管理制度，並定期向有關管理機關彙報財務情況。
8. 農基會職工不得使用農基會資金興辦自己的生意。

⁵⁸ 河南省農業廳、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河南省地方稅務局、河南省民政廳，〈關於加強我省農村合作基金會規範化管理的意見〉，8號政策文件，1995年10月11日。

9. 農基會不是「金融機構」，它應保持其社會團體的性質，為其成員服務，而不得吸收存款以營利為目的。
10. 農基會不屬於官方機構，官員不能擔保其金融風險。農基會需要有防範金融損失的內部機制。
11. 農業辦公室各級領導應該遵守農業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制訂的規章制度，農基會應允許中國人民銀行、民政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關檢查其經營狀況。

這些法規的制定暗示，事實上農基會並非以規範的方式管理；如果一切遵守規範，那就用不著以紅頭文件來重申這些規定了。對農基會經理們的訪問，證實了村民們確實更多地是靠它來儲蓄，比用它來從事與農業有關的流動資金貸款為多。經理們也承認，農基會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一樣，其利率一般要比人民銀行規定的官方標準高得多。例如，開封城郊的一家小農基會提供的存款利率為年息15.6%，而貸款則是25.2%；然而，其職工承認，實際上存、貸款的利率還要更高一些。一般來說，農基會的運作相當靈活，對信貸風險也不進行特別正規化的評估，因為它們太地方化了。例如，村委會經營著上述的那個農基會，主任是原先農村信用社的一名雇員，⁵⁹但是農基會本身與中國農業銀行並無聯繫。其發放最小的一筆貸款是二百元，期限最短的一筆是兩天。村子太小，在「出納窗口」（三英尺高的單薄木頭窗框）上也不需要任何標誌。從外表上來看，農基會相當寒酸。我訪問過的開封其中一家農基會看起來就像一間小小的廢棄校舍，即使當時它開張僅一年。當我們

⁵⁹ 碰巧，主任也就是村支書。

走進去時，三個女孩子正坐在竹席上吃西瓜。其中兩位是農基會的雇員，大一點的剛19歲，是會計；小一點的才15歲，是出納。其他兩位雇員，主任和信貸官員（都是男性），騎自行車外出去收該還的貸款了。

私人團體和互助會

雖然村委會或鄉鎮政府一般管理農基會，由私營企業主興辦的其他形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在河南的城市和城郊四處湧現。他們並不試圖像溫州人那樣公開地開辦私營銀行，但一些非政府金融機構已經以非營利的金融「團體」或「社會團體」的合法形式出現。這些團體在結構上與信用社相似。然而，根據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人民銀行於1993年頒發的第34號文件，它們以團體名義登記是有條件的，即它們旨在「扶貧並向私營經濟提供資金……（因此）促進了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⁶⁰乍看之下，他們的借貸紀錄顯示，儘管不是全部債戶，大多數的債戶是在團體存有大筆存款的私營企業主。⁶¹其營運的商業性質可由下列事實進一步證實，其中有些團體是歸人民銀行管理的。從法律上來說，人民銀行統管所有的金融機構，但是許多金融團體僅僅受到民政局的管轄。開封市郊區合作儲蓄基金會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雖然它的章程顯示，它是一個扶貧團體，宗旨是：「扶持貧困戶、救濟災區並提供企業

193

⁶⁰ 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1993年第34號文件。

⁶¹ 河南省其他城市地區也有相似的情況。對專業銀行、信用社、團體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經理與雇員們的採訪。編號第94、101、104、105、107、108、109、111、184號受訪者。

資金」，但是其日常業務主要是最後一項，還有吸納存款（年息15.6%的利率）一事。重點在於，以「社會團體」名義註冊讓私營金融企業主在從事實事上的營利金融活動時，提供了一個政治上的偽裝。

有些偽裝特別精巧。例如，張少鴻（音譯）先生富有創造性的經營之道就是一例。他在1985年離開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辦公室工作，在鄭州開辦了一家雜誌讀書社。⁶² 他解釋，人們會願意出一點錢來閱讀他私人訂閱的全國雜誌和一部分海外雜誌。入社的唯一條件是，每月在社裡存五元，年底退還，外加紅利。這項經營大獲成功。在第一年內，河南省讀來讀去讀書社已經擁有幾百名會員，因此累積了足夠的存款供張先生開辦期貨交易，並提供給會員比國有銀行標準利率更高的回報。

194 當我在1996年夏天訪問讀書社時，一樓大廳的一半面積擺放著寬大的閱讀桌，兩邊的書架上陳列著世界各地的雜誌。大幅紅旗從天花板垂下，上面印著鼓動性的政治口號，諸如「培育讀書習慣，更好為人民服務」、「投資我社，促進精神文明」。在大廳的另一半，是成排銀行出納式的窗口——人們排著隊在那裡存錢。圖書館與一家銀行並列的場面很不協調。一位穿制服的保安在大廳後面的樓梯口守護。張先生帶我們上樓時，解釋說會員現在有投資10元、20元甚至一千元的選擇；一千元的投資者一般可以獲得15%至20%的「獎讀金」。讀書社的二樓很寬敞，有一間可供50名職員用餐的自助餐廳，一間裝有高性能卡拉OK設備的宴會廳用來招待官員，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房間，裡面擺放著成排的電腦，與做期貨生意必不可少的彭博（Bloomberg）、合眾國際社（UPI）、路

⁶² 編號第100號受訪者。

透社（Reuters）以及其他線上資訊服務。當問到從事如此特殊的生意是否曾受到官方的干預，張先生說：「當然不會。我的事業促進了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因此河南省政府的最高官員都支持我……事實上，一些幹部就是讀書社的會員」。彷彿要證實他的話，他遞給我們一份華麗的小冊子和一套剪報本，裡面滿是讚揚讀書社的報紙文章。

根據調查，讀書社每月約淨賺一億元，並且背負著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之外所有國有銀行二億元未清償的累積債務。張先生說，他向世界銀行的中小企業發展部門申請一筆貸款，但是世界銀行拒絕了他的申請，理由是在中國投資的「政治風險」。

除了註冊為非營利「團體」之外，私人經辦的銀行想獲得合法批准的另一個機構偽裝，是採取「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的形式。⁶³ 它也以「團體」名義登記，並提供河南私營經濟短期的商業借貸，但它們實際上是由工商局而不是人民銀行監管。這就意味著，它們比團體擁有更多的活動空間，因為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是被允許以合法的營利機構運作的——即使碰巧是經營散戶儲蓄和貸款也是如此。在實際上，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與溫州的私人錢莊相似，它們像私營銀行一樣經營，為本地的私營企業主市場服務，而且並不刻意去偽裝其私營經濟性質的營利活動。

195

不同於更有社會意識的團體，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將其合法性建立在專門批准成立互助會的省政策文件之上。每一家互助會章程的第一頁上，都標明此金融機構是依據河南省政府1995年第40號政策文件而興辦的。40號文件鼓勵發展互助會

⁶³ 鄭州市工商局1995年第40號政策文件。

以提供私營企業流動資金。正如鄭州市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的小冊子（印在鮮亮的粉紅色紙上的互助會宗旨及經營原則）上所指明的，其宗旨是提供私營企業主「高效、快速的小額貸款」。⁶⁴ 在所有權結構上，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與信用社相似，私營企業通過交納至少五萬元成為會員，因此也成為股東；個人則需要存入一萬元。會員有許多權利和義務，包括對互助會管理的投票權、利潤如何分成，只要符合了抵押要求就能獲得貸款權、分紅權以及退會權。會員的基本義務包括遵守國家法規、確保貸款的低風險和高流動性。

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既然與城市信用社驚人地相似，毫不奇怪中國人民銀行會不同意其經營，並對其施加壓力使其遵守人行的規章。儘管如此，互助會的經理們並不擔心人行將試圖控制它們，因為它們在行政上獨立於人民銀行。我們在開封偶然地發現了人行與互助會鬥法的例子。在開封民營互助會自豪地在《開封日報》頭版宣告其開張之日，由中國人行開封分行簽署的社論式的警告〈關於嚴禁非金融機構吸收公眾存款的公告〉就登在頭版的下半頁。⁶⁵ 公告開頭就列舉了一系列非銀行金融機構，諸如「城鄉合作基金會、存儲會、資金互助會、供銷股份資金服務社等」，指責上述機構非法宣傳其經營的正當性。事實上，開封人行的領導人指出，國務院只允許有限的金融機構從公眾那裡吸收存款；其他任何機構都是非法運作。⁶⁶

⁶⁴ 鄭州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成立於1996年4月23日，《鄭州晚報》，1996年4月25日。到1996年7月，它在鄭州市已有了10個分行，編號第184號受訪者。

⁶⁵ 趙元昌，〈市發展民營經濟資金互助會成立〉，《開封日報》，1996年7月8日，1版；中國人民銀行開封分行，〈關於嚴禁非金融機構吸收公眾存款的公告〉，《開封日報》，1996年7月8日，1版。

公告的結尾威脅了那些違反規定的機構，並警告大眾不要無視中央政府的法令和非人行批准的機構從事金融交易。

開封人行登在報紙頭版的警告，很明顯是對準了開封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的開張而來的。但是互助會毫不畏懼。⁶⁷除了它是註冊為「團體」的名義，因此不受人行的直接控制之外，我們還獲悉，開封市市長策劃了互助會的創建。職工們自信市長比人行厲害，儘管人行能在當地媒體上登公告。

互助會與農村合作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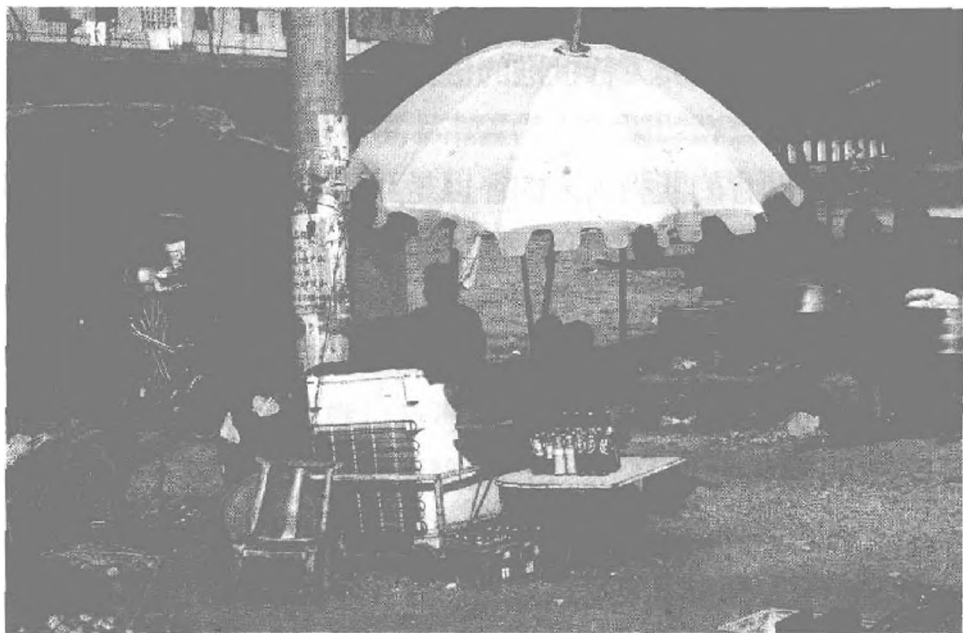
即使農基會看起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其管理層可以回溯到鄉鎮或村委會少數特定的一群人），他們的任務基本上是不同於民營資金互助會的。理論上（有時候實際上），農基會的存在是爲了服務當地社區更大的商業需求，而不管它是「集體」或是「私人」的性質。另一方面，互助會則是以地方上的私營經濟爲對象；它沒有任何制度上的義務向國有或集體企業貸款。這種經營上的對比，可以從洛陽市東部一個產煤的農村地區偃師市城關鎮那裡看出。

1993年2月27日，偃師市城關鎮合作基金會爲了向當地集體企業提供貸款而創立。其章程表明，它是根據農業部頒布的8號文件和洛陽市政府1993年第103號文件的精神而興辦起

197

⁶⁶ 中國人民銀行開封分行允許開封市能夠合法從公眾吸收存款的機構有：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信託投資公司、郵局等。可參考《開封日報》，1996年7月8日，1版。

⁶⁷ 編號第108號受訪者。



誰要買冷飲嗎？河南省偃師，1996年7月。

來的；因此，它的主要目的是以社會受益的方式促進農村發展，而不是最大化其營利。⁶⁸到1996年8月，其業務量絕大多數來自存款而非借貸（一億元的存款相對於八千萬元未清帳的貸款）。和其他的農基會一樣，城關鎮的這一家比人民銀行向存戶提供更高的利率，向借貸者也收取較高的貸款利息。例如，其月存款利率為4.2%，而官方人民銀行的月息為2.4%。雖然農基會業務的主體是城關鎮的34家大型鄉鎮企業，它也接受私人的存儲。經理解釋，由於前一年（1995-1996）集體經濟的經營不善，農基會決定向私營經濟拓展業務，允許存戶借走其定期存款的70%。⁶⁹一旦新的貸款政策付諸實施，本

⁶⁸ 城關鎮農村合作基金會會員代表大會，〈偃師城關鎮農村合作基金會章程〉，1993年12月27日。

身也是存戶的私營企業主就會成為貸款者中的30%。

相對於城關鎮農基會，偃師市城關鎮民營企業經濟互助會從1995年10月16日開展業務以來一直很興旺。互助會憑藉著省1995年第40號文件和偃師市1995年第56號文件做為自身存在的根據，這兩份文件的精神是鼓勵金融機構的發展以減少對私營企業主的信貸限制。⁷⁰的確，互助會90%的客戶都是私營企業主。到1996年8月，它已有一百個客戶和近三百個存戶。其註冊資本最初只有「幾萬元」，在經營的頭九個月就增加到六百多萬。互助會的主任（即原偃師市農業銀行主任）聲稱，⁷¹約有五百萬用於放貸，剩下的一百萬做為固定的擔保金存放在互助會；他預期1996年的全年交易量能夠達到一億元。其貸款的要求更為嚴格，利率也比人民銀行和農基會的都高。互助會的存款利率為年息16.8%，貸款則為21%。當問及如此高的利率會不會招致人行的干預，主任毫不猶豫地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釋，互助會是按照河南省政府1995年第40號和第56號文件的精神興辦起來的。而且，互助會清楚地歸屬於工商局管轄，在工商局註冊。事實上，它就設在市工商局的原址。

198

民營企業經濟互助會典型是由私人興辦的，因此比農基會或國有銀行更專注於為私營企業主服務。然而，日益增多的互助會是在工商聯合社的保護贊助下成立的，工商聯是包括基層工商局在內的一個群眾組織。⁷²互助會的宗旨，是為了減輕也

⁶⁹ 編號第111號受訪者。

⁷⁰ 〈偃師市城關鎮民營企業經濟互助會章程〉，1995年10月16日。

⁷¹ 主任說他在偃師農行主任任期內捲入「政治問題」。做為懲罰，他要被派往農村，但他頂住了，因此被委任為資金互助會主任。

- 199 是工商聯成員的私營經濟的貸款困難的。它和農基會一樣，原來只打算向工商聯的正式會員提供貸款。如果企業繳給互助會一萬元，就可以成為「企業會員」；個人入會則要求投資兩千元。1994年，濟源市工商聯在河南創辦了第一個「商會資金互助會」。經營了兩年之後，七個職工貸給企業124筆（總金額683萬），貸給個人78筆（總資額175萬）。很明顯地，互助會的營業時間很長，會員服務也很認真；星期天也營業，還親自把貸款送到工廠、親自到商店收回還款。根據濟源市工商聯—互助會主任說，濟源市政府和濟源人民銀行都支持其經營；而且據它在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來判斷，省工商局也認為工商聯主辦互助會一事在滿足私營企業主的金融需求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⁷³ 由於我沒有直接訪問互助會的經理們，因此很難說這些互助會是否都是由人行批准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基層的人行可能會對互助會向當地私營經濟提供貸款一事採取了更寬容的態度，這也與人行的一般見解更一致：那就是行政上的地方主義對工商聯—互助會的金融活動是至關重要的。我敢說工商聯—互助會可能會提供和索取比官方人行標準更高的利率，而且一旦它的規模更大時，人行會試圖去干預其經營。

政府支持的小額貸款項目

並非所有的政府批准的「非營利」金融機構都被用來偽裝營利的經營。1990年代中期，省政府本身就開始在官方認定

⁷² 馬月芳，〈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新途徑〉，《河南工商界》，1996年，第6期，頁37。

⁷³ 同前註。

的貧困縣推行小額貸款專案。提供更多的貸款機會，只是中央政府「八七扶貧計畫」所採用的政策工具之一。⁷⁴ 貸款專案在行政管理與目標群體上差異很大，但都有向貧困縣農戶提供小額低息貸款以資助私人增加收入活動的基本特徵。1994年創辦的農業發展銀行一直被國務院指定為處理扶貧貸款的專業銀行。但在實際運作中，大部分專案是由各省扶貧辦公室指導，並由各縣扶貧辦公室在鄉、村政府的合作下推行的。與此同時，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由國際贊助的小額資助專案也出現了，因為中央政府對允許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運作感到不安，所以這些專案也是在與當地政府機關的合作下推行的。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在中國農村推行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的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杜曉山教授在馬來西亞出席1984年至1985年度的亞洲太平洋發展中心的大會上第一次聽說孟加拉鄉村銀行。他對該專案以同儕團體存貸的模式很感興趣，想把它移植到中國，但是直到1990年以後金融自由化開始加速之時，他才認為中國政府會允許這樣一個項目。1993年他訪問了設在孟加拉首都達卡的孟加拉鄉村銀行總部，商談他要把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引進中國的計畫。該模式的創始人穆汗默德·尤努斯（Muhummad Yunus）教授同

⁷⁴ 「八七扶貧計畫」啟動於1993年，旨在七年內（到2000年）提高八千萬貧困人口的生活水準。到1996年，中國政府估計還有六千五百萬人口尚在貧困線以下，然而世界銀行根據中國每人每天一美元（使用購買力平價匯率）的貧困線標準，估計有3.5億。見World Bank,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World Bank: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1996).

意以2%的年息借給該項目五千美元。設在北京的福特基金會當時提供了11萬美元的資助，加拿大基金會也捐助了六千美元供推廣之用。經過了一年的運作，孟加拉信託銀行又提供了五萬美元給在河北省易縣最初的實施地點，後來又提供了35萬美元做為其他地方發展專案之用。

扶貧社最初是在1994年5月由地方民政局和扶貧辦公室（它提供扶貧社的辦公地點）的合作下成立的。做為亞太核心扶貧網（CASHPOR）的成員，杜曉山參加了它的金融管理工作坊和信貸紀律工作坊。當問及他為何不經由地方上的婦女聯合會呢？杜曉山解釋，他認為婦聯的權力有限，不足以批准這樣一個專案。

201 到2001年，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在易縣（河北）、虞城（河南）和南召（河南）三地設置了推廣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三個點；可參考表5.1上選取的經營指標。每一個扶貧社都被登記為一個非政府的「團體」，由農民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由農村發展所建立的管委會做為一個行政框架來監管推廣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現在它已有了自己的資金和職員，但農村發展所人員仍積極參與其中。

三個扶貧社的分社在運作上都有某些特徵。和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在其他各處的推廣試點一樣，五個成員形成一組，五、六個組形成一個中心。目標客戶是有創業能力的低收入婦女，如果男性是單身或鰥夫也可以加入。識別貧困戶入社所採用的經濟標準，與中國政府的標準相一致：人均年收入低於五百元，總資產低於八千元。⁷⁵ 隨後，第一筆小額貸款按照2：

⁷⁵ 用美元折算，這代表人均年收入低於62美元，總資產低於988美元（1美元折合8.1元）。

表 5.1 農村發展所資助的扶貧社推廣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一覽表

扶貧社分社	河北省易縣	河南省虞城縣	河南省南召縣
成立日期	1994年5月	1995年8月	1995年11月
下列數據統計日期	2000年12月	2000年12月	2000年12月
累計成員數	4,568	3,822	5,218
累計借戶數	4,476	3,822	5,134
婦女借戶比例	95 %	100 %	100 %
還款率	99 %	95 %	99.8 %
專職雇員	28	26	23
女雇員比例	63 %	62 %	67 %

資料來源：易縣、虞城和南召的扶貧社。

2 : 1 的比例進行發放：頭兩個成員必須在第二批兩個成員接受貸款前開始還債（從第三周起）；依序，第五個成員在第三、四個成員開始還款後領取她的貸款。於是，同一小組內的同儕壓力和互相支持就加強了貸款的償還工作。第一筆貸款的最大金額是一千元（123 美元）；第二筆為一千五百元；第三筆為兩千元。在第一筆貸款全部還清之前，不能發放第二批貸款。有效的年息是 16 %，比政府主持的扶貧貸款 2.88 % 的利息確實高的多，約與正規商業銀行的利率相當，但仍低於維持自足經營所必須的金額。⁷⁶ 成員入社的一個條件是，每週必須儲蓄一元。儲蓄的錢存在一家當地銀行（一般是農業銀行或農村信用社），那裡所獲得的利息是活期利率。在年終，如果他們願意，成員可以取回其存款。

202

實際上，有些事項偏離了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例如，在

⁷⁶ 1996 年 10 月，中國小額貸款工作小組在北京舉行會議，劉文璞教授（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扶貧社）指出，31 % 是較適當的利率。然而到了 2002 年，這麼高的一個比率在政治上仍不可行。

虞城市中心，有些農戶在第一筆借款還清之前，就獲得了第二筆貸款。⁷⁷ 偏離模式的原因是，需要給家戶提供季節性農業生產所需的貸款。與之相關的是，在農忙期間，並不是總能每週開一次會，因為中心往往離成員的家相當遠。⁷⁸ 在幫扶對象上也有偏離：雖然虞城扶貧社報告說，百分之百的借戶都是婦女，有些貸款卻是被男人從事的營利活動所用了。而且，有些農戶成員在官方認定的貧困縣中似乎處於中下階層的收入類別。

將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加以改造以適應當地情況並不一定就有問題。然而，國家參與或干預的程度可能才是引起更大關注的原因。舉例來說，中央政府認為「扶貧貸款」應該以補貼利率發放，而不應按能夠讓扶貧社支付其行政費用的利率，從而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運營；國家認為，按市場利率來徵收會剝削窮人。⁷⁹ 此外，扶貧社分社（以及其他國際支援的小額信

⁷⁷ 扶貧社虞城分社在1996年10月接受了中國小額貸款小組70位參與者的研究訪問。虞城縣和店集鄉政府，對於如此龐大的一支國內外參訪團前來觀察一個地方組織感到自豪，這使得我們難於觀察到分社日常營運的狀況。中心會議刻意安排在我們到來時召開，鼓勵我們訪問的那些農戶已經準備好了接納客人。即使如此，有些問題還是明顯的，這已經很好地總結在 Henry Jackelen and Mi Xianfeng, "UNDP Microfinance Assessment Report: China," prepared as a component of the MicroStart Feasibility Mission, United Nations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New York, October 1997.

⁷⁸ 小組成員有時也逃掉會議或讓丈夫替她來開會，她們解釋說，每週來回去收貸款要走將近三個小時太花時間，特別是她們還得照顧孩子和下田工作。

⁷⁹ 雖然中央政府原則上歡迎國際小額信貸專案引進中國，但允許非政府金融組織（例如扶貧社）徵收涵蓋支付營運專案費用的較高利率，仍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國際小額信貸幾十年積累的經驗表明了培育地方金融自給自足能力的重要性，這種觀點一般根本不被接受。中國社科

貸專案)是在當地的扶貧辦公室也在辦理自己信貸專案的地區實施。國家主辦的項目不僅提供著比扶貧社低得多的利率，一般也以一種完成配額的心態在運作。換句話說，它們的重點往往是放在累計發放的貸款金額上，而非貸款紀錄的品質，也不管借貸者是否符合資格。有理由相信，有些貸款的決定受到關係的影響——當然，扶貧社也免不了有這種考慮。⁸⁰

城市信用社

城市信用社往往是被少數特定的一群人所擁有和管理的，但是因為中國人民銀行法定要為其負責，所以它們要比金融團體或民營資金互助會面臨著更多的官方干預。「官方干預」的範圍很廣，從定期的進駐審計（除了標準的彙報要求之外），到要求發放貸款給特定的國有或集體企業。我對錢先生的訪問，就披露出經辦城市信用社的一些政治挑戰。

1996年，錢先生是一位47歲的鄭州城市信用社主任、房地產投資者、高層中共黨員和有著「革命經歷」的百萬富翁。⁸¹

院農村發展所的經濟專家是這種心態的一個特殊的例外。特別見，杜曉山、李晶，〈對扶貧社的思考〉，《中國農村經濟》，1998年，第6期，頁44-49。

⁸⁰ 除了地方政府和農村發展所之外，一些多邊的和雙邊的捐助組織也發起了基於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互相擔保的小額貸款專案。各類小額貸款項目見，劉文璞、杜曉山、張保民、孫若梅編，《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扶貧的理論與實踐：1996年中國小額信貸扶貧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以及 Albert Park and Changqing Ren, "Micro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ld Development* 29, 1 (2001): 39-62.

⁸¹ 編號第101號受訪者。

他被稱為「紅色資本家」。雖然錢先生的父母出身地主階級，他家中在河北的土地在革命中被沒收了。他的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的1937年加入了共產黨。多年來，錢先生的父親慢慢地沿著黨的階梯向上爬，成為河南當地一所知名大學的校長。他本人則在一家高級智庫擔任首席的經濟學家。

204 在1988年兩位數通貨膨脹的前夕，錢先生以15萬元興辦了一家城市信用社。在中國人民銀行的登記過程需要大量的網絡關係和賄賂：在1996年7月，他就付給省黨委會中的60人每月總數達二萬元，還給黨的一家政治研究部門的幹部們每月二百元以尋求「保護」。當問及辦一家信用社需要什麼樣的保護時，他回答：「商人必須與政府合作才能避免麻煩」，例如金融監察官員會指控他違犯規定，例如設定高息等。事實上，他能被三層司法體系騷擾：檢察院能起訴他；公安局能逮捕他；人民法院能判他坐牢。因此，錢先生得向這三個機關付費。他承認，他的信用社利率超過了人民銀行設定的限制，但他辨解說：「畢竟金融機構在自由化的資金市場上就是靠利差才能賺錢呀」。這就是說，靠著儘量擴大存、貸之間的利差來營利。官方的一年期利差是在3.6%之內，他的利差是10%。然而，由於他對政府官員收入的貢獻，他的信用社通常平安無事。

儘管如此，錢先生有時仍會接到官員的通知，要求他給某家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貸一大筆款。他通常會拒絕，因為知道貸款根本不會償還（大部分的城市信用社缺乏金融上的影響力去逃避這種要求，因此它們的貸款紀錄仍有拖欠和壞帳的包袱）。錢先生雖然有利益驅動的一貫手法，但也有例外之時，主要是發生在來自於法官的要求。因為他常與法院打交道，要

花很多時間起訴賴帳的客戶，任何時候手頭上都有30至40件訴狀。有一次，一位鄭州的法官要他貸給自己的一位親戚，也是個雄心勃勃的企業主，約15萬元。錢先生同意了，法官就對他的案子做出有利於他的判決。貸款當然也就不還了。

由於錢先生在金融業的資歷，並願意分享這些資訊，我還問他是否知道私營企業主爲了獲得貸款所採用的其他策略。⁸² 他有聲有色地生動詳述了賄賂國有銀行信貸官員和經理的流行手法，例如送重禮：轎車、傢俱齊備的公寓別墅、「女友」，甚至到澳門一遊，這包括陪同銀行官員到賭場並送他們現金（這些人一般總是男性），他可以賭掉也可以留下。錢先生說，幾千萬元的貸款就是通過這些手段貸出去了。爲什麼人們肯花這麼多錢用於賄賂，去取得一筆銀行貸款呢？很明顯地，國有銀行這些受賄的主任們會確保沒有人去找送禮者還貸款的麻煩。

有時城市信用社的成立明顯地是爲了服務某一特定單位或一群與政府有關的人。例如，一家研究機構於1990年代中期在鄭州辦了一家信用社，名義上是爲機構人員之用，但它也試圖吸收無關係的存戶的錢以支撐資金不足的局面。因爲缺乏金融與信貸管理方面的經驗，信用社慘澹經營了幾年，而且它和國有銀行不一樣，它們一直面臨著嚴格的預算限制。然而就在它破產之前，一位當地的女企業主買下了它。巾幗（婦女）城市信用社提供了一個在政治上更爲複雜的例證，能說明有些信用社是如何產生的。

205

⁸² 這位受訪者願意如此坦率地講述有兩個理由。首先，他不斷地告訴我他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良好保護，所以他並不擔心我的研究會傷害到他；其次，訪問結束時他希望我可以幫他與美國有影響的人士建立聯繫。我把自己的有限關係清楚地告訴了他。

巾幗城市信用社成立於1995年8月8日——並非巧合，就在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前不久。根據其主任所說，當聯合國決定把會址設在中國，每個省都接到北京全國婦聯的指示，要為提高婦女地位做一件持久的貢獻。⁸³她和一群她的同事們認為，建立一家專為婦女的金融機構要比再發動一場「婦女保健」（例如，計畫生育）運動更有建設性。但即使省、市、區三級婦聯的主任都一致地支持建立一家專門為婦女服務的信用社的主張，她們在獲准成立時卻遇到許多行政上的困難。

首先，有了河南省發展委員會名義上的支持，一群婦聯幹部來到省人民銀行。「人行真的瞧不起我們」，信用社主任回憶道：「他們告訴我們去辦一家幼稚園、花店或服裝店吧，說婦女不應該從事像金融這樣複雜的事情」。婦聯幹部們把這些遭遇彙報給省婦聯主任，她派她們去找鄭州市政府秘書長。秘書長在婦聯的請願書上簽了字，又給市級人行寫了張條子，重申他對婦女們信用社的支持。市人行行長收到這張條子後，又加上了他的贊同意見，接著又寫了一封信給省人行行長。省行行長回答，省人行最近制訂了一項政策，限制城市信用社的新辦數目，因此不能批准這個專案。婦聯幸運的是，這位頑固的省人行行長過幾天就退休了，他手下的副行長很快被調到（降級）省農業銀行去了。與此同時，婦聯幹部又去找負責教育、科研及婦女事務的省領導，經過幾次走訪，獲得了他的贊同。城市信用社主任猜想：「他被四個女強人圍著，肯定很尷尬」。當一位新行長到省人行去上任時，婦聯幹部也去找他。

⁸³ 編號第94號受訪者。主任原省婦女幹部學校的一位教師，學過幾年經濟管理，然後就被婦聯任命為信用社主任。

在1995年3月，在她們首次提案的18個月後，省人行終於批准了它。

三個月後城市信用社大樓建好了，七月份培訓了職工。一個月後，巾幗城市信用社正式開張。⁸⁴ 信用社25%股份由婦聯持有，其他的股份由信用社職工和婦女幹部學校的成員持有。創業資本是二百萬元；一年後，它增加到六千萬元。到1996年7月，它已擁有1,293個個人存戶，75%是婦女，82家單位存戶。信用社主要貸給國有單位（13家），雖然它也有七位個人貸款者。它集中在短期貸款（最多六個月）上，最小一筆貸款是一萬元，最大的一筆則是十萬元。她們的信貸評估程序相對來說嚴格，需要有房地產、國債、存款做為抵押，或由機關單位擔任擔保人。很明顯地，它的還款率一直很好。⁸⁵ 然而，給婦聯發放的貸款卻不受標準的放貸標準限制：因為婦聯占了那麼多股份，信用社給婦聯的活動做了特別的捐贈，例如在6月1日兒童節、3月8日婦女節和7月1日共產黨的生日之時。信用社除了資助婦聯，還貸款給與婦女有關的活動。例如，《東方家庭報》雖然關注婦女問題，省婦聯拒絕給它財力支援，信用社以低息貸給它六萬元。但是，有些信用社的做生意的客戶是由婦聯或婦女幹校的人所介紹，而且如果有位「重要」人士急需一筆貸款，信用社會立即派通訊員送去現金。簡而言之，信用社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它的初衷——為女性企業主服務。

⁸⁴ 職員包括了主任一人、儲蓄員四人、信貸官員四人、會計四人、現金出納員二人、通訊員一人、保安兼司機一人。除通訊員與司機外，全是女性。

⁸⁵ 《鄭州晚報》，1995年12月2日。

表 5.2 鄭州城市信用社 1990 年及 1995 年存、貸總額 (億元)

	1990	1995	增加量
存款	6.2	57.7	9.3 倍
貸款	4.4	37.6	8.5 倍

資料來源：鄭州城市信用社聯合社，1996 年

207 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樣，在 1990 年代中期，鄭州市的人民銀行也打算集中管理城市信用社，要求它們都成為某一保護傘組織之下的成員。1995 年 8 月 18 日鄭州市城市信用社聯合社成立。⁸⁶ 1996 年，它擁有 48 家信用社會員。雖然他們仍自負盈虧，聯社成員的資格意味著，在壞帳儲備、利差、拖帳及賴帳的計算等方面都要受制於人民銀行的營運標準。聯合社的所有成員都實行電腦管理，並與總社連線，這樣總社可以追蹤其每日累計的經營狀況。一本 1996 年印製的介紹聯合社的小冊子指出，在 1990 年至 1995 年的五年間，城市信用社的儲蓄金額成長了 9.3 倍，貸款金融成長了 8.5 倍（見表 5.2）。

農村信用社

正如城市信用社正在被改造成商業金融機構，城市金融業正日益受制於人民銀行的標準化管理一樣，農村金融業也正出現相同的發展趨勢。在 1994 年年中，農業銀行將過去以發展導向的「政策貸款」業務丟給了一個新的實體——農業發展銀行，如此一來，農業銀行和其他專業銀行就可以不再承擔發展導向的貸款包袱，而像商業銀行一樣地運作。隨著這種商業化趨勢，

⁸⁶ 城市信用社的第一家聯社是在 1991 年 1 月 22 日在鄭州成立的，但是直到五年後才要求所有的城市信用社加入它，並接受其監督。

兩年後，農村信用社的管理由農業銀行轉到了人民銀行。⁸⁷ 然而，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轉型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要比城市信用社更為複雜。在沒有農業發展銀行的地方，農業銀行將不得不繼續發放政策貸款。⁸⁸ 然而，農村信用社並不能真正地擺脫政府要求它發放政策貸款的行為，雖然人民銀行努力鞏固農村信用社，使之變成農村合作銀行有可能使它擺脫無法償還的貸款。

硬帽子和艱難時代

在聯合社的框架下合理化鄭州城市信用社的經營，只是朝向將它們轉型成準國有商業銀行的第一步。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樣，鄭州城市信用社的部分股份（一般約為30%）轉到了當地政府的名下，而且一些信用社被迫合併成城市合作商業銀行。⁸⁹ 這些改革代表著人民銀行與地方政府在分享對新實體的行政監管權和財政稅收上的妥協。⁹⁰ 到1996年年中，河南的

⁸⁷ 〈河南舉行農村銀行體制改革會議〉，《河南日報》，1996年9月17日，1版，見FBIS-CHI-96-195。

⁸⁸ 〈國務院召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會議：朱鎔基要求積極穩妥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新華每日電訊》，1996年7月16日。

⁸⁹ 城市合作商業銀行最早於1995年在深圳成立，到1996年初，擴展到上海、北京、南京、石家莊和濟南。到1996年末，國務院計畫把它擴展到另外35個大、中型城市。可參考〈合作銀行〉，《中國日報》，1996年6月25日，5版。到1998年，共有79家城市合作銀行。可參考〈中國有了繁榮的城市合作銀行〉，《新華社》，1998年4月12日，見FBIS-CHI-98-102；劉清芬，〈淺談城市合作銀行發展策略〉，《鄭州晚報》，1996年6月21日，6版。

⁹⁰ 電話採訪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的吳建生先生，1997年11月13日。

23個城市中已有59家城市合作商業銀行。⁹¹

對鄭州城市信用社的接管，反映了人民銀行日益關注正規金融體系是否有能力配合江澤民和朱鎔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所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戰略，還有試圖避免中國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在改革國有經濟和合理化金融部門的雙重壓力下，河南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成了人民銀行調查整肅的對象。

209 地方政府打擊非法金融業的第一個目標是三星集團公司，它是由鄭州郊區的一位農民於1992年興辦的實業集團。⁹² 經營於1995年陷入困難時，它的老闆想出了一個讓「榮譽股東」們「靈活銷售」的策略，讓這些人在公司投資並從家裡寄售其產品。公司答應對「金卡」和「銀卡」的會員給予20%至30%的回報，金卡和銀卡的持有者分別是在公司投資二萬元或一萬元的人，公司設法吸收了8.99億元（1.096億美元）的存款。⁹³ 當人民銀行和工商局於1998年3月對其營運進行聯合調查時，投資者和存戶緊張了，紛紛跑到三星公司擠兌其存款。兩個月後，市政府強迫其關閉，三萬名存款戶中的大部分上街遊行抗議。他們氣憤的是，這麼小的一家私人金融機構被調查，而大型國有銀行繼續以40、50億的規模放出不良貸款。河南省政府對所有的國有單位發出緊急通知，指示它們阻止自己的職工上街抗議。同時，還要求三星的存款戶向政府進行登記，以安排對其存款損失給予部分的補償。體力勞工和退休幹

⁹¹ 編號第112號受訪者。

⁹²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1998年7月7日採訪編號第87號受訪者的書面通信。

⁹³ 官方對此事件的說法見王發申的文章，〈「三星」神話的解決——李國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紀實〉，《大河報》，1998年9月6日，4至5版。

部能收回他們現金資產的6%，超過十萬元的存戶需要說明其存款的來源。這項要求大大地減少了抗議的隊伍，因為很明顯地，許多存戶是靠非法的手段積累其資金。⁹⁴

三星公司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另一家冒充實業集團的私營金融機構，白花公司的老闆突然關閉了公司的業務，帶著存戶的一千五百萬元逃到了美國，行前燒掉了公司的財務帳目。⁹⁵ 白花公司的關閉引發了全城銀行的擠兌，而所有16家鄭州的私營金融公司都沒有償付能力。

與此同時，人們開始擠兌新成立的城市合作商業銀行（即先前的城市信用社）。到1998年7月，46家城市合作商業銀行都在緊急狀態下經營：它們尚未關閉，因為政府害怕還會有一波波上街示威的群眾，暴露出當地金融的窘境；但是限制每日的取款總量最多不得超過四萬元，存戶一次只能取走二千元。當這項政策剛被宣布時，存戶先是對各自的合作銀行發火，但是很快就變成每天早晨去排隊取款，帶些小禮品去討好銀行的職員。儘管如此，1998年9月至11月期間，存戶偶爾的抗議仍在省府省委大樓前、鄭州商業區，甚至沿京廣鐵路繼續進行。⁹⁶

210

⁹⁴ 人們懷疑有大筆存款的存戶涉及大量的賄款。

⁹⁵ 2001年3月，鄭州中級人民法院發現1996年5月至1998年5月期間，白花公司從12,295個存戶中非法集資3.36億（4,060萬美元）和12萬美元。前任總經理李建被判處死刑，六個同夥被判18個月到15年的徒刑。可參考〈金融詐騙者被判死刑〉，《人民日報》，2001年3月31日。

⁹⁶ 〈鄭州500持股人在公司垮台後抗議投資損失〉，《蘋果日報》，1998年7月15日，見FBIS-CHI-98-245; Chan Yee Hon, "Investors Take to Streets over Billion-Dollar Sca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September 27, 1998; "Three Star Payouts Begin," *SCMP*, October 26, 1998; and David Rennie, "Street Protests as Chinese are Bled of Their Savings;

在某些層面上，鄭州的金融破壞行為使人聯想起1980年代中期在溫州金融市場上出現的動亂。一般市民的終生儲蓄喪失了，地方政府拚命想控制住損失。然而，兩者的根本差別卻在於金融騷亂的近因。在溫州，人們陷進了金字塔式投資騙局的複雜網絡之中（與1997年阿爾巴尼亞發生的事件相似），然而在鄭州經營的銀行卻因政府調查高息私營金融公司（包括1993年無錫醜聞以來，後來導致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倒台的最大的金字塔式投資騙局）所引發。⁹⁷ 像鄭州這樣一個省會的居民，一直是與國家政策（無論是在國家、省或市級層次上）的變遷更為保持一致的。因為，例如說，比起偏遠農村的農民，他們留心目睹國家的政策雷厲風行地推行下來。這樣一來，一家金融公司的關閉就足以引發一場信任危機，喪失對城市私營金融機構活力的信心。溫州與鄭州一個相對的對比是，前者私營經濟的發展要早得多；而後者一直更受國有企業以及毛派懷疑資本家利潤的思想禁錮。按照其結構上的差別來看，驚人的是鄭州的企業主在尋找創意的方式以從事私營金融上竟然走了那麼遠。近日對這些機構的打擊，肯定是出人意外之事，但是對於在改革開放時代以前就成年的人們來說，這事毫不奇怪。

Banks Face a Run as Deposits Vanish into the Black Hole of State-run Enterprises,”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19, 1998.

⁹⁷ Kai Peter Yu, “Facts behind Pyramid Firm Fraud Emerge,” *SCMP*, September 22, 1998.

對河南金融機構的總結

河南各式各樣的金融機構總結如表 5.3：它們的政策依據、權責機關、預期與實際上的使命（例如，目標客戶），還有利率。我在河南的田野研究地點，沒有一處擁有這些全部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但在任何一地，現存的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與正規金融機構之間，像它們自己之間一樣，都有著競爭（或非競爭性）的互動關係。如同上述案例所示，在任何一個機構的建立與維持之中，賄賂時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多數受訪者都將腐敗描述為經營中的現實：它既麻煩又非法，但在促成交易和規避官方干預上又是必須。

2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認識到腐敗的蔓延與普及，定期發動運動來懲治觸法的官員。⁹⁸ 河南的官僚們也不例外。例如，安陽市一家國有紡織廠的廠長因「挪用公款 60 萬、公司投資資金十萬，並收受一百多萬的賄賂」而被判處死刑。在調查期間，廠長牽連到安陽市長，市長因企圖藏匿 16.5 萬元的賄賂而被判處十年徒刑。在省一級，從 1984 年以來，河南一直試圖通過媒體大造聲勢來打擊不法官員。⁹⁹ 然而，這種報紙頭

⁹⁸ 〈企圖藏匿賄賂的安陽市長被判十年刑〉，《南華早報》，1998 年 7 月 15 日，最初見於《中國青年報》，1998 年 7 月 14 日。

⁹⁹ 吳介民，〈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地方產權政權：中國非正規私有化的案例研究〉（1998 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五章第 4 頁。自從 1993 年 8 月江澤民在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會上發表將腐敗當作病毒一樣打擊的反腐敗宣言以後，對各省反腐敗舉措的討論，可參考，馬宏圖、武華和俞吉，〈清除腐敗，整頓黨的作風〉，《河南日報》，見 FBIS-CHI-97-270；吳葉，〈河南回顧 1996 年反腐敗工作〉，《河南日報》，見 FBIS-CHI-97-021。這些文章敘述了近年來最特殊的案例，許多涉及國家銀行人員。一件特大銀行詐騙案牽涉到河南省滎陽中行分行的

表 5.3 河南非銀行金融機構一覽表

名稱	政策依據	權責機關	目標使命	實際使命	年息	
					存	貸
農村合作基金會	國務院 1983 年 1 號檔 ； 1984 年 1 號； 1985 年 1 號； 河南省 1991 年 9 號； 1992 年 5 號； 1992 年 23 號； 1992 年 12 號； 1994 年 1 號 ； 1994 年 4 號 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 委員會 1993 年 134 號	農業部； 由鄉政府及 村委會管理； 自 1999 年以來被人民銀行關 閉	促進農村發展、服務 農基會成員和農民； 不著眼於營利； 不應 吸收非成員的存款	在農村吸收存 款的流行工具 ； 向集體企業 和某些私營企 業提供貸款	15.6 %	25.2 %
郊區合作儲蓄基 金會		民政局	扶貧並向私營經濟提 供貸款； 促進物質、 精神文明建設	吸收存款； 向 私營企業提供 貸款	15.6 %	—
民營企業資金 互助會	河南省 1995 年 40 號	工商局	給成員私營企業家提 供貸款	給成員私營企 業家提供貸款 ； 吸收存款	9-16.8 %	21 %
城市信用社	河南省 1979 年； 人 行 1989 年 346 號； 國務院 1995 年 25 號 國務院 1977 年 154 號	城信社聯合社； 人民 銀行	給信用社成員提供金 融服務	給成員和政府 推薦的企業提 供貸款	6.0 %	18-35 %
農村信用社		以前為農業銀行； 1996 年後為人民銀行	給農村的信用社成員 提供金融服務	給成員和政府 推薦的企業提 供貸款	—	18 %
扶貧社	國務院 1993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 扶 貧辦公室； 縣政府	給農村貧困戶提供小 額低息貸款（有些專 為婦女）	在貧困縣向農 戶提供小額低 息貸款	—	16 %

條式的揭露並不能阻止其他人以身試法。¹⁰⁰

河南存在著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雖然該省被大多數觀察家視為與改革開放時代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無關的省份。不可否認的，南方沿海與北方內地在商業化發展的時間、步伐與內容上存在著地區性的差異，但是更廣泛的「資本家」創新的動力在兩地都明顯地存在。儘管河南面臨著某些地區過度工業化和被忽視的落後農村的雙重包袱，河南的私營企業主清楚地表明，自己也願意冒險離開農村、特別是脫離國有經濟。通常他們別無選擇，只得求助於自我僱傭來維持生計，然而許多企業主也承認有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發財動機。在轉型經濟中，國有單位的就業也不再提供毛時代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保障，可以這麼說，即使是社會中最「紅」的成員也顯露出其真實面目。通過基本的商品交換去追逐私人利潤已經擴展到金融這個更為複雜棘手的領域，個人打著政策認可目標的幌子，經營著實際上是私營的金融機構。

在人民銀行或國有專業銀行能對非政府金融「團體」和「協會」實施行政權威之前，這些機構都將維護合法經營的權利，儘管要付出代價，以在河南和其他地方受到工商局的保

行長助理，他明顯地低報了存款，把差額塞進腰包。他們還合夥從存戶的帳上盜走5.1億（6,200萬美元），攜款潛逃，被省及鄭州市公安局調查人員組成的專案小組在全國追捕。19個月後，他們在美國被捕，被「勸說」回了中國。可參考〈在一場高達4.77億港元的瘋狂銀行詐騙案中，五人被捕〉，《南華早報》，1998年8月23日，1版。

¹⁰⁰ 值得注意，直至1998年，監督反腐敗的非政府行為仍不被允許。1998年10月，民政部拒絕了一個叫安君的個人要登記一個叫做「腐敗觀察」的非政府組織的申請。根據Associated Foreign Press（AFP）的報導，該組織在10個省已經有80名成員。可參考，〈湖南反腐觀察團體被禁〉，香港AFP，1998年10月31日，見FBIS-CHI-98-304。

護。隨著這些組織在業務和規模上的增長，工商局侵入人民銀行行政領域一事肯定會導致政治上的衝突，如同在溫州和鄭州街上生動的場面。在過渡期間，以創意的手段去經營金融業務的嘗試將會繼續地發展。河南的民營金融團體展示了自身培養政治關係的能力，這些關係不僅使它們能夠繼續經營直到1998年的危機，而且也取得了高層官員高度的公開支持。只要中央及地方政府日益強調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做為鞏固虛弱的國有經濟的有利手段，私營金融業其他具創意的制度形式將毫無疑問地繼續出現。但是，問題仍舊是這些商業金融機構在不受人民銀行的監管下能夠經營多久。現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金融監管者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做為人民銀行打擊非正規金融業的先驅，在1998年2月一場討論金融問題的會議中，河南省副省長李玉成，指示地方政府加大轄區內整肅金融機構的力度：

214

各級政府應該支持和指示有關部門整頓和規範所有從事違法金融業務的基金會、互助會、儲蓄組和股金服務中心，並嚴格調查和懲罰利用非法手法籌集資金以及以偽裝形式高息集儲的行為，以確保各地的金融秩序。¹⁰¹

但河南人民銀行的監管者明顯地沒有想到，他們整頓金融秩序的努力竟會事與願違，而產生那麼嚴重的後果。

¹⁰¹ 〈河南舉行金融會議〉，《河南日報》，1998年2月8日，見FBIS-CHI-98-051。

第六章

比較脈絡下的場外市場

小型企業對這個國家、銀行、推廣機構和受益者來說，都是一件新的事物。因此，我們還都在學習，並希望未來企業主能自己走進銀行申請貸款而不用來找我們。 215

——喬伊斯·馬波馬 (Joyce Mapoma)
尚比亞鄉村工業委員會主席

我們正試圖打破阻礙民眾與其領導者之間相互溝通的障礙。我們正試圖去做或做好政府不做、不會做、不願做和不應做的一切。

——錢德拉·德·馮賽卡 (Chandra de Fonseka)
斯里蘭卡非政府金融組織烏瓦格拉姆 (Uvagram) 創始人

將政治權力引進經濟事務，就啟動了一場調整與反調整的辯證過程。在類似反應的過程中，當受監管者靠尋找和利用漏洞，並以更簡便的違法行為，以使監管者的意圖短路時，市場就重新調整管制的權力……這個辯證的過程可以用許多方法來解析，但往往是在國家經歷了一輪勞民傷財的政治與經濟的反作用之後。

——愛德華·克恩 (Edward J. Kane)
《貨幣、信貸和金融雜誌》，1977年

對中國各地非正規金融業的供應與私營企業主對金融機制使用的細緻解釋的敘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顯示了
 216 非正規金融業、正規和非正規金融機構，以及最普遍的，公共與私人行動者之間有著廣泛的互動動態。最終，這些二元的互動都不是零和的關係。它們是互補的，而不是互斥的。非正規金融業不一定就要犧牲正規金融業的利益。國家偏好的非正規金融仲介公司，不一定就意味著非正規金融業的終結。但它們共存的事實，確實意味著它們相互影響——因此不能被國家所忽視。國家總有一種管制、禁止或合併各種場外市場機構的傾向，雖然有時它的干預主義衝動可能被證實是無效的，甚至是自討苦吃。

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其他國家中發現。¹ 它們那些創新的金融仲介機構的發展經驗與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政治經濟邏輯相較又如何呢？回顧上述所提出的論點，並考慮它們是如何相互關聯，將會為這樣的比較建立一個分析的基礎。

連結子議題

廣而言之，本書是研究地方上的政治與經濟行動者如何創造先前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壟斷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即經濟中信貸的供應和分配。為了闡述這過程的動態，我提出兩個不同的問題。首先，為什麼有些地區存在著範圍廣泛的非正規金融機制，而其他的地區卻幾乎沒有？第二，為什麼私營企業主使用

¹ 可參考 Ibrahima Bakhoun et al., *Banking the Unbankable: Bringing Credit to the Poor* (London: Panos Publications, 1989).

不同種類的金融機制？在現實中，這兩個議題有相互加強的效力。

在大多數的基層地區，很明顯地，私營企業主的金融選擇被他們特定地區現有的選擇機會所侷限。例如，一位擁有強大政治關係並在當地住了一輩子的男老闆，比起一位沒有政治關係的外來女老闆，可能會使用更高制度化的金融形式。但是，如果一個關係良好的人碰巧生活在地方政府不支持私營經濟的地區，他的機會卻是當地根本不存在的高度制度化的私營信貸來源。簡而言之，某一地方非正規金融業的供應限制了私營企業主籌措資本的選擇。

然而，金融機構的供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在長樂縣，當地政府最初更有意發展集體經濟。但是當地方上開始接受更多的海外資金，私營經濟發展了更強的勢頭，政府就變得更遷就私營企業和私營金融了。如此一來，私營企業主不一定有意，就可能改變了地方政府在制訂當地發展戰略時所抱持的政治和經濟動機。

217

到1990年代末，日益增加的跡象表明，甚至連追隨蘇南模式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著稱的地區，也正在經歷著發展方向上的改變。首先，鄉鎮企業驚人的成長率可能無法長期持久的跡象初見端倪。除了在發展最初階段之後要繼續攀升和對付日益加劇的國內外競爭的一般挑戰之外，恰是造成早期增長的那些因素轉變成日後有效營運的障礙。正如某些地方政府以經濟福利支持鄉鎮企業，並為其發展提供優惠的條件；這些政府的政治活力還要倚靠為當地人口維持足夠的就業，即使這意味著鄉鎮企業不需要工人也得僱傭他們。第二，某些鄉鎮企業已經經歷了明顯的私有化過程。² 早就有人認識到，許多「集體」

企業事實上是私人擁有的，它們只不過是戴著紅帽子而已，但有些正開始去除偽裝。眾所周知，鄉鎮企業主要的制度化金融來源一直是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可以想見，私有化的鄉鎮企業會繼續接受這些來源的貸款。然而，從傳聞來看，很明顯有些企業也在內部發行非公開交易的股份，以「從公眾籌集資金」。³ 後一種做法在中國各地都是不合法的，因此也應該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非正規金融。⁴ 鄉鎮企業改制成為股份合作企業，也採用了實際發行和持有股份

218 各種形式。⁵ 在有些地區，股份合作企業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企業集體所有制的結構。在其他地方，股份合作企業給當地的精英們一個化集體資產為私有財產的機會。⁶ 然而，在溫州這

² 〈江蘇四分之一的鄉鎮企業已經私有化〉，《中國經濟新聞網》；〈私有的鄉鎮企業在增加〉，《新華社》，1998年12月30日。可參考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d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 這與合法登記為「股份企業」的並不一樣。

⁴ 在官方統計中，資助鄉鎮企業的「其他資金」來源在1985年至1988年期間從占GDP的2.9%上升到1992年至1996年期間的4.7%。Wing Thyee Woo把「其他資金」視為類似於非正規信貸，可參考“Improving Access to Credit in Rural China,” in Baizhu Chen, J. Kimball Dietrich, and Yi Feng, eds.,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0), 321-45.

⁵ Eduard B. Vermeer,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⁶ Sally Sargeson and Jian Zhang,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a Hangzhou District,” *China Journal* 42 (July 1999): 77-99.

一類地區，股份合作企業實質上就是私有的。⁷ 我的研究表明，某一地區的鄉鎮企業若是真正私有化了，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就會變得更友善。⁸ 而且進一步，地方金融機構（但不一定是國有銀行）就會給私營經濟更多的貸款，而且其他形式的私營金融也會發展起來。

除了觀察到地方政府的發展態度會與時俱變，另一個使問題複雜的因素是，**地方政府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正如溫州的個案所顯示的，當地國有銀行最終會反對私營銀行和其他非法的金融仲介形式，主要是因為它們受到上級人民銀行的壓力而這樣做。然而，與此同時，當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卻沒有這種來自上級的壓力。工商局的職責是對私營企業進行登記、監管和收費。如果部分已登記的私營企業碰巧也從事營利的金融仲介活動，工商局不會超出自己的職權去懲罰它們違犯人民銀行的規章。同理，當地農業局的職責是為農業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而不是執行人民銀行規定的法令。在城市地區，所有的單位在法律上都是國家的一部分，但是絕大多數並不隸屬於銀行的官僚體系。當地方政府像在中國那樣的複雜和差異時，其中一個部門忽視或甚至批准非法金融活動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國家官僚組織在結構上經常推翻自己的政策——或至少在執行政策時會遇到協調的挑戰。

正如地方政府事實上是由許多不同利益的機關所組成，地

⁷ 上海與溫州的股份合作企業的比較，可參考 Susan H. Whiting, "The Regional Evolution of Ownership Forms: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nd Rural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Wenzhou," in Oi and Walder, *Property Rights*, 171-200.

⁸ 這與下列是一致的：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and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方信貸市場也是各自區隔的（segmented）。小型的私營企業主做為一個團體可以共享對金融服務的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身分與網絡影響他們利用某些種類信貸的能力。這種區隔的部分理論根據，源自於地方經濟交易的社會性質。由於信貸交易對於借方來說，本來就帶有風險的成分，對借貸者個人的瞭解，就成了防止賴帳的一種保險形式。因此，對於發現有著相同性別和居住地的企業主卻有著歧異的私營金融交易群體這一點，不應感到奇怪。然而，除了市場區隔的社會及經濟邏輯外，當地企業主的政治關係也影響他們可以獲取或運作的金融仲介的類型。雄厚的政治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能避免官方的干預——當然，這取決於政治關係的性質以及當時更廣泛的政策環境。總而言之，非正規金融業市場區隔的事實，意味著在某一地區可能會繁榮著各式各樣的金融機制，因為它們為不同層次的人群服務。與之相關的影響是，沒有一個單一的機構可以主宰整個信貸市場；因此，政府遏制非正規金融業的努力，如果僅僅盯住最明顯違規的禍首，是不能奏效的。

上述論及的三種複雜因素（地方政府願意變革的可能性，推行政策時的各自為政，以及信貸市場的區隔）的結合表明，在未來，非正規金融業仍會是中國經濟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誠然，國家銀行體系正努力地合理化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並鼓勵合法的機構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此外，金融改革者要減少國有銀行中壞帳的比例，以確保新的貸款在合格的基礎上發放，而不是屈從於政治壓力。但是，國有經濟持續地需要補貼，而且在國有銀行更像國家政策的工具般運作了幾十年之後，很難強迫它一下子就像商業銀行一樣行事。並不是僅有中國陷於這些挑戰之中。對其他國家非正規金融業的研究表明，

本書所論及的大部分政治經濟問題並非中國所特有。的確，中國的金融監管者可以從其他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巨大的非正規金融業的正反兩方面例證中學到很多東西。場外市場機構發展的爭論不僅受到經濟需求也受到政治的考慮所影響，可以藉由四個與其他各國也有關的議題討論所說明。

- 非正規金融業並不必然就是小額信貸，貌似小額信貸卻可能會有宏觀影響；
- 企圖管制或禁止非正規金融業，只會產生反效果；
- 國家補貼的扶貧貸款一般都難以到達貧困人群手中；
- 非正規和正規金融業可以互補，不必然是互相排斥的。

220

非正規金融業的宏觀影響

在三個基本層面上，非正規金融業可能會有宏觀層次上的影響；這也是政治學家為何應該關注這些看來非政治現象的原因。首先，如同我的個案研究中所顯示的，非正規金融業不一定就是小額信貸。即使雇員少於八人的私營企業也可能有相當多的啟動資本和流動資本的需求。當經濟活躍人口中的大量民眾都依賴非正規金融業時，他們的交易可能會侵害國家對經濟中信貸供應的控制。第二，正是因為場外市場可以擴展到大量的人口，非正規金融業實際上可能支援了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這一點似乎是與直覺相反，因為場外市場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儘管如此，它們可能為正規金融體系所忽視的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服務。第三，與第二點相對，非正規金融業的自我規範

性質可以導致基層發生更大的金融危機。這並不是說，那些受到政府謹慎監督的機構就能完全免於金融上的違法行為或不良管理的風險，只是在非正規金融領域中即將發生金融崩潰的徵兆可能不那麼明顯罷了。

非正規金融業的規模比較

大多數國家都有非正規金融業，發展中或轉型的經濟往往存在受壓抑的金融環境，這特別容易導致場外市場的出現。雖然衡量非正規金融的相對範圍極為困難，表 6.1 提供了研究所得出的統計，這些統計數字試圖估計不同國家中非正規信貸與正規借貸的比例，以及參與場外市場活動的人口比例（參見附錄 E 中全世界信貸互助會的使用情況）。

222

這些比例僅為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借貸流行的狀況提供一個大略的描述。它們並不反映諸如極端的天氣、自然災害、政治和宏觀經濟環境等外來衝擊期間的非正規金融的波動。例如，在菲律賓，1983 年至 1985 年間經濟危機時，大量的農村銀行倒閉了，極大地限制了官方農村信貸的供應；在此期間，非正規的放貸者占據了大部分的信貸市場，但是，隨著正規信貸來源的重新出現，他們的市場就縮小了。⁹ 同理，宏觀經濟危機也可能暴露和加劇非正規金融機制的弱點，因此遏制它們的使用。例如，以色列 1985 年的反通貨膨脹政策在整個農村合作

⁹ Meliza Agabin, "A Review of Policies Impinging on the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the Philippin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8-12,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Quezon City, cited in Prabhu Ghate et al., *Informal Finance: Some Findings from Asi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Asia Development Bank, 1992), 12.

表 6.1 各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比較

國家	非正規借貸與正規 借貸總額之比(%)	參與非正規金融 的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 ^a	調查/ 估計日期
孟加拉(農村)	63	36.5	Germidi, Kessler, and Meghir(1991)	
玻利維亞(城市)	49.4	> 33	Berthoud and Milligan(1995); Adams and Canavesi(1989)	1987
喀麥隆	27	70	Schrieder and Cuevas(1992)	1988
中國(農村)	25	20	Shi(1996); Huan(1996); IFC(2000)	1994
多明尼加共和國	20	—	Christen(1992)	1980年代
印度(農村)	39	—	Ghate et al.(1992); AIDIS national sample	1981-1982
印尼	>80	—	Robinson(1994)	
甘比亞	c.67	—	Aryeetey(1994)	
加納	60	—	Dadson(1996)	
幾內亞	>200 ^b	—	Walker(1996)	
韓國(農村)	50	—	Ghate et al.(1992); Yearbook of Agric and Forestry	1986
柬埔寨	46.5	38	UNDP/UNCDF(1997)	1996
馬拉威	>100	> 19	Chipeta and Mkandawire(1991)	1988
馬來西亞(農村)	62	—	Van Nieuwkoop(1992)	1986
墨西哥(農村)	50-55	—	Germidis, Kessler, and Meghir(1991)	

表 6.1 (續) 各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比較

尼日(農村)	45	—	Graham (1992)	1985-1986
奈及利亞(卡杜納州)	65	85	Udry (1990)	1987-1988
尼泊爾(農村)	57.1	—	Ghate et al. (1992): Nepal Rashtra Bank	1982
巴基斯坦(農村)	69	33	Van der Harst (1974); Ghate et al. (1992): PRCS	1985
菲律賓(農村)	59-70	33	Ghate et al. (1992): Social Weather Survey	1987
斯里蘭卡	45	—	Ghate et al. (1992): Central Bank of Ceylon	1976
台灣	24-40	> 50	Shea (1994); Smith (1999)	1964-1990
泰國	21-50	—	Vongpradhip (1985); Siamwalla et al. (1990)	1995 以前
西岸和加薩走廊	—	38.6	Hamed (1998)	6/1996
尚比亞	84	—	Germidis, Kessler, and Meghir (1991)	
辛巴威	87	—	Germidis, Kessler, and Meghir (1991)	

注釋：同一國家若有多種估計，選取較低者。

a：若需完整的參考資料，見附錄 E 的資料目錄。

b：幾內亞非正規金融業的流動資金量一直被估計為正規金融業的兩倍。

經濟中激發生一場債務危機，暴露出合作信貸體系中的體制弱點——通過互相負責的安排產生了過分借貸的傾向。¹⁰ 此事的揭露導致合作信貸事業的威信掃地，造成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私人放貸者都不願再給農業合作社發放貸款；大多數的地區合作社都垮掉了。簡而言之，即使事件可能影響非正規金融業的發展，在正規信貸來源有限的情況下（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就是如此），非正規金融業的規模可能會相當大。大量的資金可能會在國有銀行和財政當局的規範之外流動。

非正規金融業對發展的潛在貢獻

儘管與官方的信貸供應在立場上相互對立，非正規金融業也可能經由自身的發展影響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環境。非正規金融業的作用在經濟中很廣泛，從光譜這一端來說它代表了爲了生存的自助策略，從光譜另一端看，它代表了可能非常有利可圖的私營經濟的自助融資策略。¹¹ 介於兩者之間，非正規金融業可能有助於家庭耐用消費品的積累，或方便住房的修建及購買。¹²

¹⁰ Yaov Kislev, Zvi Lerman, and Pinhas Zusman, "Cooperative Credit in Agriculture — The Israeli Experience," in Karla Hoff, Avishay Braver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The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4-27.

¹¹ 在社會主義的匈牙利，Szelenyi 將第二經濟中的私營企業主描述爲對抗國家控制的「抵制策略」。但這個概念化更廣泛的應用，卻取決於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見 Ivan Szelenyi,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¹² 例如，參考 Timothy Besley and Alec R. Levenson, "The Rol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Household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106 (1996): 39-59.

223 在長期遭受困苦和絕大多數人口都從事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的國家中，非正規金融可以為整個經濟的高中低三部分都提供服務。非洲第五大國查德的非正規金融業無處不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例證。查德連年乾旱、內戰頻仍，它的主要商品棉花的世界價格暴跌，從1970年代末，個體農民和生意人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甚少受到救助。而且，小企業主完全被排除在正規的金融體系之外，正規的金融體系把它絕大部分的信貸都給了查德最大的國有企業：查德棉紡廠（Cotonchad）。因此，就像非洲各地的同行一樣，查德的企業主和消費者依靠的是諸如托太恩（*tontines*）的信貸互助會的場外市場活動。¹³

儘管場外市場的發展功能範圍如此廣大，政府通常仍視正規金融而不是非正規金融體系為實現其發展目標的政策工具。根據定義，非正規經濟是國家管制範圍之外的經濟活動，因此，人們不會期望國家將其視之為工具性支配的對象。然而，工業發展的研究普遍地開始注意到國家悄悄地承認場外市場金融做為發展戰略的一個補充。更顯著的例證來自東亞的兩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台灣和南韓，它們都在金融受壓制幾十年的情況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成長。

眾所周知，台灣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間促進出口的增長歷程，依靠的是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企業投資與從事勞力密集型輕工業製造業的成千上萬家小型私營企業的結合。在以兩位數成長的這個神奇階段中，後者約占工業產出的40%。

¹³ Ousa Sananikone, "Chad," in Leila Webster and Peter Fidler, eds.,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West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105-13。西非的信貸互助會也被稱為 *paris*, *esusus*, *susus* 或 *osusus*。

¹⁴ 然而，這些家庭工廠能從國家銀行獲得的貸款有限，只能依靠著場外市場來源，諸如放貸人、當舖、存貸互助會、信用聯社、地下投資公司以及廣泛地使用遠期支票。¹⁵ 在1970年代，場外市場的金融總量估計相當於所有正規金融業借貸的30%。¹⁶ 由於場外市場的經濟重要性，台灣中央銀行回溯了它從1950年代末以來的月利率，甚至保留了三項個別的貸款利率統計分類以處理遠期支票、無擔保貸款以及公司存款。¹⁷ 這麼嚴密地監測場外市場利率的理由是，它們披露了經濟中資本真實成本的波動有價值的資訊，這些資訊反過來可以使中央銀行調整其貨幣政策。¹⁸ 總而言之，藉由對中小企業融資，場外市場可被視為對台灣出口導向的成長支持良多，而且為中央銀行提供了一個相當可靠的瞭解經濟中價格情況的管道。¹⁹

¹⁴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0.

¹⁵ 綜合的討論包括 Sheng-yi Lee, *Money and Finan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London: Macmillan, 1990); Jia-Dong Shea, "Taiwan: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Hugh Patrick and Yung Chul Park, ed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Growth, Repression, and Liber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2-87; and Shui-Yan Tang,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23, 5 (1995): 845-56.

¹⁶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161.

¹⁷ 在官方文件中，場外市場被稱為「未組織的貨幣市場」。見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的各期《金融統計月報》，台北：中華民國台灣省。

¹⁸ Nicholas H. Reigg, "The Role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79), 253, cited in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161.

¹⁹ 在1980年代，中小型企業占「就業的60%，生產的45%，製造業出



遠離家園辛勤工作。河南省開封市，1996年7月。

場外市場也一直是金融風波的根源，但總的來說，台灣的政治人物和銀行業者都承認它對改善正規金融體系中發放貸款的低效做出了貢獻。

雖然韓國的產業結構是由比台灣更大型的企業集團所組成，那裡的場外市場也在金融仲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經濟調整的關鍵時期。²⁰ 例如，在韓國戰後的第一次經濟

口的60%」，見Tein-Chen Chou, "Taiwan," in Stephan Haggard and Chung H. Lee, eds., *Financial System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²⁰ 韓國工業化的綜述，可參考Alice A.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Cole and Yung Chul Park,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Korea, 1974-197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and Jung-en Woo,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危機期間（1969-1971），國際貨幣基金（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迫使韓國採用極端的穩定政策，包括取消出口補貼和進口限制，暫時限制向外國借貸，而且最痛苦的是韓元的貶值。眾所周知，由於韓國的工業企業高度受制於外國資本，貨幣貶值嚴重地限制了其還債的能力。由於國家銀行負擔了大量的壞帳，因此無法再提供另外的貸款，甚至連最大的公司也得從私營金融仲介那裡借錢。於是場外市場膨脹：1969年非正規金融的流量約占貨幣供應的82%和約30%的銀行未還貸款。²¹

225

然而，不久之後，企業對場外市場也無法償還其金融債務。在1971年政變前夕，韓國實業家聯合會（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alists）代表大型企業集團要求政府對所有場外市場的債務宣布延期償付。經過一番政治上的討價還價，政府這樣做了。所有的債主和債戶都要向政府登記，一項凍結三年還債的措施也實施了，此後，債務轉化成一種五年期的貸款，利息上限為18%。在登記的209,896個債主中，70%是小型放貸人（資產低於2,889美元），而且其中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非正規存款已經被場外市場的仲介公司轉成了企業的資產。不客氣地說，場外市場先將大企業救出困境，然而當後者對脆弱的政府施加政治壓力時，非正規的債權人承擔了後果。儘管如此，非正規金融在發展中的角色這幅圖像，確實展示了場外市場潛在的政治功用。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¹ 這裡的討論取自於Woo, *Race to the Swift*, 109-15.

場外市場危機

226 非正規金融業可能成為國家一個正式的政治問題的第三種方式，通常發生在以低姿態運作的非正規金融業遭遇困難並波及相當多的當地民眾時。非正規金融業的危機，並非總是由從上而下的政策變化所引發，例如結構調整計畫之類。基層金融機制本身也可能是不穩定之源。如同在泉州和溫州一樣，甚至信貸互助會，如果大規模地進行經營，然後突然崩潰，也會導致嚴重的地方政治動亂。1990年代在越南的信貸互助會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當這樣的危機發生時，在短期之內群眾對場外市場活動的參與可能會自我約束。損失錢財或看到別人虧錢，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強烈的負面宣傳。儘管如此，如果沒有發展其他的金融仲介來源，有理由相信受信貸之困的企業還會返回場外市場。儘管台灣在1983年至1985年間對信貸互助會及其他場外市場機制有慘痛的經歷，對互助會的參與到1986年時又反彈到相當大的規模，到1991年已經恢復到1977年的水準（所有家戶數的20%至30%）。²²

當場外市場危機的範圍涵蓋足夠多的當地民眾時，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以組織緊急的賠償措施，或是發布嚴格的金融管制，或是從事更根本的金融改革。²³ 在溫州與泉州龐大的信貸

²² Alec R. Levenson and Timothy Besley, "The Anatomy of a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 Rosca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 1 (1996): 45-68；特別注意頁58對於1977年至1991年間追蹤參與互助會的圖表變化。

²³ 1997年，阿爾巴尼亞金字塔式的金融詐騙崩潰了，影響了大約75%的全國人口，導致嚴重的內亂，但政治上的憤怒來自於政府對此事的宣導，這造成約十億美元的損失（國家GNP的約三分之一）。可參考

互助會崩潰之前，地方當局並未過多關注「民間」金融活動，因為後者似乎刺激了當地私營經濟的發展。但隨著事件的規模大到無法忽視時，受害者迫使地方政府進行危機處理，以公開的方式懲罰違法的會頭。到最後，互助會的受害者和地方政府都對結果不盡滿意，因為大眾對其損失不能獲得全額的補償。

做為雙面刃的管制

有時，當非正規金融業給國家那些平素自滿的國家官吏製造問題時，以管制做為解決之道反而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大多數的國家都面臨著兩難的困境：如何找到允許金融市場自主經營又能管制它們的適當平衡點。由於謹慎小心，對於管制一直存在著偏見。正規金融機構要登記註冊、有充足的資本比率、標準化的彙報程序以及多元化的業務經營等，這些管制都意圖減少經濟中的金融風險。在開發中和轉型經濟中，金融自由化不僅一直是最後一塊放鬆國家控制的領域（例如，在放棄了對商品的價格管制之後），而且自由化過程本身就典型地伴隨著新增管制的擴展。使這個過程更複雜的，是如何實施金融管制又不致引發場外市場參與者不良反應的更根本的挑戰——這些反應從金融恐慌，到雖不那麼具破壞性，但仍有問題的新舊管制的破壞結果。

227

恐慌或鎮定

1998年，鄭州市銀行當局企圖整肅非法金融機構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地方層級引起有害反應的例證。許多私營金融機構都承諾一些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高息回報，因此，當每一家倒閉、互不相聯的存戶網絡喪失其存款和投資，這些機構便會引發一場小規模的恐慌。但實際卻是金融監管者大舉清查的舉動引發了城中存戶的恐慌。甚至國家批准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經歷了擠兌，即使他們並不是直接調查的對象。

在印度的喀拉拉邦發生過規模甚至更大的相似一連串事件。隨著民眾1970年代向波斯灣的遷移增加，對非正規金融的需求也持續擴大，其供應採取了金融公司的形式。到這些公司大規模崩潰之時，約有一萬二千家金融公司從事高息集儲並向各類商行提供信貸和投資證券。引發大崩潰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3月，當「壟斷及限制性活動管理委員會」(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Practices Commission) 宣布其中一家「東方金融及交易公司」並不具有足夠的投資業務量，能產生向投資者承諾的28%至35%的回報。存戶蜂擁地去擠兌，不僅從東方金融及交易公司也從其他大多數公司撤資。最後，這些金融公司大約損失了56%的總存款量。²⁴

相對地，1980年代初期至中期，當台灣的灰色市場金融機構陷入資金流動難題時，政府先發制人，而非引發進一步的公眾恐慌——雖然最終國民政府還是處分了自己的官員。在得知最知名的債戶第十信用合作社、國泰集團（台灣當時最大的

²⁴ 對此案例的討論見 Ghate et al., *Informal Finance*, 75-76.

投資信託公司)在1985年陷入金融危機之時,十信的存戶擠在合作社的大門外要求取回存款。政府緊急召集了合作金庫銀行,並提供協助。合作金庫銀行立即償付了十信所有的債務,合併了整個十信,安撫了存戶(在兩天中已提領了總額達1.5億美元)。²⁵ 其他三個可能出事的非正規金融機構也得到類似的處理。²⁶ 然而,十信事件最終暴露出比非銀行金融機構固有的金融風險更多的東西。國泰集團本身成為一系列高層調查的焦點,不僅揭露出投機的房地產投資,還有國民黨政府高層掩蓋事件真相的腐敗。²⁷ 醜聞的曝光導致經濟部長、財政部官員和國民黨秘書長的辭職。

逃避管制

除了對場外市場的存戶引起不安之外,金融管制還會引起逃避管制的反應。如同安南德·錢德瓦克爾(Anand Chandavarkar)所說:「管制非正規金融的企圖很容易失敗,因為非正規經濟的存在基礎,就在於它的非正規性和不受官方的管制。管制往往更可能產生反作用,因為在未能提供足夠的替代機構的情況下,它會導致逃避法律」。²⁸ 一些未能達到預

229

²⁵ 〈1985年2月11日和12日,一家台灣銀行——十信遭受了1.5億美元的擠兌〉,《亞洲華爾街日報》,1985年2月14日,5版;〈應銀行存戶要求,台灣政府接管十信〉,《亞洲華爾街日報》,1985年2月19日,3版。

²⁶ Ya-Hwei Yang, "Taiwan: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Patrick and Park,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314-15.

²⁷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293.

²⁸ Anand G. Chandavarkar, "The In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n Developing

期目標的金融管制的例子表明，「正常化」特定場外市場活動的努力有可能產生出另類非正規金融形式的反效果。

這裡有一個典型的案例，從中可以看出印度自1951年第一個十年的全印度農村信貸調查以來，一直努力想取締非正規金融業。這次調查暴露出當時93%的農戶依賴非正規信貸來源。²⁹官方的驚恐來自於想要規範明顯無所不在和占據壟斷地位的高利貸農村放貸者。這導致各級政府通過了大量的規章，旨在規定利率的上限，並在監管者覺察到有剝削人的金融活動時就取締它們。然而，非正規金融業仍繼續興旺。³⁰這些善意的反高利貸法律的無效，其原因之一在於官方未能弄清楚高息的深層根源：對農村信貸的需求一直超出了當時官方信貸的供應。³¹

例如，1975年的「喀拉拉邦啓蒂法案」(The Kerala Chitties Act)爲了管制信貸互助會（稱爲啓蒂基金或啓蒂），

Countries: Analysis,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1985.

²⁹ F. J. A. Bouman, with René Bastiaansen, Han Van Den Bogaard, Henny Gerner, Otto Hospes, and Joost Groot Kormelink, *Small, Short, and Unsecured: Informal Rural Finance in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14.

³⁰ 雖然1981年至1982年度全印度債務與投資調查表明，（城鄉）家庭戶從非正規金融業借過錢的比例下降到38.8%，大多數的分析家相信這數字大大低估了非正規金融業的真實規模。可參考，例如Clive Bell, “Interac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formal Credit Agencies in Rural India,” in Hoff, Braverman, and Stiglitz, 186-213; and Ghate et al., *Informal Finance*, 58-60.

³¹ 簡要的討論見Robert C. Vogel and Robert Weiland, “Regulatory Avoidance i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ale W. Adams and Delbert A. Fitchett, eds., *Informal Finan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293-302.

要求它們到州裡登記註冊。³² 然而，法案未能將互助會置於州的監管之下，反而極大地縮減了它們的效用，因為會員們不想讓自己的社區活動置於官方的監督之下。這之後不久，先前的會頭們發明出一個新辦法來從事金融業務。他們辦起了私人的「合夥公司」，透過印度的「合夥法案」（Indian Partnership Act，一種公司法）而獲得了特別的放貸許可證；許可證要求其資本額必須低於十萬盧比，而且要遵守「喀拉拉邦貨幣借貸法」（年利息限制在12%）：這兩個條件使私營金融機構能規避印度儲備銀行的監督。公司的運作證明它們極受歡迎，有利潤——而且非法。它們為商人和小企業提供年息為30%至40%的短期貸款，為存戶提供24%的年息，並持有兩本帳。簡而言之，企圖管制啓蒂基金只導致了更複雜和制度化形式的私人金融。利率上限和互助會的登記都未能達到目的，小型企業仍繼續依賴非正規金融。正如包曼（F. J. A. Bouman）所說：「不實際的立法和政策似乎培育出對其自身不滿的文化，刺激出了逃避的策略和手段」。³³

230

拒絕管制

並非所有的非正規金融仲介在本質上都逃避國家的管制與稅收。正規的登記納入了第三方參與，也會帶來某些好處，例如內部營運紀律、公眾的合法形象以及一些防範金融不當管理

³² 1975年「喀拉拉邦啓蒂法案」對該邦非正規金融業的影響，可見如下分析，B. A. Prakash, "Private Financing Firms in Kerala: A Stud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 (1984), cited and critiqued in Bouman et al., *Small, Short, and Unsecured*, 117-120.

³³ Bouman et al., *Small, Short, and Unsecured*, 118, 120-21.

和地方危機所必不可少的特性。儘管如此，還有一些例子是國家選擇不去管制某些非正規金融機構，寧願讓它們繼續非法下去。例如，在溫州（第四章），當地方上的人民銀行直接目睹了1980年代私人錢莊的經濟效用，便遊說中央的人民銀行將錢莊合法化，將其經營置於人民銀行的管制之下，中央人行卻禁止了私人錢莊。經營錢莊者於是面臨著抉擇：要麼轉入地下，要麼轉型成城市信用社。前一個選擇明顯地意味著非法經營，然而地方上對城市信用社營運要求的解釋提供了足夠的靈活性，使其可以規避國家銀行的法規，這正如印度喀拉拉邦的「合夥公司」一樣（然而，自從城市信用社合併成為城市合作銀行以來，這個灰色區域的範圍已被約束）。

1970年代末期巴基斯坦私營金融公司的迅速興衰，提供了一個更值得注意的例證，顯示拒絕管制的反作用有多大。³⁴ 隨著1977年至1979年間從中東寄回的匯款的湧入，私營金融公司在巴基斯坦擴展開來。它們從國有銀行不營業的村莊吸收存款，並投資於房地產、商業、交通運輸公司和其他可獲利的部門。除了便於將存款交給當地社區成員（農村望族子弟），
231 他們受僱於金融公司，信奉伊斯蘭教的村民也很欣賞自己的存款是在宗教名義上「分享投資回報」，而非「賺取利息」。³⁵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湧現，有些公司開始利用存款做為明

³⁴ Naved Hamid and Ijaz Nabi, "Private Finance Companies in LDCs: Lessons from an Experiment," *World Development* 17, 8 (1989): 1289-97.

³⁵ 對於伊斯蘭世界中的銀行業，可參考，例如Elias G. Kazarian, *Islamic versus Traditional Bank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Egyp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以及Abdulla Saeed, *Islamic Banking and Interest: A Study of the Prohibition of Riba and It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E. J. Brill, 1976).

顯的消費之用，而不是適當地投資。與此同時，存戶日益難以將良好經營的公司與欺詐的公司區分開來。

於是，1979年年中，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一群聲譽較佳的金融公司向國家請願，要求國家通過發放執照、審計、配備職員、存款保險以及其他要求來監管公司的活動。請願者解釋，將其置於謹嚴的監督和官方登記，就會恢復公眾的信心。銀行理事會不僅拒絕了這項要求，而且禁止金融公司在國有銀行裡存放存款。對一小部分較不嚴謹的公司虛張聲勢的調查，又進一步驚動了存戶；不出所料，金融公司出現了存款的外逃，並開始崩潰。這之後不久，政府就宣布所有的私營金融機構為非法。

在金融公司垮台時，它們已從基層存戶手中吸取全巴基斯坦總存款的5%多，這些存戶本來是被官方銀行排除在外的。於是，社會大眾為國家的壟斷吸收存款付出了代價；諷刺的是，在取締了這些金融公司之後，官方銀行又缺乏行政能力去吸收那些基層存戶的存款。國家拒絕了監管私營金融公司的機會，又強迫它們從國有銀行撤回資金，這種國家自我毀滅的舉動，喪失了一個可貴的存款來源。

因此，對非正規金融業的管制干預（或缺乏）的影響，不能以單向的思維來理解。為了謹慎起見，國家需要表示實施金融管制的意願；然而，以倉促公開的行動揭露場外市場機構的欺詐行為，可能會引發更糟的短期大眾恐慌。同理，立法以保護公眾免受高利息的舉動，可能會將缺乏管制的放債者推入更少受監督的行動領域或非法之中。如果對場外市場採取敵視性管制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尋求存款的壟斷，那麼，拒絕管制的行為，很可能就使國家喪失這些存款。欲速則不達，欲直反曲。

OK 繃式的扶貧補貼

232 在某種程度上，非正規金融可以被視為官方供應與金融服務需求之間出現鴻溝時的一個反應現象。³⁶ 政府一直忽略的事實是，大量的人口（通常，但並非全是農村）可能會被排除在正規金融體系外；於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成立了專業銀行、信用社或其他機構以完成社會福利或分配的目的，而不是去滿足更廣泛的對商業信貸的市場需求。這些信貸項目中的利率補貼就強調了其發展方向；它們不是要從窮人那裡營利。

儘管如此，由政府所主辦的低利小額信貸計畫最貼切地被描述為 OK 繃（Band-Aids）：它們是廉價的；³⁷ 它們蓋住了明顯的傷口；它們或是黏著力一旦變小就立即掉下來，或是甚至在不需要時仍頑強地黏在受影響的地區。根據幾十年失敗的補貼利率的小額貸款專案的發展經歷來看，這比喻沒有什麼爭議。學術界和政策影響研究都主張，受補貼的信貸計畫有某些共同的缺點：貸款一般有利於地方精英和早已經相對富裕的人，而不是那些低收入的目標群體；這些項目比那些徵收市場利率和費用的項目有更高的拖欠率；它們不是可持續的發展工具，因為其低息不利於存款的吸收，並且無法支付營運的支出。³⁸

³⁶ 對於「反應性的」（reactive）和「自動性的」（autonomous）金融機構的區別，見 Anand G. Chandavarkar, "The Premium for Risk as a Determinant of Interest Rates in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Com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2 (1965): 322-25.

³⁷ 實際上，維持這些項目的費用很昂貴，但對借貸者來說，貸款本身是廉價的。

³⁸ 對補貼利息的信貸項目的經典性批評，收錄在 Dale W. Adams,

這三項弱點的潛在邏輯似乎是反直覺的。為何低利率反而阻礙了發展目標的實現，當專門的信貸計畫的全部目的就是爲了提高弱勢群體的經濟福利？而且，窮人怎麼有可能得利於支付貸款的市場利率？要解釋這些看起來自相矛盾的現象，我們回過頭來老調重彈：在基層，當地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決定性地影響著信貸的分配。雖然本書所涉及的金融制度創新的案例是從基層發展起來的，這些政治與社會的邏輯可能會擴展到來自更高層政府補貼貸款的發放。更具體地說，這種邏輯的調節效力可以解釋爲什麼非正規金融甚至在有很多補貼信貸流動的地區仍繼續繁榮。純粹的經濟邏輯會期望增加官方的信貸就會限制對非正規金融的需求。³⁹ 然而，經驗表明，一直並未產生過這樣的結果。

233

例如，從1916年以來，泰國政府嘗試過各種辦法以增加農民的信貸機會。會使農村受益的再分配政策的政治壓力，在1973年軍政府倒台之後變得格外強烈。於是，各銀行被要求貸款給一家專門的農業銀行，農業和農業合作社銀行（BAAC），接下來它又被要求增加對農村信用社和個體農戶的貸款。儘管農業信貸的供應有了巨大的增加，貧窮的農民仍然持續

Douglas H. Graham, and J. D. Von Pischke, eds., *Undermining Rural Development with Cheap Credi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相反的觀點，見Jonathan Morduch, "The Microfinance Schism,"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626,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ebruary 1998.

³⁹ 這是「供應導向」（supply-leading）的金融業觀點。經典的代表有Harvey Leibenstei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iley, 1957); W. A.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Ill.: Irwin, 1955); and Hugh T. Patri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14, 2 (1966): 174-89.

依靠主要是非正規信貸的高息來源。正規的信用社寧願將較大宗的貸款發放給有土地的農民，而村莊的放貸者和商人卻更願意與更窮的農戶合作，官方機構將其視為高風險的客戶，但是他們卻願意付高息去獲得貸款。地方信貸市場並不按照嚴格的經濟邏輯運作。正如阿曼·西阿瓦拉（Ammam Siamwalla）及其同事所觀察到的，即使農民能從信用社獲得貸款也會向放債人借錢去償還信用社的債，因為信用社不願意讓流動資本貸款延期償還。⁴⁰ 西阿瓦拉的研究顯示出社會複雜性的另一個面向，但這裡的重點是，由於地方信用市場的政治及社會區隔，僅僅增加官方信貸的供應可能無法產生替代非正規金融的效應。

然而，泰國農村的信貸案例多少有些獨特之處，就在於信用社沒有經歷大多數補貼貸款專案所遭遇的大量拖欠與賴帳。一項1984年世界銀行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農業信貸計畫的研究顯示，平均拖欠率為39.4%，而補貼的專案則報導有50%至95%的賴帳率。⁴¹ 除了與生產有關的因素使得借貸者無法準時償還貸款（例如，在某一特定年份天氣對收成的影響）之

⁴⁰ Ammar Siamwalla, Chirmsak Pinthong, Nipon Poapongsakorn, Ploenpit Satsanguam, Prayong Nettayarak, Wanrak Mingmaneeakin, and Yuavares Yubpun, "The Thai Rural Credit System and Elements of a Theory: Public Subsidies,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Segmented Markets," in Hoff, Braverman, and Stiglitz, 154-85.

⁴¹ World Bank, "Agriculture Credit: Sector Policy Paper," 2nd ed., 1984, cited Marguerite S. Robins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Lessons from Indonesia, Part Two,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482,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rch 1994), 38; Nimal Sanderatn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Loan Defaults by Small Farmers," *Savings and Development* 2, 4 (1978): 290-304, excerpted in J. D. Von Pische, Dale W. Adams, and Gordon Donald, eds.,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Use and Abu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4.

外，兩個非經濟因素造成了這些專案發展的不良表現。首先，如前所述，官方的信貸計畫時常被地方精英所把持，並用於他們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目的。上級的補貼貸款很難穿透地方政治官僚體制的重重障礙。⁴² 與此相關的第二點是，政府給人的印象是這些規劃並沒有嚴格的預算限制，這意味著賴帳者將不會受到懲罰，信貸計畫還會繼續收到新的補貼貸款。⁴³ 某些案例中，政府會因為政治因素而免除某些特定人群的債務。⁴⁴ 同樣地，政府還公然地使用補貼貸款做為一種政治回報。例如，玻利維亞的雨果·班紮爾（Hugo Banzer）將軍在1971年經由軍事政變上台，該場政變得到了包括聖·克魯茲（Santa Cruz）低地農民在內的聯合力量支持。在班紮爾1971年至1978年執政期間，聖·克魯茲就接受了一筆不合比例的農業貸款，犧牲了玻利維亞高地農民利益的這筆貸款就進了農村精英的口袋。⁴⁵

⁴² 例如，可參考 Bruce L. Robert Jr., "Agricult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ural Development and Agrarian Politics in Madras, 1837-1937,"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6, 2 (1979): 163-64, adapted in PISCHE, Adams, and Donald,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354-364.

⁴³ Sandaratne, "Analytical Approach," 88-89。這實際上是小額信貸參與者中的普遍認知。

⁴⁴ 印度被引證為一個例子，見 Jacob Yaron, McDonald P. Benjamin Jr., and Gerda L. Piprek, *Rural Finance: Issues, Design, and Best Practices*,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1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102, cited in Joanna Ledgerwood, *Microfinance Handbook: An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Perspective* Sustainable Banking with the Poor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9); Box 1.3, 15.

⁴⁵ 高地的農民以接受來自 USAID 的援助而告終，可參考 Jerry R. Ladman and Ronald L. Tinnermei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Credit: The Case of Boliv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3, 1 (1981): 66-72.

235

於是，對「傳統的」信貸計畫不滿的批評者，要求不要再通過政府機關發放優惠貸款，而主張建立獨立的地方金融機構，以財政上可以自我維持的方式向個體戶發放貸款。⁴⁶ 這些機構可以採取非政府組織金融機構（例如，孟加拉的BRAC、肯亞的K-REP等）、金融公司（如哥倫比亞的Finansol）、同儕聯合的借貸團體（如孟加拉的Grameen 銀行）、信貸聯合會、村莊銀行（如印尼的BRI、墨西哥和哥斯大黎加的FINCA）或甚至成熟的商業銀行（如印尼的BRI and Bank Dagang Bali、玻利維亞的BancoSol、哥倫比亞的Caja Social、斯里蘭卡的Hatten 國家銀行）等形式。⁴⁷ 不管其法人地位如何，它們都被鼓勵去徵收利息，以支付營運和向社區中經濟活躍的成員（特別是經常向婦女小生意經營者）發放小額貸款的成本。

在專門向婦女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仲介公司中，全世界的小額信貸實踐者所累積的經驗表示，婦女比男人更可能償還貸款，更可能投資其營利所得在諸如教育、衛生和食物等發展用

⁴⁶ 此觀點更進一步的提出，見Malcolm Harper, *Profit for the Poor: Cases in Micro-Finance*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998); Jan Pieter Krahnen and Reinhard H. Schmidt, *Development Finance as Institution Building: A New Approach to Poverty-Oriented Banking*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Ledgerwood, *Microfinance Handbook*; and Maria Otero and Elisabeth Rhyne, eds., *The New World of Microenterprise Finan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1994); and practitioner-oriented publications by members of CGAP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n Women and Credit.

⁴⁷ Banco Solidario, SA (BancoSol) 是一個金融非政府組織PRODEM的分支機構，主要從事小企業的業務；可參考Amy J. Glosser, "The Creation of BancoSol in Bolivia," in Otero and Rhyne, *New World of Microenterprise Finance*, 229-50；Hatton 國家銀行在1989年開辦了一項稱為Gami Pubuduw 的小額信貸計畫，可參考"Scaling to Microfinance: The Hatton National Bank," *CGAP Newsletter* 3 (January 1997).

途上。⁴⁸ 相同社經地位的男人更可能對貸款賴帳，並將他們可支配的收入用於抽煙、喝酒、娛樂等個人消費上。⁴⁹ 事實上，最受歡迎的小額信貸的典範之一，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最初在孟加拉營運時，並沒有性別區分；然而，長時間下來，婦女證明了更少有信用風險，並開始主導孟加拉銀行團體借貸計畫，現在該模式已在全世界推廣。⁵⁰ 在這方面，收取較高的利息可以做為尋找目標群體的篩選機制。那些從事生產性投資活動以帶來收入的人更可能採用高息貸款。⁵¹ 從放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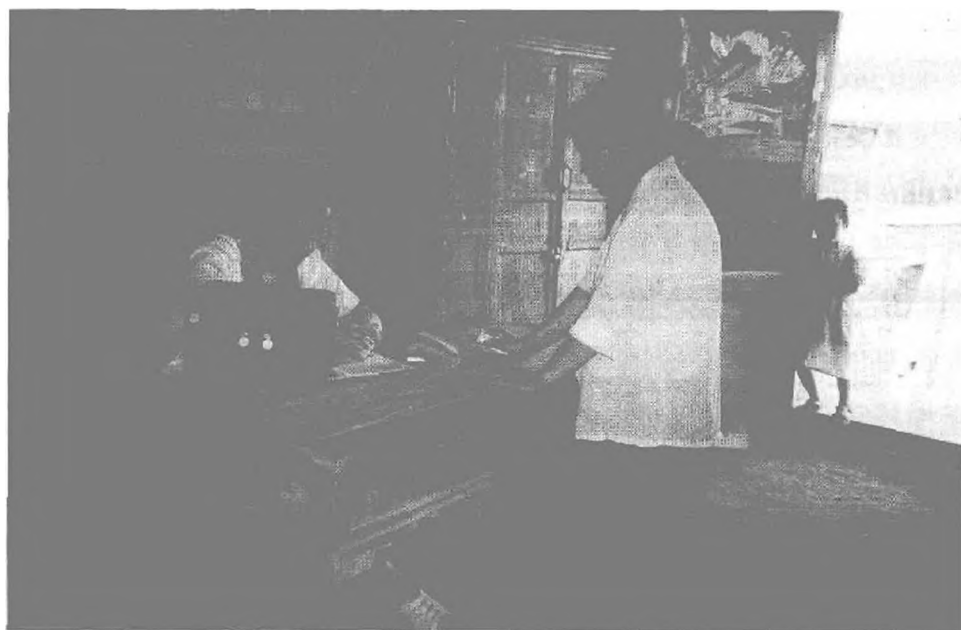
236

⁴⁸ 可參考Marguerite Berger and Mayra Buvunic, eds., *Women Ventures: Assistance to the Informal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1989); publications by Women's World Banking; and Daisy Dwyer and Judith Bruce, eds., *A Home Divided: Women and Income in the Third Worl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hich cites earlier studies (5).

⁴⁹ 我許多的訪談人也同意這一種因性別而異的投資與消費行為模式差異，包括編號第23、27、34、38、72、76、97號受訪者。

⁵⁰ David Bornstein, *The Price of a Dream: The Story of the Grameen Ba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Susan Holcombe, *Managing to Empower: The Grameen Bank Exper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ondon: Zed Books, 1995); and Shahidur R. Khandker, Baqui Khalili, and Zahed Khan, *Grameen Bank: Performance and Sustainability*,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30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5).

⁵¹ Karla Hoff and Joseph E. Stiglitz,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 Puzzle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in Hoff, Braverman, and Stiglitz,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33-52.



按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償還小額貸款。

河南南召縣羊屎溝村，1996年10月。

237 儘管大規模的國際輿論對受補貼的貸款計畫的負面影響進行了批評，⁵² 還有來自經驗豐富的捐助者和實踐者的警告，中國目前的扶貧策略正在重蹈幾十個發展中國家已經走過的老路；到1998年8月，政府在補貼的小額信貸項目上已經花了六億元（7,260萬美元）。⁵³ 利率的上限定為年息2.9%，這要比中國人民銀行的商業利率低超過10%，甚至比場外市場的利

⁵² 提倡不補貼利率最有力的小額信貸機構包括：CGAP，一個由世界銀行領導的捐助者的國際財團；以及諸如世界婦女銀行、ACCION和FINCA之類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網絡。

⁵³ 這些數據由貧困地區經濟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被引用在 Albert Park and Changqing Ren, "Micro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ld Development* 29, 1 (2001): 39-62.

率更低。有些政府的小額信貸甚至還是無息的。⁵⁴ 推行這種過時的小額信貸方式的原因是政治性的。此類資金的發放都涉及了以搞運動的動員策略建國（或許還有整黨）的一些成分，以完成定額的計畫。⁵⁵ 此外，所有由國際資助的小額信貸計畫都必須通過當地的扶貧辦公室、民政局、農業局或婦聯才能運作，即使大多數的捐贈者寧願直接地支持或成立地方的非政府組織。⁵⁶ 在發放受補貼的貸款中採取一種積極與直接的方式使得國家可以接受信貸，可以說，爲了其扶貧的行動。

與此同時，中央也明白這些扶貧行動在實施中遭遇了困難，這些困境象徵著中國在政策執行中更廣泛的挑戰。地方政府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如同在官方的《求是》雜誌上所承認的：

有些地方和幹部有時候不能堅決地與自覺地執行政策，有時甚至自行其事，採取反抗的手段以規避上級

⁵⁴ 例如，在1997年雲南省，向25個貧困鄉的七千戶發放了六百萬元的無息貸款，〈中國向農戶發放扶貧貸款〉，《新華社》，1997年12月10日。

⁵⁵ 媒體中的官方聲明稱每年脫貧的人不斷增加：1998年報導說，1996年七百萬，1997年八百萬，1998年的目標是一千萬；1999年初的一份報導說，1998年有八百萬，1999年的目標是再脫貧一千萬，可參考〈楊永哲論中國消除貧困的能力〉，《新華社》，1998年3月29日；〈中國增加1999年的扶貧預算〉，《新華社》，1999年1月29日。到2001年，中國聲稱共有2.2億人口脫貧，貧困人口降至三千萬，約占農村人口的8%，可參考〈江歡呼中國的扶貧成就〉，《新華社》，2001年5月25日；〈中國宣布主要的扶貧計畫成功〉，《新華社》，2001年5月24日，見FBIS-CHI-2001-0524。

⁵⁶ 在某些案例中，政府的扶貧貸款計畫與國際貸款計畫並存，且比後者大得多。例如，陝西省丹鳳縣推廣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運作便被官方政府的計畫擠出該地。

所發布的政策……有些地方……挪用或截留公款、支農資金和扶貧資金，於是妨礙農民獲得應有的收益。

238 若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會抑制農民的積極性，損害黨群和幹群關係，影響農村的發展和穩定。⁵⁷

確實如此，一項在1997年至1999年間進行的官方調查發現，地方官員已非法將20.4%的政府扶貧基金（相當於43億元或5.19億美元）挪作他用，包括幾個省用於平衡預算、從事「計畫外項目」、購買房地產和汽車，並偽造發票以掩蓋盜用公款的行為。⁵⁸

回到OK繃式的譬喻，有時補貼貸款專案甚至蓋不住明顯的傷口。更糟的是，由於申請「OK繃」一事本身已成為地方上爭執和仇恨的來源，它們還會造成新的創傷。這並非否認政府的扶貧計畫已經使農村的千百萬農民受益，或是鄙視中國所面臨的發展挑戰；相反地，它是要強化這種觀點，那就是中央的命令在地方上可能會事與願違。

（國家）對基層銀行體系的建設

中央與地方的動態關係能聯手以更有益於發展的方式對待正規與非正規金融業的關係嗎？我對國家干預非正規金融相當

⁵⁷ 俞雲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求是》，1999年1月1日，第1期，頁9-12。

⁵⁸ 〈中國的腐敗消耗了五分之一的扶貧款〉，《香港AFP》，2000年7月15日，見FBIS-CHI-2000-0718。

嚴酷的抽樣調查顯示，嚴謹的監督能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經指導的信貸似乎更有利於地方精英而非更弱勢的農戶。人們會想知道，是否有辦法讓國家在增加基層民眾獲得正規信貸來源一事中發揮更有效的作用？或許由於目前的政治現實和管制的無能，國家註定要重蹈錯誤的覆轍。或許國家沒有必要去處理基層的金融。然而，印度辛迪加銀行（Syndicate Bank）和印尼雷卡亞銀行（Bank Raykayat）的例子提供了相反的例證。儘管事實上兩個國家都持續在宏觀層次上面臨著各種不同的金融部門的挑戰，這些國有銀行在服務小企業主方面的相對成功，提供了一絲可仿效的希望微光。

印度的辛迪加銀行

直到1969年，印度的大型城市銀行一般是不與農業或非農領域的中小企業打交道的，主要是因為覺得這樣做的交易成本似乎是高的不可行。然而，1925年在一個偏遠地區興辦的一家農村銀行最終卻成功地發明出節約的辦法與中小企業合作——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在1969年主要銀行的國有化之後，它成功地獲得了中央銀行的支持。⁵⁹在許多方面，辛迪加銀行及其分行的工作受到發展目標的鼓舞，例如向農民及小企業主提供技術支援，建立村級的教育機構以培訓現有以及未來的銀行職工，還吸收存款。然而，這種發展導向的策略並沒有影響到銀行的盈利。例如，在1928年，一個稱為「小精靈存

239

⁵⁹ V. V. Bhatt, "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Credit Market Evolution," *World Development* 16, 2 (1988): 281-92。除非另外指出，本節的實證資料主要源於Bhatt的文章。

款」(Pigmy Deposit) 的存儲專案最初被視為一項盈利頗豐的商業服務：銀行業務員直接定期上門，到小販和農戶家中吸收存款，人們也樂意把錢存在銀行裡生息。⁶⁰ 大多數的農民和店主都是有錢可存的，但是只有少數人願意自己走到銀行去存錢。1960年，該銀行存款總額的21%來自「小精靈存款」。這個比例後來下降了，因為其他的變通存款方式增加了，還有來自模仿辛迪加銀行服務的其他新銀行的競爭。儘管如此，在1997年至1998財政年度，「小精靈存款」仍占該銀行國內存款總額的15.6%（或其全球存款總額的5.6%），而且一項準備將分行從1,632家擴展到2,000家的計畫正在運作之中。⁶¹

240 由於辛迪加銀行看來似乎從中獲利了，⁶² 眾多新銀行進入了為農戶服務的這個市場，榜樣的更廣泛涵義更在於此。而且，對待基層銀行的政策態度也改變了：在印度主要銀行的國有化之前，印度儲備銀行批評辛迪加銀行的營運不循常規，但在國有化之後，它鼓勵各銀行在農村設立分行並與小企業打交道，以拓展和加強其服務。

⁶⁰ 部分業務員貪污的風險，由於要求其在銀行保留一份相當於其回扣的10%的擔保金而減小了。

⁶¹ "India: Syndicate Bank Aims at 2,000 Branches," *Hindu Business Line*, November 26, 1998; "India: Syndicate Bank Balance Sheet Fudged," *Business Standard*, March 11, 1997; "India's Syndicate Bank Records \$6.1 Bln Business," *Asia Pulse*, June 1, 1998。根據其網頁上的介紹 (<http://www.syndicatebank.com/frame-network.html>)，到2001年6月14日，它已有1,733家分行，包括在倫敦的一家。

⁶² 辛迪加銀行也經歷了坎坷的階段——例如，1990年代初，它蒙受了損失，印度儲備銀行發現它試圖掩蓋1995年至1996年損益表上的損失；但在1990年代末，它就又再度獲利了。見"India: Syndicate Bank Needs Tough Steps," *Economic Times*, November 18, 1993, 12; Dilip Maitra, "Syndicate Bank Takes the High Road," *Business Today*, June 7, 2000.

印尼的雷卡亞銀行 (BRI)

雷卡亞銀行 (The Bank Raykyat Indonesia, BRI)，印尼的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提供了一幅更大規模的圖像，顯示一家國有銀行是如何以商業上可行的方式成功地開拓了一個看起來無利可圖的市場。它的農村銀行體系 (unit desa) 是一個領先的榜樣，表明一個國家指導的存貸計畫是如何在該國最大、最有聲譽的商業銀行之一逐步展開。援助的捐贈者、學者以及發展實踐者研究了該銀行，部分是因為它如此大規模地成功主導了專案的經營。它主要的貢獻是其宣示效應。正如瑪格麗特·羅賓遜 (Marguerite Robinson) 所說：「在地方層次上，將政府補貼的信貸發放到可盈利的金融仲介這個開創性的轉變中，雷卡亞銀行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示了，發展中國家對小額貸款的巨大需求能夠被一個以商業方式提供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機構所供應；而且，這些服務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貢獻極大」。⁶³

但是，雷卡亞銀行的農村銀行體系並不總是成功的。因做為國家政策「集中指導」(BIMAS, *Bimbingan Massal* or Mass Guidance) 的一部分，該計畫推行稻米生產的自給自足，農村銀行體系在1969年試驗性地建立，以提供農民補貼貸款。其基本理念是，每一個單位由四名雇員所組成，負責進行田野調查，以找出潛在的客戶，並確保貸款能按時償還。後者被證明很難達成，然而，儘管經營一直在賠錢，農村銀行體系網絡在

⁶³ Marguerite S. Robinson, "Leading the World in Sustainable Microfinanc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PRI's Unit Desa System,"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nuscript, November 1995), 2。以下的討論同樣取自於 Robins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41 整個七〇年代急速地擴展。⁶⁴ 做為地方銀行的農村代表，這些單位實質上是由財政部補貼。然而，當「集中指導」計畫在1983年底逐步結束時，雷卡亞銀行面臨著潛在的破產危機。當年3,600個農村單位虧損，總額達2,800萬美元，銀行考慮著放棄該體系。⁶⁵

重要的是要指出，政府提供補貼的政治經濟環境消失了。1980年代初期，由於蘇哈托政府擔心石油稅收的可能下跌（並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主張金融自由化），推行了一系列的財政和金融改革，以提高印尼非石油出口的生產力。更重要的是，國家已經實現了稻米生產的自給自足，政府認為增加私營經濟的儲蓄與投資是最優先的事；這個發展策略伴隨著試圖將國有銀行改造成真正商業銀行的改革。因此，政府不僅沒有毀掉雷卡亞銀行在基層的廣大網絡，反而試圖將其商業化。農村銀行體系被重新界定為一個獨立的核算單位或在雷卡亞銀行內部的一個「策略經營單位」；存款與貸款的利率都自由化了；在兩年的過渡期之後，雷卡亞銀行於1986年開始盈利。它成功的金融原因很簡單：農村銀行體系把存貸之間的利差設定在可以支付其營運成本的水準上。⁶⁶ 而且，實地業務員

⁶⁴ 雷卡亞銀行源自於1895年的一家銀行，並在1968年正式成立做為專責農村信貸的國有商業銀行。1970年它在全國有470個村莊銀行體系，到1984年擴展到3,626個，但數量上的擴張並不伴隨著信貸成比例的增加。見Richard H. Patten and Jay K. Rosengard, *Progress with Profi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ing in Indonesia* (San Francisco, CA: ICS Press w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1), 57-58, 62-65.

⁶⁵ Robins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

⁶⁶ 在1980年代中期，存款利率是15%，貸款利率是32%；同前註，頁66-82。

也被賦予經濟上的動機，使個人的收益與吸收存款、發放和收回貸款相扣連；在1984年推行的一套利潤分成制度之下，工作人員得到年利潤的10%做為獎金，個人的薪水也根據業績來決定。

到1990年代，雷卡亞銀行的農村銀行體系向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著名成就，贏得了國際發展社會的廣泛認可。到1996年，該體系為超過10%的印尼人口服務。而且，它還掌握著印尼存款總金額的約30%，它平均每月發放超過16萬筆的貸款，總值達1.59億美元；其銀行營運完全可以自我支持，存貸比率超過170%。⁶⁷ 雖然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同儕聯合的借貸團體模式做為最具創新性的（或許也是最成功的）小額信貸計畫之一占據了西方媒體，雷卡亞的農村銀行體系實際上規模更大（相較於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每月二萬五千位新成員與雷卡亞銀行的每月16萬多筆的貸款），並且吸收了更多的存款做為其借貸的一部分（孟加拉鄉村銀行為45%，雷卡亞銀行為170%），而且正如雷卡亞銀行的支持者所指出的，農村銀行體系不再依賴補貼。⁶⁸

242

人們可能會預期1990年代末席捲東南亞的金融危機會在雷卡亞銀行的成功經歷上留下傷心的印記。畢竟，印尼最終是該地區受到貨幣貶值、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與利率、經濟緊縮（1998年約為10%）以及政治動盪等打擊最嚴重的國家。然

⁶⁷ 1996年，平均貸款金額是1,007美元。可參考Stephanie Charitonenko, Richard H. Patten, and Jacob Yaron, "Indonesia: Bank Rakyat Indonesia Unit Desa 1970-1996," *World Bank Case Studies in Microfinance* (June 1998): 5-6, 12.

⁶⁸ 同前註，然而，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成員比起雷卡亞銀行的客戶來說，一般收入更低。可參考Morduch, "Microfinance Schism," 5.

而，雷卡亞銀行的農村銀行體系在危機期間實際上發展地更為強大。保爾·馬克奎爾（Paul MuGire）說：「存戶數目從1997年6月的1,699萬巨幅地增長到1998年3月的1,913萬，明顯地反映出一種『向優質的逃奔』」。借貸戶的數目也增加了，雖然不那麼突出，從255萬上升到261萬。最引人注目的是，農村銀行體系在金融危機高峰時期仍維持了它的高償還率：1997年6月為97.82%，1998年3月為97.8%。到2001年5月，該體系有2,670萬存款戶，償還率為99.2%。⁶⁹ 很明顯，危機主要影響的是農村銀行和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

印度辛迪加銀行和印尼雷卡亞銀行的例子表明，向基層民眾提供金融服務時，國有銀行不必然無效。而且，這些銀行雖不尋常，卻並不是絕無僅有。其他國有銀行從事小額信貸又相對贏利的著名實例，還有馬利的國家農業發展銀行（BNDA）和泰國的農業合作銀行（BAAC）。⁷⁰ 眾所周知，它們都是國有銀行，那似乎足以說明廣泛的政策環境在本質上影響著它們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能夠運作的程度（例如，職員的任命、利率的上限、額度等）。辛迪加銀行在未得到官方的庇護

⁶⁹ Paul B. McGuir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Some Implications for Microfinance," *Microbanking Bulletin* 2 (July 1998): 9-10; correspondence with Jay Rosengard, June 22, 2001。更多的背景詳情，見Richard H. Patten, Jay K. Rosengard, and Don E. Johnston Jr., "Microfinance Success amidst Macroeconomic Failure: The Experience of Bank Rakyat Indonesia during the East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29, 6 (2001): 1057-69.

⁷⁰ Siamwalla et al., "Thai Rural Credit System"，集中在BAAC的缺點上，但它也一直被做為服務面廣大的銀行榜樣，為約一百萬借戶和360萬存戶服務。可參考Joyita Mukherjee, "Strengthening Asian MFIs," *CGAP Newsletter* 5 (January 1998)。Michael Montesano 在1988年的田野工作進一步加強了BAAC在基層的正面影響（引自與作者的通訊，1999年3月28日）。

和贊同時，一直堅持它的「小精靈存款」和提供技術援助專案，但一旦出現大的政策變化（銀行的國有化），它的活動就成為「主導」。雷卡亞銀行的成功也可以追溯到具體的政策變化，雖然與辛迪加銀行的方式不一樣。雷卡亞能發展如此巨大的（雖然甚至是賠錢的）農村銀行體系網絡，是受到政府「集中指導」的稻米自給計畫的直接影響。國家在把它改造成商業銀行上，扮演了類似的工具性的角色。⁷¹ 國家對金融業的政策，並不是毫無作為的。

對於上述的例證，重要的是要指出，這些例子不能被視為金融仲介的現成模型，不加修正地就移植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正如艾林諾·奧斯多姆（Elinor Ostrom）所強調以及幾十年國際發展經驗所確認的，僅僅輸入機構的解決辦法是大有問題的。⁷² 觀察家們指出，雷卡亞的農村銀行體系迄今為止的有效性，在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特定結合。⁷³ 首先，如前所述，政府為興建網絡提供協助，後來又使農村單位商業化。對該計畫有系統的政治支持非常重要。第二，雷卡亞在一個宏觀經濟相對穩定的時期發展成熟。若是在1960年代中期極度通貨膨脹的環境中，試圖興辦農村銀行體系將會難於上青天。

⁷¹ Cecile Lapenu, "Indonesia'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orld Bank Microfinance Case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ustainable Banking for the Poor, May 1998); March 1999.

⁷²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f. Timothy W. Guinnane, "A Failed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Raiffeisen's Cooperatives in Ireland, 1894-191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1994): 38-91.

⁷³ 可參考 Patten and Rosengard, *Progress with Profits*, 91-103.; 以及 Robinso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23.

第三，地方經濟的空間及社會組織一直有助於有效率的金融中介。農村銀行體系在人口稠密、相對有社會凝聚力且為同族的爪哇和巴厘島興旺；⁷⁴ 於是，農村銀行體系的工作人員就能夠依靠既存的社會網絡（包括他們自己的網絡）來辨別和篩選潛在的客戶。辛迪加銀行的工作人員可能要走很遠才能到達客戶，而農村銀行體系的工作人員就住在當地。

244 雷卡亞銀行成功的這些條件之中：政治支持，經濟穩定與社會鑲嵌，很明顯地中國缺少一個關鍵的因素：對基層獨立的、商業上有活力的金融機構的政治支持。中國已經有了一個農村機構的網絡：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這為更大的拓展和商業化提供了可能性。⁷⁵ 到1998年，全國約有五萬家農村信用社（約相當於正規金融體系總存款額的12.7%和總貸款額的10%）。⁷⁶ 農村合作基金會（數量超過一萬八千個，為五百多萬存戶服務），但因為它們是由農業部創辦的，並由村、鎮經營，中國人民銀行從不承認它們是合法的金融機構。⁷⁷ 做為整頓金融體系的全國性運動的一部分，1999年3月，中

⁷⁴ 這當然過於簡化了其相似性。在1950年代所做田野研究的基礎上，Clifford Geertz觀察到爪哇島上有一個華人商業群體，該島還有與游走的小販有個人的經濟交往的傳統；而巴厘島社會更有群體的性質，其經濟也更是傳統政治等級制度的派生物。可參考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⁷⁵ 就中國如何能向BRI學習以利農村信用社更好地服務鄉鎮企業一事上，見Woo, "Improving Access to Credit in Rural China."

⁷⁶ 〈銀行官員表揚農村信用社的作用〉，《中國經濟資訊網》，1999年1月14日。

⁷⁷ 就部分省份農村合作基金會崩潰一事，見Carsten A. Holz, "China's Monetary Reform: The Counterrevolution from th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27 (2001): 189-217.

央銀行宣布為農村信用社注入150億元（18億美元），以增加向農民發放的優惠貸款。⁷⁸然而，國務院同時宣布關閉經營不善的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並由農村信用社接管經營較好的農村合作基金會，此舉引發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廣西和重慶等至少六個省市農民的抗議。⁷⁹中央並沒有讓農村合作基金會接受更嚴格的管制，而是選擇了拒絕管制和乾脆取締的辦法，因此（雖不是有意地）釀成了農村新的不滿。

所有這些複雜的現實都豐富了這整個故事。雖然地方上金融的制度供應限定了私營企業主現存的選擇範圍，但供應本身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就像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一樣。增加機構供應和當地發展戰略的變動現實是，沒有哪一個地方政府對私營金融業有一致的立場。國家的各個部門可能會侵入銀行官僚體系的領域，留下一串配合不當的足跡。

為什麼政治學要關注國家金融領域內不當配合的足跡呢？我認為，無論在中國還是中國之外，非正規金融在政治上舉足輕重有三大原因。首先，大量經濟上活躍的人口可能會從事危及國家控制信貸分配的金融活動。第二，非正規金融實際上可能補充了國家的發展目標。第三，非正規金融可能會破壞穩定，並引發國家的干預。這三個原因結合在一起，就表示國家繼續使其要麼以政策指導的方式行使其管制權，要麼做出遏制

245

⁷⁸ “Central Bank Gives Farmers \$1.8B Spending Boost,” *FP*, March 22, 1999；以及與福特基金會（北京）項目官員Stephen McGurk的通訊，1999年3月28日。

⁷⁹ 〈中央銀行官員就銀行金融業風險管理一事接受採訪〉，《中國黨政幹部論壇》，1999年2月6日，第2期；見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March 19, 1999; “China Closes Credit Coop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2, 1999; “Over 1,000 Investors Protest Closure of Credit Cooperative in Hubei,” *FP*, March 23, 1999.

市場發展的反應。僅僅禁止非正規金融業極少能長久奏效。非正規金融業的發展動態依靠的不僅是簡單的供給與需求的經濟邏輯；它還有一個政治及社會的邏輯，這就是為何似乎簡明易懂的經濟政策可能會產生非預期的政治及經濟後果的原因。

第七章

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

山高皇帝遠。

246

——中國傳統諺語

如果地方基層組織堅強有力，我們就能妥善地貫徹中央政府的原則和政策，並結合地方政府完成上級所規劃的工作，喚起群眾的熱情，指引、保護並領導群眾去共同致富……基層政權直接面對群眾，因此加強基層幹部建設並確保適當地安排他們是極端重要的事。

——李嵐清，國務院副總理，2000年

大多數的國家都有自己的地下金融業者，他們填補了由正規銀行體系所造成的市場空隙，而且這些灰色區域的大多數金融行動者相對不被注意地從事其日常的經營——那也就是說，直到一場全面性的金融危機的高潮引起官方的關注之前都是這樣。信貸互助會、當舖、後街錢莊的經營者一般都避免在政治上公開的對抗；那樣對生意不好。但在市場不完善、產權模糊不清的國家裡，金融企業主也必須是政治企業主。同理，私營企業主做為金融企業主的主要客戶，也需要和鄰里放高利貸者要生存一樣，得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機敏靈巧。

中國非國有經濟驚人的增長表明，總的來看，私營經濟行動者明顯成功地達成了做生意所必須的政治交易。裝飾著霓虹燈的零售店已經搬進了過去陰濕的水泥廠房，以前這裡是蘇聯式機器運作之處；燈光耀眼的百貨公司和迪斯可舞廳在千年的稻田中湧現。然而，在這些可見的繁華背後，是小販為獲取短期流動資金而典當資產、半私營銀行登記成社會慈善機構和其他的場外市場應對機制。將這些真相放在一起，挑戰著傳統關於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觀念。

首先，從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的成功所得出的開明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並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中國驚人的經濟表現。私營企業主已設法建立了精心設計的、範圍廣泛的金融機制，表明中央的國家能力的侷限。非正規金融業違反了一系列監管的制度和國家銀行法規。而且，有些地方比別處存在著更為發達的場外市場，此一事實也表明了地方政府在形成基層經濟成果方面的重要性。在改革的頭20年間，各地沿著不同的發展軌道演變，這反映在地方政府對待私營經濟及其金融機制的態度上。此外，即使在私營經濟主導的地區，地方政府也不是以統一的「發展」方式來對待企業主。根據定義，一個發展型國家不應有掠奪性的行為。訓練有素的官僚們不應該搶掠生產市場。他們也不應該出於個人私利的考量濫用其職權，讓非正規金融業者戴上令人可憎的「帽子」。

第二，中國的經濟奇蹟挑戰了**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強調的是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產權的重要性。它認為，一個產權不清晰的國家不應該激發出私營經濟兩位數的發展速度。在缺乏明晰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權利及責任的法規的情況

下，場外市場的交易不會出現，更不會繁榮。與之相關的是，如果私營企業主確實是一心只想要賺錢的話，他們也不會借錢給沒有資產的文盲朋友。

然而，不但不應該因此就說中國和中國的企業主「不合邏輯」，如果人們尊重這兩種流行理論的完整性的話，正確的結論應該是，人們必須接受國家的多重現實，以爲其經濟成長做出一番不同的敘事。最終，私營經濟增長和非正規金融業的歷程依靠一種我稱之爲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local logics of economic possibility）。非正規金融業的產生，涉及了以各種方式動員政治及社會資源；這些方式超越了國家所設立的限制，並從日常生活的原料中創造出經濟生存（如果還說不上財富的話）的可能性。

一個發展型的國家？

在1980年代，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做爲取代新古典經濟學 248
對東亞增長解釋的替代觀念而產生。對日本、韓國和台灣的詳盡研究披露出，經由產業政策（例如優先發展）、指導的信貸計畫和壓制勞工的三管齊下，國家在各國戰後經濟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¹ 在這些國家的經濟中，謹慎從事的國家干預促進了而不是如新古典經濟學家預期的那樣壓抑了增長。² 眾所周

¹ 見第一章註17的引文，以及Frederic C. Deyo,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² Bela A. Balassa,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然而，一些經濟理論確實關

知，全世界社會主義指令經濟的經驗已經產生了不理想（如果還不是毀滅性的話）的後果，發展型國家的主張引起爭議之處在於，在某種情況下，國家的官僚機構是否可能有韋伯式（Weberian-style）的效率和自我約束。³ 在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這些特殊的條件包括了精英領導的公務員系統、國家與大企業之間合作或「鑲嵌」的關係、訓練有素且積極的勞動力，而且，至少在初期的幾十年間，還有一個威權主義或國家統合主義的政權。⁴ 再加上國家對經濟的策略性干預，其最終結果就是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

從1970年代末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在經濟自由化上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而且總的來說，中國也有大量的增長。因此，可以理解，有些學者把中國視為發展型國家，或至少是一個朝向相似的由國家指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演進的國家。⁵ 更確切地，在鄧小平時代，官僚機構的任用變得更為精英領導，而不那麼講究政治及意識形態。中國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以管制集體和私營企業；建立了經濟特區；教育機構經過十

注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潛在的積極作用，見Juhana Vartiainen, "The Economics of Successful State Intervention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234.

³ 然而，在日本與韓國所爆發的腐敗醜聞的顯示，發展型國家事實上從來也不像當初所想像得那麼公正、有道德。

⁴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f. Andrew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⁵ 參見第一章註12的引文。對於「毛澤東式發展型國家」失敗的討論，可參見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93).

年的衰敗又恢復了活力；在重要的部門，物資的價格仍是補貼的；國有銀行仍向戰略產業的大型企業發放「政策性貸款」；整體來說，國家更傾向技術官僚化。除了以銀行貸款支撐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這個主要的例外，上述各項都表明中國對經濟所採取的國家干預可能是積極正面的。

然而，認為中國是個發展型國家的最有趣的（如果不是完全有說理力）理由，是中國尋求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在1989年的危機之前，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辦的研究機構中的知識分子積極地辯論著中國仿效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式的得與失。⁶ 被其鼓吹者稱為「新權威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的主張是，中國需要歷經一個轉型階段，在指望它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化之前，應該有一個強硬的政府和溫和的經濟。⁷ 諷刺的是，1989年動亂之後的政治壓制有效地壓制了關於新權威主義的公開討論。儘管如此，江澤民政權中的統治精英們認為，對於中國這個發展階段的經濟成長來說，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必不可少的。⁸ 在公開的論述

⁶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f.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⁷ Stanley Rosen and Gary Zou, eds., "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winter 1990-91, spring-summer 1991; Barry Sautman, "Sirens of the Strongman: New-Authoritari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72-102。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知識分子論及了杭廷頓的著作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此書已於1987年被譯成各種中文本。

⁸ 論述江澤民如何尋求把中國從一個列寧式的黨國改造成「發展型的專政」，參見Bruce Gilley, *Tiger on the Brink: Jiang Zemin and China's New*

中，國家將自己界定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型國家，並以穩定和繁榮的承諾來為其對政治活動的壓制行為辯解。

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儘管缺少其發展型鄰國的一些特徵，如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統治精英中的共識，經濟改革進程所達成的政策凝聚力，還有在國家指導的發展之前就部分私有化的經濟等。⁹ 然而，我認為，把中國定位成一個發展型國家的主要限制，在於「國家」在實踐中並不做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指揮了20多年的驚人的經濟成長，但在地方層級，實際運作的官員在解釋中央的政策時有相當大的空間。各地在政治經濟條件上的巨大差異，部分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意願的偏離。雖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平衡和結構隨時在波動，地方上掌握著不同的資源、有著不同的動機，也各自不同地執行著國家的政策。

將中國視為發展型國家的一個補救辦法，是說明發展型的表現下存在著地理上的差異。或許存在著等級層次：夏明聲稱中國實際上有著「雙重發展型國家」(dual developmental state)，在中央發展型國家之下還有著地方的發展型國家。¹⁰ 而即使中國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的政治體制，中國學者確實辨認出地方發展型諸國。首先，一些具體部門的研究已經把地方工業部門（包括皮件、汽車、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成就歸功

El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⁹ Shaun G. Breslin,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17, 4 (1996): 689-706.

¹⁰ Ming Xia, *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hina's Transition* (Brookfield, Vermont: Ashgate, 2000).

於地方政府的「優先發展」策略，給這些產業減稅與優惠貸款。¹¹ 第二，在毛時代有著強大社隊企業基礎的地方政府，1980年代時似乎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1990年代時又以發展型的方式將其私有化。¹² 第三，即使關於早期私營經濟增長的溫州模式研究尚未把它界定為發展型，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確實促進了私營企業，這從它們在1980年代願意給它們發紅帽子，並允許例外的金融活動上可以得到確證。

上述的例子能夠為解釋經濟成長的詞彙中接受地方發展型國家的概念提供一個基礎。然而，對這種現象，我通常歸結為「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對私營經濟的態度，而不是「地方性國家」(local state)的態度，因為後者將不同種類的機構混為一談，視之為鐵板一塊的一個複合體。工商行政管理局可能與人民銀行衝突，人行可能與農業辦公室衝突，農業辦公室可能與婦女聯合會衝突，等等。將地方性國家的概念具體化，會遮掩這些潛在不一致之處。然而，它們正是非正規金融業得以滋生繁榮的縫隙。

除了術語在分析上的侷限，將地方上的「國家」標定為「發展型」也有問題。首先，早在該術語用於中國之前，發展

251

¹¹ Marc Blecher and Vivienne Shue, "Into Leather: State-led Develop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Xinji," *China Quarterly* 167 (June 2001); and Eric Thun, "Changing Lanes in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1999"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Cf. Adam Segal and Eric Thun,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29, 4 (2001): 557-88.

¹² 戴慕珍稱這種模式為「地方性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因為在這種模式中，鄉、村政府像一家單一公司的董事會一樣行事，可參考"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World Politics* 45, 1 (1992): 99-126.

型國家的概念就傾向於由其建設性的經濟結果來界定。經濟成長率驚人的晚期發展中國家（當其成長持續時）就被譽為發展型的；當其落後時，則被診斷為「脆弱」（weak）、「掠奪性的」（predatory）、「貢奉性的」（prebendal）、「世襲的」（patrimonial）、「顛倒的」（inverted）或其他種病態。¹³ 只有發展型國家和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成熟資本主義才能與繁榮相聯繫，因為醜化貶低的標籤總是歸納性地用於那些經濟混亂的國家——即使某些快速增長的國家也有世襲的或其他非理性的法律品質。

除了重複地使用發展型國家的框架外，一個更深層的缺點是，這個概念掩蓋了發展的動態過程，長時間下來，可能會變得日益問題叢生或不可持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精明節儉的發展型幾乎是一夜之間就被重新闡釋成用人唯親、家族裙帶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曾將此概念用於其專門研究國家的大多數學者都會同意，實際上，對更緩慢的發展中國家的觀察家們來說，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從來不像看起來的那麼有道德。快速的成長是以民眾有限的政治自由和被壓低的工資為代價的。即使查莫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他的研究啟發了整個研究議程，也承認了產業政策的混合影響：「國家可以建構市場的動機以實現發展的目標，正如日本的例子清

¹³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Joshua Forrest, "State Inversion and Nonstate Politics," in Leonardo A. Villalon and Phillip A. Huxtable, eds., *The African State at a Critical Junctur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8), 45-56; Richard Joseph, "Class, State,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221, 3 (1983): 21-38; and Joel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楚地顯示，但是它也能以犧牲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而自利其親友」。¹⁴ 同理，時間一久，將優惠的信貸選擇性地提供給實業界的成功者就變得逐漸成為問題。¹⁵

發展型國家可能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如韓國的經驗所示，由於勞工日益好鬥、工業資本減少對國家的依賴，或許還有來自被社會所滲透的官僚機構內部想減少國家干預的要求，成功的發展型國家可能會自掘墳墓。¹⁶ 或是（根據國家中心派理論家們更一般的觀察）「不管最初是否自主，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長時間下來，會導致國家自主性的降低，並減少國家採取前後一致行動的能力」。¹⁷

252

我認為，正是由於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包括著相互矛盾的現象，將它應用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在分析上並沒有益處。宣稱蘇南或溫州模式是發展型一說頗有誘惑力，因為地方政府確實促進了非國有經濟，但這些地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門卻明顯地以非發展型的方式行事。例如，在幾個有可能是發展型的研究地點，街道居委會的官僚機構就對私人小販騷擾和隨意地勒索罰款。¹⁸ 若明顯地發展型的地方性國家也可能有掠奪人的爪

¹⁴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48.

¹⁵ David Kang, "Bad Loans to Good Friends: Money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Ko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1 (2002): 179-209.

¹⁶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229.

¹⁷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54.

¹⁸ 對於社會服務機關中低階的雇員如何面對巨大的壓力和裁量權，可參考Michael Levitsky,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3).



街對面的生意好些嗎？福建省惠安縣，1996年11月。

牙，那麼發展型的術語就是誤導人的。而且，即使在以緊密的政商關係著稱的地方，也可能不是真正的發展型。在推行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的地方，到了1990年代日益明顯的是，地方當局並非總是推行促進地方經濟的政策。有些地方政府積極地阻撓私營經濟的發展，以保持自己對集體企業的控制；在其他地方，政治精英們用集體企業改制成股份合作企業的手段做為藉口，將集體財產化為私人所有。¹⁹ 這種行為看起來更像是彼得·伊萬斯（Peter Evans）稱的「竊盜的世襲財產

¹⁹ Sally Sargeson and Jian Zhang,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a Hangzhou District," *China Journal* 42 (July 1999): 77-99; and Susan H.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主義」(klepto-patrimonialism)，或更簡單地說，就是掠奪。²⁰

稱中國是一個發展型國家的困難還在於，它明顯地有別於已辨認出的地方性國家變種的其他研究。在發展型與掠奪型國家的兩個極端之間，研究中國的學者為地方性國家起了一大堆分類的標籤：「企業家式」(entrepreneurial)、「有助於市場的」(market-facilitating)、「侍從式」(clientelistic)、「管理的統合主義式」(managerial corporatist)或「癱瘓的」(paralyzed)，²¹更重要的是，有些人指出，它們並不相互排斥。例如，一個發展型國家也可能是「企業家式」的；有些地方政府將管制職能行使的相當好，但也兼職從事盈利的生意。²² 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企業主式與發展型的特徵相結合，產生一種「有助於市

²⁰ Peter Evans, "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 *Sociological Forum* 4, 4 (1998): 561-87.

²¹ 分別可參考 Marc Blecher, "Developmental State, Entrepreneurial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Reform in Xinji Municipality and Guanghan County," in Gordon White,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and Jane Duckett,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Real Estat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s in Reform Era Tianjin* (London: Routledge, 1998), 273; Jude Howell, *China Opens Its Door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3); Gregory A. Ruf, "Collective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 Sichuan Villag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nagerial Corporatism,"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7-48; and Kevin J. O'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2 (July 1994): 33-60.

²² 如 Duckett 所解釋的：「由於國家企業主義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 指的僅是國家活動的一個面向，它也許存在於發展型的地方政府之內。政府可能配合促進發展型的和基礎設施的計畫，同時仍然允許個別部門經營生意」。可參考 *Entrepreneurial State*, 173.

場的」國家。²³ 但企業主式與世襲的特徵相結合，產生的是「分贓的社會主義」國家，意味著一種腐敗的國家。²⁴ 因此，
 254 我並不同意為中國的中央國家和地方國家貼上越來越多的分類標籤，²⁵ 或偏好單一的解釋；我發現，承認多種政治經濟模式在基層並存，並專注於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出現的會更有成果。

地方發展中路徑依賴的多樣性

在本書討論過的18個地點之中，某些路徑依賴的發展模式可以被辨識出來。「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意指著既存的資源和制度影響著行動者在任一特定時間點所面臨的選擇的相對特點及便利。²⁶ 我使用這一個術語並不是決定論式的運用，而是與大衛·斯達克(David Stark)和拉茲洛·布魯茲(László Bruszt)的觀點相一致，他們認為：「過去可以為現在

²³ Howell, *China Opens Its Doors*, and Shu-Yun Ma, "The State, Foreign Capital,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5, 3 (1999): 54-79.

²⁴ Xiaobo Lu, "Booty Socialism, Bureau-preneur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2, 3 (2000): 273-94. Cf. Paul D. Hutchcroft, *Booty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in the Philippin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⁵ 對於區分企業主式的、侍從式、掠奪式和發展型等各類國家的分類，可參考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hl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4-60.

²⁶ 在此案例中，「行動者」指的是地方政府和各機關的地方單位，還有私營企業主。

的變革提供制度上的資源」，相對於依賴理論的衰退觀點（involutionist approach）認為「過去是現在的累贅」。²⁷的確，我研究過的所有地方，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變化巨大，甚至在我田野調查的1994年至2001年之間也是如此。有些變化主要反映了中央政策的改變，包括1984年開始的城市企業改革、1988年認可較大型的私營企業、1989年的政治危機、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1994年的財稅改革、1995年的商業銀行改革、1997年的國有經濟改革、1999年農村合作基金會的關閉，再加上同年的憲法修正案通過對私營經濟提供更強大的法律保護。

然而，在處理為私營經濟服務的非正規金融業上，各地的官員與企業主對這些中央政策有著相當不同的反應。即使在某一省內，場外市場的範圍與規模也有很大差別，這些差異可以回溯到毛時代的政治經濟條件，那時留下了不同的資源和可能性。²⁸正如前蘇聯集團國家以不同程度的工業化起步，影響了它們自1989年至1990年以來各自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國各省市單位的情況也是如此。²⁹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些地方因農村分田單幹釋放出過剩的勞動力，所以很樂意能夠興辦自己的非國有經濟。這樣的政府是相對地支持私營經濟發展的，

255

²⁷ David Stark and László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ov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²⁸ 關於改革開放時代中產權安排變化的路徑依賴的主張，見 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²⁹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Vedat Milor, ed.,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Priv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and Reforming Communist Stat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4), 115-46.

地方官員可以忽視私營企業主違犯國家法令的行為，或甚至主動地找出法律上的漏洞以方便新的商業活動。這些政府多是位於1949年以前就存在某些商業、但因其地理戰略區位或政治敏感性而在中共治下遭受冷落的地區。雖然溫州和泉州在許多方面不同，但它們可以做為這種發展軌跡的例證，先是都有相對發達的商業，接著在中共治下衰敗，而後又有私營經濟的發展。

相對地，繼承了大量國有企業的地方政府願意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促進經濟的成長，但同時又受到挑戰的限制，一是要維持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二是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要應付不滿的工人。在這些工業化的地區，政府對私營經濟的發展一直抱著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由於地方官員的發展優先權受到他們得對付的工人的限制，私營企業主有時候要為初涉市場經濟並肩共存的國有企業付出高的財稅代價。儘管如此，如在河南省的工業城市所見到的那樣，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急於撈取發展非國有經濟並支持其例外的金融機制的好處。

第三種地方政府可能對私營經濟採取的態度，可以最恰當地稱為不支持。至少有兩條路徑導致了這種態度。第一，有些地方在毛時代發展了強大的社隊工業，這意味著當公社轉制為鄉政府、生產大隊改為村時，公社時代的許多權力關係和機構繼續塑造著經濟生產和群眾動員的方式。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這些地方政府樂於發展集體經濟，因為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需要一種如果不是侍從式的也是密切的關係。與私營經濟缺乏支援相關的第二條路徑，是由那些在毛時代就貧困且環境惡劣，而後不是停滯就是惡化的地區所採用的。在這些地區，政府可能對私營的營利活動採取寬容的態度，但當地幹部和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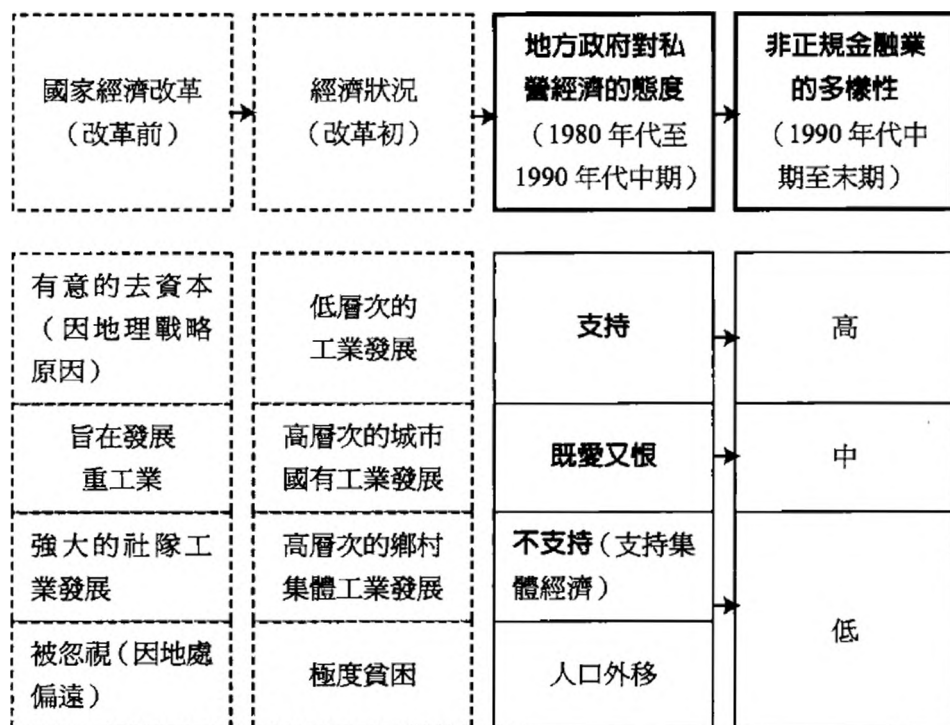


圖 7.1 各地非正規金融業的路徑變化

多把永久性的外移視為逃避貧困最便捷的手段。

還可以劃分出更精細層次的發展路徑。例如，海外華人和外國資本的相對可獲得性、基層的社會關係結構（例如，單姓村的親族關係）、地方上的族群組成（漢族為主的地區或是族群多元的地區）、重要的歷史經歷等都影響著基層當代的經濟動態。圖 7.1 中總結了發展的路徑，記錄了我在田野調查中所觀察到的非正規金融業的基本變化類型。

我將不用這些觀察和路徑來分類地方性國家成固有的發展型、掠奪型、企業主型、侍從型或是用連字符號組合起來的這些名詞的雜燴。當我們在繁榮的地區會見地方官員或大型私營企業時，地方性國家似乎是發展型的。當我們與農民和小販在

257 狹窄的小路上交談時，地方性國家似乎是掠奪型的。當我們看到一個政府智庫興辦一家信用社時，地方性國家看起來像企業主式的。當我們發現工商行政管理局頒發營業執照給一位雄心勃勃的放貸者，地方性國家看起來是發展型的或侍從型的。然而如果此營業執照辦下來要比別人花的錢更多，那麼地方性國家就像是掠奪型的。我對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態度的分類，只是用來代表非正規金融業創立及生存的整體環境狀況。支持、模稜兩可和不支援這三種簡化的描述性分類，指的是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進而對非正規金融業事先就存在的偏好。

到了改革開放頭20年的後期，絕大多數的中國私營企業主仍然依賴自我籌措資金，雖然在全國各地的程度不同。³⁰ 總體經濟統計資料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做為一個整體正在中共統治下私有化；但在實際上，大量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私有化的真相是，地方精英正在推行名義上的企業改革，並沒有真的取消他們在地方經濟中個人的利益。在這些地區，真正的私營企業仍在逆境中掙扎。在北京的合法且合理的發展型國家一直並沒有透過政策貸款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相反地，當國有銀行試圖救助國有企業時，某些地方政府卻操縱當地的資源和國家的法令以允許其他的金融模式。儘管中央一直要求做到管制上的一致，然而在實踐中，貫穿全國的發展型軌跡並不存在。北京制訂的法令一到了基層，就有了極為不同的意義與內涵。企業主與地方政府之間共謀在金融合作上的特定表現，以為私營金

³⁰ 1999年，國際金融委員會和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北京、成都、順德和溫州的私營企業進行了普查（樣本數為628），發現90.5%依靠自我籌措資金。這與我自己調查中的發現是一致的。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China's Emerging Private Enterprises: Prospects for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00).

融精心打造偽裝，在事先就存在的當地資源與發展偏好上是極有可能出現的。

經濟成長的地方邏輯

如果我們接受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動力存在於國家以下各省市縣層次的看法，那麼，問題仍在於在缺乏穩定的產權下這是如何發生的。一個產權明晰的體系是國家繁榮所必不可少的觀點的關鍵，在於經濟行動者（包括企業主、投資者以及消費者）需要確認他們的經濟交易是被法治所保障的；否則，獲取、使用和轉移資產的風險將會非常地高。正如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和羅伯特·湯瑪斯（Robert Thomas）所解釋的：「個人必須受到獎勵的誘惑才會去承擔合乎社會需求的活動……如果私人成本超過私人收益，個人通常是不會願意從事此活動的」。³¹ 根據這種觀點，產權減少了收集資訊的交易成本；減少機會主義者的逃避責任；還能使日常的人們做出互相可信的經濟承諾。³² 在功能健全的市場經濟中，國家充當契約的最終第三方強制實施者，這樣，所有涉及的當事人都相信違反契約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這種制度適合願意減小不確定

258

³¹ Harold Demsetz,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2 (1967): 347-57; 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3.

³²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1960): 1-44;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風險而致力於極大化利潤的個人。

那麼，產權界定不清的國家如何能增長的這麼快呢？學者廣泛地從鄉鎮企業，做為整個1980年代鄉村工業化的基礎，是如何在沒有明確的私有化條件下產生，檢視這一個議題。³³ 其他的人將高成長率的頭20年視為藉由動員農村剩餘勞動力為過去失去的彌補與追趕。他們認為，由於改革開放所採取的漸進主義途徑（與波蘭和俄國的自由市場休克療法相比）所造成的扭曲，中國的成長注定會減緩。³⁴ 然而，我的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是私營經濟本身在無法取得正規信貸來源的情況下，到1990年代末如何能夠擴展到占中國GDP三分之一的地步。如果答案的一大部分，如我所言，是來自非正規金融業，那麼進一步要分析的問題就是，在大多數案例中，非正規金融業如何能在缺乏生存的法律權利的情況下存在。企業主一直在一種尷尬的情況下經營，那就是私營經濟雖然合法，但大多數私營的金融來源卻不合法。

259

本書提出了兩個相互補充的命題，來解釋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產生和堅持。首先，**非正規金融業源自於地方的積極主動**。私營企業主沒有坐待國家來合法化其私有財產或明晰其產權。他們也沒有坐等國有銀行來清理其帳本並向一個新興、潛在的信用可靠的市場提供貸款。取而代之的是，企業主們走在

³³ Oi and Walder, *Property Rights* (3-4, nn. 9-13, cite other explanations).

³⁴ Jeffrey D.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994): 102-45; cf. Chong-En Bai,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Thriving on a Tilted Playing Field: China's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the Reform Era,"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Working Paper, No. 856,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2001.

前頭，根據實際上的需要和機會主義，拼湊出各種各樣的金融機制。他們在購買原料、建立存貨、投資於固定資產的正常過程之中做了這些事。

第二，非正規金融業依賴地方的政治保護和社會的強制實施。非正規金融業通常能起作用，是因為它衍生自當地界定和實施的遊戲規則。全國各地的私營銀行都穿戴著偽裝，因為地方政府機關願意容忍各種不同的偽裝技術。任何想要公開經營的私營金融機構仍然必須登記成某種形式的企業或社會組織。能出示一份營業執照，就意味著地方政府的某個部門已經批准了它的經營。然而，多半的情況是，「規則」並沒有寫在契約的條款中，或甚至沒有系統地加以規定。這些規則在日常的交易中演進和強化。不管實用或不實用，它們都變成了習慣。³⁵除了需求和機會主義的刺激因素之外，許多場外市場交易之所以奏效，是因為一種社會義務感——而不是違約賴債或拒絕貸款一定會導致懲罰性的法律後果。因為大多數非正規金融業的形式在開始時是非法的，索取過高利息的放貸者已經是違犯國家的法令，所以爭取官方的幫助只能是自投羅網、自我毀滅的選擇。然而對於債務人來說，對場外市場交易的背信棄義就可能帶來持久的個人後果，這成為了遵從契約條款的強大動力。

在這方面，非正規金融業的地方邏輯為新制度經濟學增添了另一個反直覺的面向，因為激勵或強制實施的機制都不是純粹經濟上的。企業主們面臨著信貸的金融需求，而涉足場外市場比試圖從國有銀行取得貸款有更低的交易成本，雖然有些企業主是在缺乏明顯的物質利益的情況下參與非正規金融機制

³⁵ 這與Pierre Bourdieu對慣習(habitus)的見解相呼應：*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回族老嫗不識字，女紅猶嫻熟。河南省鄭州，1996年8月。

260 的。場外市場的交易根植於人際和社會規範的網絡之中，此網絡要比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經濟行動者所接受的理性主義模式更為豐富。有時候，人們參與信貸互助會僅僅是因為他們受到親戚、鄰居、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之邀而加入。

場外市場機制這種時常是社會性的基礎，正是它們在缺乏法律認可及官方第三者強制實施的情況下，通常能夠合理地良好運作的原因。它們是自治的，因為它們依賴互惠、信任或其他社會慣例的規範。³⁶ 在許多案例中，地方網絡和共享的認同
261 對場外市場的債權人和債務人施行更強的懲戒性權威，這要比

³⁶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北京發布、省城學舌的嚴厲詞句的管制更為強大。一旦涉及「面子」，金融上的債務人可能是社會上的債權人，但是沒有人曾經把這些用文字寫下來。可以這樣說，清楚地將其寫進契約，反而會減小其實際的威力。世界上指令式的集體社會救濟制度徹底地失敗。是非正規的社會機構，而不是正規的政治機構，管制著基層的金融；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和習慣制約著交易，彷彿它們是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之下受到保護。它們產生了企業主要興辦和資助其企業的希望，如果不是必然的話。的確，企業主本身經由每日的互動參與了這些規範性劇本的設計和再設計。³⁷ 弔詭的是，企業主和地方官員利用正規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確定性，創造出提升地方繁榮潛力的非正規金融機構。對雄心勃勃的企業主來說，不確定性的另一面就是靈活性，更樂觀地說，就是可能性。

這並非意味著非正規金融業總是有效率的、可靠的，或是與其他的正面效果相關的。非正規金融業通常只有在它從事生產性——而不是投機性——的營利活動時，才會有用。而且正如在前幾章所示，外來的震盪，例如管制環境的改變（例如，掃除非法金融機構的政治運動），會干擾場外市場的穩定性。

一個過渡的現象？

眾所周知，中國仍處在「並非由詳盡計畫而導致成長」的

³⁷ 民族學方法論者特別強調日常的互動如何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問題。可參考Harold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過程中，³⁸ 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觀點，即本書所描述的各式各樣的非正規金融機構僅僅只是一個過渡的現象。或許某些地方存在著特別廣泛的各種金融機構，因為它們仍在歷經地方場外市場競爭的形成時期。或許持續的競爭會促進組織上的整合，並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減少機構的形式。組織社會學家認為：

262

在激烈的競爭中，組織採用有效率的結構和行動，或是與較能適應的對手相比更冒失敗的風險。制度環境通過社會壓力塑造組織，並導致制度的同型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中的組織，隨著它們面對相同的管制和規範性的壓力，或是隨著它們模仿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成功的組織所採取的結構，便開始彼此相像。³⁹

換句話說，在原型的自由放任條件下，達爾文學說的優勝劣敗的競爭邏輯可能會排擠掉低效率的組織。然而我卻認為，非市場行動者（例如負責管制的國家）的存在，改變了遊戲場上的規則。如果制度的同型性確實從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出現，它並不一定出自於競爭的優勝劣敗的邏輯，而是因為公開經營的金融機構會受到國家的管制。制度形式上的趨同，是由法律命令所造成的，而不是兇殘的競爭。

³⁸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⁹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H. Hamilto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East Asia," in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61-62.

然而，在非正規金融領域內，卻沒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仍然地下經營的機構會彼此相像。事實上，只要在大的政治環境中結構上造成的競爭存在，金融機構的多樣性就會持續下去。這樣的發展動態並非中國所獨有。華特·鮑威爾（Walter Powell）在美國的脈絡中觀察到：「多重層次的政府——聯邦、各州和地方——和不同種類的政府部門爭奪著控制權，並提供了不同的管制和誘因。相互矛盾的壓力和重疊的管轄創造了組織上的異質性和複雜性」。⁴⁰ 官僚機構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的競爭，不僅未能給各種可能的組織形式劃分界線，實際上還可能造成更多的制度多樣性。

另一個關於中國非正規金融業的潛在過渡本質的討論，是銀行體系的合理化最終會消除社會對場外市場金融業的需求。這部分是一個長期以來正規金融體系如何排斥異己的經驗性問題。其實，只要人口中一部分的經濟活躍者（小商人，由少數族群或婦女所興辦的企業）在結構上仍受到獲取官方信貸來源的限制，非正規金融業就可能會繼續下去。即使其他國家的比較證據顯示，如果經濟行動者能不受限制地獲得官方認可的金融機構的貸款，非正規金融業在他們之中就不會那麼普遍；但是還很明顯的是，僅僅有信貸的可用性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減少對場外市場的依賴。⁴¹ 正規與非正規金融來源之間的替代效應並不完善，因為它們在功能上並不相同。在金融受壓抑的環境

263

⁴⁰ Walter W. Powell, "Explaining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Powell and DiMaggio, *New Institutionalism*, 196.

⁴¹ 考慮到非正規金融業的靈活性，即使銀行的雇員也可能傾向加入資金互助會，而不願意與自己的銀行打交道。見 Mayada M. Baydas, Zakaria Bahloul, and Dale W. Adams, "Informal Finance in Egypt: 'Banks' within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23, 4 (1995): 651-61.

中，正規銀行的信貸可能會提供借貸人比場外市場更低的利率，但商業銀行的貸款通常需要複雜的申請程序、抵押或法律上的擔保以及固定的償還日期。這些條件在非正規的放貸者中通常要更為寬鬆——或根本就沒有——而代價是更高的利息。對潛在的存戶和間接的放貸者來說，經濟上的交易通常是在正規金融業的低回報、高安全性與場外市場的高回報、高風險之間徘徊。若不從純粹的金錢角度考慮，有時候非正規金融業確實是更方便的，因為它們就設在當地且由私人訂定條款。

非正規金融業的頑強存在，也可以追溯到地方信貸市場的區隔。增加基層官方（有補貼的）信貸的供應，也不可能排擠出場外市場，因為企業主並不僅僅受到經濟考慮所驅動。更確切地說，私營企業主是追求利潤的行動者，但他們並不是共享和追逐同一利益的整體。有些是農村的外來人口；其他是就業不足的國有企業工人；還有一些是黨國的代理人。他們都面臨資本的限制，但他們解決這個經濟需求的方式，取決於其具體的政治及社會地位。企業主們相互競爭的政治及社會身分篩選了各自金融選擇的範圍。由於這些社會建構的身分，僅從物質條件上看起來平等的企業主，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平等的。人們不能以為，在同一個市場攤位上販賣同一種商品的兩個小販，是交付同樣的稅費，或依賴相同類型的金融機制。企業主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會和親族網絡，也有不同的利益。

企業主的可能性

企業主們共享的一個特性，是他們都願意承擔盈虧的風

險。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裡，不管私人產權可能界定的多麼清晰或模糊，所有的企業主都把自身置於潛在的經濟上脆弱挨打的地位上。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企業主也面對著嚴重的政治風險。然而，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做為投資者、所有者、工人和數不清的支持者參與了私營經濟。他們這樣做，出於各種原因。有些人也因為不同的原因離開了私營經濟。但更重要的是，所有涉及非正規金融業生產的個人及團體行動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企業主。他們都承擔著風險，雖然不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風險。金融企業主坐牢的有，被殺頭的也有。庇護他們的中共官員也是如此。信貸互助會的會頭們在互助會崩潰時失去了一生的朋友，沒有營業執照的小販被沒收貨物、遭到毒打，然而第二天仍舊上街販賣。創業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眾所周知，為了以儆效尤，國家的媒體上也經常報導。

264

儘管如此，私營企業和私營金融還是繁榮興旺。要理解這種弔詭的現象，學者們需要暫時擱置他們自己關於可被容忍的風險層次的固有印象，並承認上述的現象無論看起來多麼缺乏理性，它們的確有自己的地方邏輯。這個方法論上的提醒並不只限於中國，雖然中國似乎有著看似無窮盡的地方邏輯。最後，本書是研究多重合理性的，透過這種合理性整個經濟部門在沒有合法的管道去獲得其燃料——融資——的情況下發展起來。有時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有時是有意的，在農村、工廠和政府機關中的企業主們合作去爭取生活中的重大改善，或至少是邊際改善的可能性。就是這種看起來可能——只是可能，不是很有希望，但也不是不可能的——的地方邏輯，能解釋明顯的經濟上的弔詭，包括在私營經濟發展與非正規金融中的巨大差異性。正是這種可能性的想法對必然性提出質疑。某些經濟

學家當作不可信的保證而不予考慮的東西，一旦經由地方可能性的觀點去看時，卻是可信可靠的。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不能簡單地只看北京承諾要建設「市場社會主義」，就假定中國正在演進成一個發展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其中私人資本犧牲政治權力以換取對其物質利益更大的保護。中國也不一定會變成一個由大企業所控制的原始資本主義國家，或甚至成爲一個（後—）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在其中私營經濟被課以重稅以提供廣泛的公共福利。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發展趨勢，在地方層次上都可發現其蹤影。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並非是一個控制不住的滾動大潮，或是朝向市場資本主義的熟悉模式聚合發展，它在中國各地的政治經濟策略一直是各式各樣，在地方邏輯上五花八門，並且出現許多非預期的經濟組織形式。正是在這種發展的多樣性與可能性脈絡中，私營企業主們經營著他們的金融——在國家背後，與國家一起，並藐視著國家。既不是忠實的官僚，也不是完善的私人產權能精心安排出地方上的這些奇蹟和悲劇。企業主們創造了信貸——不僅僅是出於貪欲，也是出於感激、內疚和容易受騙。敢這樣做，他們理應得到信貸。

附錄 A

研究方法論

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非正規部門的統計資料，因為這些國家中的非正規部門通常在總體就業和增加收入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過去經常認為，非正規部門的資料收集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因為涉及的單位及其活動是「無法測量的」。然而，……經由各式各樣的調查，還是有可能獲得非正規部門的統計資料，只要調查方案的設計和操作能符合非正規部門的特徵。 267

——波胡斯拉夫·赫爾曼（Bohuslav Herman）

Unveiling the Informal Sector, 1996

問卷調查的指標測量

本研究在分析的兩個層次上有兩個依變項：（DVa）特定地區金融制度上的供應和（DVb）個人的金融制度選擇。第一個要解釋的對象涉及與河南、福建、浙江省等 18 個地區的政府官員、國有銀行業者以及私營金融業者的廣泛採訪。問卷調查的方法在確認私營企業主個人層次上的特徵。¹ 從 1996 年至

1997年，問卷調查從私營老闆那裡收集到以下的資訊：

1. 基本的經營和個人的指標（經營類型、雇員數、經營時間、固定和非固定的資產類型、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性別、就業史、階級背景、生活狀況和遷徙類型）。
2. 從私營營利活動中獲取的收入來源及其占全家收入的百分比。
- 268 3. 個人是否因為存款或貸款的目的，與正規金融機構有來往。如果有，交易如何安排（直接或透過中間人），條件如何（利率、金額、期限、抵押品、償還計畫）？如果沒有，是什麼原因？
4. 在非正規金融機構和安排（例如朋友、親戚、同事、鄰居、高利貸、當舖、信貸互助會）的存、貸經驗。
5. 提高自己獲取各種信貸所採取的策略（例如登記註冊為集體企業，與官員或相關人士培養關係）。
6. 交納的稅金、牌照費用和其他收費情況。
7. 在家庭和企業經營中的性別分工與決策權。
8. 做為私營企業主對目前職業的滿意程度（例如薪資、社會地位、自我實現等方面）。

表A.1至表A.10呈現了描述性的統計資料，其中包括問卷調查的區域分布（表A.1），和不是很直接地用來做假設檢定的基本社會經濟指標（年齡、教育程度，表A.2和表A.3）。個人問卷調查的清單在附錄C，表中所採用的行業代碼請見附錄D。

¹ 實際問卷調查的內容可以從作者的網頁上查詢：
<http://jhunix.hcf.jhu.edu/~ktsai>

表 A.1 問卷調查的區域分布

地區	城市	郊區	農村	合計
北方(河南)	80	20	無問卷調查， 僅採訪	100
南方(福建、浙江)	185	73	16(外加採訪)	274
合計	265	93	16	總計 374 份 問卷調查

表 A.2 接受問卷調查的企業主年齡分布

年齡	數量	所占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 19	7	1.9	1.9
19-24	58	15.5	17.4
25-29	75	20.0	37.4
30-34	71	18.9	56.4
35-39	43	11.5	67.9
40-44	51	13.6	81.6
45-49	22	5.9	87.4
50-54	26	7.0	94.4
55-59	10	2.7	97.1
60-69	7	1.9	98.9
> 70	4	1.0	100.0
總計	374	100.0	100.0

表 A.3 接受問卷調查的企業主的教育程度

教育	數量	所占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上過幾天小學	34	9.1	9.1
小學	68	18.3	27.4
初中	120	32.3	59.7
高中	88	23.7	83.4
初專	18	4.8	88.2
中專	26	7.0	95.2
大學	17	4.6	99.8
研究所	1	0.3	100.0
總計	372	100.0	100.0

經濟學的假設

私營企業主自報的月收入，被用來檢定經濟資源與金融安排的制度化之間的關聯性的經濟學假設。在資料集中，它被編碼成一個連續變項（GROSSY）。² 見表 A.4。

經營經歷

270 一個企業主從事經營的時間長短與其使用的金融機制的制度化相關。我製作出一張順序表，經由呈現商販從事經營的年限的基本描述性統計數據來判定「已立足的」私營企業的狀況。在區間（interval）的基礎上計算，平均年限數為4.89年，中位數為三年，二年代表多種模式中的最低值。眾所周知，後

² 編碼名稱都使用大寫的字母來代表編了碼的變項，以區別於沒有統計意義的原詞。

毛時代的中國私營經濟相對年輕，於是決定「初涉足的經營」是那些二年或更短經歷者，「已立足的經營」是那些經營三至五年者；「根基穩固的經營」是那些有五年以上經歷者（見表 A.5）。隨之而生的變項「經營時間」（BUSTIME）被依序編碼為：初涉足的經營（1），已立足的經營（2），以及根基穩固的經營（3）。一項分成兩類的變項「已經經營時間」（BUSTIMED）也是可用的，將五年的經營時間做為「初涉足者」（0）與「立足穩固者」（1）的分界線（在類型劃分掩蓋了經營時間的連續效果的個例中，在田野中的原始記錄還保留著標記為「年限」，如此一來變項也可以以區間來分析）。

表 A.4 私營企業主的收入水準（GROSSY）

自報的每月總收入（元） ^a	數量	百分比%
1,000 元或以下	64	18.2
1,001 元至 5,000 元	173	49.1
5,000 元以上	115	32.7
總計	352	100.0

a：自報的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812,270 元；中位數為 2,565 元；平均值為 9,301 元。

表 A.5 私營企業主的經營時間

從業時間	企業數	占總數百分比%
初涉足的經營（<3 年）	151	40.5
已立足的經營（3-5 年）	105	28.1
根基穩固的經營（>5 年）	117	31.4
總計	373	100.0

政治關係的強度

有著強政治關係的企業主被假設比弱政治關係的企業主會採用更加制度化的金融機制。問卷調查明確地詢問企業主或其配偶是否在政府的行政部門工作過，當過幹部，或是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表 A.6）。

然而，依賴自報回答的問題是，在 1996 年至 1997 年間，法律上是不允許政府官員和黨員經營私營企業的，這就意味著受訪者可能會否認他們的政治關係。因此，決定採用「相對稅、費負擔」（稅、費占總收入的比例）做為「政治關係的強度」一個較好的替代指標，因為有些生意實際上是不交納稅費的，然而有些卻要將其總收入的過半交納稅費。因為大多數人對於將財務告訴陌生人感到不太舒服，依靠私營企業主的自報收入和稅費確實本身有信度（reliability）的問題。如同在此附錄結尾所討論的，問卷調查的過程被建構成對於財務問題的回答能夠以許多方法來交叉檢驗。

271 如表 A.7 所示，官方稅率是隨著收入水準而累進的，例如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下者僅付其總收入 5 % 的稅，而超過五萬元的要交 35 % 的稅。大略地瀏覽這一個表即可發現官方稅率與實際交納稅率之間的巨大差異。這個變項的邏輯基於這樣的預設：根據自報的收入水準，若繳納的稅低於所需交的量，就可能表明是政治力量導致減稅；同理，私營企業主若繳交了高於官方稅率的稅款就有可能是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關係。³ 其他對

³ 當然，繳納少於官方規定的稅，也可能表明其在逃稅方面的成功。控制不依賴政治關係而逃稅的影響，其中一個方法是除去所有室外流動的攤販；他們在收稅人員每日、每週或每月巡視特定的市場時，能夠收

中國私營企業主的研究也支持了這個假設的效度（validity），即私營企業主的實際納稅情況比稅階等級更能反映其政治關係。⁴

根據表 A.7 的數據，圖 A.1 顯示了在不同收入層次上私營企業主實際所繳的平均稅率與官方稅率之間的差異。由於存在著不正當的稅務負擔和成功的逃稅等原因，收入水準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於是創造出一個名目來測算實際交納稅（ T_p ）與應交納稅（ T_d ）之間的差異。實際稅率分布的常態曲線，於是被用來建構表 A.8 第三行顯示的等級。爲了增加檢定選擇的多樣性，所產生的變項以兩種方式編碼：政治關係按強弱劃分，無（0），低（1），中等（2），高（3）；政治關係按有無劃分被編碼成一個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0 代表缺乏強政治關係，而 1 代表存在。

拾起攤子就跑（或騎車逃走）。

⁴ 例證可參見 Dorothy J.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M.E. Sharpe, 1993); and David L. Wank,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53-183.

表 A.6 私營企業主自報的政治背景

就業史	% ^a	樣本數
沒有政治工作經歷	85.3	162
在政府行政部門工作過	14.2	28
當過幹部	6.3	12
在政府行政部門當幹部	3.7	7

a：由於重疊的回答，這些百分比的總計超過 100 %。

表 A.7 官方與實際的稅率

每月總收入	官方稅率 ^a (%)	實際交納稅率		
		%	最小 / 最大	樣本數
5000 元以下	5	20.4	0 / 100	243
5000-10000 元	10	18.0	1.8 / 100	69
10000-30000 元	20	18.3	0.9 / 76.8	42
30000-50000 元	30	7.0	2.1 / 12.5	4
50000 元以上	35	17.5	0 / 84.4	16

a：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稅政局，《中國稅收制度》，1996 年版，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



資料來源：作者的問卷調查（1996年至1997年）。

■ A.1 官方稅率與私營企業主實際納稅的對比

表 A.8 藉由相對的稅務負擔操作化私營企業的政治關係強度

政治關係 (按強弱分)	政治關係 (按有無分)	Tp-Td	% ^a	樣本數
沒有 (0)	0	≥ 50 %	5.3	20
低 (1)	0	10 至 49 %	35.3	132
中等 (2)	1	9 % 至 -9 %	43.0	161
高 (3)	1	≤ -10 %	8.3	31

a：占 344 份有效答卷中的百分比。

表 A.9 私營企業主的原居住地

原居住地	樣本數	所占百分比%
本地 (0)	250	67.6
本省 (1)	80	21.6
外省 (2)	40	10.8
總計	370	100.0

表 A.10 私營企業主的性別

性別	樣本數	百分比
女	207	55.4
男	167	44.6
總計	374	100.0

原居住地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假設在某一特定地區的當地私營企業主更有可能採取高度制度化的金融機制，外來的企業主則更可能採用較不制度化的金融機制。我在問卷調查中測量了這個變項，並將其編碼成一個類別變項 (categorical

variable，見表A.9）：本地（0），本省（1），外省（2）。為統計的目的還創造了另一個虛擬變項（本地為0，外地為1）。

性別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假設女性企業主比男性更有可能採用中低程度制度化的金融機制，男性企業主則更可能採用高制度化的金融機制（見表A.10）。

資料中的限制及潛在偏差

抽樣偏差

274 雖然抽樣的方式是「隨機」的，我調查的不僅有官方的市場，還有未經政府指定的貿易場所（市區的胡同、小巷、工廠背後、夜市等），但在我們所選擇接觸的人群上和願意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主類型上，可能產生了系統的偏差（bias）。在抽樣這一方面，例如我們如何決定接觸哪一個商販，以及何時實施問卷調查，我們通常安排在生意不太忙的空閒時間進行問卷調查。例如，在上午九點以前的銷售高峰時段訪問蔬果批發市場就會影響經營。同樣地，在吃飯時間，餐廳老闆也會因為太忙而無法回答問題；週末，城中心的零售市場也會擠滿了人群。簡單地說，雨天可能特別適合問卷調查，因為那時他們的生意比較清淡。

除了避免在一天或一週之中的繁忙時段採訪商販，以及正忙碌地接待顧客之時外，我們潛在受訪者的選擇也會受到店主是否在場的影響。我們只想對老闆做問卷調查，而不是其雇員。有時候，很明顯地，店裡唯一的人不是店主（例如，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標準的行動原則是，詢問店主是否在，如果不在，他或她什麼時候會回來。

在我們的選取之中，一個更嚴重的偏差來源可能是一直不自覺的。一般來說，研究助理和我在某一特定的市場總是試圖捕捉商販的典型橫切面。例如，如果我們調查一個服裝區，這裡通常由婦女所主導，我們訪問的女性就多於男性。在販賣各式商品的市場，我們就會試圖調查各種行業，而不只是食品乾貨攤或唱片行。⁵ 如果沒有研究助理陪伴的話（約占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可能無意之中會從看起來能說普通話而不是僅說一種地方方言的商販那裡去尋找問卷調查的對象。在城市和郊區，語言通常不是一個難題，在農村，我很少會單獨從事問卷調查。此外，如果語言問題確實造成了對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的抽樣偏差，唯一可能受影響的自變項是性別，因為婦女的平均教育水準低於男子。換句話說，在抽樣中婦女可能被過低代表了（underrepresented）。

275

除了在我們抽樣程序中可能的偏差之外，對自願參與者的依賴又導致了一些自我選擇的偏差。我們並不堅持商販的參與；因此，那一些願意回答調查問卷的人比起那些拒絕的人，可能更有自信、有更好的教育程度，以及比較不忙碌。確切地說，文盲的店主和生意繁忙的店主對於回答調查問卷一事較不

⁵ 同理，我們避免對商販「配額抽樣」（quota sampling），例如我們不會訪問每一個特定種類的商販，如果其生意類型是非典型的。

感興趣。

據我所知，可能的受訪者並不會因為我的年紀或性別而「排除」我；年輕的企業主似乎和年長者一樣願意和我們講話；男人似乎並不比婦女更可能拒絕參與問卷調查。⁶ 然而，某些類型的商販有可能根據我不是本地人的相貌和口音而更有可能拒絕我們的要求。大多數企業主可以分辨的出我不是本地人，許多人會打聽我的家鄉或「老家」在哪裡。北方人認為我是南方人，南方人認為我是北方人。⁷ 然而，受訪者因為我不是當地人而虛應敷衍的程度可能會因為出身本地的研究助理而有所改善；助理先是用當地方言去交涉。在受訪者同意參與問卷調查後，我們會改用普通話交談；若是受訪者不說普通話，我的助理就會問問卷中的問題，而當某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或解釋時，我會插話。

補救措施：這些可能的抽樣偏差對於本書中的論點都沒有嚴重的影響。問卷調查資料的處理並非代表整個中國。相反地，每一個基於經驗研究的章節的討論發現，只涉及影響相關變項特定表現的地方特質。而且，我大多數基於經驗的觀點並不僅僅依賴具有統計上顯著性的嚴格檢驗，也出自於問卷調查中所得到的材料。這些材料能被視為「資訊提供者」的資訊，而不是「受訪者資料」本身。

6 一些年長的受訪者（包括男性與女性）確實問及我的年齡和婚姻狀況，並評論說我結了婚。他們似乎關心我是花費了生孩子的關鍵年齡來從事調查。兩位年輕的男單身漢開玩笑地提議搞一場為了拿綠卡的婚姻。

7 當我解釋我是來自美國的學者，許多受訪者似乎並不相信。在長樂、泉州和溫州（那裡許多人有親戚在國外），人們對我的國籍要少些驚訝。

忽略變項的偏差

實際上，所有的研究設計都會有忽略那些擁有解釋力的變項的風險，這意味著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假說的強度可能是虛假的。例如，這次問卷調查在許多指標上並未收集資料，而這些指標事實上可能對依變項的方向有重要的影響。當地的政策環境就是這樣的一個變項。有些研究地點並不具有能夠管制私營企業並收稅的完善政權；別的地方比較起來則是過度勒索。由於問卷調查還有正式訪談、檔案研究以及當地人的個人生活經歷做為輔助，我可以識別出像政策環境這樣一個變項有可能對企業主對官方干預其經營程度的態度，產生一種系統的（systematic，而不是不系統的或隨機的）影響。⁸

同樣地，南方沿海地區的企業主更可能有在海外的親人，或得益於海外華人或台灣人的投資，這一事實也是我的研究興趣所在，但是並未透過問卷調查而明確地掌握。⁹ 然而，其他體系因素的忽略，例如依賴烏雞出口的村莊裡烏雞的數目，如果該數目並不與另外一個假設的自變項相關（例如兩個自變項之間的關聯被排除掉），或它對依變項沒有影響，就可能不會造成偏差。¹⁰

⁸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1-63.

⁹ 在與其他國家華人的聯繫上，省內之間的差異也很明顯。例如，長樂縣和長樂市代表了福建外出移民的主要發源地；因此，當地的經濟就圍繞著向美國和別處非法偷渡移民的生意而建構，外出移民寄回長樂的現金匯款是當地資金的主要來源。然而，在閩南，海外資金的來源多是來自台灣的投資。

¹⁰ King, Keohane, and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168-76.

答案的信度

人們說謊、遺忘和誤解。由於收稅費者反覆無常的作風，所以商販們習慣於低估其利潤和淨值。這可以被視為是一個系統的偏差，以至於幾乎所有或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會低估其純收入。即使極少有商販會把我們當成收稅費者（「他們一張嘴就要錢，不會像你們這樣先和我們說話」），許多人還是不相信我是個「客觀的」學者，唯一的動機是去瞭解他們的工作。在
277 受訪者堅信我是來自北京的一位新聞記者的個案中，他們對地方性國家勒索的負擔及憑藉強迫手段的抱怨可能有誇大其詞之處，因為他們希望我會把關於當地腐敗的情況彙報上去。然而，在企業主們抱怨收稅中使用暴力手段的六個市場中的四個，我直接目睹了引發這些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怨言的事件，因為我的調查行程無意之中尾隨了那些地點收稅者的行動。

補救措施：田野調查需要主觀的判斷。我並不總是從外表的價值上判斷。我大膽地通過直接觀察來評價受訪者生活條件。例如，如果一位小販聲稱家裡沒有摩托車（問卷調查中生活水準的指標之一）。後來，我看到受訪者的配偶騎著原來一直停在院內的一輛摩托車出門，我就會詢問此事，或許也會在問卷調查紀錄上寫上該戶使用過一輛摩托車。在其他的個案，旁觀者或相鄰的小販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看法向受訪者的回答提出質疑。重點是，問卷調查的過程隨著與店主的聊天，以便深入的瞭解其對各種議題的態度，因此，補充材料有時候甚至糾正了正式建構的問卷調查問題的答案。不幸的是，我沒有統計記錄有多少答案是根據明顯的矛盾之處而修正過的。

至於對有關收入和交納稅費的直接問題的答案的信度，問

卷調查的安排是這樣的，有關交納各種稅費的問題放在有關總收入的問題前面。具體的情況是，首先我會小心地詢問：「在我去過的其他地方，每個月要繳各種的費用，像工商局費和衛生費，本地的小販也要繳這些費嗎？」受訪者通常會抓住這個機會，抱怨他們的稅費負擔。一個典型的回答是：「我們不僅要繳這些費，而且還要繳X、Y、Z之類的費。」而能在稅費上獲得特別優惠的企業主們，則會自豪地講起他們的政治關係：例如，「大多數人必須要繳X費，但我在X局有個朋友，因此我比這裡的其他商販要少繳一些。」在談到稅費時，收入的問題時常會冒出來。例如，一個餐廳老闆在描述了自己爲了繼續做生意不得不繳的所有稅費和賄賂後，又說：「我得把我利潤的70%用來繳這些稅費，你算算有多少！」¹¹ 他還說，剩下30%的利潤也比他在工廠時的工資高十倍。他懷疑我的數學不怎麼樣，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一個月淨賺約五千元」。

278

當受訪者不願意回答收入情況，或是我懷疑他們沒有提供真實的資訊時，另外四個問題給了我判斷真假並更準確地評估其收入的機會。第一個交叉比對的問題，問到與前一年相比目前的經營狀況。¹² 例如，一個餐廳老闆說她每個月只賺四百元，但她曾經提到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我就會在表上加註，這個地區的大多數餐廳似乎今年每個月至少賺八百元。第二個交叉比對的問題，是關於收入的季節性波動。由於大多數消費者導向的生意都說，在春節前後收入高，而在夏秋兩季生意

¹¹ 編號第225號問卷調查受訪者。

¹² 問卷調查的問題如下：「你目前生意經營的（1）比去年好；（2）比去年差；（3）與去年差不多；（4）很難說？」

淡，我就會問商販一年內其收入的高低兩端。這兩端的收入會與其自報的目前收入相比，請受訪者解釋是否有異常的生意環境使其收入水準向一端或另一端歪斜。第三個交叉比對的問題，是詢問受訪者的配偶賺的比其多或少。如果夫婦兩人一起整天地經營生意，並沒有另外還在單位工作，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澄清生意的利潤。但若夫婦中有一個非生意的收入來源，這個問題就會給我提供另一個機會去調查數據的真偽。第四個交叉比對的問題，不像前三個那麼精巧。它問及來自各種來源的全家總收入，並包括一個子問題，要受訪者區分生意收入和非生意收入。

附錄B 1994年至2001年非問卷調查的田野訪問名單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1	94/5/20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助理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研究
2	94/5/27	長樂	縣	福建	中國	部門主任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政府
3	94/5/27	長樂	縣	福建	中國	秘書	長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		政府
4	94/5/27	長樂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5	94/5/27	長樂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6	94/5/2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研究員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7	94/5/2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外事辦公室主任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8	94/5/2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教授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9	94/5/2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行政官員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10	94/5/2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與海上絲路研究中心		研究
11	94/5/30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12	94/5/30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宣傳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13	94/5/31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14	94/5/31	洪山	鎮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農村信用社		金融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名稱	類型
15	94/5/31	洪山	村	福建	中國	委員	村委會	政府
16	94/6/2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行政官員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7	94/6/2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18	94/6/2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信貸官員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19	94/6/2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經理	城市信用社	金融
20	94/6/2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與海上絲路研究中心	研究
21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外事辦公室	政府
22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23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24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外事辦公室	政府
25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會長	工商婦女聯誼會	非政府組織
26	94/6/3	惠安	縣	福建	中國	副主席	中國政治協商會議	政府
27	94/6/4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28	94/6/4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主席	婦聯	群眾組織
29	94/6/4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副主席	婦聯	群眾組織
30	94/6/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研究員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31	94/6/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研究員	福建社會科學院國際文化經濟中心	研究
32	94/6/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經理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33	94/6/7	福州	鎮	福建	中國	主任	農村信用社	金融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名稱	
34	94/6/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35	94/6/8	黎明	村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36	94/6/8	黎明	村	福建	中國	經理	鄉鎮企業	公司	公司
37	94/6/15	北京	中央	北京	中國	宣傳主任	全國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38	94/6/15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文化編輯	中國特稿社	新聞	新聞
39	94/6/15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編輯	中國特稿社	新聞	新聞
40	94/6/29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顧問	福特基金會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41	94/7/6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顧問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42	94/7/22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人口與農業部門 顧問	聯合國人口基金外事辦公室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43	94/8/6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助理教授	中國婦女管理學院	研究	研究
44	94/8/8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講師	北京大學	研究	研究
45	94/8/9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研究員	中國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	研究
46	96/3/25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研究	研究
47	96/3/26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研究	研究
48	96/3/28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研究生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研究	研究
49	96/3/27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助理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研究	研究
50	96/3/28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經濟學家 副教授 政府部門	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	研究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名稱	
51	96/3/27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研究員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研究
52	96/4/19	連江	縣	福建	中國	行政官員	文化局		政府
53	96/4/21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信貸官員	中國建設銀行		金融
54	96/4/21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經理	中國建設銀行		金融
55	96/4/5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人民政府		政府
56	96/4/1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經濟學家	中國人民銀行		金融
57	96/4/18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經理	中國人民銀行		金融
58	96/4/26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59	96/5/9	洪山	村	福建	中國	主任	農村信用社		金融
60	96/3/25	洪山	村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農村信用社		金融
61	96/6/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研究員	福建社會科學院		研究
62	96/6/10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企業主	無		企業
63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外事辦公室		政府
64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秘書	外事辦公室		政府
65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工商銀行		金融
66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農民銀行		金融
67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個體勞動者協會		政府
68	96/6/12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經理	農村信貸基金會		金融
69	96/6/13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企業主	無		企業
70	95/7/10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教授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婦女研究中心		研究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名稱	
71	95/7/10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研究員	勞動與人事學院婦女研究	研究	研究
72	96/6/14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73	96/6/14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職員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74	96/6/14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職員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75	96/6/14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職員	婦聯	群眾組織	群眾組織
76	96/6/17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行政人員	個體勞動者協會	政府	政府
77	96/6/18	長樂	市	福建	中國	企業主	舞廳	企業	企業
78	96/6/20	營前	鎮	福建	中國	經理	鄉鎮企業	企業	企業
79	96/6/20	海興	村	福建	中國	主任	村委會/中國共產黨	政府	政府
80	96/6/20	營前	鎮	福建	中國	老闆	思鄉花生油工廠	企業	企業
81	96/6/20	營前	鎮	福建	中國	主任	鄉鎮企業	企業	企業
82	96/6/21	十堰	村	福建	中國	村民	家戶	家戶	家戶
83	96/6/21	石屏	村	福建	中國	村民	家戶	家戶	家戶
84	96/6/21	高湖	村	福建	中國	農民	家戶	家戶	家戶
85	96/6/21	燕洋	村	福建	中國	村民	家戶	家戶	家戶
86	96/7/3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與海上絲路研究中心	研究	研究
87	96/7/5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研究員	河南社會科學院	研究	研究
88	96/7/8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主席	省政協;工商局	政府	政府
89	96/7/8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經理	洪山酒店	企業	企業
90	96/7/9	金水	區	河南	中國	主任	計畫生育	政府	政府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名稱	類型
91	96/7/10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主任	婦聯	群眾組織
92	96/7/10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經濟學家	河南社會科學院	研究
93	96/7/9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經理	工商局	政府
94	96/7/15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主任	金谷城市信用社	金融
95	96/7/12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經濟學家	河南社會科學院	研究
96	96/7/12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主任	河南社會科學院	研究
97	96/7/15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副主任	《東方家庭週刊》	新聞
98	96/7/15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副總	《婦女生活月刊》	新聞
99	96/7/16	鄭州郊區	鎮	河南	中國	企業主	塑膠工廠	企業
100	96/7/15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企業主	讀書社	企業
101	96/7/18	鄭州	省	河南	中國	主任	城市信用社	金融
102	96/7/23	開封	市	河南	中國	教授	河南大學	研究
103	96/7/21	開封	市	河南	中國	主任	煤炭工廠	研究
104	96/7/21	開封	村	河南	中國	出納	農村信貸基金會	金融
105	96/7/21	開封	村	河南	中國	會計	農村信貸基金會	金融
106	96/7/21	開封	村	河南	中國	企業主	安養院	企業
107	96/7/22	開封	市	河南	中國	職員	郊區合作基金會	金融
108	96/7/22	開封	市	河南	中國	職員	開封資產互助會	金融
109	96/7/23	開封	區	河南	中國	職員	城市信用社	金融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110	96/7/25	開封	市	河南	中國	主任	舞廳；投資公司等		企業
111	96/8/6	城關	鎮	河南	中國	職員	城關農村信用社		金融
112	96/8/16	洛陽	市	河南	中國	研究員	河南社會科學院		研究
113	96/8/18	廈門	村	河南	中國	農民	無		家戶
114	96/9/4	紐約	無	無	美國	教授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研究
115	96/9/24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研究
116	96/9/26	沙田	無	新界	香港	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研究
117	96/9/27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項目官員	福特基金會		國際組織
118	96/10/14	北京	無	無	美國	研究員	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		國際組織
119	96/10/14	北京	無	無	孟加拉	從業人員	Grameen Bank		金融
120	96/10/14	北京	無	無	美國	私部門發展主任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國際組織
121	96/10/14	北京	無	無	澳洲	青海社區發展	澳洲國際發展署 (AusAid)		國際組織
122	96/10/15	成都	省	四川	中國	主任	四川社會科學院		研究
123	96/10/15	北京	省	北京	中國	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
124	96/10/15	北京	無	無	德國	資深顧問	德國技術合作		國際組織
125	96/10/18	Dianji	縣	河南	中國	農民	家戶		家戶
126	96/10/18	丁莊	村	河南	中國	農民	家戶		家戶
127	96/10/22	北京	省	北京	中國	副秘書長	促進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 (ICCIC)		非政府組織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名稱	類型
128	96/10/24	北京	省	北京	中國	副主任	促進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 (ICCIC)	非政府組織
129	96/10/24	北京	省	北京	中國	職員	促進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 (ICCIC)	非政府組織
130	96/10/24	北京	省	北京	中國	研究員	婦女大學	研究
131	96/10/25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居民代表助理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國際組織
132	96/10/18	商丘	地區	河南	中國	副專員與主席	行政官員	政府
133	96/10/18	商丘	地區	河南	中國	區長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34	96/10/18	虞城	縣	河南	中國	副縣長	縣政府	政府
135	96/10/18	商丘	地區	河南	中國	編輯	《河南經濟日報》	新聞
136	96/10/24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項目官員	聯合國外事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37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副主任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38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職員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39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辦公室主任	縣政府	政府
140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41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主席	婦聯	群眾組織
142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副主席	婦聯	群眾組織
143	96/11/11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職員	婦聯	群眾組織
144	96/11/12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人民銀行	金融
145	96/11/12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146	96/11/12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主任	農村信用社	金融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類型
							名稱	名稱	
147	96/11/13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行政官員	工商局	工商局	政府
148	96/11/13	安溪	縣	福建	中國	行政官員	個體勞動者協會	個體勞動者協會	群眾組織
149	96/11/14	湖頭	鎮	福建	中國	農民	無	無	家戶
150	96/11/16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館長	泉州海事博物館	泉州海事博物館	研究
151	96/11/17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助理研究員	泉州海事博物館	泉州海事博物館	研究
152	96/11/17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副主席	婦聯	婦聯	群眾組織
153	96/11/17	厝城	區	福建	中國	職員	工商局	工商局	政府
154	96/11/17	泉州	市	福建	中國	職員	個體勞動者協會	個體勞動者協會	群眾組織
155	97/3/11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職員	外事辦公室	外事辦公室	政府
156	97/3/12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主席	婦聯	婦聯	群眾組織
157	97/3/12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副主席	婦聯	婦聯	群眾組織
158	97/3/13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主任	大眾文化研究所	大眾文化研究所	非政府組織
159	97/3/13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助理主任	大眾文化研究所	大眾文化研究所	非政府組織
160	97/3/13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主任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政府
161	97/3/17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職員	個體勞動者協會	個體勞動者協會	群眾組織
162	97/3/17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會長	私營企業主協會	私營企業主協會	群眾組織
163	97/3/17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職員	工商局	工商局	政府
164	97/3/18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顧問	承包公司	承包公司	企業
165	97/3/19	橋頭	縣	浙江	中國	局長	工商局	工商局	政府
166	97/4/1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局長	工商局	工商局	政府

編號	日期 年/月/日	地點	行政層級	省份/地區	國家/地區	職位	機構	
							名稱	類型
167	97/4/1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副局長	工商局	政府
168	97/4/1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會長	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主協會群眾組織	政府
169	97/4/17	福州	省	福建	中國	局長	工商局	政府
170	97/5/19	北京	無	北京	中國	項目官員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國際組織
171	97/5/20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所
172	97/5/20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所
173	97/5/20	北京	無	無	孟加拉	主要官員	Grameen Bank	金融
174	97/5/21	易縣	縣	河北	中國	主任	易縣扶貧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75	97/5/21	易縣	縣	河北	中國	會計	易縣扶貧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76	97/5/21	太平	村	河北	中國	中心領導	易縣扶貧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77	97/5/22	北京	市	北京	中國	會長	促進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 (ICCIC)	非政府組織
178	97/5/25	南召	縣	河南	中國	主任	南召扶貧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79	97/5/26	南召	縣	河南	中國	副主任	南召扶貧辦公室	非政府組織
180	97/5/26	羊屎溝	村	河南	中國	農民	南陽匯豐藝品公司	家戶
181	97/5/26	南召	縣	河南	中國	企業主	南陽匯豐藝品公司	企業
182	97/6/13	福州	市	福建	中國	主任	福州城市商業銀行	金融
183	97/6/13	福州	市	福建	中國	司機	福州城市商業銀行	金融
185	2001/1/15	甌海	縣	浙江	中國	企業主	電子零組件廠	企業
186	2001/1/19	溫州	市	浙江	中國	資深經濟學家	溫州中國農業銀行	金融

附錄 C 1996 年至 1997 年問卷調查名單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1	96/4/7	福州	福建	B5
2	96/4/10	福州	福建	B5
3	96/4/10	福州	福建	A7
4	96/4/11	福州	福建	B5
5	96/4/11	福州	福建	C8
6	96/4/11	福州	福建	A1
7	96/4/11	福州	福建	B1
8	96/4/11	福州	福建	A1
9	96/4/11	福州	福建	C2
10	96/4/11	福州	福建	A1
11	96/4/11	福州	福建	B5
12	96/4/11	福州	福建	A7
13	96/4/11	福州	福建	A1
14	96/4/11	福州	福建	A7
15	96/4/11	福州	福建	B5
16	96/4/11	福州	福建	A8
17	96/4/11	福州	福建	A1
18	96/4/11	福州	福建	B3
19	96/4/12	福州	福建	A11
20	96/4/12	福州	福建	C2
21	96/4/13	福州	福建	A16
22	96/4/13	福州	福建	C5
23	96/4/13	福州	福建	A7
24	96/4/13	福州	福建	C16
25	96/4/13	福州	福建	B5
26	96/4/13	福州	福建	C5
27	96/4/13	福州	福建	BX
28	96/4/13	福州	福建	C8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29	96/4/15	福州	福建	A3
30	96/4/13	福州	福建	A3
31	96/4/13	福州	福建	A18
32	96/4/12	福州	福建	C7
33	96/4/12	福州	福建	A3
34	96/4/12	福州	福建	A3
35	96/4/12	福州	福建	C17
36	96/4/12	福州	福建	A6
37	96/4/12	福州	福建	A6
38	96/4/12	福州	福建	A3
39	96/4/12	福州	福建	C5
40	96/4/12	福州	福建	A3
41	96/4/14	福州	福建	A11
42	96/4/14	福州	福建	C6
43	96/4/13	福州	福建	C2
44	96/4/14	福州	福建	C5
45	96/4/14	福州	福建	A9
46	96/4/14	福州	福建	B5
47	96/4/12	福州	福建	C13
48	96/4/12	福州	福建	A10
49	96/4/14	福州	福建	C17
50	96/4/14	福州	福建	B4
51	96/4/14	福州	福建	C15
52	96/4/14	福州	福建	C3
53	96/4/14	福州	福建	B5
54	96/4/12	福州	福建	A0
55	96/4/12	福州	福建	C4
56	96/4/12	福州	福建	CX
57	96/4/12	福州	福建	A11
58	96/4/12	福州	福建	CX
59	96/4/12	福州	福建	B5
60	96/4/12	福州	福建	A8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61	96/4/11	福州	福建	C8
62	96/4/12	福州	福建	C13
63	96/4/11	福州	福建	CX
64	96/4/11	福州	福建	B5
65	96/4/12	福州	福建	C5
66	96/4/13	福州	福建	B4
67	96/4/14	福州	福建	A19
68	96/4/13	福州	福建	C11
69	96/5/4	福州	福建	B1
70	96/5/4	福州	福建	B2
71	96/5/4	福州	福建	B7
72	96/5/4	福州	福建	C5
73	96/5/4	福州	福建	B1
74	96/5/4	福州	福建	A1
76	96/5/3	福州	福建	A3
77	96/5/3	福州	福建	A3
78	96/5/3	福州	福建	A1
79	96/5/3	福州	福建	A1
80	96/5/3	福州	福建	B5
81	96/4/12	福州	福建	A3
82	96/4/12	福州	福建	A20
83	96/4/19	福州	福建	A3
84	96/4/19	福州	福建	A3
85	96/4/19	福州	福建	A3
86	96/5/3	福州	福建	A1
87	96/4/19	福州	福建	A3
88	96/4/19	福州	福建	A3
89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0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1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2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3	96/4/19	福州	福建	A3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94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5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6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7	96/4/19	福州	福建	A3
98	96/4/19	福州	福建	B2
99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00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01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02	96/4/19	福州	福建	A5
103	96/4/19	福州	福建	A5
104	96/4/19	福州	福建	A5
105	96/4/19	福州	福建	A5
106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07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08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09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0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1	96/4/19	福州	福建	B7
112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3	96/4/19	福州	福建	B1
114	96/4/19	福州	福建	B1
115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6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7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8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19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20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21	96/4/19	福州	福建	B3
122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23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24	96/4/19	福州	福建	B2
125	96/4/19	福州	福建	A6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126	96/4/19	福州	福建	A6
127	96/4/19	福州	福建	A6
128	96/4/19	福州	福建	A10
129	96/4/19	福州	福建	A4
130	96/4/10	福州	福建	A1
131	96/4/13	福州	福建	A1
132	96/4/13	福州	福建	A11
133	96/4/13	福州	福建	A19
134	96/4/14	福州	福建	B4
135	96/4/13	福州	福建	B4
136	96/4/13	福州	福建	B1
137	96/4/13	福州	福建	B3
138	96/4/13	福州	福建	A7
139	96/4/12	福州	福建	A1
140	96/5/3	福州	福建	A1
141	96/5/3	福州	福建	B1
142	96/5/3	福州	福建	A1
143	96/5/3	福州	福建	B1
144	96/5/3	福州	福建	A1
145	96/4/11	福州	福建	B5
145	96/6/13	長樂	福建	A4
146	96/6/13	長樂	福建	A16
147	96/6/13	長樂	福建	A11
148	96/6/13	長樂	福建	A14
149	96/6/15	長樂	福建	BX
150	96/6/15	長樂	福建	B5
151	96/6/16	長樂	福建	A11
152	96/6/16	長樂	福建	A4
153	96/6/16	長樂	福建	A10
154	96/6/16	長樂	福建	C11
155	96/6/16	長樂	福建	A4
156	96/6/16	長樂	福建	A4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157	96/6/16	長樂	福建	A8
158	96/6/17	長樂	福建	B8
159	96/6/17	長樂	福建	A2
160	96/6/17	長樂	福建	A1
161	96/6/17	長樂	福建	B1
162	96/6/17	長樂	福建	B2
163	96/6/17	長樂	福建	B8
164	96/6/17	長樂	福建	B1
165	96/6/17	長樂	福建	B1
166	96/6/17	長樂	福建	B1
167	96/6/17	長樂	福建	A6
168	96/6/17	長樂	福建	A1
169	96/6/17	長樂	福建	B5
170	96/6/17	長樂	福建	B5
171	96/6/18	長樂	福建	A15
172	96/6/18	長樂	福建	A15
173	96/6/18	長樂	福建	A11
174	96/6/18	長樂	福建	A15
175	96/6/18	長樂	福建	A15
176	96/6/18	長樂	福建	A5
177	96/6/18	長樂	福建	A14
178	96/6/18	長樂	福建	B5
179	96/6/19	長樂	福建	A4
180	96/6/19	長樂	福建	A16
181	96/6/19	長樂	福建	A4
182	96/6/19	長樂	福建	A8
183	96/6/19	長樂	福建	A5
184	96/6/19	長樂	福建	A8
185	96/6/19	長樂	福建	A4
186	96/6/19	長樂	福建	A11
187	96/6/19	長樂	福建	A4
188	96/6/20	長樂	福建	BX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189	96/6/20	長樂	福建	B2
190	96/6/21	長樂	福建	A1
191	96/7/4	福州	福建	AX
192	96/7/7	鄭州	河南	B2
193	96/7/7	鄭州	河南	A1
194	96/7/9	鄭州	河南	C5
195	96/7/13	鄭州	河南	A10
196	96/7/13	鄭州	河南	A16
197	96/7/13	鄭州	河南	A5
198	96/7/13	鄭州	河南	B4
199	96/7/14	鄭州	河南	A5
200	96/7/14	鄭州	河南	A2
201	96/7/14	鄭州	河南	A5
202	96/7/14	鄭州	河南	A9
203	96/7/15	鄭州	河南	A3
204	96/7/15	鄭州	河南	B3
205	96/7/16	鄭州	河南	AX
206	96/7/16	鄭州	河南	A8
207	96/7/18	鄭州	河南	A4
208	96/7/18	鄭州	河南	A14
209	96/7/18	鄭州	河南	A4
210	96/7/18	鄭州	河南	A4
211	96/7/18	鄭州	河南	A4
212	96/7/18	鄭州	河南	CX
213	96/7/21	開封	河南	AX
214	96/7/22	開封	河南	A4
215	96/7/22	開封	河南	A4
216	96/7/22	開封	河南	B3
217	96/7/22	開封	河南	B7
218	96/7/22	開封	河南	B1
219	96/7/22	開封	河南	A19
220	96/7/23	開封	河南	A1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221	96/7/23	開封	河南	B8
222	96/7/23	開封	河南	A4
223	96/7/23	開封	河南	C1
224	96/7/23	開封	河南	B1
225	96/7/23	開封	河南	B5
226	96/7/24	開封	河南	A1
227	96/7/24	開封	河南	B5
228	96/7/25	開封	河南	B1
229	96/7/25	開封	河南	BX
230	96/7/25	開封	河南	BX
231	96/7/25	開封	河南	C5
232	96/7/25	開封	河南	C15
233	96/7/27	鄭州	河南	A4
234	96/7/27	鄭州	河南	A4
235	96/7/27	鄭州	河南	A4
236	96/7/27	鄭州	河南	A4
237	96/7/28	鄭州	河南	B5
238	96/7/28	鄭州	河南	A6
239	96/7/28	鄭州	河南	A6
240	96/7/28	鄭州	河南	B1
241	96/7/28	鄭州	河南	C10
242	96/7/29	鄭州	河南	B5
243	96/7/29	鄭州	河南	A16
244	96/7/29	鄭州	河南	A11
245	96/7/29	鄭州	河南	A17
246	96/7/29	鄭州	河南	B5
247	96/7/30	鄭州	河南	B1
248	96/7/30	鄭州	河南	B7
249	96/7/30	鄭州	河南	BX
250	96/7/30	鄭州	河南	A3
251	96/7/31	鄭州	河南	A16
252	96/7/31	鄭州	河南	A13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253	96/7/31	鄭州	河南	B7
254	96/7/31	鄭州	河南	A16
255	96/7/31	鄭州	河南	AX
256	96/8/1	鄭州	河南	CX
257	96/8/1	鄭州	河南	A4
258	96/8/1	鄭州	河南	A4
259	96/8/1	鄭州	河南	A4
260	96/8/1	鄭州	河南	A14
261	96/8/2	鄭州	河南	A4
262	96/8/2	鄭州	河南	A11
263	96/8/7	洛陽	河南	A3
264	96/8/7	洛陽	河南	A3
265	96/8/7	洛陽	河南	A8
266	96/8/7	洛陽	河南	A3
267	96/8/7	洛陽	河南	AX
268	96/8/7	洛陽	河南	B7
269	96/8/8	洛陽	河南	A16
270	96/8/8	洛陽	河南	A16
271	96/8/11	鄭州	河南	BX
272	96/8/11	鄭州	河南	A1
273	96/8/11	鄭州	河南	B2
274	96/8/11	鄭州	河南	A4
275	96/8/11	鄭州	河南	B5
276	96/8/13	鄭州	河南	B3
277	96/8/13	鄭州	河南	B3
278	96/8/13	鄭州	河南	B3
279	96/8/14	鄭州	河南	B1
280	96/8/14	鄭州	河南	B1
281	96/8/14	鄭州	河南	AX
282	96/8/15	鄭州	河南	BX
283	96/8/15	開封	河南	B1
284	96/8/15	開封	河南	A1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285	96/8/15	開封	河南	B3
286	96/8/17	開封	河南	A12
287	96/8/17	開封	河南	B7
288	96/8/17	開封	河南	AX
289	96/8/17	開封	河南	B1
290	96/8/17	開封	河南	B1
291	96/8/20	開封	河南	A6
292	96/11/12	安溪	福建	A2
293	96/11/12	安溪	福建	C11
294	96/11/12	安溪	福建	A12
295	96/11/13	安溪	福建	A1
296	96/11/13	安溪	福建	A13
297	96/11/14	安溪	福建	B5
298	96/11/14	安溪	福建	A11
299	96/11/14	安溪	福建	BX
300	96/11/14	安溪	福建	A4
301	96/11/14	安溪	福建	A16
302	96/11/15	安溪	福建	A1
303	96/11/15	安溪	福建	A6
304	96/11/15	安溪	福建	A4
305	96/11/15	安溪	福建	A1
306	96/11/18	泉州	福建	C5
307	96/11/18	泉州	福建	A4
308	96/11/19	泉州	福建	B3
309	96/11/19	泉州	福建	AX
310	96/11/19	泉州	福建	BX
311	96/11/19	泉州	福建	A4
312	96/11/19	泉州	福建	A10
313	96/11/20	晉江	福建	AX
314	96/11/20	晉江	福建	A6
315	96/11/20	晉江	福建	A1
316	96/11/20	晉江	福建	A1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317	96/11/21	泉州	福建	A4
318	96/11/21	泉州	福建	A1
319	96/11/21	泉州	福建	B1
320	96/11/21	泉州	福建	A1
321	96/11/22	泉州	福建	A2
322	96/11/22	泉州	福建	B2
323	96/11/23	泉州	福建	B5
324	96/11/25	惠安	福建	A1
325	96/11/25	惠安	福建	A6
326	96/11/25	惠安	福建	B5
327	96/11/25	惠安	福建	C3
328	96/11/25	惠安	福建	A19
329	96/11/25	惠安	福建	AX
330	96/11/25	惠安	福建	B1
331	96/11/26	惠安	福建	A16
332	96/11/26	惠安	福建	B7
333	96/11/26	惠安	福建	A16
334	96/11/26	惠安	福建	A4
335	96/11/26	惠安	福建	A15
336	96/11/26	惠安	福建	C2
337	96/11/26	惠安	福建	BX
338	96/11/26	惠安	福建	B1
339	96/11/27	惠安	福建	B5
340	96/11/27	惠安	福建	C13
341	96/11/27	惠安	福建	A4
342	96/11/27	惠安	福建	C5
343	96/11/27	惠安	福建	B5
344	96/11/28	惠安	福建	C14
345	96/11/28	惠安	福建	B1
346	96/11/28	惠安	福建	A4
347	96/11/28	惠安	福建	A6
348	96/11/28	惠安	福建	B1

編號	日期	地點	省份	行業類型 ^a
349	97/3/12	溫州	浙江	A1
350	97/3/14	溫州	浙江	A11
351	97/3/14	溫州	浙江	B5
352	97/3/14	溫州	浙江	B3
353	97/3/14	溫州	浙江	A6
354	97/3/14	溫州	浙江	A11
355	97/3/15	溫州	浙江	A5
356	97/3/15	溫州	浙江	AX
357	97/3/15	溫州	浙江	AX
358	97/3/15	溫州	浙江	A4
359	97/3/15	溫州	浙江	AX
360	97/3/16	溫州	浙江	AX
361	97/3/16	溫州	浙江	AX
362	97/3/16	溫州	浙江	AX
363	97/3/16	溫州	浙江	AX
364	97/3/16	溫州	浙江	AX
365	97/3/17	溫州	浙江	A13
366	97/3/18	溫州	浙江	B5
367	97/3/19	溫州	浙江	A13
368	97/3/19	溫州	浙江	A15
369	97/3/19	溫州	浙江	AX
370	97/3/19	溫州	浙江	AX
371	97/3/19	溫州	浙江	AX
372	97/3/20	溫州	浙江	A17
373	97/3/20	溫州	浙江	A19
374	97/3/20	溫州	浙江	A5

a：可參考附錄D

附錄D 行業類型的編碼

在問卷調查中我針對行業類型的編碼，意指該行業是否為「室內經營」或「室外經營」（1或2），以及更廣泛範圍的商品種類、食品或服務（A、B或C），和特定種類的行業。舉例而言，「2C14」指的是一個室外的算命生意。然而，在附錄三之中，「行業類型」這一欄只列出後兩位的編碼。

A 商品種類

- 0 百貨公司
- 1 日常雜貨
- 2 低價家庭用品
- 3 高價家戶產品
- 4 外衣
- 5 內衣
- 6 鞋類
- 7 新聞與雜誌
- 8 書籍
- 9 文具與辦公室用品
- 10 電子用品
- 11 音樂（卡帶、CD）
- 12 腳踏車
- 13 珠寶首飾
- 14 手袋與皮包
- 15 髮型配件
- 16 禮品
- 17 化妝品
- 18 眼鏡
- 19 花卉
- 20 運動用品
- X 其他

B 食品

- 1 水果與／或蔬菜
- 2 肉類與／或水產
- 3 餅乾與／或乾果
- 4 快餐店
- 5 餐廳
- 6 家禽
- 7 瓶、罐或紙盒裝飲料
- 8 茶
- X 其他

C 服務

- 1 修理腳踏車
- 2 修理鞋
- 3 裁縫
- 4 洗衣
- 5 美髮
- 6 打字／文字處理
- 7 住房（旅館）
- 8 影印
- 9 修理電器
- 10 打鑰匙
- 11 相片沖洗
- 12 清潔
- 13 交通（例如計程車、腳踏車）
- 14 算命
- 15 KTV或舞廳
- 16 撞球場
- 17 錄影帶店
- X 其他

附錄E 信貸互助會的比較綜述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玻利維亞	城市		<i>pasanakkus</i>	預先決定、以需要決定	農業生產；應急	Adams and Canavesi (1992)
喀麥隆	農村	婦女	<i>Djanggis</i> <i>Njanjis</i> <i>tontines</i>	預先決定、以需要決定	生活支出(租金、學費、廚具)	Rowlands (1995) ; Schreider and Cuevas (1992)
中國	福建(福州、長樂、泉州) 江西、廣東、浙江(溫州、寧波)	漢族, 婦女	標會、互助會 搖會 程會、舉會、輪會、莊會、買回、幹會 壓會	競標、以需要決定或擲骰子	生意、儲蓄、買房(婚嫁)、移民	蔡欣怡的田野研究(1994-1997) ; Cui (1996) ; Pairault (1990) ; Ma (1995) ; Xu and Li (1988) ; Zhang and Mao (1993)
剛果	城市	Mbochi, Teke 婦女	<i>likilimba</i> , <i>otabaka</i> , <i>kiteme, etion</i>		宗教、喪葬	Seibel and Marx (1987)
埃及	城市與農村	婦女	<i>gam'iyas</i>	抽籤	互助、儲蓄	Baydas, Bahloul and Adams (1995)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甘比亞	城市與農村	男性與婦女	<i>osusu (kafos)</i>	預先決定或抽籤	從事小生意	Shipton (1992) ; Esim (1996)
迦納	南部、市集	婦女	<i>susu</i>	以需要決定、投票決定	生意、儲蓄	Bortei-Doku and Aryeetey (1995)
幾內亞— 比紹	市集	類似的年紀、性別、種族	<i>abotas</i>		生意、耕種(季節性)、急用、採購設備	Esim (1996)
蓋亞那		Yoruban roots、婦女	<i>boxi money, throwing a box</i>	由會頭事先決定	生意、耕種、嫁娶	Besson (1995)
印度	Kerala、印度南部	婦女	<i>chit funds</i>	絕大多數以競標方式	生意、儲蓄	Nayar (1973)
印尼	爪哇中部、蘇門答臘西岸	城市婦女；農村、部分華人	<i>arisan, arisan call (julu-julu in Sumatra)</i>	抽籤或競標(在城市地區)	購買家用品與家具(婦女)；修建屋頂與排水設備(男性)	Geertz (1962) ; Dewey (1964) ; Penny (1968)
象牙海岸	農村地區	Kru Akan Mande	<i>akpole wule, susu, aposumbo n' detie, m' bhlisika monu, mone</i>		農業生產(1987)	Seibel and Marx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日本	直到1990年 代中期的農 村地區	農民、 武士、 婦女	<i>Kou, kō,</i> <i>tanomoshi-kou,</i> <i>mukin-kou</i>	抽籤、競標	耕種、生意、儲 蓄、地方財政支 出	Izumida (1992) ; Miyana (1995)
肯亞	奈洛比屯墾 區	Gikuyu、 婦女	<i>itega</i>	預先決定	儲蓄、學費、投 資	Nelson (1995)
韓國	農村	婦女	<i>kye</i>	抽籤、預先決定、 依需求	耕種、生意、慈 善	Janelli and Yim (1988)
馬拉威		〔低收入者〕	<i>chiryelano,</i> <i>chiperigani</i>	「談判」	消費、儲蓄、教 育、耕種	Chipeta and Mkandawire (1992)
墨西哥	城市	〔受刑人〕	<i>tanda (or ronda,</i> <i>quincela)</i>	預先決定、依需 求、投標	消費、儲蓄 (marijuana in prisons)	Kurtz and Showman (1978) ; Vélez- Ibañez (1983)
尼泊爾	Himalays - 農村 (Lo region of Mustang) Pokhara, Kathmandu —城市 Pokhara —城市	Loba (Tibetan) Nepali Thakali	<i>dhikuri</i> <i>dhikuri</i> <i>sihku dhikuri</i>	抽籤 抽籤 抽籤	生意、儲蓄 生意、儲蓄、 投資 移民後的適應 開支	Chhetri (1995) Messerschmidt (1978) Vinding (1984) ; Chhetri (1995)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尼日	城市與農村	流行於大眾之中；婦女	<i>tontines</i>	依需求而定	生意、耕種	Graham (1992) ; Colley (1996)
奈及利亞	西部 東部	Yourba, Igala	<i>ojo</i> <i>isusu</i>	輪流或是依需求而定	儲蓄、保險、耕種	Seibel and Marx (1987)
巴基斯坦			<i>bisi committees</i>		低收入戶	Van der Harst (1974)
巴布亞新幾內亞	Rabaul (德屬新幾內亞) → Port Moresby	從廣東來的中國漢族與來自香港的妻子；教師	<i>piu-wui</i> (標會)	競標	生意、儲蓄、消費	Wu (1974) ; Fernando (1992)
菲律賓	Sapang Palay markets, Dasmariñas 遷徙區 (近馬尼拉)	女性漁販、家庭	<i>paluwagan</i>		家戶、消費儲蓄、各項設備、子女教育、生意	Keyes (1983) ; Lambertw and Bunda (1988)
塞內加爾	城市地區；部分農村	婦女	<i>natt, teck, piye, pari</i>		生產、消費	Chidzero (1996)
獅子山	農村	親戚、族群	<i>esusus</i>	會員中的長輩	耕種、消費、應急	Hadjimichael (1996)
南非	城市	婦女 (特別是單親媽媽)	<i>stokvel, gooi-gooi</i>	預先決定	儲蓄、消費、喪葬	Burman and Lembete (1995)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斯里蘭卡			<i>cheetus</i>	抽籤、競標或預先決定	喪葬、耕作	Sanderatne (1992)
台灣	[特別是公部門的僱員]	家庭婦女	標會	競標	消費、生意	Levenson and Besley (1996)
坦尚尼亞	城市	婦女	<i>upatu, mchezo</i>	現金	生意、消費	Malkamäki (1991)
泰國	屯墾區；曼谷		<i>chaer or pia huey</i>	競標	生意	Rozental (1967) ; Angel and Sevilla (1978) ; Vongpradhip (1985)
多哥		Ewe、Kotokoli 婦女	<i>sodyokyo aboo</i>	輪流	生意	Seibel and Marx (1987)
千里達		Yoruban (西非)	<i>susu</i>	由會頭決定	消費、住房	Herskovits and Herskovits (1947)
土耳其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	家庭主婦、政府僱員、教師	<i>altn günü, gümüş günü</i>	輪流	儲蓄(以黃金的形式)	Khatib-Chahidi (1995)
英國	倫敦	北部索馬利人、婦女	<i>hagbad</i>	依需求而定	帳單、醫療	Summerfield (1995)
	牛津	厄利特里亞人、婦女	<i>iqqubs</i>	預先決定	消費	Almedom (1995)

國家	區域／地區	種族／性別	名稱	借貸方式	使用目的	資料來源 ^a
美國	城市中心的 移民	墨西哥人 韓國人 中國人	<i>cundina kye san yi hui</i>	預先決定、依需 求而定、投標	消費、生意、儲 蓄、嫁娶、喪葬、 賭博	Kurtz (1973) ; Vélezlbañez (1983) ; Light (1972)
越南	胡志明市	華人、女性	<i>ho, whoo-ie、會</i>	預先決定、投標	生意、儲蓄	Leshkovich (2000)
西岸／ 迦薩走廊	城市；難民 營	白領雇員		抽籤、預先決定 或依需求而定		Hamed (1998)

備註：這絕非是一份世界上所有信貸互助會的名單

^a：完整的參考書目，請參考資料來源書單。

表6.1 與附錄E中的資料來源

Abbreviated Sources:

A&B (1995) refers to Shirley Ardener and Sandra Burman, eds. *Money-Go-Rounds: The Importance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for Women* (Oxford: Berg Publishers Limited, 1995).

A&F (1992) refers to Dale W. Adams and Delbert A. Fitchett, eds. *Informal Finan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W&F (1996) refers to Leila Webster and Peter Fidler, eds.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West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6).

Adams, Dale W., and Marie L. Canavesi.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in Bolivia." *Savings and Development* 13 (1989): 219-36.

———.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in Bolivia." In A&F, 313-323.

Adams, Dale W., and Delbert A. Fitchett, eds. *Informal Finan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Almedom, Astier M. "A Note on ROSCAs among Ethiopian Women in Addis Ababa and Eritrean Women in Oxford." In A&B, 71-76.

Angel, Shlomo, J. H. de Goede, and Ramon Sevilla. "Sharing the Risk of Being Poor: Communal Savings Games in Bangkok."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6, 2 (1978): 123-45.

- Ardener, Shirley and Sandra Burman, eds. *Money-Go-Rounds: The Importance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for Women*. Oxford: Berg, 1995.
- Aryeetey, Ernest. "Private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in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22, 8 (August 1994): 1211-21.
- Baydas, Mayada M., Zakarea Bahloul, and Dale W. Adams. "Informal Finance in Egypt: 'Banks' within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23, 4 (1995): 651-61.
- Berthoud, Olivier, and Walter Milligan. *Sector Informal Urbano y crédito*. La Paz, Bolivia: Dirección de la Cooperación Técnica Suiza, 1995.
- Besson, Jean. "Women's Use of ROSCAs in the Caribbean: Reassessing the Literature." In A&B, 263-88.
- Bortei-Doku, Ellen, and Ernest Aryeetey. "Mobilizing Cash for Business: Women in Rotating *Susu* Clubs in Ghana." In A&B, 77-94.
- Burman, Sandra, and Nozipho Lembete. "Building New Realities: Women and ROSCAs in Urban South Africa." In A&B, 23-48.
- Chhetri, Ram B.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Nepal: *Dikhuri* as Capital, Credit, Saving, and Investment." *Human Organization* 54, 4 (1995): 449-53.
- Chidzero, Anne-Marie. "Senegal." In W&F, 195-202.
- Chipeta, Chinyamata and Mjedo L. C. Mkandawire. "The In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n Malawi." *African Review of Finance, Money, and Banking* 2 (1992).
- Christen, Robert P. "Formal Credit for Informal Borrowers: Lessons from Informal Lenders." In A&F, 281-92.
- Colleye, Pierre-Olivier. "Niger." In W&F, 177-84.
- Cui, Liukang. "Dui fazhan nongcun hezuo jijinhui jige wenti de bianxi" (On the problems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rural cooperative foundations). *Nongye jingji wenti*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5 (1996): 15-18.
- Dadson, Christine.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hana." In *Establishing a Microfinance Industry: Proceedings of the 4th*

- Microfinance Network. Annual Conference, Establishing a Microfinance Industry*, 1996, in Niagara-on-the-Lake Canada, Washington D.C.: Microfinance Network, 1997.
- Dewey, Alice. "Capital, Credit, and Saving in Javanese Market." In Raymond Firth and B. S. Yamey, eds., *Capital, Savings, and Credit in Peasant Societies: Studies from Asia, Oceania, the Caribbean, and Middle Americ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4), 230-55.
- Esim, Simel. "The Gambia." In W&F, 115-26.
- . "Guinea-Bissau." In W&F, 139-51.
- Fernando, Nimal A. "Informal Finance in Papua New Guinea." In A&F, 119-31.
- Geertz, Clifford.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 (1962): 241-63.
- Germidis, Dimitri, Dennis Kessler, and Rachel Meghir. *Financial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What Role for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Sectors?*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1991.
- Ghate, Prabhu, Arindam Das-Gupta, Mario Lamberte, Nipon Poapongsakorn, Dibyo Prabowo, Atiq Rahman, and T. N. Srinivasan. *Informal Finance: Some Findings from Asi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Asia Development Bank, 1992.
- Graham, Douglas H. "Informal Rural Finance in Niger: Lessons for Building Formal Institutions." In A&F, 71-83.
- Hadjimichael, Bitá. "Sierra Leone." In W&F, 203-13.
- Hamed, Osama, with Samia Al-Botmeh and Fause Ersheid. "Informal Finance and Lending NGO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Working Paper, Palestin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S), Jerusalem and Ramallah, August 1998.
- Herskovits, Melville J., and Frances S. Herskovits. *Trinidad Village*. New York: Knopf, 1947.
- Huang, Weiting. *Zhongguo de yinxing jingji* (China's hidden economy).

- Beijing: Zhongguo shangye chubanshe, 1996.
-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China's Emerging Private Enterprises: Prospects for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IFC, 2000.
- Izumida, Yoichi. "The *Kou* in Japan: A Precursor of Modern Finance." In A&F, 165-80.
- Janelli, Roger L., and Dawnhee Yim. "Interest Rates and Rationality: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among Seoul Women."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6 (1988): 159-85.
- Keyes, William J. "Freedom to Build—Philippines: Experience with the Freedom to Build Project at Dasmarinas, 1976-1982." Research Report no. 3, Divis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Development,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ngkok, 1983.
- Khatib-Chahidi, Jane. "Gold Coins and Coffee ROSCAs: Coping with Inflation the Turkish Way in Northern Cyprus." In A&B, 241-61.
- Kurtz, Donald V.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n Adaptation to Poverty." *Human Organization* 32 (1973): 49-58.
- Kurtz, Donald V., and Margaret Showman. "The *Tanda*: A RCA in Mexico." *Ethnology* 17 (1978): 65-74.
- Lamberte, Mario B., and Ma. Theresa Bunda. "The Financial Markets in Low-Income Urban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Sapang Palay." Working Paper, Series 88-05,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Manila, March 1988.
- Leshkovich, Ann Marie. "Tightly Woven Threads: Gender, and Kinship, and 'Secret Agency' among Cloth and Clothing Traders, in Ho Chi Minh City's Ben Thanh Market."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 Levenson, Alec R., and Timothy Besley. "The Anatomy of a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 Rosca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 1 (October 1996): 45-68.
- Light, Ivan H.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ress, 1972.
- Ma, Jinlong. "Wenzhou jinrong shichang" (Wenzhou's financial market). In Zhang Xu and Zhang Dajiong, eds., *Wenzhou shichang* (Wenzhou's market).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1995.
- Malkamäki, Marrku, et al. *Banking the Poor: Informal and Semi-formal Financial Systems Serving the Microenterprises*. Helsink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991.
- Messerschmidt, Donald A. *Dhikuris: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Nepal*. The Hague: Mouton, 1978.
- Miyanaga, Kuniko. "Economic Kou (ROSCAs) in Japan: A Review." In A&B, 149-62.
- Nayar, C. P. Smananthan. *Chit Fina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t Funds*. Bombay: Vora, 1973.
- Nelson, Niki. "The Kiambu Group: A Successful Women's ROSCA in Mathare Valley, Nairobi (1971-1990)." In A&B, 49-70.
- Pairault, Thierry. "Approches Tontinières: Formes et Mécanismes Tontiniers" (Tontine Approaches: Typology and operation of tontines), pts 1-2. *Etudes Chinoises* 9, 1-2 (1990)
- Penny, D. H. "Farm Credit Polic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2, 1 (1968): 32-45.
- Robinson, Richard, ed. *Indonesia Assessment 1994: Finance as a Key Sector in Indonesia's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 Rowlands, Michael. "Looking at Financial Landscape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ROSCAs in Cameroon." In A&B, 111-24.
- Rozental, Alek A. "Unorganiz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y."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1, 4 (1967): 453-60.
- Sanderatne, Nimal. "Informal Finance in Sri Lanka." In A&F, 85-101.
- Schrieder, Gertrud, and Carlos E. Cuevas. "Informal Financial Groups in Cameroon." In A&F, 43-56.
- Seibel, Hans Dieter, and Michael T. Marx. *Dual Financial Markets in*

- Africa*. Saarbrücken: Verlag Breitenbach, 1987.
- Shea, Jia-Dong. "Taiwan: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Hugh T. Patrick and Young Chul Park, ed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hi, Jiliang. "Guanyu nongcun xinyongshe gaige he fazhan de jige wenti" (Issues relating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Nongcun jingji wengao* (Rural economic essay draft), 1996: 25-28.
- Shipton, Parker. "The Rope and the Box: Group Savings in Gambia." In A&F, 25-41.
- Siamwalla, A., et al. "The Thai Rural Credit System: Public Subsidies,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Segmented Market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4, 3 (1990): 271-95.
- Smith, H. "The State, Banking, and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Korea and Taiwan."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form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September 21-22, 1999.
- Summerfield, Hazel. "A Note on ROSCAs among Northern Somali Wom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A&B, 209-15.
- Udry, Christopher. "Credit Markets in Northern Nigeria: Credit as Insurance in a Rural Econom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4, 3 (1990): 251-70.
- UNDP and UNCD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United Nations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Microfinance in Rural Lao PDR: A National Profile*. Vientiane, Laos: UNDP/UNCDF, June 1997.
- Van der Harst, J. "Factors Affecting Housing Improvement in Low-Income Communities, Karachi, Pakistan." *Ekistics* 39, 235 (1974).
- Van Nieuwkoop, Marien. "Rural Informal Credi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Bank Pertanian Malaysia, December 1986. In Ghate et al. (1992).

- Vélez-Ibañez, Carlos G. *Bonds of Mutual Trust: The Cultural Systems of RCAs among Urban Mexicans and Chicano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Vinding, Michael.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pal Himalayas: The Case of the Thakalis of Mustang District." *Contributions to Nepalese Studies* 12, 1 (1984): 51-105.
- Vongpradhip, Duangmanee. "Urban Unorganized Money Markets in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to SEACEN Seminar, Yogyakarta, Indonesia, November 1985. In Ghate et al. (1992).
- Walker, Angela. "Guinea." In W&F, 127-37.
- Webster, Leila, and Peter Fidler, eds.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West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 Wu, David Y. H. "To Kill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of the Papua New Guinea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1 (1974): 565-584.
- Xu, Guangyue, and Li Tao, *Guai Tai* (Strange fetus). Zhejiang: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1988.
- Zhang, Zhenning, and Mao Chunhua. *Wenzhou jinrong xianxiang toushi* (Perspectives on the phenomenon of finance in Wenzhou).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1993.

索引

頁碼爲英文原書頁碼，頁碼後標示 t, f, n 爲該頁之表、圖或註。

-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ABOC) 中國農業銀行 29, 93, 99, 142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162
 loan application process 貸款程序 69-70
 loans to collective enterprises 貸款給集體企業 75, 100
 loan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貸款給私營企業主 163, 184
 and RCCs/RCFs 農村信用社／農村信用基金會 152-54
 reform of 改革 100, 207-8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ADB)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microfinance program of 小額信貸計畫 200
 policy loans 政策貸款 100, 207-8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扶貧貸款 100
 and RCCs 農村信用社 207
 separation from ABOC 207-8
- Agriculture 農業
 credit facilities (*see*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ural Cooperative Foundations) 信貸工具（見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基金會）
 decollectivization of 去集體化 13n, 16, 44, 114, 173, 186, 255
 See als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亦見農業部
- Anxi County 安溪 99-101
 banking in 銀行業務 100
 collective sector in 集體經濟 61, 99-100, 119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102f
 foreign investment in 外國投資 99
 and gender 性別 101

-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103t
- lack of informal finance in 缺少非正規金融 107
-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扶貧貸款 100-101
- private sector in 私營經濟 101-3f
- RCCs and RCFs in 農村信用社與農村信用基金會 100
-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性別分工 101
- Asian financial crisis 亞洲金融危機 21, 208, 242
- Bangladesh 孟加拉
- BRAC 農村發展委員會 235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221t
- See also* Grameen Bank 亦見格萊敏銀行
- Bank Raykyat Indonesia (BRI). *See* Indonesia Banking system. *See*
Financial system 印尼人民銀行。見印尼銀行體系。見金融體系
- Banque Nationale de Développement Agricole of Mali (BNDA) 馬利農
業國家發展銀行 242
- Blecher, Marc 9n, 12n, 250n, 252n
- Bolivia 玻利維亞
- BancoSol 235
- embezzl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in 侵占扶貧貸款 234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221t
-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 20n, 36n, 259n
- Brokering 中間人 39, 127, 155t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5, 37t
- See also* Moneylenders 亦見銀背
- Bureaucrats. *See* Cadres 官僚。見幹部
- Business associations. *See also* Individual Laborers' Association 商會
163。亦見個體勞動者協會
- Cadres 幹部
- interactions with private entrepreneurs 與私營企業主互動 126-29,
131-34, 154-56
- motivations of 動機 20
- rent-seeking behavior of 尋租行為 128-29

- Capital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ies (CMAs, *minyong qiye zijin huzhushe*)
 民營企業資金合作社 194-99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197-98, 211t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mission of 宗旨 211t
 and RCFs, differences between 與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差別 196-99
 regulation by ICMB 由工商管理局管制 194
- Central bank. *See* People's Bank of China 中央銀行。見中國人民銀行
- Chad, informal finance in 查德的非正規金融 223
- Changle City/County 長樂市／縣 73-80
 collective enterprises in 集體企業 74-75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output by sector 對經濟產出的部門貢獻 74t
 economic growth in 經濟成長 74-77
 and emigration 移民 76-79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foreign investment in 外國投資 74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61, 103t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77-79, 107t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國際機場 75-76
 karaoke dens in 卡拉OK包廂 78
 mountain villages in 山村 80, 104
 prostitution in 賣淫 78-79
 Sea Star Village in 海星村 74-75
 TVEs in 鄉鎮企業 74-75
- China Investment Bank 中國投資銀行 29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Se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中國社會科學院。見農業發展研究所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中國共產黨 50, 167n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與私營企業 44, 131n, 163
 and unintended effects of policy announcement 政策公布的非預期結果 139
See also Cadres 亦見幹部
- Collateral 抵押品

- reducing risk 降低風險 147
- requirements in commercial banks 商業銀行的必要條件 2, 107
- See also* Pawnshops 亦見當舖
- Collective action 集體行動 111-17
- agency and 行動者 113-15
- among former colleagues 在從前的同事中 176-77
- Collective enterprises 集體企業 34, 74
- as disguise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做為私營企業的偽裝 34, 65-66, 87, 104, 130-133, 144-47
- types of in Wenzhou 在溫州的種類 133
- See also* Red hat disguise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亦見紅帽子偽裝；鄉鎮企業
- Colombia, Caja Social 哥倫比亞 235
- Cooperative Bank of Taiwan (CBT) 合作金庫銀行 228
- Corruption. *See also* Rent-seeking 貪污 129, 212。亦見尋租
- Credible commitment 可信的承諾 19, 111-13
- Credit 信貸
- demand for (*see*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oice of financing strategies of) 需求 217-18 (見私營企業主對信貸策略的選擇)
- and gender 性別 104-17
- supply to private sector 對私營經濟的供給 2, 22, 28-35, 59, 65, 68-70
- See also* Financial system; Informal finance; State banks; Trade credit 亦見金融體系；非正規金融；國有銀行；行業信用
- Cultural explanations. *See also* Gender: and economic culture 文化解釋 54-55。亦見性別：與經濟文化
- Curb market. *See* Informal finance 場外市場。見非正規金融
- De Soto, Hernando 4
- Decollectivization. *See* Agriculture 去集體化。見農業
- Default 拖欠 207
- and gender 性別 235
- and informal lending 非正規借貸 58
- insurance against 保險 219
- and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 73, 77, 87, 88, 112,

117, 135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國有企業 204

and subsid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受補貼的扶貧貸款 232-34

See also Risk;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collapse of 亦見風險；信貸互助會的崩潰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17

pragmatism 實用主義 130-31n

Southern tour 南巡 44, 64, 66n, 254

Developmental state 發展型國家 8-11, 247-54

Du Xiaoshan 杜曉山 200, 202-3n

East Asian NICs, model of development. *See also* Developmental state; Japan; Korea; Taiwan 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式 248-51。
亦見發展型國家；日本；韓國；台灣

Economic explanations 經濟解釋

of dura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機構的持續性 126

expectations of 預期 52, 167

limitations of 限制 7, 10-11, 102-4

and property rights 產權 3-4

See als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ational choice 亦見新制度經濟學；理性選擇

Economic reform. *Se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of “8-7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 *See also*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Microfi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s 經濟改革。見金融體制改革：「八七扶貧計畫」 199-200。亦見扶貧社；小額金融；扶貧計畫

Emigration, illegal (*toudu*) 移民，非法（偷渡） 76-78, 79

Entrepreneurial state 企業家型國家 12

Evens, Peter 9n, 248n, 251-52n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十五大 17, 33, 133n, 172, 183

Finance companies 金融公司

in Pakistan 在巴基斯坦 230-31

private, in Henan 私人的，在河南 208-10

- speculative investments of 投機性的投資 230
- Financial system (formal) 金融體系 (正規)
 - crisis in 危機 30-31
 - gender and 性別 107-8, 112
 - reform of 改革 8, 14, 21-22, 29-33, 44, 121, 123, 208, 254
 - regional variations in 地區差異 50-52
 - savings in 存款 156-57
 - state role in 國家的角色 10
 - structure of 結構 31, 32f
 - See also* Credit; State banks 亦見信貸；國有銀行
- Floating population 流動人口
 - employment as prostitutes 從事賣淫的工作 78-79
 - itinerant vendors 流動攤販 174-75
 - and native place markets 當地市場 175-76
 - in Quanzhou 在泉州 83-84
 - and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Fuzhou 在福州的信貸互助會 72-73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ee specific locations* 外國直接投資。見特定地區
-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sistance (FINCA) 國際社區扶助基金會 235
- Fujian 福建 17, 49-52
 - economy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of 經濟與金融環境 61-66
 - FDI in 外國直接投資 63, 64t, 66, 74, 118
 - and gendered participation in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的性別參與差異 104-17
 -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of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的制度多樣性 102-3, 103t
 -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地方政府與私營經濟 16-17, 61
 - NBFIs in 非銀行金融機構 64-65
 - postal savings office in 郵政儲蓄 65
 -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in 區域發展差異 62-63
 -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信貸互助會 17, 61, 104-17
 - short-term bank credit in 短期銀行信貸 65t

- “small Third Front” in 「小三線」 119
-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經濟特區 50, 63
- state banks in 國有銀行 42
- TVEs in 鄉鎮企業 62
- See also* Anxi; Changle; Fuzhou; Huian; Jinjiang; Quanzhou; *specific locations* 亦見安溪；長樂；福州；惠安；晉江；泉州；特定地區
-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FPC, fupinshe) 扶貧社 200-203**
- deviations from Grameen Bank model 偏離格萊敏銀行模式 202
- economic eligibility criteria of 符合經濟上的要求 201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201-2, 211t
- mission of 宗旨 211t
-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營運指標 201t
- target clients of 目標客戶 201
- See also* Grameen Bank; Microfinance 亦見格萊敏銀行；小額信貸
- Fuzhou Municipality 福州市 66-73**
- availability of formal credit in 取得正規信貸的可能性 69
- economic growth of 經濟成長 66, 67f, 117
-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 ICMB markets in 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 67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70-73, 107t, 117
- local government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態度 61, 67, 73, 103t
- micro-entrepreneurs in 小企業主 67-73
-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外來企業主 72
- predatory state behavior in 掠奪性國家行為 68
-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台灣投資 66
- Gender 性別**
- and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取得正規信貸 53t, 107-8
- and agency 仲介 113-15
- and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97-98, 101, 109
- and economic culture 經濟文化 108-10
- and Grameen Bank 格萊敏銀行 235
- and migration 移民 77, 97

- patriarchal construction of 父權結構 111-16
- roles,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角色, 歷史的理解 106
- and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 27, 29, 61, 72, 97, 104-17
- and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109-10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9-10
- Grameen Bank 格萊敏銀行
 - compared to Indonesia's BRI 與印尼人民銀行比較 241-42
 - founding of 成立 235
 - gender focus of 性別重點 235
 - peer solidarity lending of 同儕借貸 235
 - replications in China 在中國的複製 112n, 200-203
- Guangdong 廣東 26, 50
- Guanxi. *See* Politic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關係。見政治網絡；社會網絡
- Hang-on enterprises (*quahu qiye*). *See* Red hat disguises 掛戶企業。見紅帽子偽裝
- Help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See*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扶貧社。見扶貧社
-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 16, 49, 50, 51
 - corruption in 貪污 212
 - economic structure of 經濟結構 168-72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金融機構 210-14
 - foreign investment 外國投資 169, 171
 - grey hat institutions in 灰帽子機構 188
 - and hui 會 54-55
 - impoverished counties in 貧困縣 185-86
 -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187-214
 -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地方政府與私營經濟 16, 166-67
 - Mao period 毛澤東時代 167
 - microfinance program in (FPCs) 小額信貸計畫(扶貧社) 199-203, 211t
 - pawnshops in 當舖 188-89

- peri-urban cooperative savings foundations in 郊區的互助會 211t
 poverty alleviation in 扶貧 172
 private-sector industry in 私營經濟產業 168-70
 private societi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 私人社團與互助會 192-99, 211t
 production in 生產 168f
 protest in 抗議 171n, 209-10
 RCCs in 農村信用社 207-8, 211t
 RCFs in 農村合作基金會 189-92, 211t
 red hat institutions in 紅帽子機構 188
 state banks in 國有銀行 42, 186-88
 and SOEs 國有企業 188
 strikes by state workers in 國有企業職工抗議 171
 and Three Star incident 三星事件 208-9
 UCCs in 城市信用社 187, 203-7, 211t
 Women's Federation UCC in 婦聯城市信用社 205-6
 See also Kaifeng; Luoyang; Zhengzhou 亦見開封；洛陽；鄭州
 Hong Kong 香港 7, 9, 167n
 investment in Fujian 在福建投資 63
 Hui. Se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會。見信貸互助會
 Huian County 惠安縣 94-99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61, 103t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96-98, 107t
 private sector in 私營經濟 94-96, 95-96f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性別分工 97-98
 and Taiwan 台灣 94
 TVEs in 鄉鎮企業 94
 women 婦女 97-99
 India 印度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221t
 Pigmy Deposit in 小精靈存款 239
 regulation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rala 喀拉拉的非正規金融管制

227-30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信貸互助會 229, 238-40

Syndicate Bank 辛迪加銀行 238-40

Individual Laborers' Association (ILA, geti laodongzhe xiehui) 個體勞動者協會 43, 81, 163, 173

Indonesia 印尼

Bank Dagang Bali 巴厘商業銀行 235

BIMAS program 集中指導計畫 240-41, 243

BRI 印尼人民銀行 235, 238, 240-43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221t

unit desas in 農村銀行體系 240-41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ICB) 中國工商銀行 29, 70, 73, 164, 184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Bureau (ICMB) 工商行政管理局 29, 43, 45, 81, 142, 173

CMAs 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 194

establishment of official markets 公營市場的建立 67-68

fees collected by 收稅 68, 174-75, 177, 184

perception by private entrepreneurs 私營企業主的理解 ix-x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money house 對私人錢莊的保護 142, 144

rent-seeking behavior of 尋租行為 158, 175, 184-85

Inflation 通貨膨脹 2, 26n, 29, 129, 150, 203, 242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agency and 行動者 18, 165

attitude of local officials toward 地方官員的態度 73, 87

competition with formal finance 與正規金融競爭 123, 156

crises of (*See also*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collapse of) 危機 2, 226-28, 231 (亦見信貸互助會的崩潰)

definition of 定義 36

disguises (*see* Capital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ies; Henan: grey hat institutions in; Private societies; Red hat disguises) 偽裝 144-47 (亦見民營企業資金互助會；河南的灰帽子機構；私人社團；紅帽子偽裝)

distinction from microfinance 與小額信貸的差異 219-20

- institutional durability over time 長時間下組織的持續性
-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 37-38, 39t
- legal status 合法地位 3, 35-36, 37t, 58, 121
- local initiative and 地方的積極主動 259
- local variation in 地方的差異性 5-6, 10, 25, 48-59
- long-term diversity of 長時間的差異 261-63
- macro-effects of 宏觀影響 220-22
- Mao era 毛澤東時代 54
- market segmentation of 市場區隔 52, 104, 218-19, 263
- path to local variation in 地方差異性的軌跡 256f
- political production of 政治成果 6-11
-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政治上的重要性 244-45
- potential developmental contribution of 可能的發展貢獻 23, 220, 222-25
- in pre-1949 China 1949年以前的中國 25-27
- property rights and 產權 258
- regulation of 管制 1-2, 21-22, 121, 126, 154-61, 220, 226-31
-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durability and visibility of 機構的可見性與持續性之間的關係 161f
- risk and 風險 88, 97, 147, 263-64
- scale in China 在中國的規模 2, 36-37
- sca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發展中國家的規模 220-22
- self-governing nature of 自治的性質 220, 260-61
- social pressure and 社會壓力 6, 58
- as threat to state 對國家的威脅 x, 2
- typology of 類型 39
- universality of 普遍性 7
- Informal institutions 非正式組織
 -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與正式組織 6, 20, 232-45, 261-63
 - local nature of (*See also* State-society dichotomy) 地方性質 5-6, 10, 20, 25, 48-59, 259 (亦見國家與社會二分狀態)
 - potential macro-level outcomes of 宏觀層次的可能結果 6
 - role in creating credible commitment 創造承諾可信的地位 19
 - as self-enforcing innovations 自我實施的創新 4-5, 260-61
 - as unarticulated rules of the game 並未清晰表達的遊戲規則 20

- See also* Informal finance; Reciprocity; Social networks; Trust 亦見
非正規金融；互惠；社會網絡；信任
- Insurance companies 保險公司 65
- Interest rates 利率
ceilings on 上限 29, 35
charged by the hour in private money houses 在私人錢莊中依小時
來計價 16, 142-43
floating, by RCCs in Wenzhou 浮動，在溫州的農村信用社 152
impact of official rates on curb 官方利率對場外市場影響 58n
in interpersonal loans 民間借貸 56-58, 70-71
of loan sharks 高利貸 98
spread between official and curb 在官方與場外市場之間 135,
143t, 149
in state banks 在國有銀行中 71
subsidiz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受補貼的扶貧貸款 202,
232-38
underground 地下 71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國際貨幣基金 224, 241
-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mpany (ITIC) 國際信託投資公
司 32f
- Interpersonal lending (minjing jiedai). *See also* Informal finance 民間
借貸 37t, 39, 56-58, 96。亦見非正規金融
- Israel, debt crisis in 以色列，債務危機 222
- Japan 日本
industrial policy in 產業政策 34
state as financial entrepreneur 國家做為金融企業主 10
- Jiang Zemin 江澤民 44, 64n, 249
- Jinjiang County/City 晉江縣／市 47, 89-94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91f
foreign investment in 外國投資 91-92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61, 94, 103t
industry in 工業 92-93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107

- model of development 發展模式 92
- overseas Chinese and 華僑 92
- private enterprises in 私營企業 90-94, 90f, 91f
- SOEs in 國有企業 93
-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台灣投資 90
- Johnson, Chalmers 9n, 251n
- Joint venture banks 合資銀行 50, 65
- Judd, Ellen 110, 113, 114n

- Kaifeng City 開封市 177-81
 -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 history of 歷史 177-78
 - industry in 工業 178
 - KTV clubs in KTV俱樂部 180-81
 - Mao era and 毛澤東時代 178
 - Muslims and 穆斯林 178
 - private sector growth in 私營經濟的成長 179-80
- Karaoke TV 卡拉OK 78-79, 180-81
- Kenya Rural Enterprise Program (K-REP) 肯亞農村企業計畫 235
- Kinship ties 親屬關係
 -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慈善捐款 118
 - and economic investment 經濟投資 94
 - and native place 家鄉 92
 - and norms in charging interest 收取利息的規範 70-71
 - and pressure in informal lending 非正規借貸的壓力 58
 - and single-surname villages 單姓村 92, 119n, 256
 - and women 婦女 113-14
 - See also* Overseas Chinese 亦見華僑
- Korea 韓國 114n
 - developmental strategy 發展策略 251-52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36, 221, 224-25

- Lardy, Nicholas 拉迪 19n, 31-33n
- Loan sharks. *See* Moneylenders 高利貸。見銀背
- Local governments 地方政府

- as developmental 發展的 250-51
- as independent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獨立於中央政府 12
- orientation toward private sector 對私營企業的態度 14-18, 38-44, 48-52, 118-19, 247, 250
- path dependency of 路徑依賴 254-57
- predatory behavior of 掠奪行爲 252
- segmentation of 區隔 218
- See also* specific locations 亦見特定地區
- Local logics of economic possibility 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 14-18, 247, 264
- Luoyang City 洛陽市 47, 181-85
 -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 and former state workers as entrepreneurs 前國有企業員工的企業主 183-84
 - history of 歷史 181-82
 - ICMB rent-seeking in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尋租 185-86
 - industry in 工業 181-82
 - private-sector growth in 私營經濟的成長 182-83
- Lyons, Thomas P. 4n, 60-62n, 118n, 134n
- Mao era (1949-1976) 毛澤東時代 (1949年至1976年)
 - banking during 在此階段的銀行業 6, 27-28
 - economic structure legacies of 經濟結構遺產 15-17, 49-50, 62, 123, 167, 250, 254-55
 - informal finance during 在此階段的非正規金融業 27-28, 54
- Macro-entrepreneurs (*getihu*) 個體戶 45, 55n, 66
 - in Anxi 在安溪 101
 - in Changle 在長樂 75
 - in Fuzhou 在福州 67-73
 - growth in numbers of 成長數量 170, 173, 182-83
 - in Huian 在惠安 96-98
 - in Jinjing 在晉江 92
 - in Kaifeng 在開封 178-81
 - in Luoyang 在洛陽 182-83
 - migrant 移民 174-75

- obstacles to obtaining formal loan 獲取正規信貸的障礙 59, 68-73, 163
- PRC definition of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義 40
- in Quanzhou 在泉州 81, 87
- taxes and fees imposed upon 所收取的稅費 67-68, 174-75, 184
- in Wenzhou 在溫州 123-24, 163-64
- in Zhenzhou 在鄭州 173-77
- See also* Floating population; Private entrepreneurs 亦見流動人口；私營企業主
- Microfinance 小額信貸 69, 232-38
- corruption and 貪污 237-38, 239n
- distinction from informal finance 與非正規金融的差異 219-20
- government sponsored programs 由政府所主辦的計畫 22, 185-86, 199-203
- See also*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Grameen Bank;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亦見扶貧社；格萊敏銀行；扶貧貸款
- Middlemen. *See* Moneylenders 銀背。見銀背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農業部 152
- protection of RCFs 對農村信貸基金會的保護 189-92
-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民政部
- and microfinance 與小額信貸 200, 237
- and RCFs 與農村信貸基金會 191-92
- regulation of private societies 對私人社團的管制 193
- Ministry of Finance 財政部 14, 24, 228, 240
- Minsheng Bank 中國民生銀行 30t, 32f
- Money houses. *See* Private money houses 錢莊。見私人錢莊
- Moneylenders 銀背 7, 39, 155t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71, 98
- kidnapping and 綁架 16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 in Quanzhou 在泉州 87
- Mountain villages, depopulation of 山村人口流失 80
- Naughton, Barry 8n, 49n, 261n
- Nee, Victor 4n, 8n, 131n, 133-34n

- Neo-authoritarianism. *See also* Developmental state 新權威主義
249。亦見發展型國家
-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ies. *See* Economic explanations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見經濟解釋
-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經濟學 3-4, 247, 257-61
-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NIC). *See* East Asian NICs 新興工業化國家。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
-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BFIs). *See also*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Urban credit cooperatives 非銀行金融機構 29, 154-61, 213。亦見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See also* Soci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114n, 200, 202n, 236n, 237。亦見社會團體
- North, Douglass 道格拉斯·諾斯 3, 258
- Oi, Jean C. 戴慕珍 4n, 12n, 17n, 92n, 129n, 133n, 217-18n, 250n, 253n, 258n
- Open Door Policy 開放政策 63
- Ostrom, Elinor 243, 260n
-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華僑，匯款 76-77, 118, 276
and Anxi 與安溪 99
and Fujian 與福建 62, 85
and Jinjiang 與晉江 92
- Pakistan 巴基斯坦 230-31
- Parris, Kristen 12n, 44n, 131-32n
- Partnership households 合夥戶 133
- Path dependence. *See also* Mao era: economic structural legacies of 路徑依賴 15-18, 254-57。亦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結構遺產
- Pawnshops (dangpu, diandang) 當舖、典當 39
clientele of 顧客 147
cyclical performance of 週期性循環發展 147-51
financing of 融資 149, 150f
in Fujian 在福建 65
in Henan 在惠安 188-89
history of 歷史 25, 148n

- interest rates 利率 149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 as a red hat enterprise 做爲紅帽子企業 147
- regulation of 管制 149-50, 155t
- in Wenzhou 在溫州 16, 147-51
-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中國人民銀行 14, 29, 31, 130
 - attitude toward RCFs 對農村信用基金會的態度 100
 - and CMAs 與民間信貸互助會 195-96
 - efforts at banning informal finance 打擊非正規金融的努力 x, 121, 143-45
 - interest rates on savings in 存款利率 58
 - and private societies 與私人社團 193
 -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金融體系改革 34
 - regulation of informal finance 管制非正規金融 149-50, 213-14
 - and UCCs 與城市信用社 203
- People's 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 29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人民解放軍 12, 178, 181-82
- Peri-urban cooperative savings foundations (jiaoqu hezuo chu jijinhui) 郊區合作儲蓄基金會 39, 211t
- Philippines 菲律賓
 - economic crisis in 經濟危機 222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221t
- Polanyi, Karl 卡爾·博蘭尼 7-8, 109n
- Policy loans. *See als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State banks 政策貸款 8, 22, 34, 100, 207-8, 248。亦見農業發展銀行；國有銀行
- Political networks 政治網絡
 - and entrepreneurship 與企業主 146-47, 270-73
 -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alization 與金融制度化 19, 53t, 117, 126, 161-65, 163f, 216, 219
- Ponzi schemes. *See* Ponzi Pyramidal investment schemes 騙術。見金字塔式的投資騙局
- Poverty Alleviation Bureau 扶貧社 202-3, 237
-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扶貧貸款
 - in Bolivia 在波利維亞 234

- effects of subsidized interest rates on 受補貼利率的效果 202, 232-38
- embezzlement of 侵占 22, 237-38
- outreach to poor 擴展到窮人 100, 220, 233
- in Thailand 在泰國 233
- See also*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Microfi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Bureau 亦見扶貧社；小額信貸；扶貧社
- Private banks. *See* Minsheng Bank; Private money houses 私人銀行。
見中國民生銀行；私人錢莊
- Private entrepreneurs 私營企業主
 - age distribution of 年齡分布 268t
 - agency of 行動者 18, 165, 261
 - bribing by 賄賂 204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s 中國共產黨員 44, 131n, 163, 203
 - choice of financing strategies of 金融策略的選擇 6, 18-20, 52-56, 73, 104, 161-65, 216
 - and contribution to local public goods 對地方公共財的貢獻 93, 122n
 - education level of 教育程度 269t
 - experience in business of 經商經歷 270t
 -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金融創新 123-27, 140-52
 - with full-time state employment 全職國有企業員工 180-81
 - gender of 性別 273t
 - identities of 認同 19, 61, 218, 263
 - income level of 收入水準 269t
 - interaction with cadres 與幹部互動 126-29, 131-34, 154
 - interpersonal lending among 民間借貸 56-58
 - as laid-off state workers 下崗國有企業員工 97, 183-84
 - motivations of 動機 20, 213
 - official lending to 官方借貸 2, 28, 30t, 33-35, 65, 123, 158
 -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政治背景 271t
 - political ties of (*see* Political networks) 政治聯帶 270-73 (見政治網絡)
 - residential origin of 原居住地 273t

- stigma against 污名 34
- strategies for accessing bank capital 取得銀行資本的策略 65-66
- tax rates of 稅率 271t
- Private money houses (qianzhuang) 私人錢莊 39
 - banning of 禁止 144
 - disguised as UCCs 偽裝成城市信用社 144-47, 158
 - history of 歷史 25, 141n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142-43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5, 37t, 141-47
 - organizational progression of 組織的發展 146f
 - regulation of 管制 155t, 158
 -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傳統定義 141n
 - underground (dixia qianzhuang) 地下(地下錢莊) 39, 146t
 - in Wenzhou 在溫州 140-47
-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私人產權 3-5, 247, 257-61
- Private sector. *See* Private entrepreneurs 私營經濟。見私營企業主
- Private societies 私人社團 193-94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211t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 microfinance programs (FPCs) as 小額信貸計畫(扶貧社) 200
 - mission of 宗旨 211t
 - and PBOC 與中國人民銀行 193
- Privatization. *Se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私有化。見國有企業；鄉鎮企業
- Prostitution. *See also* Karaoke TV 賣淫 78-79, 180。亦見卡拉OK
- Protest 抗議 1-2, 21
 - in Henan 在河南 1, 50n, 171n, 209-10
- Pyramidal investment schemes 金字塔型的投資騙局 16, 37t, 134-40, 155t, 210, 226n
 - varieties of 變化 137-38t
- Quanzhou Municipality 泉州市 81-89
 - collapse of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信貸互助會的崩潰 87-89
 - economic growth of 經濟成長 81-83, 117
 -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82f

- and foreign investment 外國投資 82, 85-86
-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sector 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61, 81, 84, 103t
- history of 歷史 81
- ICMB in 工商行政管理局 81, 87n
- and ILA 個體勞動者協會 81
- industry in 工業 83-85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86-89, 107t
- and migration 移民 83-84
- model of development 發展模式 255
- number of registered businesses in 企業註冊的數量 82f
- private sector conditions in 私營經濟的環境 83f
- TVEs in 鄉鎮企業 81

- Rational choice 理性選擇
 - expectations of 預期 19, 112
 - games involv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cadres 私營企業主與幹部之間的賽局 131-34
- Reciprocity 互惠 109, 117, 136, 260
 - among villagers 在村民之間 110-11
 - See also Trust 亦見信任
- Red hat disguises (*dai hongmaozi*) 戴紅帽子 39, 94, 130-34
 - versus gray hat disguises 灰帽子偽裝 188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 pawnshops as 當舖 147
 - regulation of 管制 155t
 - stability of 穩定性 162
 - urban/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s 城市／農村信用社 144-47, 159
 - See also Collective enterprise 亦見集體企業
- Regulation of informal finance 對非正規金融的管制 1-2, 21-22, 121, 126, 154-61, 220, 226-31
 - avoidance of 逃避 228-30
 - in India 在印度 227-28, 229-30
 - in Pakistan 在巴基斯坦 230-31
 - panic resulting from 產生恐慌 227-28

- “regulatory denial” 「拒絕管制」 230-31
 in Taiwan 在台灣 228
- Repayment 償還**
 and informal loans 非正規借貸 58-59
 noneconomic guarantees of 非經濟保證 6
 rates in microfinance 在小額信貸中的比率 201t, 240, 242
See also Default; Risk 亦見拖欠；風險
- Rent-seeking. *See also* Corruption 尋租** 13, 128-29, 134, 155, 158, 184-85。亦見貪污
- 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方法論** 267-78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依變項 267
 and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 bias of data 資料的可能偏差與限制 278
- Research sites 研究地點**
 methodology of fieldwork in 田野研究的方法論 44-47
 organized by economic and statist explanatory variables 依經濟與國家論的解釋變項而組織 43t
 organized by regions and levels of development 依區域與發展程度而組織 40t
- Risk 風險**
 in entering private sector 進入私營經濟的 4, 213, 263-64
 of false registration 不實登記 66
 and gender 性別 112, 116, 235
 higher in loan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對借貸給私營企業主有更高的信貸風險 35, 233
 in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88, 97, 147 166, 219-20, 263-64
 in RCFs 農村信貸基金會 191-92
 role of state in reducing (*See also*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國家在降低風險中的角色 9-10, 227, 258 (亦見私人產權)
-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
 activities financed by 受資助的活動 28-29, 72-73, 77
 and agency 行動者 114-15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 291-95
 cash flow for organizers of 會頭的現金流動 136t
 collapse of, in Quanzhou 崩潰，在泉州 87-89, 117

- collapse of, in Wenzhou 崩潰，在溫州 134-40, 226
- contractual terms of 契約條款 72
-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可信的承諾 111-13
- forms of 形式 25-26, 39, 71-72
- in Fujian 在福建 17, 71-73, 87-89, 96, 101
- and gender 性別 27, 29, 61, 72, 97, 104-17
- in Henan 在河南 54-55
- history of in China 在中國的歷史 25-27, 54-55, 105n
- and interest rates 利率 26n, 71, 135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5, 37t
- as pyramidal investment schemes in Wenzhou 在溫州金字塔型的投資騙局 134-40
- and reciprocity 互惠 109-11, 117
-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pularity of 區域普及上的差異 54-55
- regulation of 管制 155t, 160
- scale of 規模 134-35
- social cost of 社會成本 115-17
- and trust 與信任 109-11, 117
-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 (ROSCA). *Se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見信貸互助會
-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CCs) 農村信用社
 - efforts to close private money houses 關閉私人錢莊的努力 144
 - in Fujian 在福建 64, 94, 96, 100
 - in Henan 在河南 207-8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152, 162, 179, 211t
 - mission of 宗旨 211t
 - reform of 改革 154
 - savings in, in Wenzhou 儲蓄，在溫州 156f
 - scale of 規模 244
 - in Wenzhou 在溫州 144, 152-61
- Rural cooperative foundations (RCFs, nongcun hezuo jijinhui) 農村合作基金會 39, 51
 - closure of 關閉 100, 112, 153-54, 190, 244, 254
 - and CMAs, differences between 與民營企業資金合作社的差異 196-99

- competition with banks 與銀行競爭 190
- establishment of 成立 112n, 189
- evasion of PBOC regulations 逃避中國人民銀行的管制 153
- in Fujian 在福建 94, 96, 100
- in Henan 在河南 189-92
- interest rates in 利率 192, 211t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153, 189
- lending volume of 借貸額 153n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otection of 農業部的保護 189-92
- mission of 宗旨 211t
- regulation of 管制 155t, 191-92
- scale of 規模 153, 189, 244
- in Wenzhou 在溫州 152-61
-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農村發展研究所 200-201, 211t
- Savings 儲蓄
 - in banks 在銀行 129-30, 156f
 - in RCCs 在農村信用社 156f
 - in RCFs 在農村合作基金會 153-54
 - regional difference in form of 形式的區域差異 55
 - See also* Interest rates 亦見利率
-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enterprise (gufen hezuo qiye) 股份合作企業
 - 39, 160, 217-218
 - legality of 合法性 37t, 133
 - regulation of 管制 155t
- Shue, Vivienne 6n, 8n, 9n, 12n, 250n
- Smuggling, human 偷渡人口 76-78, 79
- "Snake heads". *See also* Smuggling, human 蛇頭 77-78。亦見偷渡人口
- Social capital. *See* Social networks 社會資本。見社會網絡
-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 and briefcase merchants (pibao shang) 皮包商 136
 - and financing strategies 融資策略 6, 19, 164, 218-19
 - and formal finance 正規金融 69
 - and gender 性別 110

- and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6, 19, 88, 128, 136, 259-61
- and microfinance 小額信貸 243
- among state workers 國有企業員工之中的 54-55
- among villagers 在村民之中的 55, 110-12
- See also* Reciprocity; Trust 亦見互惠；信任
- Social organization (*shehui tuaiti*). *See* Capital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ies; Funding the Poor Cooperative; Private societies 社會團體。見民間企業資金合作社的差異；扶貧社；私人社團
- Society 社會
 - definition of 定義 9, 12
 - state autonomy from 相對於國家自主性 9-10
 - See also* State-society dichotomy 亦見國家與社會的二分狀態
- Solinger, Dorothy J. 蘇黛瑞 129n, 271-72n
-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 經濟特區 50, 60, 63, 248
- Stark, David 8n, 32n, 254-55n
- State bank 國有銀行
 - corruption scandals 貪污醜聞 212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29, 71, 143t, 157-58
 - lending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 貸款給國有企業 29, 33-35, 59
 - loan practices of 貸款活動 31-35, 123, 164, 186-87
 - loan-to-deposit ratios 存貸比 42t, 51
 - lobbying by local branches 地方分行的遊說 157-58
 - microfinance and 小額信貸 238-45
 - nonperforming loans of 逾期放款 219
 - reform of (*See also*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of) 改革 31, 34, 100 (亦見金融體系：改革)
 - regulation of informal finance 對非正規金融的管制 126, 157-58
 - rent-seeking behavior of 尋租行為 158
 - saving in 儲蓄 16, 58, 156-57
- State capacity 國家能力 43t
 - in financial terms 金融術語 5, 11, 41-42
 - limits of 限制 11, 20-23
- State workers 國有企業員工
 - early retirement of 提前退休 97, 177
 - laid-off 下崗 97, 176, 183-84

- 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做為私營企業主 89, 180-81
- voluntary leave of absence of 自願性的離退 183-84
-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國有企業 40-41
 - conversion into private market space 轉變成私營市場空間 130-34
 - financing of during Mao period 在毛澤東時代的融資 28
 - in Fujian 在福建 74, 96
 - "hang-on household enterprises" and 「掛戶企業」 130-34
 - privatization of 私有化 12, 33
 - reform of 改革 119
 - as a restraint on local government 對地方政府的限制 255
 - share of bank loans 銀行貸款的份額 28, 33
 - state bank "policy lending" to 國有銀行的「政策貸款」 8, 14, 29, 31, 34, 100, 249
- State-society dichotomy 國家與社會的二分狀態
 - disaggregation of 分析 11-14
 - value in transcending 超越的價值 19-20
- Sunam model of development 蘇南發展模式 49, 119, 217, 252
- Syndicate Bank. *See* India 辛迪加銀行。見印度
- Taiwan 台灣 7, 9, 15, 167, 276
 - Cooperative Bank of 合作金庫銀行 228
 - curb market rates 場外市場的比例 224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36, 221t, 223-24, 228
 - investment in Fujian 在福建投資 60, 63, 82, 85, 94, 99, 118
 - popularity of post-dated check in 遠期支票的普遍性 223
 -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 88-89n, 223, 226
 - Tench Credi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第十信用合作社 228
- Thailand 泰國
 - BAAC 泰國農業合作銀行 242
 -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36, 221t
 -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in 扶貧貸款 233
- Third Front development strategy 三線發展戰略 49, 199
 - "small third front" in Fujian 在福建的「小三線」 119
- Tiananmen Square crisis 天安門事件 17, 44, 129-30, 144, 150, 158
-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鄉鎮企業 49

- conversion into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轉型為股份合作企業
29, 217
- decline in growth of 成長衰退 217-18
- financing of 融資 217-218
- in Fujian 在福建 62, 74-75, 81, 96, 99
- local government attitude toward 地方政府的態度 12, 99-100
- privatization of 私有化 17, 217-18
- Sunan model 蘇南模式 49, 119, 217, 252
- See also* Collective enterprise; Red hat disguises 亦見集體企業；紅
帽子偽裝
- Trade credit (*hangye xinyong*) 行業信用 37t, 39, 125, 155t, 164
- Transaction costs 交易成本 3-4, 69, 161-65, 239, 258-59
- Trust 信任
 - decline of 衰退 97
 - and informal finance 非正規金融 6, 260
 - and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信貸互助會 88, 111, 117
 - and social network 社會網絡 109-11
- Unemployment. *See also* State workers: laid-off 失業 33, 123, 171。
亦見國有企業員工下崗
- United Societ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工商聯合社 198-99
- Urban Cooperative Bank (United City Bank) 城市合作銀行 29, 145-
46, 209-10
- Urban credit cooperative (UCCs) 城市信用社
 - and bribing 賄賂 203-4
 - as disguise for private money houses 做為私人錢莊的偽裝 144-47
 - in Fujian 在福建 64
 - in Henan 在河南 203-7
 - interest rates of 利率 204, 211t
 - lending to private enterprise in Henan 貸款給河南的私營企業 187
 - lending to SOEs in Henan 貸款給河南的國有企業 204
 - mission of 宗旨 211t
 - reform of 改革 29, 145-46, 208-10
 - regulation of 管制 206
 - relationship to, PBOC 與中國人民銀行的關係 203-4

- in Wenzhou 在溫州 130, 144-47
- Women's Federation establishment of 婦聯的成立 205-6
- in Zhengzhou 在鄭州 207t
- Zhengzhou United Society of UCCs 鄭州城市信用社聯社 206-7
- Walder, Andrew G. 魏昂德 4n, 92n, 133n, 253n, 258n, 272n
- Wank, David 131n, 132n, 272n
- Wen Jiabao 溫家寶 31
- Wenzhou 溫州
- average capitalization of businesses in 平均的企業資本額 125f
 -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 government support for private sector in 政府支持私營經濟 120, 125
 - and "hang-on household enterprise" 與「掛戶企業」 130-34
 - informal finance in 非正規金融 16, 123-25, 127-54
 -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地方政府與私營經濟 16, 160-61
 - migrant in 移民 130
 - model of development 發展模式 16, 49, 92, 127-30, 250, 252, 255
 - pawnshops in 當舖 147-51
 -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私營企業主 123-27, 124f, 161-65
 - private money houses in 私人錢莊 140-47, 158, 230
 - pyramidal investment schemes in 金字塔型的投資騙局 134-40
 - RCCs in 農村信用社 152-54
 - RCFs in 農村信用基金會 152-54, 159
 - red hat enterprise in 紅帽子企業 130-34, 133f
 - regulation of NBFIs in 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制 154-61
 - and SOEs 國有企業 124n
 - state banks in 國有銀行 157-59
 - stock exchange in 股票交易 160
 - UCCs in 城市信用社 144-47
 - underdevelopment of 未開發 122-23
 - See also* Zhejiang 亦見浙江
- Whiting, Susan 15n, 17n, 133n, 162n, 217-18n, 252n, 254n
- Women's Federation 婦聯 112, 114
- broker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oans 安排扶貧貸款 100-101, 237

operation of women's credit cooperative 婦女信用社的運作 205-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8n

Xiamen International Bank 廈門國際銀行 50

Yanshi City 偃師市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Zhejiang 浙江 49, 50, 51

state banks in 國有銀行 42

See also Wenzhou 亦見溫州

Zhengzhou City 鄭州市 172-77

collective action on 集體行動 176-77

employment in 就業 41t

floating street peddlers in 流動攤販 174-75

history of 歷史 172

ICMB market in 工商行政管理局 173-75

private enterprise in 私營企業 173-77

protest in 抗議 1

regulation of informal finance in 對非正規金融的管制 227

Yiwu market 義烏市場 175-76

Zhengzhou United Society of UCCs 鄭州城市信用社聯社 206

Zhao Ziyang 趙紫陽 63-64